

國立台灣大學社會科學院政治學系

碩士論文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College of Social Scienc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Master Thesis

瑞典之歐洲化研究：

以就業與外交政策為例

Europeanization of Sweden Employment and Foreign Policy



陳雪琳

Hsueh-Ling Chen

指導教授：張亞中 博士

Advisor: Ya-Chung Chang, Ph.D.

中華民國 99 年 7 月

July, 2010

口試委員會審定書

國立臺灣大學碩士學位論文  
口試委員會審定書

瑞典之歐洲化研究：  
以就業與外交政策為例

**The Europeanization Studies of Swedish Emploment and  
Foreigh Polici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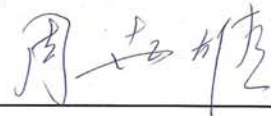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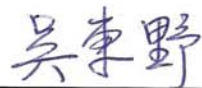
本論文係陳雪琳君（學號：R96322031）在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完成之碩士學位論文，於民國 99 年 6 月 4 日承下列考試委員審查通過及口試及格，特此證明

口試委員：



（簽名）

（指導教授）



## 謝辭

經過了這段日子的努力，很高興我的論文能夠有順利完成的一天。在這段期間，我身旁的許多人給了我許多幫助。首先要感謝我的指導教授張亞中老師，他總是能夠了解我在寫作過程中的困難，並親切地給予指導。吳東野教授與周世雄教授給了我相當多的鼓勵，讓我有足夠的信心寫作。我也要感謝國發所的施世駿教授，給了我寫作上的指導與方向。另外，我的父母也是我最大的支持者與後盾，謝謝你們給我最大的包容，讓我能夠專心地寫作。

研究所的朋友們也給了我許多支持與鼓勵。婉萍是我這一年的革命夥伴，還有綺齡與珍伶，那些相聚的夜晚讓我更有勇氣往前。研究室 102、108 和 103 的各位與學弟妹們，大家開朗的笑容是那段日子裡的美好景色之一。此外道昀、勁豪與劉昊是我的寫作生活指導，隨時給偶爾迷惘的我一點鼓勵。還有我最好的朋友元貞，希望接下來換我當即將遠行的你的支持者。最後，要謝謝我這段生命中最重要朋友威霖，因為有你的鼓勵，我才能夠完成這一階段的挑戰。

## 中文摘要

本文整理並介紹歐洲化研究(Europeanization Study)近年來的理論發展方向，歸納出整體的理論分析架構；接著就個案研究之對象即瑞典，針對瑞典的外交政策方針與福利政策變遷為對象，做廣泛而清楚之分析與研究。希望藉著研究瑞典政策與歐盟政策發展的互動過程，能夠瞭解瑞典政策歐洲化的過程與發展。

本文可分為兩個部分。第一部分先將目前歐洲化研究與理論發展的情況作一整理，以建立一有意義的分析框架。第二部分則是透過分析瑞典在加入歐洲聯盟之後的外交與社會福利政策變遷，描述瑞典歐洲化之過程並研析歐盟政策典範對於瑞典之影響力。

關鍵詞：歐洲聯盟、歐洲化研究、瑞典、歐盟安全暨防衛政策、歐盟就業策略



## Abstract

In this essay, the author organizes the recent theoretical development of Europeanization Study, and inducts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it. Consequently, to portray the interactive policy-making process between a single member country and European Union, the essay will analyze the change of Swedish foreign policies and social welfare policies that demonstrates the Europeanization of Swedish policy.

The essay is composed of two parts. The first part will organize the recently developed Europeanization Study and then illustrate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In the second part, through analyzing the changes of EU joined Sweden's foreign and social welfare policies, the essay will demonstrate the progress of Europeanization of Sweden, and evaluate the effect of "the EU policy paradigm" on Swedish policy.

**Keywords:** European Union (EU), Europeanization, Sweden, European Security and Defence Policy (ESDP), European Employment Strategy (EES).

# 目錄

口試委員會審定書.....	i
謝辭.....	ii
中文摘要.....	iii
Abstract.....	iv
第一章 緒論.....	1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問題意識.....	1
一、研究動機與目的.....	1
二、問題意識與研究問題.....	2
三、分析架構與研究方法.....	4
第二節 文獻回顧.....	7
一、國內針對歐洲化研究之現況.....	7
二、歐洲化研究之定義與範圍.....	9
三、瑞典各領域在歐洲聯盟內部發展.....	16
第三節 研究架構.....	20
第二章 歐洲化研究的內涵.....	22
第一節 歐洲化之定義與形成.....	22
一、歐洲化研究的觀點.....	22
二、歐洲化與歐洲統合.....	28
三、歐洲化的範圍與界線.....	30
第二節 歐洲化的內容與意涵.....	33
一、三步驟的歐洲化.....	33
二、歐洲化的機制與不適應的概念.....	34
三、適應壓力的概念.....	36
四、影響國家適應行為的中介因素.....	39
五、成員國家的回應與策略.....	40
第三節 歐洲化與歐洲認同.....	44

一、新制度主義的影響.....	44
二、歐洲認同的形成.....	47
第四節 小結.....	52
第三章 瑞典福利政策及外交政策.....	53
第一節 瑞典社會福利模式.....	53
一、瑞典社會福利模式起源與特色.....	53
二、瑞典社會福利模式.....	55
三、瑞典福利國家改革.....	60
四、瑞典模式的基礎價值.....	61
第二節 瑞典中立政策傳統與不結盟政策.....	65
一、瑞典中立政策傳統.....	65
二、瑞典的國際主義思惟.....	68
三、北歐認同.....	78
第三節 小結.....	81
第四章 瑞典就業政策之歐洲化.....	83
第一節 歐盟就業策略與開放協調法.....	83
一、歐盟就業策略.....	83
二、開放協調法.....	93
第二節 下載：歐洲就業策略對瑞典的影響.....	96
一、瑞典積極性勞動市場政策.....	96
二、歐洲化過程之影響.....	101
第三節 上傳：瑞典對歐盟就業策略的影響.....	107
一、阿姆斯特丹條約政府間會議.....	109
二、倡導聯盟的誕生.....	110
三、英國、德國與法國的回應.....	115
第四節 小結.....	117

第五章 瑞典外交政策之歐洲化.....	119
第一節 歐盟安全暨防衛策略與瑞典中立政策.....	120
一、歐盟安全暨防衛策略.....	120
二、1990 年代瑞典中立政策的發展.....	126
第二節 下載：歐洲安全暨防衛政策對於瑞典的影響.....	130
一、歐盟安全暨防衛政策影響瑞典的途徑.....	130
二、瑞典軍力規模與目標變遷.....	134
三、菁英社會化的過程.....	141
第三節 上傳：瑞典對歐盟安全暨防衛政策的影響.....	145
一、衝突預防的推動.....	145
二、歐盟安全暨防衛政策的非軍事層面發展.....	153
第四節 小結.....	156
第六章 結論.....	157
第一節 研究回顧.....	157
第二節 研究展望.....	161
參考文獻.....	162



## 表目錄

表 2-1：歐洲化影響的範圍.....	32
表 2-2：加入時間長短與適應壓力.....	37
表 3-1：瑞典社會福利模式.....	60
表 3-2：瑞典、法國、德國與英國海外發展援助及其所佔國民生產毛額.....	71
表 3-3：北歐國家冷戰時期參與之聯合國國際維和任務(1948-1987 年).....	74
表 4-1：阿姆斯特丹條約磋商期有關歐盟就業政策的討論.....	108
表 5-1：瑞典國防軍力 2006-2009 年度變化表.....	139

## 圖目錄

圖 1-1：歐洲化研究示意圖.....	4
圖 1-2：分析架構.....	6
圖 1-3：歐洲化被視為社會化的過程.....	17
圖 2-1：宏觀發展過程模式.....	28
圖 2-2：歐洲統合與歐洲化.....	29
圖 2-3：歐洲化過程與成員國國內變遷.....	34
圖 4-1：歐盟就業協定的三個進程.....	87
圖 4-2：1997 年歐盟就業策略－「四個支柱」模式.....	89
圖 4-3：2003 年新「歐盟就業策略」－三大首要目標模式.....	92
圖 4-4：1990 年至 2004 年瑞典國內生產毛額與失業率折線圖.....	97
圖 4-5：歐洲化過程中可能的政策結果.....	102

# 第一章 緒論

##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問題意識

### 一、研究動機與目的

隨著歐洲統合的廣度與深度不斷前進，經過了經濟統合與政治統合的努力之後，歐洲聯盟作為一個屬於歐洲整體單元的輪廓也日漸清晰。然而在統合過程中，在許多政策範疇與問題上，凸顯了歐洲內部認同不足的現象；以 2005 年歐洲憲法通過失敗為例，可以看出基於對歐洲認同的不足，使得成員國乃至於其人民在選擇時，採取了相對保守的態度。這也說明了一個歐洲統合中日益重要的問題：在經歷過經濟統合與政治統合已達到相當程度的過程後，應當開始謹慎思考關於歐洲集體認同建構的範疇。

自冷戰結束後，面對美國力量相對的式微，歐洲勢必在新的冷戰局勢中重新定義自身的意義與價值。對內方面，歐洲化要求內部人民與國家能夠藉由地理相近與文化較為相近進而發展出作為歐洲內部的集體人民身份認同。<sup>1</sup>總歸來說，歐洲在經過了經濟與政治統合的層次之後，開始思考如何透過歐洲集體認同的建立，來解決目前在統合中所遇到的深度與廣度方面的困難。

學術界對於統合理論的討論，多集中在新功能主義、政府間主義與多層治理等，隨著歐洲聯盟的發展，不同於新功能主義與政府間主義注重於對於統合歷史過程的解釋，新一代的歐盟研究將關注轉移至新的治理制度之發展，且將關注重新轉回國家，討論國家在統合中的角色與轉變。歐洲化研究就是在反思與批判的基礎上，突破原有議題、運用新視角、新方法探討新的問題。<sup>2</sup>

本文之目的即在於討論歐洲聯盟成員國在與歐盟互動過程中，所產生與發展

---

<sup>1</sup> Borneman, J. and N. Fowler (1997). Europeanization.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Annual Reviews Inc. 26, pp.487.

<sup>2</sup> 吳志成，王霞，2007，〈歐洲化:研究背景、界定及其與歐洲一體化的關係〉，《教學與研究》，6期，頁48-55。

之歐洲化(Europeanization)的現象；並且關注於在政策與制度的歐洲化現象之外，是否有助於歐洲統合的發展。本論文以瑞典為例，從歐洲化的觀點，探究瑞典在與歐盟的互動過程中，是否確實地因受到了來自於歐盟由上而下的壓力而做出調整；而在做出內部政策調整的過程中，瑞典是否有能力與意願在各項政策領域中試圖由下而上地影響歐盟的作為來達到對於自身最佳的結果。

## 二、問題意識與研究問題

### (一) 問題意識

在眾多歐洲化研究中，目前主流在於討論歐洲化現象在於成員國內部制度(Institutions)上與政策(Policy)上的影響力。對此一議題，歐洲化研究側重於兩個部分：首先是歐盟成員與歐洲聯盟制度、政策等相互適應間連續過程的發展；其次則是歐盟實際上不應該被當作一個獨一無二的現象(Sui-generis)，而可以作為一個能夠輸出到其他地區的範例或典範。<sup>3</sup>

歐洲化研究在經歷了制度層面的理論發展之後，學術界也開始思考並發展關於以歐洲化為基礎，進而進行建構歐洲集體認同的過程。面對歐洲為數眾多的國家、文化與語言藩籬，歐洲聯盟在統合過程已經達到了使用共同貨幣歐元(Euro)、旗幟、新聞報紙與電視台等共同的生活形態；代表著歐洲統合的進程已達到了新的層次(level)，也有了新的強度(intensity)；對外方面，歐洲化研究主張歐洲統合的目標必須形塑對外共同一致的認同(identification)。

瑞典是一個值得研究的案例。瑞典在 1995 年加入歐洲聯盟，距今已有 14 年的時間。在瑞典加入歐盟之前，瑞典在外交政策、經濟與社會政策等各方面皆有不同於其他國家之獨特之處。在外交政策方面，瑞典處在歐洲的北端，與其他北歐國家一樣同時夾在歐洲與蘇聯兩大對峙集團的前緣，因此瑞典近代以來一直

---

<sup>3</sup> Olsen, Johan P. (2002). The Many Faces of Europeanization, *Journal of Common Market Studies*, Vol. 40, No. 5, pp. 923

秉持著中立之政策，試圖在各強國中間取得穩定的安全秩序。在經濟社會政策方面，做為福利國家典範的瑞典社會福利制度，從二次大戰以來歷經了蓬勃的發展與上個世紀末的福利國家經濟危機，加入歐洲聯盟對瑞典本身之經濟策略與福利政策改革皆形成相當大的影響。

北歐地區自古以來與真正的歐洲核心地區，一直保持著相當的距離與若即若離的關係，而且北歐地區國家擁有相近語言、維持中立之傳統與統合主義式民主；政治面上則是共享平等、社會團結與社會保護的理念，因此形成了獨特的北歐特性(Nordic Identity)。

不同於其他較早期加入歐盟的國家，瑞典在與歐盟各方面政策互為調適的過程中，面對的是已經作為一個擁有完整的組織架構與行為能力之整體；也由於成員國眾多，瑞典作為一個中型國家，因此不必然在政策決定過程中都可以獲得讓自身十分滿意的結果。因此瑞典在加入歐盟之後，在國內制度上的適應、調適與其如何透過互動的過程將自身的政策偏好反映之歐盟層面等相關研究探討，可以作為歐洲化理論的研究對象。

## (二) 研究問題

在本文中，欲解釋歐洲化研究的發展，必須要有一個適合的例證來解釋並證明歐盟成員國歐洲化的情形；並在檢視成員國內部受到歐洲化影響之過程中建立歐洲認同的可能性。歐洲聯盟近年來加入之新成員國眾多，如果選擇了加入資歷較淺的國家，則制度適應過程尚未到達完備的程度。因此本文選擇了北歐國家中的瑞典作為個案研究之對象。

本文首先整理並介紹歐洲化研究近年來的理論發展，試圖歸納出一個整體的理論分析架構；接著就個案研究之對象即瑞典，針對瑞典的外交政策方針與福利政策變遷為對象，做廣泛而清楚之分析與研究。希望藉著研究瑞典政策與歐盟政策發展的互動過程，能夠瞭解瑞典政策歐洲化的過程與發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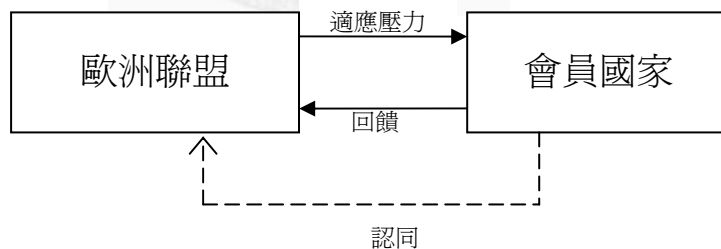
### 三、分析架構與研究方法

#### (一) 分析架構

近年來，歐洲出現了以「歐洲化」(Europeanization)為名的學術研究，歐洲化研究著重於歐洲聯盟會員國在國內政策與歐盟政策有所衝突時，會員國基於調適壓力(adaptational pressure)，選擇採取或適應歐盟政策的過程，換句話說，可以視為歐洲聯盟自上向下(top-down)影響會員國政策的過程。

歐洲化之過程主要有三項因素，首先是建構歐洲化典範的建立；接著是散播這些作為歐洲化之典範到各成員國內，以期能夠作為成員國國內制度的模範；最後這些歐洲化典範會影響到成員國內關於規範、信念和正式與非正式、一切行事準則在國家或是次國家體系的制度化表現。<sup>4</sup>廣泛地說，歐洲化是在更進一步統合中必然會發生的現象。至少在政策與政府機構兩方面會顯露歐洲化的現象。<sup>5</sup>

圖 1-1：歐洲化研究示意圖（作者自繪）



對於歐洲化的研究，早期研究重點在於討論由歐洲聯盟層次政策形成一種典範，當要求會員國按照歐盟政策典範行事時，由於歐盟政策典範與會員國國內原本政策在脈絡上產生不適應(misfit)，而形成適應壓力，迫使會員國在此壓力下修

<sup>4</sup> Ladrech, R. (1994). Europeanization of Domestic Politics and Institutions: The Case of France. *Journal of Common Market Studies* 32(1), pp.69-88.

<sup>5</sup> Simon Bulmer, M. B. (1998). Organizing For Europe: Whitehall, The British State And European Union. *Public Administration* 76(4), pp.601-628.

改自身政策，為一種由上而下(top-down)的壓力。近期的研究則是不僅強調由歐盟層次往下的歐洲化過程，也開始注重不同的研究途徑：包括由下至上(bottom-up)與水平方向(horizontal)之歐洲化現象與過程。<sup>6</sup>

本論文融合了不同途徑與方向之歐洲化研究，一方面研究自歐盟層次由上而下地對瑞典的政策壓力；另一方面同時討論瑞典基於在歐洲化過程中為了縮小適應歐盟政策之成本(cost)，會主動地由國家層次自下而上地試圖與歐盟層次互動並影響政策制訂。(請見圖 1-1)

本文的分析架構可以分為兩個部分。(請見圖 1-2) 第一部分先將目前歐洲化研究與理論發展的情況作一整理，以建立一有意義的分析框架，作為瞭解瑞典各方面政策之歐洲化的過程與現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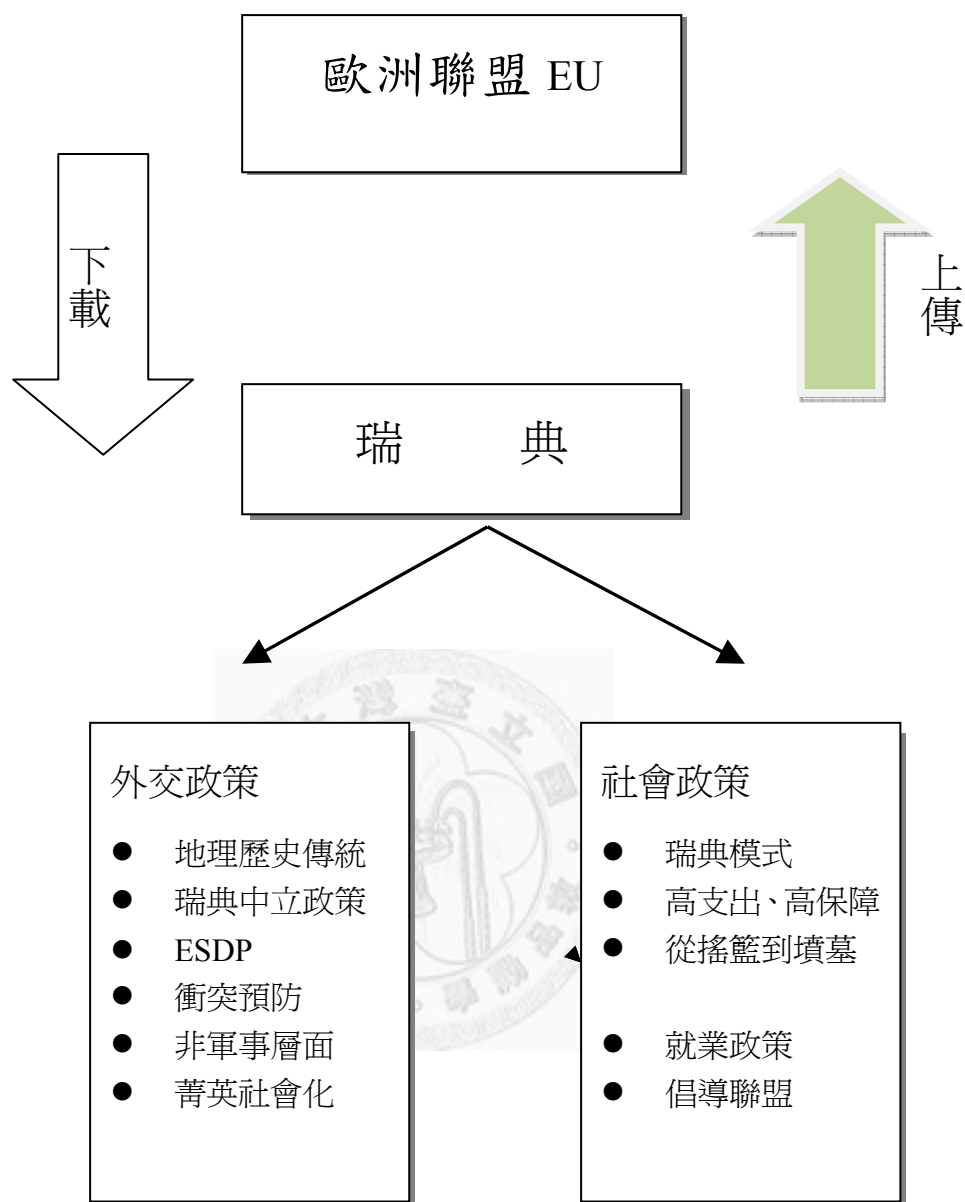
第二部分則是廣泛地透過觀察並討論瑞典在加入歐洲聯盟之後，在外交政策與社會福利政策各方面，以特定領域與議題為例，研析歐盟政策典範對於瑞典之影響力與瑞典歐洲化之過程。



---

<sup>6</sup> Dyson, K., & Goetz, K. (2003). Europeanization in Context: Concept and Theory. In K. Dyson & K. Goetz (Eds.), *Germany, Europe, and the politics of constraint*, New York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p. 37-53.

圖 1-2：分析架構（作者自繪）



## （二）研究方法

本文將採用文獻分析法，試圖藉著文獻的分析與探討，討論歐洲化現象在瑞典加入歐盟之後國家發展上所發揮的影響力。文獻的來源分為兩大類，一類為第一手資料，來自於歐洲聯盟官方文書、民意調查資料或政策宣示；也有來自於瑞典官方政策文書，與國家機關所刊載之官方研究報告。利用歐洲聯盟與瑞典兩方

面之官方文書與調查，有助於瞭解可以掌握雙方的實際互動脈絡，與各自之政策發展變遷。歐盟官方機構所提供之民意調查資料，運用廣泛而大規模地對歐盟內部人民調查，是目前最具有公信力之實證證據之一。

第二類文獻為學界以歐洲化研究與瑞典各領域政策發展為探討對象的研究成果。在歐洲聯盟內部關於歐洲化研究之相關文獻相當豐富，瑞典基於其中立外交政策、福利國家模式，在歐美學界中探討文獻也相當豐富。在文獻的使用上，筆者希望由整理歐洲化研究發展脈絡，以發展出有效之分析架構，再輔以瑞典各領域研究之文獻，綜合兩者以清楚說明並解釋瑞典國家政策發展之脈絡，是本文努力之方向。

在歐洲聯盟內部討論歐洲化研究之相關文獻數量龐大，且種類豐富；然而在國內關於歐洲化研究之文獻與歐洲學界相比，來得稀少許多。本文主要分析對象為瑞典，然而受限於語言能力，僅能使用英文文獻為主的瑞典研究相關資料。因此本文將以英文文獻為主，中文文獻為輔，並廣為蒐集與本文相關的專著、期刊論文、研討會論文，期以能豐富本文的研究背景。

## 第二節 文獻回顧

### 一、國內針對歐洲化研究之現況

國內研究歐洲化與瑞典相關文獻數量並不多；歐洲化研究文獻數量相當稀少，以下就國內針對歐洲化研究現況作一闡述。李靜慧在其 2005 年碩士論文中利用歐洲化研究框架進行對英國加入歐元之政策做出討論與評析，李靜慧經由「歐洲化」研究架構的檢證，發現了影響英國政府制定歐元政策的因素如同其所論述之歐洲化研究架構所言，有制度相容程度的疑慮、國內有否決者的存在、時機問題、國內的政治信念與組織文化等因素之影響，與英國轉換歐元的制度調整



成本之考量。<sup>7</sup>

戴嘉宏則是在其 2007 年碩士論文中討論探討西班牙在加入歐洲共同體後，隨著歐洲共同體/歐洲聯盟之發展，而產生對於西班牙自身國內一連串政治經濟層面的轉變。<sup>8</sup>與歐洲化有關之碩士論文研究在國內數量並不多；另外關於歐洲化研究相關之期刊文章數量在近數年來數量有緩慢增多的趨勢，以下就期刊文章與歐洲化相關之文獻做一回顧。

最早在《問題與研究》中，洪茂雄教授曾提出對於捷克在後共產主義時期之內部政治發展的觀察，捷克在後共產主義時期之政治發展出現了民主化與歐洲化的趨勢。然而洪茂雄教授在文中所提到之歐洲化概念還處於初期發展階段，與目前學術界討論的「歐洲化」基本上並不屬於相同的範疇<sup>9</sup>。爾後黃榮源教授為國內歐洲研究學術介紹了新的思維。黃榮源教授質疑統合理論研究途徑，究竟能夠為當今歐盟的發展結果提供多少解釋，這也是許多歐洲政治菁英及學術研究者所共同關切的問題。因此黃榮源教授介紹了挪威學者 Johan P. Olsen 之觀點，其認為制度變遷才是歐洲聯盟發展中應該被注意的重點，現今歐洲聯盟所面臨之難題，解決關鍵即是在歐盟制度本身是否有能力處理。<sup>10</sup>

楊三億教授則是在 2008 年發表文章由社會學習的角度分析波蘭在 1990 年代憲政改革過程，其認為波蘭憲政制度變遷即是歐洲化過程之具體表現。楊三億教授認為，加入歐盟雖是波蘭國家發展最主要目標，不過單純由物質性因素解釋勢必受到侷限，因此社會學習動機與過程亦扮演程度不一的重要力量。<sup>11</sup>中研院歐美所黃偉峰教授曾經就歐洲化研究的方向與侷限撰文討論。<sup>12</sup>

---

<sup>7</sup> 李靜慧，2005，《欲拒還迎—從歐洲化觀點看英國的歐元政策》，高雄：中山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班畢業論文。

<sup>8</sup> 戴嘉宏，2007，《西班牙加入歐洲共同體後國內政治經濟的轉變》，嘉義：南華大學歐洲研究所碩士班畢業論文。

<sup>9</sup> 洪茂雄，1997，〈後共產主義時期捷克的政體發展—民主化與歐洲化〉，《問題與研究》，36 卷 9 期：13-25。

<sup>10</sup> 黃榮源，2005，〈歐盟治理與研究的新途徑？一個來自奧斯陸的聲音〉，《公共行政學報》，17 期，頁 159-167。

<sup>11</sup> 楊三億，2008，〈波蘭 1990 年代憲政改革：制度變遷與社會學習之歐洲化過程〉，《全球政治評論》，24 期，頁 83-120。

<sup>12</sup> 黃偉峰，2009，〈歐洲化研究之新取向及其侷限〉，「『歐洲化』之衝擊」學術研討會，台

至目前為止，國內關於歐洲化研究相關文獻數量不是非常多，然而在中國大陸方面關於歐洲化研究文獻數量正在快速增加中，不過筆者觀察中國大陸方面之文獻還是以整理及觀察歐洲化研究歷史與發展方向為主，不過對於整理文獻與取得資料有很大的幫助。

目前國內關於本文欲探討之瑞典的外交、經濟與福利政策等領域之相關文獻眾多，大多是著重於瑞典單一領域政策，如外交政策與工業政策等領域。<sup>13</sup>因此筆者希望能夠討論關於綜合瑞典各領域政策之歐洲化過程與認同之研究，為歐洲化研究與發展形成一完整分析架構做出努力，是本文所要努力的對象。

## 二、歐洲化研究之定義與範圍

二次大戰後的歐洲統合發展到近代已經有相當顯著的成果，由經濟層面開始的政治、社會方面的歐洲統合為歐洲人民的生活帶來極大的巨變。而關於歐洲統合的研究經歷了長期的發展，近來受到建構主義的影響，歐盟研究開始注重以認同建構為基礎的歐洲統合之研究。

而歐洲統合之研究也出現了以「歐洲化」(Europeanization)為主體的研究，歐洲化主張基本上應是由地域性(territoriality)與集體性人民身份(peoplehood)兩項原則形成的群體認同(group identification)形塑了近代歐洲的發展。<sup>14</sup>

而在近二十年來出現的歐洲化研究以 1994 年萊德克(R. Ladrech)對於法國在簽署馬斯垂克條約前後出現的歐洲化過程之探討，為較具代表性之開端。萊德克對歐洲化的定義是成員國內國家組織與決策邏輯的重新定向。萊德克並指出歐洲化作為討論法國國內政治與決策的變遷不能顯現在每一個領域當中，因此萊德克

---

北，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

<sup>13</sup>向志豪，1992，《瑞典申請加入歐洲共同體之研究》，台北：淡江大學歐洲研究所碩士班畢業論文；顏嘉君，1995，《瑞典安全政策之研究(一九四五年-一九九五年)》，台北：淡江大學歐洲研究所碩士班畢業論文；陳盛鵬，1998，《瑞典加入歐洲聯盟之研究》，台北：國立政治大學外交學系碩士班畢業論文；劉璐娜，2001，《瑞典社會民主面臨全球化挑戰之初探》，台北：淡江大學歐洲研究所碩士班畢業論文；許沛煜，2006，《瑞典加入歐洲聯盟後社會福利政策之演進》，台北：淡江大學歐洲研究所碩士班畢業論文。

<sup>14</sup> Borneman, J. and N. Fowler (1997). *Europeanization.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Annual Reviews Inc. 26: 487.

挑選憲政變遷(constitutional revision and changes)與立法(legitimacy)作為解釋歐洲化對於法國國內政治的影響<sup>15</sup>。歐洲化研究作為一種學術新興產業，最大的主流在於討論歐洲化在於制度(Institutions)上的影響力<sup>16</sup>。

布爾默(S. Bulmer)則是認為歐洲化作為一種現象，是受到歷史制度主義(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的影響。歐洲化用以瞭解歐洲聯盟加諸於成員國上的影響，作為進一步統合中的固有現象，然而單純利用歐洲化現象來檢視歐盟對於成員國的影響是有些過於鬆散；因為並無法真正地將單純的歐盟影響(EU-effect)由其他的現象（如全球化）中明顯分辨出來<sup>17</sup>。

巴賽爾(T. A. Börzel)提供了兩種國家必須因應歐洲化的情形：一種是基於自己原有政策的「不適應」(misfit)，有適應的壓力 (adaptational pressures)；另一種是歐盟本身存在著「促進因素」(facilitating factor)的存在，促使成員國產生歐洲化的現象。<sup>18</sup>相較布爾默以歷史制度主義，巴賽爾使用理性選擇制度主義(Rational-Choice Institutionalism)與社會制度主義(sociological institutionalism)來解釋歐盟政策由上而下(top-down)地將歐盟政治與經濟動力邏輯內化至國內組織與決策過程的邏輯中。<sup>19</sup>

針對巴賽爾所提的「促進因素」，舒密特(V. A. Schmidt)也針對這方面做出有系統的解釋；舒密特認為國家在面對來自歐洲化的經濟面調適壓力時，不同國家不同的調適方式。其中舒密特指出了五個中介變數：經濟脆弱度(Economic

---

<sup>15</sup> Ladrech, R. (1994). Europeanization of Domestic Politics and Institutions: The Case of France. *Journal of Common Market Studies* 32(1): 69.

<sup>16</sup> 如 Lagreid, P. (2002). Europeanization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Effects of the EU on the Central Administration in the Nordic States. *Stein Rokkan Centre for Social Studies*. ; Fairbrass, J. (2003). The Europeanization of Business Interest Representation: UK and French Firms Compared. *Comparative European Politics* 1(3): 313.; Lehmkuhl, C. K. a. D. (1999). How Europe Matters. Different Mechanisms of Europeanization " *European Integration online Papers* (EIoP) 3.

<sup>17</sup> Bulmer, Simon, M. B. (1998). Organizing For Europe: Whitehall, The British State And European Union. *Public Administration* 76(4): 601-628.

<sup>18</sup> Börzel, T. (2000). When Europe Hits Home: Europeanization and Domestic Change. *European Integration online Papers* (EIoP) 4(15).

<sup>19</sup> Ladrech, R. (1994). Europeanization of Domestic Politics and Institutions: The Case of France. *Journal of Common Market Studies* 32(1): 69.

Vulnerability)、政治制度能力(Political Institutional Capacity)、政策遺緒(Policy Legacies)、政策偏好(Policy Preference)與國內論述(Discourse)。<sup>20</sup>

巴賽爾在 2002 年的文章中進一步提出歐洲化作爲一個雙向的互動過程，同時包含了自上而下(top-down)、自下而上(bottom-up)兩種不同方向的過程。成員國行政機構爲了最大化自身國家利益、最小化在國內適應歐盟政策與政治的成本，會採取不同的因應方式：主動積極 (pace-setting)、消極拖延 (foot-dragging) 與中立 (fence-sitting) 等不同的作法。<sup>21</sup>

雷庫(D. Lehmkuhl)和尼爾(C. Knill)則是將歐洲化進行的機制(Mechanisms)分成：積極統合(Positive Integration)、消極統合(Negative Integration)和結構統合(Framing Integration)三個種類；不同的統合機制可以解釋國內不同政策領域受到歐盟政策影響所發生變化的情形，並沒有一個單一的機制可以解釋所有的國內政策變化。<sup>22</sup>

歐洲化的定義雖然尚未有明確的定義，但是關於歐洲化的範圍，學界大抵有數個已然成形的方向。歐爾森(J. P. Olsen)對於歐洲化的範圍做出了明確且清晰的定義：包括了外部界線的擴大，隨著歐盟之地理界線向外擴張；歐盟層次集體行爲能力的加強，某種程度代表了歐洲化的成果；由於歐盟與成員國間多層次治理的政治特色，歐盟層次的治理能力與國家或次國家體系政治單元有所聯繫的程度，也成爲了界定歐洲化的範圍；歐盟作爲一種政治制度的典範向外輸出的可能性與效度；最後是成爲歐盟治理成爲一種統一的政治體制，與國家和次國家體系聯結的進程變化，以上概括略述了學界對於歐洲化的範圍與內容的界定，歐洲化被歐爾森認爲是對於國內核心制度、治理的影響現象與過程；被認爲是歐盟層面制度與政策的結果。<sup>23</sup>

---

<sup>20</sup> Schmidt, V. A. (2001). Europeanization and the Mechanics of Economic Policy Adjustment. *European Integration online Papers (EIoP)* 5.

<sup>21</sup> Börzel, T. (2002). Pace-Setting, Foot-Dragging, and Fence-Sitting: Member State Responses to Europeanization. *Journal of Common Market Studies* 40(2): 193-214.

<sup>22</sup> Knill, C. and D. Lehmkuhl (1999). How Europe Matters. Different Mechanisms of Europeanization. *European Integration online Papers (EIoP)* 3.

<sup>23</sup> Olsen, J. P. (2002). The Many Faces of Europeanization. *Journal of Common Market Studies*

不過歐爾森的看法被認為是一種由上而下的歐洲化過程。隨後 Featherstone 在歐洲化的範圍中加入了跨國性散佈歐洲文化的概念，如民主與人權等之現象；對內則是強調「制度適應」和「政策與政策過程適應」(Adaption of Policies and Policy Process)來描繪外交政策的歐洲化聚合現象<sup>24</sup>，如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等。

歐洲化研究在發展了十數年後，一般著重的研究方向都是由歐盟層面往下將政策適應之壓力下放到成員國國內，並討論適應壓力是如何促使成員國內部制度與政治出現改變，如 2001 年考爾斯等人(M. G. Cowls)的研究中討論由歐盟層面往下的政策適應壓力是如何改變了國內政治結構即為一例。<sup>25</sup>但自二十一世紀初開始，歐洲化研究不再只被認為是單方向地由上往下進行，而是在歐盟與成員國間進行相互雙向的影響。<sup>26</sup>

拉達那利(C. M. Radaelli)認為許多研究歐洲化的學者都傾向將歐洲化所能處理的範圍過於擴大。只有將歐洲化這一綜合性的概念「解構」(unpack)，才能確切瞭解歐洲化研究的範圍，避免出現歐洲化概念過度延伸的問題。拉達那利認為歐洲化的概念必須與政策、政治聚合(convergence)現象、和諧(harmonization)與政治統合等名詞概念分開；歐洲化與歐盟政策形成也該有所區分，歐洲化的結果是有可能反饋到歐盟新一輪或是修正決策中<sup>27</sup>。

拉達那利也在 2004 年對於歐洲化研究的世代變化提出看法：不同於傳統統合理論有些趨向於預測國家角色之衰微，歐洲化研究將歐洲統合視為一個過程；研究重點並非是會員國是否被歐洲化至最後失去了主體能力，而是討論在這過程中有哪些因素導致或促成了過程的繼續進行或阻礙<sup>28</sup>。總的來說，歐洲化研究提

---

40(5): 921-952.

<sup>24</sup> Featherstone, K. (2003). *The Politics of Europeaniza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sup>25</sup> Cowles, M. G. (2001). *Transforming Europe*. Ithaca, N.Y. :,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sup>26</sup> 如 Dyson, K. a. K. G. (2003). *Germany, Europe, and the politics of constraint*. New York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Schmidt, V. A. (2001). Europeanization and the Mechanics of Economic Policy Adjustment. *European Integration online Papers (EIoP)* 5. ; Lee-Ohlsson, F. (2008). Swede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uropean Security and Defence Policy : A Bi-Directional Process of Europeanization. *EU Diplomacy Papers* 5: 1-26.

<sup>27</sup> Radaelli, C. M. (2000). Whither Europeanization? Concept stretching and substantive change. *European Integration online Papers (EIoP)* 4(8).

<sup>28</sup> Radaelli, C. M. (2004). Europeanisation: Solution or problem? *European Integration online*

供了垂直過程與水平動態變化，並且提供了規範性與認知性框架，藉此解釋國內行為者因認知與知識交換而社會化的情形。

豪威爾(K. E. Howell)也提出了類似的質疑。豪威爾認為歐洲化這個語詞在學術運用上概念運用出現了過於延伸(Conceptual stretching)的隱憂與問題。因此豪威爾將歐洲化視為一種情境(situation)，並混合實證主義和建構主義的方法論，檢驗歐洲化研究作為一中距理論(Middle range theory)亦或是實質理論(substantive theory)上具體的內容，並檢驗歐洲化與歐洲統合的差異。<sup>29</sup>最終歐洲化概念在經過檢證之後，被認為作為中距理論上代表了一種過程(process)；做為一個實質理論，歐洲化偏向於在下載(downloading)、上傳(up-loading)與跨界移轉(cross-loading)中的一種情境。

梅爾(P. Mair)針對考爾斯與費瑟斯通(K. Featherstone)的著作歸納出歐洲化的定義與適用範圍，考爾斯接受了國際政治會影響國內政治變遷的假設，且注重歐洲化對國內制度結構的影響與國家的回應。他是將歐洲化與國內變遷分開，而非將歐洲化視為變遷的一環；費瑟斯通則是由比較政治的方向入手，將歐洲地區的發展不僅當作一種外部秩序，更當作一種政治制度。他對歐洲化定義較為傳統，重視制度變遷，即為歐洲層面之政策對於國內政策與政治領域的滲透(penetration)。此外更強調歐洲文化與歷史實體性。這樣的觀點為歐洲化研究帶來了更多需要注意的地方，也使得在歐洲化研究中很難將國內政治與國內政策分開<sup>30</sup>。

隨著歐洲化研究的發展，歐洲化研究有逐漸往一般理論方向(general theory)方向邁進的可能。哈弗蘭(M. Haverland)看到了這個趨勢，卻擔心有其盲點存在的可能性。他認為，對於歐洲化的研究長期存在著一個問題，即歐盟作為一個不變、而且可以刺激國內變化、發展的自變項，卻忽略了國內發展(domestic change)

---

*Papers* (EIoP) 8.

<sup>29</sup> Howell, K. E. (2004). Developing Conceptualisations of Europeanization: Synthesising Methodological Approaches. *Queen's Papers on Europeanization* 3.

<sup>30</sup> Mair, P. (2004). The Europeanization dimension. *Journal of European Public Policy* 11(2): 337-348.

與歐洲聯盟間是否有「不必然有關係」的問題(No variation problem)。因此 Haverland 試圖將焦點放在案例選擇 (case selection) 的問題上，並且利用了反事實推論法 (counterfactual reasoning) 以及比較歐盟成員國與非成員國之差異，來討論歐盟作為檢驗國內發生變動的自變項是否真的具有其相應的影響與關連性。<sup>31</sup>

再者，關於由歐盟層面自上而下因與國內政治政策不同性質而產生的適應壓力，會引發國內政治與制度發生改變的論述(goodness of fit)一直是歐洲化研究的中心。瑪斯滕布羅克(E. Mastenbroek)就針對此一論述討論；瑪斯滕布羅克假設在於現狀(status quo)與對歐盟之回應間關係是虛假(spurious)的，其實兩者都是受到國內行為者的偏好與信念所影響。而有其他學者也提出類似的看法認為歐盟層面政策與制度邏輯和會員國內發生的政治制度變遷之間的關連性實際上相當微弱。<sup>32</sup>

格拉齊亞諾(P. Graziano)與文克(M. P. Vink)則是對於歐洲化範圍的界定的看法有些不同。首先他們認為並不存在由上而下的分析架構，即不認為需要從歐盟層次開始分析歐洲化的範圍與議題，而是由歐盟的制度與政策如何影響國內制度政策的轉變與調整，即是由各成員國內層次與次國家層次分析<sup>33</sup>，這包含了直接效應如歐洲立法對於各國立法的影響，與非直接效應如水平效應(Horizon effect)等歐洲化現象。

他們認為不應當將歐洲化視為單一，實際上歐洲化會帶來多種且多樣的效應；在注重歐洲化對於國內政策影響的同時，更應注重政策背後結構、認同與國內意見的轉變；最後應當注意到歐洲化不是歐盟單方面對於成員國的力量，而是歐盟與其成員國間雙向的施力並反饋的過程。

---

<sup>31</sup> Haverland, M. (2005). Does the EU cause domestic developments? The problem of case selection in Europeanization research. *European Integration online Papers* (EIoP) 9(2).

<sup>32</sup> Mastenbroek, E., Michael Kaeding (2006). Europeanization Beyond the Goodness of Fit: Domestic Politics in the Forefront1. *Comparative European Politics* 4(4): 331-354.

<sup>33</sup> Hix, S., Goetz, Klaus H. (2000). Introduction: European Integration and National Political Systems. *West European Politics* 23(4): 1.

關於歐洲化在制度上影響力，格拉齊亞諾與文克在「歐洲化：新研究議程」一書中對於歐洲化的概念下了兩項定義：首先就是以地理為界線的區域中，文化、地理與歷史背景較為相似的國家進行經濟上的高度聯繫，進而進行了區域統合的進程。接著強調了子國家內部的制度適應(domestic adaption)，不僅是適應歐盟所產出的政策，也涵蓋在國內制度的運作，為了更貼近歐盟整體運作所進行的正式與非正式的調整，包括了國內行政體系的協調、利益團體與社會運動等在國家層次中進行對於歐盟層次影響的回饋(feedback)。<sup>34</sup>

制度適應的概念在拉達那利的解釋中有更進一步的解釋。拉達那利強調了歐盟對於成員國治理型態的影響，在於成員國與歐盟間制度相互影響是在於歐盟決策產出過程中就已發生的相互聯繫，而非是在歐盟先產出政策再來影響成員國內部之執行過程與相對應之制度，實際上是說明了歐洲統合(European Integration)與歐洲化(Europeanization)概念上的細微差異。

拉達那利更進一步說明了歐洲化在制度化概念上的影響力，並非是政策適應到國內施政的過程，而是在歐盟層次中各國首先將國內制度調整與歐盟同步，再進行協商，這樣一來即改變以往決策的形式(paradigm)；歐洲化並說明了歐盟提供政治空間供各國菁英或是公眾意見發聲、討論的平台之概念。<sup>35</sup>

貝切特(T. Beichelt)整理出歐洲化研究至今以來關於定義與範圍發展的三個方向：由上而下的適應過程(top-down approach, misfit model)、宏觀發展過程(macro-process model)與國內政治與制度發生轉變(transformation)的現象和過程；其中第三個方向與第一個方向類似，不過更強調國內因素對國內政治與制度的影響力。其中以宏觀發展過程在歐洲化研究中最為被廣泛接受的意義。<sup>36</sup>

歐洲化一反以往傳統統合理論如新功能主義與自由政府間主義缺乏檢驗成

<sup>34</sup> Graziano, P. and M. P. Vink (2007). *Europeanization : new research agendas*. Basingstoke, [England] ;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sup>35</sup> Radaelli, C. M., R. Pasquier (2007). Conceptual Issues. *Europeanization : new research agendas*. P. Graziano and M. P. Vink.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sup>36</sup> Beichelt, T. (2008). *Dimensions of Europeanisation Européanisation*. D'Ouest en Est L'Harmattan T. B. François Bafail. Frankfurt/Oder Logiques Politiques.



員國對於歐洲統合的反饋的不足之處，並以建構主義為其基本論述強調共享知識與互動的重要性，且融合以制度化途徑來檢驗歐洲化對於歐洲統合的影響，因此形成了歐洲化途徑的基本論述。

### 三、瑞典各領域在歐洲聯盟內部發展

#### (一) 安全政策的歐洲化研究

瑞典基於其地理位置處在北部歐洲的界線與瑞典自身歷史發展，在傳統上，瑞典與其他北歐國家如芬蘭相同，傾向採取中立(neutrality)或是不結盟(non-alignment)的態度立場。冷戰時期，北歐國家採取的策略是維持兩大超強在地區中的力量平衡－北歐平衡(Nordic balance)。然而在冷戰結束之後，北歐面臨了多重安全認同與策略的挑戰，會需要一點時間去適應與重新定義。<sup>37</sup>也因此瑞典在加入歐洲聯盟後，隨著統合的步伐，歐盟自 1999 年以來即開始重視危機處理和自身軍事力量的發展，瑞典是否加入歐盟安全與集體防衛之議題成爲了焦點。北歐國家是在歐盟安全政策暨其他方面都相當特殊的一個群體，北歐國家採取相當不信任的態度面對歐盟安全議題。歐盟這個方向的發展自然與北歐國家以往的中立政策有所衝突。<sup>38</sup>

瑞克(P. Rieker)著重於北歐國家國家安全認同的歐洲化過程；他首先對於安全的定義作一符合時代變遷的定義。他接受布贊(Barry Buzan)認爲傳統安全已轉換著重於軍事、政治、經濟、社會與環境等綜合概念性安全的趨勢。

他接著也對於國家安全認同的建構提出優勢論述(dominant discourse)的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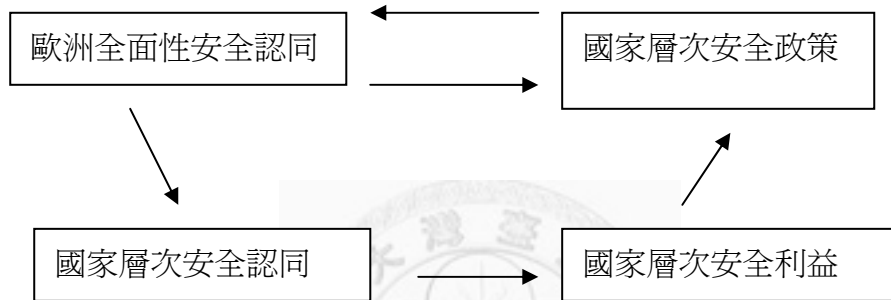
---

<sup>37</sup> Rieker, P. (2004). Europeanization of Nordic Security: The European Union and the Changing Security Identities of the Nordic States. *Cooperation & Conflict*. 39: 369-392.

<sup>38</sup> Bailes, A. J. K., G. Herolf, et al. (2006). *The Nordic countries and the European security and defence policy*. New York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Browning, C. S. and P. Joenniemi (2004). Regionality Beyond Security? The Baltic Sea Region after Enlargement. *Cooperation & Conflict*. 39: 233-253. ; Eliasson, J. (2004). "Traditions, Identity and Security: the Legacy of Neutrality in Finnish and Swedish Security ; Tepe, F. F. (2007). "Swedish Neutrality and its Abandonment." *stanbul Ticaret Üniversitesi Sosyal Bilimler Dergisi* 6(11): 183-201.

釋，認為優勢論述是一套在國家中被認可的認知架構。國家中的優勢論述影響了國家安全認知的形成，國家安全認知更主導了國家安全政策的出現。其中的安全認知概念是會隨著時間與環境變遷而改變，因此必須觀察國家所釋出的長期官方論述最為優勢論述的來源，並且讀其內部優勢論述的架構與型態的存在，才能瞭解到國家安全認知的形貌。<sup>39</sup>以下是瑞克論述歐洲或作為社會化的過程圖示。(請見圖 1-3)

圖 1-3：歐洲化被視為社會化的過程



來源：Rieker, P. (2006). *Europeanization of national security identity*, pp.54.

瑞典在歐盟安全政策領域中的實際作為與角色力量的變化，也成為研究瑞典外交與安全政策的焦點。<sup>40</sup>現今的瑞典是歐盟內部對於國際危機處理能力之發展最為主動的國家之一。<sup>41</sup>瑞典也是北歐軍事力量(Nordic Battlegroup)的領導者，且瑞典內部之國防工業近年來也呈現相當地私有化與國際化的趨勢。在 2006-2008 年間，瑞典因新政府上任造成對外政策改變，對於外部歐洲安全暨防衛政策 (ESDP)與北約(NATO)事務採取積極主動的態度，軍隊也快速地重新整合以符合

<sup>39</sup> Rieker, P. (2006). *Europeanization of national security identity*. London :, Routledge.

<sup>40</sup> Brummer, K. (2007). *The North and ESDP-The Baltic States, Denmark, Finland and Sweden*, Bertelsmann Stiftung. ; Agius, C. (2006).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Swedish neutrality : challenges to Swedish identity and sovereignty*.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 Ferreira-Pereira, L. C. (2004). The Militarily Non-Allied States in the CFSP of the 1990's. *European Integration online Papers (EIoP)* 8.

<sup>41</sup> Tepe, F. F. (2007). Swedish Neutrality and its Abandonment. *stanbul Ticaret Üniversitesi Sosyal Bilimler Dergisi* 6(11): 183-201. ; Björkdahl, A. (2008). Norm advocacy: a small state strategy to influence the EU. *Journal of European Public Policy*, Routledge. 15: 135-154.

國際任務之需求。<sup>42</sup>有鑑於瑞典在安全議題上角色上的轉換，瑞典安全政策歐洲化之研究開始將關注置於討論瑞典安全政策歐洲化過程中，瑞典與歐盟相互影響的雙相互動現象。<sup>43</sup>

## (二) 瑞典經濟與福利制度之變遷

瑞典在 1990 年代由於國家經濟不景氣、失業率增加等連鎖效應，造成政府財政情形惡化，使得瑞典必須面對加入歐洲聯盟的問題。而瑞典加入歐盟之後，歐洲金融、貨幣統合等因素的影響，使得瑞典福利制度模式出現變化。然而瑞典本身認同與價值相當特殊，因此在害怕本身價值、制度被破壞的可能性之下，瑞典對於歐盟的態度顯得猶豫不決。在考慮是否加入歐盟時，瑞典就經歷了一番掙扎。而加入歐盟後，當瑞典面對進一步的經濟、金融統合，瑞典的態度顯得更加躊躇。<sup>44</sup>因此在學者研究瑞典經濟與社會福利制度變遷的過程中，歐盟之力量對於瑞典在經濟社會政策的影響力上顯得不可或缺。<sup>45</sup>

在經濟政策層面上，歐洲經濟暨貨幣聯盟(EMU)之成立與發展，再加上歐元於 2002 年正式發行之後，自由市場與共同貨幣之壓力加深了瑞典經濟與福利制度歐洲化的壓力，這也成爲瞭解瑞典經濟政策歐洲化的焦點。<sup>46</sup>瑞典在 2003 年

---

<sup>42</sup> Anderson, J. J. (2007). *Denationalisation of Defence. convergence and diversity* / J. H. Matlary. Burlington, VT :, Ashgate Pub.

<sup>43</sup> Lee-Ohlsson, F. (2008). Swede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uropean Security and Defence Policy : A Bi-Directional Process of Europeanization. *EU Diplomacy Papers* 5: 1-26.

<sup>44</sup> Gould, A. (1999). The erosion of the welfare state: Swedish social policy and the EU. *Journal of European Social Policy* 9(2): 165.

<sup>45</sup> Korpi, W. (2003). Welfare State Regress in Western Europe: Politics, Institutions, Globalization and Europeanization, *Swedish Institute for Social Research*. ; Martinsen, D. S. (2005). The Europeanization of Welfare - The Domestic Impact of Intra-European Social Security. *Journal of Common Market Studies*, Blackwell Publishing Limited. 43: 1027-1054. ; Palier, B. (2004). The Europeanisation of Welfare Reforms. Cost Conference. ; Taylor-Gooby, P. (2004). *New risks, new welfare*. New York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Taylor-Gooby, P. (2005). *Ideas and welfare state reform in Western Europe*.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sup>46</sup> Dyson, K. (2000). EMU as Europeanization: Convergence, Diversity and Contingency. *Journal of Common Market Studies* 38(4): 645-666. ; Jupille, J. and D. Leblang (2007). Voting for Change: Calculation, Community, and Euro Referendum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UK. 61: 763-782. ; Lindahl, R. and D. Naurin (2005). Sweden: The twin faces of a euro-outsider. *Journal of European Integration*, Routledge. 27: 65-87. ; Miles, L. (2005). Introduction: Euro-outsiders and the politics of asymmetry. *Journal of European Integration*, Routledge. 27: 3-23.

曾經舉辦過徵詢人民是否贊成瑞典加入歐元區的公投，最後以失敗告終；瑞典歐元公投的失敗，標示著某種程度上瑞典經濟政策歐洲化的暫時失敗。林德(R. Lindahl)在 2005 年的文章中指出，瑞典公投的失敗是因為政治菁英與一般人民對歐洲聯盟的認知與態度不同，所以導致了公投的失敗。其他關於瑞典 2003 年公投之研究也提出了不同且多樣的看法。<sup>47</sup>

在社會福利政策方面，隨著 1990 年代以來瑞典國家經濟情形惡化，許多原本由中央政府供給的社會福利措施逐漸走向縮減與私有化(privation)的方向。<sup>48</sup>因此在此福利國家社會政策與歐盟新發展之歐盟社會模式間，藉由歐洲化途徑互相影響與發展的關係成為研究者之重心。<sup>49</sup>本文選擇了瑞典模式中具有代表性的(Active Labour Market Policy)作為集中討論的對象。

瑞典的積極性勞動市場政策支持了瑞典在戰後大量的就業，幫助維持社會福利國家龐大的公共財政支出與國家稅收之間的平衡。在後冷戰時代，瑞典經濟遭受了嚴重的打擊，國內失業率也節節升高。儘管如此，瑞典積極性勞動市場政策依然是歐洲國家最先進的勞動市場政策之一。

---

<sup>47</sup> Aylott, N. (2005). Lessons Learned, Lessons Forgotten: The Swedish Referendum on EMU of September 2003. *Government & Opposition*, Blackwell Publishing Limited. 40: 540-564. ; Lindahl, R. and D. Naurin (2005). Sweden: The twin faces of a euro-outsider. *Journal of European Integration*, Routledge. 27: 65-87. ; Miles, L. and M. Lindh (2004). "After the Referendum: a Swedish Euro Paradox?" *Cooperation and Conflict* 39(2): 201-206. ; Widfeldt, A. (2004). Elite Collusion and Public Defiance: Sweden's Euro Referendum in 2003. *West European Politics* 27(3): 503 - 517.

<sup>48</sup> Huber, E. (2001). *Development and crisis of the welfare state*. Chicago :,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sup>49</sup> Vifell, Å. (2004). Swedish employment policy and European guidelines. *Score rapportserie*(11). ; Stenberg, S.-A. (1998). Unemployment and Economic Hardship: A Combined Macro- and Micro-Level Analysi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Unemployment and Means-Tested Social Assistance in Sweden. *European Sociological Review* 14(1): 1-13. ; Raveaud, G. (2007). The European Employment Strategy: Towards More and Better Jobs? *Journal of Common Market Studies* 45(2): 411-434. ; Olsen, G. M. (2007). Toward Global Welfare State Convergence?: Family Policy and Health Care in Sweden, Canada and the United States. *Journal of Sociology & Social Welfare*, Western Michigan University. 34: 143-164. ; Martinsen, D. S. (2005). The Europeanization of Welfare - The Domestic Impact of Intra-European Social Security. *Journal of Common Market Studies*, Blackwell Publishing Limited. 43: 1027-1054. ; Heidenreich, M., Bischoff, Gabriele (2008). The Open Method of Co-ordination: A Way to the Europeanization of Social and Employment Policies? *Journal of Common Market Studies* 46(3): 497-532. ; Earles, K. (2004). Policy Feedback in the Reregulation of the Swedish Welfare State. CPSA ANNUAL CONFERENCE. ; Andreasson, S., H. D. Holder, et al. (2006). *Estimates of harm associated with changes in Swedish alcohol policy: results from past and present estimates*. Addiction, Blackwell Publishing Limited. 101: 1096-1105.

在歐盟就業策略(European Employment Strategy, EES)發展的過程中，瑞典一方面接收到來自於歐盟政策的壓力；另一方面由於瑞典就業政策的先進，在就業領域統合過程中能夠達到上傳國家偏好的作用，並且達到帶領歐盟就業政策發展的領先位置。<sup>50</sup>因此本文中將集中討論瑞典積極性勞動市場政策在歐洲統合過程中，受到來自於歐盟的適應壓力與瑞典影響歐盟的雙向過程。

### 第三節 研究架構

經過前面幾個章節對於動機、問題意識，還有歐洲化與瑞典內部政策等相關文獻回顧與分析之後，接下來本節會說明本篇文章之章節架構與安排。

在第二章的部分會先由歐洲化研究領域開始，就歐洲化相關研究迄今對於歐洲化現象之相關定義做出分類與探討；接著討論歐洲化研究運用之相關領域，如外交、經濟與社會等相關政策領域，另外在歐盟與成員國互動過程中，制度與理念的相互影響是否有助於歐洲認同的產生。因此在第二章的第三節會討論認同這個在歐洲化研究中尚在發展中的理論部分；並希望藉由經過本篇文章的討論之後，能夠對於認同的產生做出一些結論。

第三章開始會針對瑞典，即為本篇文章所要探討的目標，做相關各領域政策的研究。本章針對瑞典中立政策傳統與不結盟政策，以及國際主義的外交政策傳統做一評析與介紹。接著介紹瑞典社會福利制度中的各項政策傳統，旨在為瑞典外交政策與社會福利體制提供清楚的背景介紹。

首先第四章將焦點放到瑞典社會保障體系在經歷過一連串之政治、經濟因素

---

<sup>50</sup> Jacobsson, K., & Johansson, H. (2009). The micro-politics of the open method of coordination : NGOs and the social inclusion process in Sweden In M. Heidenreich & J. Zeitlin (Eds.), *Changing European employment and welfare regimes : the influence of the open method of coordination on national reforms* (pp. 173-191). New York: Routledge. ; Jacobsson, K., & Vifell, Å. (2007). New Governance Structures in Employment Policy Making – Taking Stock of the European Employment Strategy. In I. Linsenmann, C. O. Meyer & W. Wessels (Eds.), *Economic government of the EU : a balance sheet of new modes of policy coordination*.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衝擊與調適之後，瑞典社會保障體系所出現的變化與調適之過程。瑞典身為北歐福利模式代表之一，強調的是全面、平等、完善的社會保障體系；然而在面對經濟衝擊與歐洲內部市場高度自由化時，瑞典高支出性的福利模式無法持續得到相應的經濟發展支持。瑞典政府在經濟模式發生變化的同時，也採取了在限度內社會政策的調適與改變。本章即以就業政策領域為例，探討瑞典在這段期間政策之變化與調適的行為。

又瑞典在相關社會政策發展上相當成熟，然而由於歐盟會員國經濟發展與社會保障發展速度有落差，瑞典一方面因經濟因素必須調整或是裁減社會福利措施的動作，另一方面在整體歐盟社會政策領域發展過程中，瑞典處於領先的地位並能夠影響指導政策發展。本章會檢視瑞典與歐盟在互動過程中相互影響的過程。

第五章則是將視角放在瑞典的外交政策上，瑞典在傳統上一直堅持著中立政策的路線，以求在俄國與歐洲的夾縫中取得安全保證。然而在加入歐洲聯盟之後，歐洲安全暨防衛政策(European Security and Defense Policy, ESDP)發展的脈絡中，瑞典逐漸取得了關鍵的地位；並試圖在歐洲安全暨防衛政策發展過程中，影響其關於採取攻勢或守勢之立場方向。並且最終討論瑞典在歐洲安全暨防衛政策發展當中與歐盟互動的雙向互動關係。

第六章則是為本文結論。一方面將回顧本文的研究成果，評估與檢討本文研究不足之處；並對本研究對於瑞典國家和歐盟間互動關係之言界做出結論與討論，並且提出未來的可行研究方向。

## 第二章 歐洲化研究的內涵

歐洲聯盟(European Union, EU)自從 1992 年馬斯垂克條約(Treaty of Maastricht)通過以來，隨著會員國數目不斷地增加，歐洲聯盟所涵蓋的範圍達到了前所未有的廣度。同樣地，以往偏向於關注歐洲統合是如何地吸引並納入不同會員國的研究，也開始轉向關注會員國在納入歐洲聯盟影響範圍後，會員國國家政府與歐盟領導中心的互動過程和結果。

歐洲統合研究自歐洲共同體出現以來，持續作為學術關注的焦點。自早期的功能主義(Functionalism)、新功能主義(Neo-Functionalism)與政府間主義(Inter-governmentalism)等歐洲統合研究作為歐洲統合研究的重點。在會員國數目增加之後，學術研究的重心轉向了歐盟政策的效度與影響國家施行政策的能力。<sup>51</sup>而歐洲化研究(Europeanization Study)也應運而生。歐洲化作為一種歐盟政策，影響會員國國內政策的現象或過程，在 1990 年代之後逐漸地受到關注。而且在受到制度主義(Institutionalism)與建構主義(Constructivism)的影響，歐洲化研究呈現了不同途徑與範疇的面貌。本章就歐洲化研究對於歐洲統合過程中，歐盟層面與會員國政府互動的現象與結果等各方面作一介紹與評析。

### 第一節 歐洲化之定義與形成

#### 一、歐洲化研究的觀點

歐洲化研究相較其他歐盟相關理論與研究來說，發展的歷史較短。歐洲化研究被認為作為中級理論(middle-range theory)，目的在於針對特定經驗現象做出解

---

<sup>51</sup> Schmidt, V.A., and C.M. Radaelli (2004) 'Policy change and discourse in Europe: Conceptual and methodological issues', *West European Politics*, 27(2): 183-210.

釋，也仍然處於發展中的階段。因此，對於歐洲化這一名稱，學界做出的定義呈現了多變與多樣化的面貌。首先對於歐洲化之意涵提出定義的是 1994 年萊德克 (R. Ladrech) 提出的定義：歐洲化是成員國在受到歐洲聯盟在政策等各方面影響，而造成成員國內國家組織與決策邏輯的重新定向。<sup>52</sup>

有學者更進一步地說明了歐盟的日益穩定與強大在歐洲層面出現一個獨立且具自身特色的機構，其同時有政治、法律與社會制度的特性，也有解決問題的能力；形塑了一個全新的行為者、政策網絡的領域。歐洲聯盟的發展同時具有「歐洲特色化」(Europeification) 的傾向，即是在成員國內政治、政策變遷過程中歐盟的政策與行為能夠作為一項自變數。<sup>53</sup>

而對於歐洲化名稱的釋義，由發展初期就出現了不同的解釋。名稱釋義的分歧主要分為兩派<sup>54</sup>：一是將歐洲化解釋為一種過程(process)<sup>55</sup>；另一種則是將歐洲化單純是為一種現象(phenomenon)或情況(situation)。<sup>56</sup>

拉達那利(C. M. Radaelli)延續了萊德克的定義，認為歐洲化是一個建構(construction)、傳播(diffusion)、以及正式制度與非正式的規則、政策典範制度化的過程。<sup>57</sup> 拉達那利將定義的重點放在歐洲化改變了成員國政治行為的邏輯，他認為歐洲聯盟層面的政策、制度與價值規範經由歐洲化的過程將國內政治制度之論述(discourse)改變為符合歐盟風格的論述、認知、規範架構與風格。此外歐

<sup>52</sup> Ladrech, R. (1994). Europeanization of Domestic Politics and Institutions: The Case of France. *Journal of Common Market Studies*, 32(1), 69-88.

<sup>53</sup> Börzel, T. (2000). When Europe Hits Home: Europeanization and Domestic Change *European Integration online Papers (EIoP)*, 4(15), 1-24.

<sup>54</sup> Fairbrass, J. (2003). The Europeanization of Business Interest Representation: UK and French Firms Compared. *Comparative European Politics*, 1(3), 313-334.

<sup>55</sup> Lægreid, P. (2000). Europeanization and Domestic Administrative Response. *ARENA seminar*, 1-31.; Radaelli, C. M. (2000). Whither Europeanization? Concept stretching and substantive change *European Integration online Papers (EIoP)*, 4(8). 1-28.; Radaelli, C. M. (2004). Europeanisation: Solution or problem? . *European Integration online Papers (EIoP)*, 8, 1-26.

<sup>56</sup> Bulmer, S., Martin Burch., (1998). Organizing For Europe: Whitehall, The British State And European Union. *Public Administration*, 76(4), 601-628.; Buller, J., & Gamble, A. (2002). Conceptualising Europeanisation. *Public Policy and Administration*, 17(2), 4-24.; Howell, K. E. (2004). Developing Conceptualisations of Europeanization: Synthesising Methodological Approaches. *Queen's Papers on Europeanization* 3.

<sup>57</sup> Radaelli, C. M. (2000). Whither Europeanization? Concept stretching and substantive change *European Integration online Papers (EIoP)*, 4(8), 1-28. pp.4



洲化也有可能同時發生在組織與個人層面；包括了政治結構、公共政策、認同與認知範圍。亦有可能同時發生在會員國與非會員國間。

歐爾森(J. P. Olsen)認為歐洲化是對於國內核心制度、治理的影響現象與過程；並且是受歐盟層面制度與政策影響下的結果。歐爾森還為歐洲化明確地定義如下：第一是外部領域界線的改變；第二個是歐盟層次上制度面的發展；第三是歐盟對於國家與次國家治理系統的滲透；第四個定義為明確且典型的歐洲政治組織與治理方式的向外輸出；最後是在政治上出現統一與強大的歐洲。<sup>58</sup>

歐爾森在為歐洲化下定義之後，下一步則是發展出制度面同時具有變遷與連續性兩種特性的解釋。他對於歐洲化在成員國內部兩層面的變化有興趣：政治制度，以及人民心中認同與意識型態組合而成之政治理念變遷。

制度變遷指的是主要制度機關間權力分配的變化，也代表且影響了國家內部主要行為者間權力的變化。<sup>59</sup> 歐盟對於成員國治理制度變遷的影響在於兩種基本適應過程：經驗學習(experience learning)、競爭性選擇(competitive selection)，更是一種歐盟制度向外擴散的過程。

競爭性選擇代表著制度與行為者藉由效率與比較利益上的競爭，在相關政策範圍中，只有最有效率的制度機關可以被留下來。而歐爾森也指出國家機關有足夠的彈性與調適能力，只是在這個被影響的過程中國家機關發生了權力分配的轉變(transforming)，而非國家力量被強化或弱化的結果。<sup>60</sup>光是政治結構與制度面的影響不足以完全解釋歐洲化，另外價值觀與政策典範的影響，包含了論述和認同，也作為歐洲化影響的一環。

巴賽爾(T. A. Börzel)則是認為歐洲化同時包含了由上而下(top-down)與由下而上(bottom-up)兩種彼此雙向的過程。<sup>61</sup>歐盟與成員國之間形成兩個層次的相互

---

<sup>58</sup> Olsen, J. P. (2002). The Many Faces of Europeanization. *Journal of Common Market Studies*, 40(5), pp.921-952. pp.923-926.

<sup>59</sup> Olsen, J. P. (2002). The Many Faces of Europeanization. pp.6

<sup>60</sup> Ibid., pp.14-16

<sup>61</sup> Börzel, T. (2002). Pace-Setting, Foot-Dragging, and Fence-Sitting: Member State Responses to Europeanization. *Journal of Common Market Studies*, 40(2), 193-214. pp.193

關係(two-level game)，換句話說是決策(ascending)與執行(descending)的關係。

除了歐盟將自身政策與價值向下輸送到成員國，使成員國的決策與組織邏輯重新定向。另一方面在國內層次，內部行為者會對國家施加壓力，希望國家在歐盟層面追求對行為者自身有利的政策。而成員國政府到了歐盟層面，會積極推動某些政策以滿足來自於本國內部之壓力。

另一方面布勒(J. Buller)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認為歐洲化太快被當成一個能夠形成某種具有影響力的過程。歐洲化是一套歐洲獨特治理模式影響(transform)了國內政治的情況(situation)。歐洲化作為一種情況而非過程(process)，代表歐洲化並非必然發生，而只是反映了某些不確定之新的社會互動型態之出現。而這裡的影響(transform)並非單純指的是改變(change)，還必須考慮到國內政治包含正式制度與非正式之規範與信仰、論述、政策等，發生變化的幅度為何，不能以暫時的制度變化為單一考量。<sup>62</sup>

歐洲化研究在發展了大約十年之後，歐洲化研究的意涵與架構已有了初步的規模。然而學界豐富的研究經歷了一段時間的發展之後，歐洲化研究新一代的發展漸漸與初期的研究內容與範圍有了分歧。

戴森(K. Dyson)將歐洲化研究分為兩個世代，第一個世代代表了自 1990 年代以來歐洲化研究的方向。<sup>63</sup>第一個世代的歐洲化研究將重點放在正式制度之上，注重歐盟在國內政治發展中的角色，強調歐盟制度與政策由上而下地影響了成員國內政治制度與政策的產出。歐盟正式制度與成員國內制度的不適應(misfit)形成了歐盟影響成員國內政治的前提條件；在這樣的過程當中，在第一代的歐洲化研究認為成員國多是非自願性地去回應歐盟帶來的影響。這樣一來，歐洲化過程最顯著的結果則是成員國國家力量與自主權明顯地弱化。

---

<sup>62</sup> Buller, J., & Gamble, A. (2002). Conceptualising Europeanisation. *Public Policy and Administration*, 17(2), 4-24. pp.17-19.

<sup>63</sup> Dyson, K., & Goetz, K. (2003). Europeanization in Context: Concept and Theory. In K. Dyson & K. Goetz (Eds.), *Germany, Europe, and the politics of constraint* (pp. 37-53). New York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戴森也整理了第二個世代的歐洲化研究與第一代的歐洲化研究的差異在於：不再只研究歐盟層面至成員國層面單一方向(top-down)的影響，同時注重成員國由下而上地(bottom-up)反饋且試圖影響歐盟層面政策與制度的產出。除此之外成員國間水平方向地相互影響(horizontal)也是研究的面向之一。在歐洲化的前提上更強調政治上動態的適應與適合：將利益、信念、價值與理念納入適應的概念中，與正式制度佔有相同比重。

另外戴森指出不能單以制度、政策上的不適應解釋歐洲化的產生，而應該將政策空隙(policy *ab ovo*)的概念也納入「不適應」的概念中。在南歐國家(西班牙、葡萄牙與希臘)的案例中，某些歐盟欲往下傳播的制度與政策概念，在這些國家政策中是處於空缺的情形，因此必須將受歐盟影響之新政策、制度的產生也納入適應的概念裡。

最後是國家行為者也有可能是為了傳達政策偏好，而非不適應的情形而上傳(uploading)政策偏好(policy reference)至歐盟層面。而國家也並非是非自願性地回應，而是透過自願性政策改變與學習達到政策適應的目標。總結來說，第二代歐洲化研究著重於歐洲化對於國內政治、制度與政策等的動態性影響。

拉達那利則是總結了至 2004 年為主的歐洲化研究，指出歐洲化研究可以被歸類於三種分析的途徑。第一種是歐洲化被當成是一種治理(governance)模式的向下傳播；再來歐洲化被視為是一種制度化(institutionalization)的過程；最後歐洲化可以由論述話語(discourse)的角度解釋：歐洲化研究提供了垂直過程與水平動態變化之外，並且提供了規範性與認知性框架，造成國內行為者因認知與知識交換而朝歐盟主流價值社會化的情形。<sup>64</sup> 換句話說，代表隨著成員國內的政治、制度與政策被歐洲聯盟影響，國內政治性論述的方向也會逐漸向以歐盟為主的價值靠攏。

近來貝切特(T. Beichelt)整理出歐洲化研究至今以來關於定義與範圍發展的兩個模型：第一個由上而下地強調國家制度與歐盟政策及制度不適應的情形與適

---

<sup>64</sup> Radaelli, C. M. (2004). Europeanisation: Solution or problem? pp.1-26.

應過程(top-down approach, misfit model);第二個是與國內政治與制度應因歐洲化而發生變革(transformation)的現象和過程。其中第二個方向與第一個方向類似，不過更強調國內因素對國內政治與制度的影響力。但是歐洲化研究中，各學者的定義都不脫萊德克的定義太遠。<sup>65</sup>

貝切特認為現存的兩種模式皆忽略了國家對歐盟的影響能力。即使將歐洲化過程中回饋(feedback, bottom-up approach)的途徑也納入考量，貝切特還是認為這兩種模式太過於注重歐盟的能力(European impulses)。<sup>66</sup>

因此貝切特提出了宏觀發展過程模式(macro-process model，請見圖 2-1)，排除了線性的適應過程，而是將歐盟是為一個場域(arena)，國家力量、歐洲聯盟與全球化力量在這裡形成交織且相互影響的影響效應。這一模式延續了拉達那利的歐洲化定義，包含了社會建構主義(Social Constructivism)的基本認知論述。論述說明藉由不同行為者的相互知識共享，能夠促進社會價值與規範的解構和重新建構。在這個模式中，雖然國內政治仍然深受歐盟力量影響，卻打破了以往模式中國家與歐盟間階層性的關係。<sup>67</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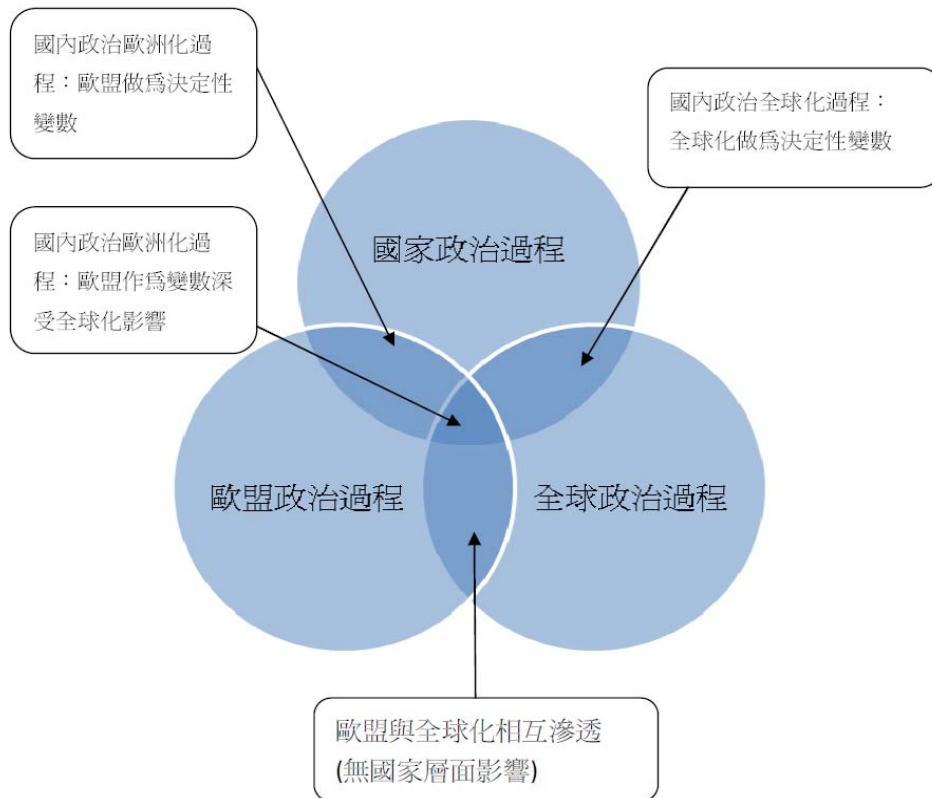
---

<sup>65</sup> Beichelt, T. (2008). Dimensions of Europeanisation In T. B. François Bafoil (Ed.), *Européanisation. D'Ouest en Est L'Harmattan* Frankfurt/Oder Logiques Politiques.

<sup>66</sup> Ibid., pp.8

<sup>67</sup> Ibid., pp.9

圖 2-1: 宏觀發展過程模式



來源：Beichelt, T. (2008). Dimensions of Europeanisation In T. B. François Bafoil (Ed.), *Européanisation. D'Ouest en Est* L'Harmattan Frankfurt/Oder Logiques Politiques, pp.7；作者自繪

## 二、歐洲化與歐洲統合

經過了新功能主義與政府間主義注重於對於統合歷史過程的解釋；新一代的歐盟研究將關注轉移至新的治理制度之發展。過去的歐洲統合理論重點在於解釋歐盟層面上所發生的變化，歐洲化研究則是讓國家層面的分析重新回到歐洲統合研究範疇當中。<sup>68</sup>此外歐洲化研究關注在歐洲統合的動力、方向以及如何發生的問題的性質不同。相較於其他統合理論注重國家與超國家制度間的平衡關係，歐洲化偏向於不預測，而是單純將焦點放在國家適應的層面。

在新一代歐盟研究中，歐洲化研究承接許多歐洲統合理論出現。歐洲化研究並非一個完整且全新的理論，而是歐盟統合研究中的新出現之綜合體。歐洲化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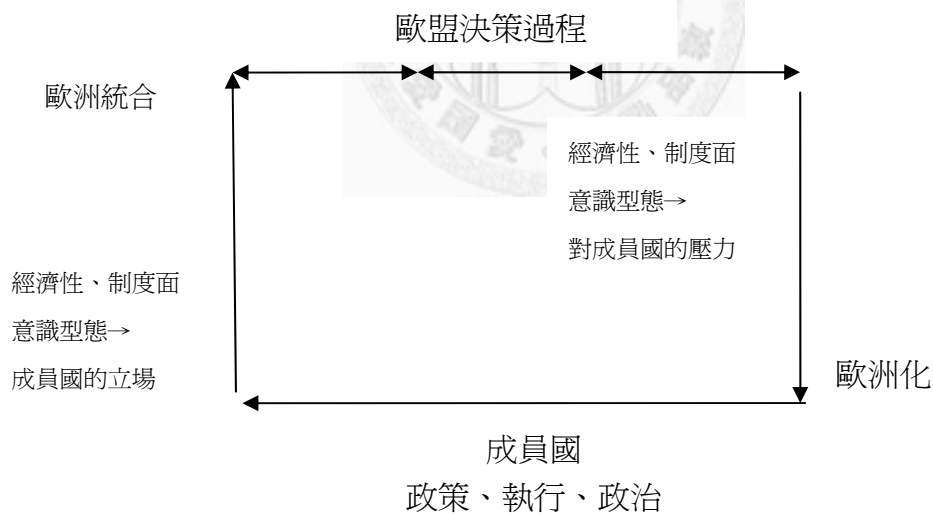
<sup>68</sup> Buller, J., & Gamble, A. (2002). Conceptualising Europeanisation, pp.8

究與歐洲統合理論也必須做一個明確的區分。統合理論與歐洲化研究在本體論(ontology)上有所差異。歐洲化研究的重點不在於解釋歐洲統合是屬於政府間主義或是超國家主義等本體論的問題。而是討論歐洲統合間對於成員國政策影響與效應等後本體論(post-ontological)的問題。<sup>69</sup>

歐洲化研究不同於新功能主義與政府間主義之處在於新功能主義提高了歐盟機構的地位與能力，歐洲化理論研究則是保留了國家權威與合法地位，強調由於實體環境的改變而造成國家內部政治與政策也隨之改變的過程。政府間主義論述邏輯雖然也是保有國家主體性，而國內政治與政策是受到歐盟影響而改變。

然而歐洲化研究與政府間主義的不同點是歐洲化的來源同時具有內生壓力與外生壓力。外生的壓力是來自於歐盟對於成員國內部政策與政治型態變遷的壓力。而內生的壓力是包含了內部政治因素的刺激。<sup>70</sup>

圖 2-2: 歐洲統合與歐洲化



來源：Schmidt, V. A. (2001). "Europeanization and the Mechanics of Economic Policy Adjustment" *European Integration online Papers (EIoP)* 5 (Figure. 1)

<sup>69</sup> Schmidt, V. A. (2001). Europeanization and the Mechanics of Economic Policy Adjustment. *European Integration online Papers (EIoP)* 5 : 3

<sup>70</sup> Ladrech, R. (1994). Europeanization of Domestic Politics and Institutions: The Case of France. *Journal of Common Market Studies* 32(1): 70-72.

在圖 2-2 中歐洲統合是在歐盟層面上運作，由成員國各自表達立場並參與歐盟決策的過程。而歐洲化是發生在歐盟決策完成之後，由決策性質帶給各個成員國不同性質的政策適應壓力。

不同於傳統統合理論有些趨向於預測國家角色之衰微，歐洲化研究將歐洲統合視為一個過程；研究重點並非是會員國是否被歐洲化至最後失去了主體能力，而是討論在這個過程中有哪些因素導致或促成了過程的繼續進行或阻礙。歐洲化研究提供了垂直過程與水平動態變化，並且提供了規範性與認知性框架國內行為者因認知與知識交換而社會化的情形。<sup>71</sup>

### 三、歐洲化的範圍與界線

當歐洲化研究受到學界重視，學者紛紛以歐洲化為研究對象形成為數眾多的歐洲化研究領域。而歐洲化研究學者多傾向將許多因成員國國內政治受歐盟影響而產生變化的現象視為不同程度的歐洲化，卻沒有明確的界線與種類。(Radaelli, 2000；Howell, 2004)

依薩多里(G. Sartori)的等級主義(Degreeism)的說法來看，原本歐盟成員國國內政治與歐盟政治是不同種類(different kinds)。<sup>72</sup>但在歐洲化研究中，成員國國內政治卻是被放在與歐盟政治同個光譜中。也就是所有因歐盟政治而發生變化的成員國國內政治現象都被當成「某種程度上的歐洲化」的時候，那又有什麼沒有被歐洲化影響呢？<sup>73</sup>

拉達那利認為有許多研究歐洲化的學者都傾向將歐洲化所能處理的範圍過於擴大。解決之道就是將歐洲化這一個綜合的概念「解構」(unpack)，且要先將歐洲化與其他三個概念分辨清楚。這三個概念是聚合(convergence)、調和一致化(harmonization)與政治統合。聚合作為歐洲化的結果之一而非同義詞，歐洲化的

<sup>71</sup> Radaelli, C. M. (2004). Europeanisation: Solution or problem?, pp.4-5.

<sup>72</sup> Sartori, G.(1991) Comparing and miscomparing, *Journal of Theoretical Politics*, 3(3) : 243-57.

<sup>73</sup> Radaelli, C. M. (2000). Whither Europeanization? Concept stretching and substantive change. pp.5

結果也有可能造成分歧。而歐洲化過程並不伴隨著一致化。

有學者曾在研究法國環境政策的文章中提到，即使歐洲化提昇了解決歐盟內部問題的能力，成員國間還是會為了解決問題的方法產生分歧。因成員國各國利益與制度文化不同形成的意見分歧，歐洲化並不能完全消除，只能減輕或是無法有任何作用。<sup>74</sup>

布爾默(S. Bulmer)對歐洲化的範圍和面向做出初步的分類，主要分為國家內部(intra-state)與國家間(inter-state)歐洲化現象。國家內部的歐洲化現象代表歐盟政策、規範、作為與價值對於國家國內政策行為發揮的影響力。包括了歐盟政策對於成員國內部政府作為與議程目標的影響力；歐盟的行為標準、價值規範是否已經被成員國接受並內化至國內行為。此兩方面的影響更影響了政府機構的作為與價值觀，甚至於憲政秩序。接著是國家間歐洲化現象，是牽涉國家政府對外的行事風格與實際作為，受到歐盟的影響。<sup>75</sup>

巴賽爾進一步指出了歐洲化影響了三個國內政治範疇：第一個是政策領域，歐盟政策在國內實施造成了成員國內部政策邏輯的改變，包括規範、途徑與論述。再來是政治過程的影響，在成員國內政治運作過程當中，意見與利益的匯集和回應接受到來自歐盟政治邏輯的影響。最後是國家政體，為了因應並適應歐盟政策與政治邏輯，成員國在歐洲化過程中，有可能改變國內固有的某些政治體制，除了司法、政治和行政架構改變之外，國家政治傳統與經濟制度、論述等都在被影響的範疇。<sup>76</sup>

---

<sup>74</sup> Ibid., pp.6.

<sup>75</sup> Bulmer, S., & Burch, M. (1998). Organizing For Europe: Whitehall, The British State And European Union. *Public Administration*, 76(4), 601-628.

<sup>76</sup> Börzel, T., & Risse, T. (2000). When Europe Hits Home: Europeanization and Domestic Change European Integration online Papers (EIoP), 4(15), 1-24. pp.2-4



表 2-1: 歐洲化影響的範圍

影響的層面	政策(policy)	政治(politics)	政體(polity)
影響的範圍	規範標準 工具手段 解決問題的途徑 政策的論述	過程： 利益形成 利益聚合 利益代表、請求 公共論述	政治制度 政府機關間關係 司法架構 公共行政機關 國家傳統 經濟制度 國家-社會關係 認同

來源：Börzel, T., & Risse, T. (2000). When Europe Hits Home: Europeanization and Domestic Change European Integration online Papers (EIoP), 4(15), 1-24 ;作者自繪

而根據拉達那利的看法，歐洲化的範圍包括了國內政治結構(domestic political structure)與公共政策(public policy)。<sup>77</sup>國內政治結構的範疇包含了政治結構、民意代表結構與認知與規範結構。政治結構(political structure)包括了正式制度、公共行政、政府間關係與法律結構。在公共政策方面，歐洲化對成員國內行政機關是否作為一獨立變數，經過研究說明了歐盟並不能作為一獨立的變數，而是應當作為一中介變數與其他因素綜和考量。<sup>78</sup>

在政府間關係的面向，拉達那利則提出巴賽爾的說法認為歐洲化提供了促使國內機會權力架構發生變化，資源重分配（resource redistribution）的可能性，後果則必須端視行為者的能力與制度設計而定。<sup>79</sup>

<sup>77</sup> Radaelli, C. M. (2000). Whither Europeanization? Concept stretching and substantive change. pp.5-15

<sup>78</sup> Hix, S., & Goetz, K. H. (2000). Introduction: European Integration and National Political Systems. *West European Politics*, 23(4), 1-26.

<sup>79</sup> Börzel, T., & Risse, T. (2000). When Europe Hits Home: Europeanization and Domestic Change. pp.6-7.

接著是民意代表結構，歐洲化使得某些政策議題在歐盟層面就被決定，使得政黨等利益團體無法直接在制定時，即時地發揮影響力。政黨等民意代表機關只能尋求制度內措施如否決權的運用對政策發揮影響力。<sup>80</sup>

最後是認知與規範結構，說明了歐洲化在影響成員國正式制度的同時，代表著政策和制度背後固有政治邏輯也重新被塑造成一個符合新制度的模式。這帶動了個人對於立法政策背後的政治邏輯的重新塑造，隨之而來的即是國內特定公共政策論述(specific discourse on public policies)的重建。與一般歐洲論述(general discourse on Europe)有所不同，特定論述的用處在於協助歐洲化在制度面影響成員國的過程，可以被認為是歐洲化的一個手段工具，也是一種結果。

舒密特說明了成員國接受歐洲化的層面有三：經濟面、制度面與論述。特定公共政策論述的用處就是經濟面與制度面在合法化過程中協助這兩面向的政策、制度適應更加順暢。<sup>81</sup>

而在公共政策方面，有為數眾多的歐洲化研究將焦點放置在國家內部政策上。歐洲化影響了政策所能賦予行為者權力大小、資源多寡、政策工具與風格等各面向的特色。龐大的影響層面顯示了歐盟在政策面上對成員國內部政策的可觀影響力。

## 第二節 歐洲化的內容與意涵

### 一、三步驟的歐洲化

歐洲化在上一節的定義中，學界大部分的看法是將歐洲化視為歐盟將在歐盟層面產出的政策向下傳播到成員國的一種「過程」。在這樣的過程當中，成員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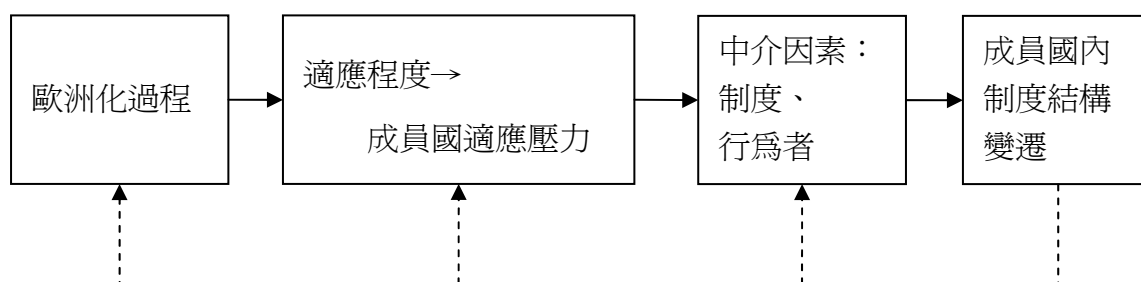
---

<sup>80</sup> Radaelli, C. M. (2000). Whither Europeanization? Concept stretching and substantive change. pp.11.

<sup>81</sup> Schmidt, V.A. (1997) "Discourse and (dis)integration in Europe: The case of France, Germany, and Great Britain", *Daedalus*, 126(3), Summer: 167-97.

家政治制度與歐盟層面政策間的「不適應」成爲了主要分析因素。<sup>82</sup>成員國國內政治制度因受到歐盟政策影響而產生由上而下的變化過程(Top-Down process)可以分爲三個階段來檢視。<sup>83</sup>(請見圖 2-3)

圖 2-3: 歐洲化過程與成員國國內變遷



來源：Cowles, M. G. (2001). *Transforming Europe.*, pp.6

首先歐洲化的過程指的是當在歐盟層面已經形成一系列包含完整正式、非正式的規範、規則、指令、程序與政策執行方法時，根據不同的政策領域內容，歐盟的政策規則與政治邏輯，和成員國原有的政策邏輯有極大的可能出現不符的情況，會促使歐盟政策與政治邏輯向下傳播至成員國國內，而形成不同的歐洲化過程，形成了歐洲化研究初步的框架。

## 二、歐洲化的機制與不適應的概念

這些歐洲化過程會對成員國形成適應的壓力(Adaptational Pressure)，成員國們國家內部原有的政治制度與邏輯和歐盟間的差距形成了適應程度(the goodness of fit thesis)的不同或是不適應。<sup>84</sup>

<sup>82</sup> Beichelt, T. (2008). Dimensions of Europeanisation. pp.3

<sup>83</sup> Cowles, M. G. (2001). *Transforming Europe.* Ithaca, N.Y. :,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pp.6-12.

<sup>84</sup> Lægreid, P. (2000). Europeanization and Domestic Administrative Response. *ARENA seminar*, 1-31.; Mastenbroek, E., Michael Kaeding. (2006). Europeanization Beyond the Goodness of Fit: Domestic Politics in the Forefront1. *Comparative European Politics*, 4(4), 331-354.; Börzel, T. A., & Risse, T. (2003). Conceptualizing the Domestic Impact of Europe. In K. Featherstone & C. M. Radaelli (Eds.), *The Politics of Europeanization* (pp. 57-82).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如果成員國原有的政治制度與邏輯與歐盟越符合，則適應壓力越小；反之適應壓力則越大。然而在討論適應程度的概念時，必須分清楚兩方面的概念：第一是制度不適應與政策不適應；政策不適應指的是政策內容導致了不適應，而制度不適應指的是規則、規範風格與政治架構不同導致的不適應。第二個則是法律現狀與事實現狀之間的差異：代表著很多時候實際存在的規範，其實並未在法律中明文規定。<sup>85</sup>在歐洲化國家適應的過程中必須特別考慮到這類的因素。

透過適應程度的論題討論，藉此了解歐洲化過程中不同歐洲化的機制(mechanisms)，會造成成員國國內政策領域有不同的變遷方向。歐洲化的機制通常分為三種，第一種是強調在制度方面的適應。主要是針對歐盟新興的政策領域積極地統合例如環保、工作環境安全與消費者保護等，在這種情況下，歐洲化過程為由歐盟直接創造出一種新的歐洲模式(European Model)作為模版(templates)，迫使成員國適應這樣一個各國一致的政策。而不同國家的制度適應能力(institutional compatibility)決定了國家適應的結果。<sup>86</sup>

其次則是消極統合，就成員國原有的政策如市場政策等固有且重要的政策領域，如果與歐盟自由化共同市場機制的要求使得國家制度出現不適應的狀態，則歐盟會採取重塑國家市場政策的方式。隨著市場情況的不同，而做出適當地促進市場自由的調整。當經濟統合加深，對於物品人力與資本的跨國流動需求增加，影響國家政府修正市場政策，使其與歐盟政策方向更加貼近。<sup>87</sup>

因此有可能不會出現一個一致的政策迫使成員國跟從。而且歐盟藉著改變國內的市場遊戲規則與資源分配，並且重新形塑國內的制度機會結構(domestic or institutional opportunity structure)來影響會員國內政策與政治制度。

---

<sup>85</sup> Mastenbroek, Ellen, (2005). EU Compliance: Still a 'Black Hole'? *Journal of European Public Policy*, 12:6, p.1109.

<sup>86</sup> Knill, C., & Lehmkuhl, D. (1999). How Europe Matters. Different Mechanisms of Europeanization *European Integration online Papers (EIoP)*, 3, 1-20.; Radaelli, C. M. (2000).; Schmidt, V. A. (2001).

<sup>87</sup> Knill, C., & Lehmkuhl, D. (1999). How Europe Matters. Different Mechanisms of Europeanization. pp.2

最後是認知的統合，除了上述各項政策之外，還有更多政策領域如共同體鐵路政策等，等待著由歐盟來帶動政策的聚合。然而歐盟是利用激起會員國內部討論並最終走向支持由歐盟帶領的制度改革。歐盟藉著制訂指標性、象徵性的法規，而其他政策空白部分則留給各會員國自行依循歐盟價值規則訂立相似卻又各自不同的政策，並由各國自行處理細節與價值衝突的部分。而最終的目的在於加深各國人民對自身國家改革的支持，進而加深對於歐盟與歐洲統合的信心與信念。

拉達那利進一步擴張了三種機制的整理，說明了前兩種機制在治理上具有階層性，由歐盟上對下地主導統合並要求成員國達成要求。而認知統合在治理方式上除了傳統的政策法規等硬性法(hard law)之外，還加入了開放協調法(Open Method of Co-ordination)等軟性法(soft law)的治理方式。除此之外，拉達那利認為成員國政策執行(Implementation)方法上，會出現議價(Bargaining)的方式，使得歐盟與個別成員國間共同找出最適合的執行方式。<sup>88</sup>

### 三、適應壓力的概念

舒密特認為依據政策領域的不同會帶來不同的適應壓力(Adaptational Pressure)，而歐洲化的機制也會出現不同的模式。<sup>89</sup>如金融、環境標準等領域的統合，需要成員國政策高度一致或聚合(Convergence)，因此適應壓力較大，歐盟會用較強烈(Coercion)的態度與要求成員國適應歐盟政策。接著會依照各政策領域所形成的適應壓力不同，形成適應(Adaptation)、模仿(Mimesis)、規範競爭(Regulatory Competition)與認知形塑(Framing)<sup>90</sup>等不同的歐洲化機制，達到不同政策領域的歐洲化目標。

<sup>88</sup> Radaelli, C. M. (2004). Europeanisation: Solution or problem? pp.6.

<sup>89</sup> Schmidt, V. A. (2001). Europeanization and the Mechanics of Economic Policy Adjustment European Integration online Papers (EIoP) 5, p.7-13

<sup>90</sup> Radaelli, C. M. (2000). Whither Europeanization? Concept stretching and substantive change. pp.16-19.

拉瑞德(P. Lagreid)曾經就北歐四國不同的政治結構特色與適應壓力討論兩者與適應行為間的關係。<sup>91</sup>其中他認為適應壓力除了與各個國家本身的政治結構特色有關之外，也會隨著加入歐盟與否和時間長短有所差異。(請見表 2-2)

另外，不單是會隨著國家改變，不同層面與領域也會出現程度不一的適應壓力。在拉瑞德的研究當中，非成員國指的是如挪威加入歐洲經濟區(European Economic Area, EEA)卻未加入歐盟之國家。

表 2-2: 加入時間長短與適應壓力

	內部組織	統合網絡	歐洲執委會參與	政策指導原則	歐盟影響力
非成員國	低	低	高	低	高
舊成員國	低	中等	高	中等	低
新成員國	低	高	高	高	中等

來源：Lagreid, P. (2000). *Europeanization and Domestic Administrative Response*, pp.6.

第一項是中央政府組織型態，由於歐盟尚未發展出一套確立的中央政府組織型態，因此對成員國或非成員國來說，這一方面的適應壓力是很低的。第二項是統合網絡(Corporative Network)，歐洲統合的結果使歐盟發展出獨特的多層次治理(Multi-level Governance)模式。在歐盟決策過程中，國家內部利益團體的意見能夠繞過國家層次直接參與歐盟層次的討論，再加上歐盟決策模式與國家內部原有統合主義決策過程有所相異而產生衝突或不適應。這兩個因素導致了新加入歐盟的成員國承受了較高的適應壓力，必須適應新的歐盟治理與決策模式與原有國家統合主義式決策過程間的差異。

第三項是執委會的參與，在這一項三者的壓力都很高是因為執委會作為歐盟重要的決策機構，所做出來的決策皆對歐洲地區有決定性的影響。即使連非成員國，如拉瑞德提到的挪威，也因為被允許參與在執委會裡由專家委員會所主導的

<sup>91</sup> Lagreid, P. (2000). *Europeanization and Domestic Administrative Response*. ARENA seminar.

正式決策前的準備過程(decision-shaping process)。因此在這一項上，新舊成員國與非成員國受到的適應壓力皆都很高。

第四項是政策指導原則，新成員國因為還處於適應和學習的階段，對於歐盟政策的一般指導原則，跟舊成員國相較，還無法完全地「社會化」與「內化」到自身國內政策邏輯當中。非成員國則因為尚未加入歐盟，更沒有執行歐盟政策的義務，因而沒有類似的壓力。最後是歐盟影響力，包括了執委或或是執委會底下的專家委員會。在這一項非歐盟成員國因為加入了 EEA 必須執行相應的政策，卻不被允許加入正式的決策過程，非成員國與歐盟間權力最不均等。新成員國在適應過程中也會遭受相當程度來自於歐盟的壓力。<sup>92</sup>

由上述可以讓我們了解歐洲化過程當中，不同政策領域會形成不同的歐洲化過程與策略。而成員國特性與條件的不同，會對成員國在不同層面引起不同程度的適應壓力。

拉達那利曾對於適應程度論題說明並非所有國內制度都相當脆弱且不堪一用，歐洲化與國內制度間的關係應該是辯證的(dialectic)。他認為適應壓力與歐洲化間的關係是曲線性的。即是當適應壓力很低時，則沒有必要改變國內制度；但是當適應壓力非常強，成員國會傾向採取不同的方式適應甚至是拒絕歐洲化過程(opt-outs)。<sup>93</sup>

這也是我們稍後會談到的成員國對於歐洲化的回應與策略的部份。學者普遍認為適應壓力與適應程度論題能夠作為一個起點，成為未來歐洲化研究更多元及精細的基礎。

---

<sup>92</sup> Lagreid, P. (2000). "Europeanization and Domestic Administrative Response." ARENA seminar, p.5-8.

<sup>93</sup> Radaelli, C. M. (2000). Whither Europeanization? Concept stretching and substantive change. pp. 21

#### 四、影響國家適應行為的中介因素

由上而下的歐洲化過程依照圖 2-3 的步驟，介紹過了歐洲化形成與適應壓力之後。接著在國家因適應壓力而接受歐洲化的過程中，還有許多中介因素 (Mediating Factors) 會影響國家在適應過程中的行為、選擇與結果。

歐洲化研究學者針對歐洲化的中介因素提出了許多不同的見解。包括了制度能力與歐盟政策產生的時機，政治組織文化等。舒密特整理出了五項歐洲化過程中，影響成員國產生不同的結果與適應行為。<sup>94</sup>

第一項是經濟脆弱度(Economic Vulnerability)作為主要的原因，在面臨經濟危機與經濟脆弱度較高的國家會比經濟規模較大、較穩定的國家更願意開放對於政策的調整。

第二項為政治制度的彈性(Political Institution Capacity)決定了國家對於新政策的態度與接納程度。政治制度包括了制度安排(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與在政治制度脈絡底下發生的政治互動(Political interaction)，其中關鍵的一點是決策過程中，國家制度提供的否決點(Veto-point)。在決策過程中，正式決策行為者的多寡與社會利益團體納入與否的制度設計，影響了國家的適應行為。當否決點越多、政治權力越分散時，決策者必須考慮其他決策者及機關，以及社會力量的意見；這樣一來適應行為必然不能快速且必須與國內多方協商之後才能執行。<sup>95</sup>

第三，政策軌跡(Policy Legacies)對於國家適應歐盟政策的過程中，引發了「適合與否(fit)」的問題。國家長期政策發展的邏輯與脈絡和新產生的歐盟政策能否相符與適應，成為在適應行為中重要的中介因素。

第四，政策偏好(Policy Preference)則是決定了參與決策行為者的理念與偏好。就利益面來看，行為者經由理性計算之後所形成的政策偏好；就理念觀察，

---

<sup>94</sup> Schmidt, V. A. (2001). Europeanization and the Mechanics of Economic Policy Adjustment. pp.4-7.

<sup>95</sup> Radaelli, C. M. (2000). Whither Europeanization? Concept stretching and substantive change .pp.21-22.



原有的社會共享知識與規範決定了行為者對於歐盟政策的喜好或厭惡，造成參與決策行為者在制度安排之下，再加上政策偏好的作用，影響了新政策的執行結果或是不通過。

最後是論述(discourse)，舒密特在論述對於成員國在歐洲化過程中的接受、執行或反應上著墨甚多。舒密特曾經提出「論述制度主義(Discursive Institutionalism)」，說明偏好的改變或是一項新的政策能夠被成員國內部意見所接受，必須注意並重視論述的力量。論述能夠在協商和施行的過程中給予政策決定者能力。<sup>96</sup>

國內論述的方向與政策施行的方向相同，則有助於成員國接受並適應新的歐盟政策；反之歐盟政策不能為國內論述所接受的話，則政策的施行會十分的困難。另外論述能夠藉由提醒先前政策的失敗或改變一般認知邏輯，幫助歐盟政策成為政策偏好所支持的那一方。然而論述的作用必須搭配其他的中介因素，才能發揮解釋的能力。<sup>97</sup>

## 五、成員國家的回應與策略

歐洲化作為一個雙向的過程，包含了由下而上與由上而下兩種不同的層面。<sup>98</sup>在討論了歐洲化過程由上而下地影響了成員國內的政治制度與政策之後，接下來開始討論成員國在面對來自於歐盟政策要求成員國適應的壓力時，會有什麼樣的反應與回應。歐洲化過程會造成成員國家不同的反應和國內制度、政策邏輯等產生變遷。<sup>99</sup>

---

<sup>96</sup> Schmidt, V. A., 2002. *The futures of European capitalism*, Oxford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sup>97</sup> Schmidt, V. A. (2001). Europeanization and the Mechanics of Economic Policy Adjustment. pp.5-7.

<sup>98</sup> Borzel, T. (2002). "Pace-Setting, Foot-Dragging, and Fence-Sitting: Member State Responses to Europeanization." *Journal of Common Market Studies* 40(2):193-196.

<sup>99</sup> Börzel, T. (2000). When Europe Hits Home: Europeanization and Domestic Change. pp.10. ; Radaelli, C. M. (2000). Whither Europeanization? Concept stretching and substantive change. pp.14-15.

成員國家內部發生的變遷包括了維持現狀(Inertia) 或拖延(delay)、吸收(Absorption)、典範上的變遷(Transformation)與縮減(Retrenchment)。<sup>100</sup>

維持現狀是發生在當成員國發現歐盟政策與國內現存政策、制度或是政治邏輯差距太大，無法順利地適應時，成員國會傾向於盡量地維持現狀，或是採取拖延的策略來規避來自於歐盟的適應壓力。然而這樣的策略只能維持一段時間，長期來看成員國無法永遠地採取維持現狀的策略。

而當成員國的制度有足夠的彈性足以承受來自於歐盟的適應壓力，成員國會吸收歐盟政策到國內，並將政策內化且轉換成適合在成員國內施行的政策。在這樣吸收的過程當中，歐盟政策帶來的變化是不會改變成員國制度本身基本核心(core)邏輯。因此，在不牽涉國家制度基本邏輯的前提之下，成員國能夠順利並成功地將歐盟政策帶進會員國內層面。

第三種是國家政治典範變遷。此種國內制度與政策產生的變遷是根本性的。對成員國家來說，是一種國家內部基本的政治行為模範(paradigmatic)的變遷。最後一種是縮減，代表在歐洲化過程中，成員國國內政策不但沒有朝歐洲化的方向進行，反而朝與歐洲化反方向的方向進展。

從歐洲化過程是由上而下過程的角度來看，成員國似乎只有被動地選擇接受或拒絕歐盟政策的歐洲化。巴賽爾說明了歐洲化過程實際上具有兩個層次，除了由上而下的傳播歐盟政策之外，還有由下而上地成員國爲了自身利益而上傳政策與意見的過程。<sup>101</sup>

---

<sup>100</sup> Radaelli, C. M. (2000). Whither Europeanization? Concept stretching and substantive change. *European Integration online Papers (EIoP)* 4(8). 在Börzel與Risse(2000)的分類中，國內變遷的程度由低至高爲：吸收(Absorption)、適應(Accommodation)與典範變遷(Transformation)。其中適應(Accommodation)的意涵在Radaelli的說法中與吸收(Absorption)相同，並引用Héritier(1998：21)的說法。Héritier, A. (1998) *Differential Europe: Administrative responses to Community policy, Paper presented to the conference on Europeanization and Domestic Change*, EUI, Florence, 19-20 June 1998.

<sup>101</sup> Dyson, K. a. K. G. (2003). *Germany, Europe, and the politics of constraint*. New York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Howell, K. E. (2004). *Developing Conceptualisations of Europeanization: Synthesising Methodological Approaches. Queen's Papers on Europeanization* 3.

這樣的政策上傳(Policy Uploading)過程在國內層次，代表國內政治與社會行為者會對國家施加壓力，希望成員國在歐盟層面追求對行為者自身有利的政策。而成員國政府到了歐盟層面，也會積極推動某些政策以滿足來自於本國內部之壓力，藉此將國內反對力量壓至最小。

另一方面，由成本計算概念可以解釋，成員國是以自身利益作為重要考量。在歐盟政策產生過程中，成員國在歐盟層面先追求形塑歐盟政策(uploading)，將政策塑造成與成員國本身制度與利益最一致的狀態。成員國藉此能夠在政策適應的過程減少國家的適應成本。

成員國會依照自身國內情況選擇不同的回應策略。<sup>102</sup> 對於成員國來說，最好的方法是將國內制度邏輯上傳至歐盟層面。這樣一來，成員國能夠在歐洲化過程中可以最大化自身利益，最小化制度適應帶來的成本。<sup>103</sup> 成員國政府的目標就是在歐盟決策與執行過程中佔有重要位置，藉此形塑歐盟政策使其與國內政策邏輯相符。<sup>104</sup>

成員國在歐盟決策過程當中，決定國家策略時所考量的因素包括了政策偏好與行動能力。這些考量因素牽涉到了成員國家的經濟發展程度與法規完善程度。以各類管制政策(Regulatory Policies)為例，經濟發展較佳的國家有可能已經發展出較為完善的法律規範；而經濟發展程度較不佳國家的相關法規離歐盟的要求還有一段距離。因此巴賽爾提出了歐盟成員國在面對來自於歐盟統合與歐洲化的適應壓力時，會出現主動(pace-setting)、拖延(foot-dragging)與靜觀其變(fence-sitting)等不同的態度。<sup>105</sup>

主動的態度(pace-setting)代表了成員國基於國內政策偏好與利益，在歐盟層面主動積極地想要將歐盟政策形塑成符合本國利益的方向。以德國在歐盟環境政

---

<sup>102</sup> Ibid., pp.194.

<sup>103</sup> The more a European policy fits the domestic context, the lower the adaptation costs in the implementation process. Borzel, T. (2002). Pace-Setting, Foot-Dragging, and Fence-Sitting: Member State Responses to Europeanization. pp.196.

<sup>104</sup> Ibid., pp.195.

<sup>105</sup> Borzel, T. (2002). Pace-Setting, Foot-Dragging, and Fence-Sitting: Member State Responses to Europeanization. pp. 196-208.

策中為例，基於國內汽車製造產業的需求，德國政府積極地追求在歐盟環境相關法規政策中，減輕汽車排放標準部分的要求。<sup>106</sup>同時，抱持主動態度的成員國也會與其他同樣抱持主動態度，但卻擁有分歧主張的成員國在歐盟決策過程中競爭。競爭方式不單單是在法案表決時，由成員國追求通過或否決；還包括了在先前的步驟，即決策草案擬訂時，成員國就會提供相關資訊給予歐盟執委會，協助且試圖影響政策草案的樣貌。<sup>107</sup>

成員國採取拖延(*foot-dragging*)的態度，是因為歐盟政策所提出來的要求往往帶給原本經濟表現不佳的國家更多、更沈重的財政負擔。帶來財政負擔的同時，歐盟政策的要求如環境保護標準也會讓這些國家在對外貿易上產生新的障礙。因此成員國不願意遵守歐盟政策的要求，選擇抱持拖延的態度。然而拖延的態度不能成為長久的方針，而事實上成員國採取拖延且反對通過歐盟政策的態度是因為想要在其中獲得某部分的補償。所獲得的補償並不能彌補成員國所損失的經濟及各方面效益，更加深了成員國不服從(*Non-Compliance*)的態度。<sup>108</sup>

採取靜觀其變(*fence-sitting*)態度的成員國會對歐盟政策抱持著漠不關心(*indifferent*)或是中立(*neutral*)的態度，但是會分別在不同議題上與支持或是反對的國家合作推動或抵制歐盟政策。換句話說，成員國不會試圖上傳政策偏好到歐盟層面；也因為主動積極的國家所推行的政策草案，與自身國內現行相關政策有相符之處，因此不會有任何可預見的損失。也有可能是因為成員國錯估了歐盟政策施行到國內所需的成本，或是這些成本是可接受的。第三種可能是成員國國家政府能力不足，即使國家內部支持歐盟政策，但沒有足夠政府能力施行完善的歐

---

<sup>106</sup> Ibid., pp.197-198.

<sup>107</sup> Ibid., pp. 198-200. 德國與荷蘭在執委會與歐洲議會等機關，安排了大量專家，試圖在環境政策領域影響決策的擬訂過程。

<sup>108</sup> 請見 Borzel, T., (2003). Why do states not obey the law? Non-compliance in the European Union, *EUSA Conference, Nashville*. March. 27-30. ; Mastenbroek, E. (2005), EU Compliance: Still a „Black Hole“? *Journal of European Public Policy* 12 (6): 1103-1120. ; Versluis, E. (2007), Even Rules, Uneven Practice: Opening the “Black Box” of EU Law in Practice. *West European Politics* 30 (1): 50-67.

這些國家自身各方面法規並沒有一個完善的框架與論述，再加上沒有足夠的財力與人力資源上傳政策到歐盟層面。因此這些國家試圖以阻礙或拖延歐盟政策，尋求補償或再其他方面獲得好處。

盟政策。最後是即使有成員國反對某項歐盟政策，然而他們所採取的行動並非再決策過程中反對歐盟政策，而單單只是不執行歐盟政策，且忽視歐盟施加的政策適應壓力。

### 第三節 歐洲化與歐洲認同

#### 一、新制度主義的影響

歐洲化研究與新制度主義有很密切的關係。<sup>109</sup>新制度主義說明了制度作為一個重要的因素影響了歐洲化的過程。國內制度系統受到獨特歐洲政治系統影響所形成的制度化。歐洲聯盟在超國家層面建立一權威性的政治系統，產生了對成員國制度的創造與聚合現象。

外來新制度型態的傳播有可能對於成員國國內制度形成新的束縛、壓力，如私有化造成了原本由國家壟斷的產業造成國家主導能力下降，抑制了國家原本的裁量權力。但也有可能對於國家固有政策造成強化的作用，例如原本已有發展區域政策的國家，歐盟區域政策的產生對國家原有政策形成強化的作用。而對於至於在尚未發展區域政策的國家，則形成刺激與催化的作用。

在政治行為者方面，歐盟新自由主義觀念的散播，有可能造成傳統左派政黨減少。歐洲議會直選也對於各國內部選舉過程、政黨與政黨系統形成影響。但歐盟的存在也給予了利益團體新的政治結構與表達途徑。<sup>110</sup>

新制度主義產生的背景在 1960 到 1970 年代，為了回應行為主義(Behaviorism)的主張，分析目標多放在跨國公共政策的比較，且將重點放在國內制度結構如何

---

<sup>109</sup> Schmidt, V. A., & Radaelli, C. M. (2004). Policy Change and Discourse in Europe: Conceptual and Methodological Issues, pp.183-210.; Mastenbroek, E., Michael Kaeding. (2006). Europeanization Beyond the Goodness of Fit: Domestic Politics in the Forefront1. *Comparative European Politics*, 4(4), 331-354.

<sup>110</sup> Hix, S. and Goetz, Klaus H. (2000). Introduction: European Integration and National Political Systems. *West European Politics* 23(4), pp.10-11.

影響了法律、組織利益、選舉與司法間相互關係。哈爾(Hall)以及泰勒(Taylor)將新制度主義途徑分為三種，分別是理性選擇制度主義(rational-choice institutionalism)、歷史制度主義(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社會學制度主義(sociological institutionalism)，代表了不同面向的制度主義概念。<sup>111</sup>

歷史制度主義將制度視為國內政治組織架構中正式或非正式規則程序、規範與傳統等因素的呈現。行為者在理性計算的邏輯下，會選擇循著現存制度使行為成本降到最低。並且行為者同時會受到理念(ideas)的影響，在現存制度形成的脈絡之下相信現存制度會是較佳的選擇。

因此歷史制度主義者認為制度一旦被建立，會遵循著路徑依賴(Path Dependence)的邏輯，一直在歷史過程中被強化而持續不斷。<sup>112</sup>路徑依賴是指當行為者面臨選擇的時候會選擇經由長時間積累而成的、習慣性的行為模式，而對其產生依賴，現存的制度也就成為行為者首要的選擇。歷史制度主義同時關注關鍵時刻(critical juncture)<sup>113</sup>以及歷史遺緒(Historical Legacies)的存在對形成路徑依賴的影響。布爾默就曾經用關鍵時刻來分析英國政府被歐洲化所影響的情況。<sup>114</sup>

而新制度主義中的理性選擇制度主義以人性自利為假設，透過理性計算的結果會選擇合作以解決集體行動的難題。特定制度的產生說明了行為者以最小化成本、最大化利益的理性邏輯選擇能使每人皆獲得最大利益的結果。<sup>115</sup>有學者認為依循著後果性邏輯(the logic of consequences)，說明了歐洲化過程當中歐盟提供了促使國內機會權力架構發生重分配(resource redistribution)的可能性。而當國內政治架構發生重分配的情形時，行為者偏向經由理性計算之後，會做出相對應的行為來處理國內政治被歐洲化所影響的情況。

---

<sup>111</sup> Hall, P., & Taylor, R. (1996). Political Science and the Three New Institutionalism. *Political Studies*, 44(5), 936-957.

<sup>112</sup> Ibid., pp.936-942.

<sup>113</sup> 造成制度在短期間內形成大幅度的轉變的重要時間、事件因素。

<sup>114</sup> Simon Bulmer, M. B. (1998). Organizing For Europe: Whitehall, The British State And European Union. *Public Administration* 76(4), pp.601-628.

<sup>115</sup> Hall, Peter and Rosemary Taylor, (1996). Political Science and the Three New Institutionalism. pp. 942-946.

國內政治歐洲化的結果則必須端視行為者的能力與制度而定，這些因素能夠決定適應的結果會有所不同：第一個決定歐洲化程度的因素是制度內的多重否決點(multiple veto point)是否能夠提供行為者抵抗外來的適應壓力。當制度無法協助行為者抵抗來自於歐盟的適應壓力，有可能迫使行為者必須行為使國內政治去符合來自歐盟的要求。

第二個是國內正式制度(formal institutions)提供實質與理念上的資源，是否幫助行為者將適應壓力引導至有利於行為者自身的方向。因此理性選擇制度主義認為歐洲化會引起國內不同力量的權力重分配，進而形成不同的資源制度重新配置的情況。<sup>116</sup>

最後是社會學制度主義的適當性邏輯(the logic of appropriateness)，說明行為者固然透過理性選擇，但是個人理性是受到特定文化與社會價值理念所影響的。制度是由社會建構且使行為者視為「理所當然(taken for granted)」，因此必須由社會既定框架來理解行為者與制度間的關係。<sup>117</sup>

社會學制度主義解釋歐洲化對國內政策、制度的影響，歐盟政策、規範與共享知識對於國家內部固有的知識與認知造成不同程度的衝擊，這也促使了成員國在國內進行不同的調適。兩項內化新規範與新認同過程中的調和因素包括了能動者(Change agents)與規範創造者(Norm entrepreneurs)推動了國內論述的改變並且促使其他人重新塑造認同與利益；政治文化或是其他非正式制度存在有助於塑造共識。因此社會學制度主義認為歐洲化是經由國內社會化與集體學習的作用推動國內認同與價值利益的變遷過程。<sup>118</sup>

---

<sup>116</sup> Börzel, T. (2000). When Europe Hits Home: Europeanization and Domestic Change. pp.1-2.

<sup>117</sup> Hall, P., & Taylor, R. (1996). Political Science and the Three New Institutionalism. pp.946-950. °

<sup>118</sup> Börzel, T. (2000). When Europe Hits Home: Europeanization and Domestic Change. pp.1

## 二、歐洲認同的形成

經過了前述有關歐洲化與歐洲化研究相關的介紹之後，接下來的部分將針對成員國對於歐盟的認同出現的脈絡與可能途徑做一研究。

首先在歐洲化研究中，除了新制度主義途徑之外作為解釋歐洲化出現的途徑之一，另外社會建構主義也是作為解釋歐洲化過程現象中的一種理論。德蘭笛(G. Delanty)與朗弗德(C. Rumford)曾經就社會建構主義來解釋歐洲化。他們認為歐洲化研究忽略了國家-社會間的關係，除了實證性研究之外，規範性研究也有不能輕忽的重要性。

歐洲化研究不能單是由國家政府與功能性的角度解釋歐洲化，社會建構主義認為社會真實(Social Reality)其實是由多樣化的來源所建構出來，而且此建構的過程不能被化約成如新制度主義所主張的單純結構與能動者的關係。建構主義提供了有別於政府間主義與行為者中心途徑的解釋。<sup>119</sup>

建構主義將重點放在價值觀的角色、規範與認同。<sup>120</sup>這一過程需要以社會為研究目標的理論來解釋。因此德蘭笛與朗弗德認為由社會面切入解釋歐洲化會帶來與其他歐洲化研究理論框架不同的角度。第一是這樣的理論角度不必然將歐洲統合與歐洲社會的出現劃上等號，因為在現今歐洲統合的過程中尚未出現歐洲社會這一概念。

第二則是歐洲化與歐盟必須被放在全球角度下被檢視。針對現在技術、金融與人口流動，再加上跨國家、跨地區的信仰理念團結等現象，世界主義式認同(cosmopolitan identification)解釋了這些現象的發展。<sup>121</sup>

---

<sup>119</sup> Delanty, G., & Rumford, C. (2005). Theorizing Europeanization: towards a constructivist theory of society *Rethinking Europe : social theory and the implications of Europeanization* (pp. 1-27).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Pp.13

<sup>120</sup> Ibid., pp.2.

<sup>121</sup> Ibid., pp.5; Rumford, C. (2005). Cosmopolitanism and Europe. *Innovation: The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s*, pp. 1-9.; Beck, U., & Grande, E. (2007). Cosmopolitanism: Europe's Way Out of Crisis.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Theory*, 10(1), 67-85.



在這樣的前提下，歐洲化是發生在全球社會之下，因此必須放在全球社會變遷動力的脈絡底下研究。社會在多方面的全球化情況下被社會行為者與公共論述所建構的，則歐洲是由不同的設計、論述話語、社會模式、想像與爭論主張在全球化過程中散佈與互動中所建構出來的。這樣社會建構主義途徑的看法對歐洲化下了不同於其他學者對歐洲化所下的定義：必須以超越制度性架構，由社會的動態性來解釋歐洲化；文化動力(cultural dynamics)的被重視；歐洲轉化過程中多方議題的爭論中心，要放在全球脈絡下以了解歐洲發展；對歐洲轉化的問題被政治科學論述解釋的不滿。<sup>122</sup>

在這樣的看法當中持續地提到歐洲化與全球化兩者是被連結起來；要想解釋歐洲化的過程，必須放在全球化的脈絡下研究。全球化的發展在世界各地造成不同的斷裂化(fragmentation)，使得城市與鄉村脫離過去此一區域地理歷史的發展，造成文化、歷史的斷裂。也因此歐盟所領導歐洲區域的歐洲化會與全球化所形成的斷裂，在歐洲內部歷史文化轉變的過程中引發了緊張關係。

然而歐盟成員國的增加與歐盟在全球經濟上的角色，又給予了歐盟一個促進全球化發展的角色。也就是說歐洲化的動力是被全球化過程與社會轉變而形成的嶄新形式所包裝。

總而言之，社會建構主義認為歐洲化也代表了是對於歐洲的社會建構的一種過程。歐洲化是歐洲各成員國藉由與歐盟和其他成員國的互動中，或出現社會性的相互滲透；歐洲化的重點在於代表了藉著集體認同與脈絡解釋國家和跨國的利益建構，進而形成國家的轉變。

新制度主義同樣地重視文化與認同的作用，但還是將重點放在能動性(agency)上。而社會建構主義以認同解釋歐洲化過程中出現的現象；歐洲化作為論述與認知結構的轉變。不同的認同、利益與社會設計使新型態的社會真實出現。

---

<sup>122</sup> Ibid., pp. 7.

最後是歐洲化代表了現代性的轉變。也就是說，歐盟擴大與後共產國家的加入，再加上全球化脈絡的影響，歐洲地區出現了新的現代性模式。在歐洲，不同的社會建構邏輯正在發生，由集體認同與想像與到新的國家-社會關係等。

瑞斯(T. Risse)則是以討論合法性需求出發，來討論集體認同(collective identity)。<sup>123</sup>他認為根據歐洲統合到 21 世紀後的發展並沒有，也不可能有任何條約或政策規範要求歐洲聯盟內部人民轉移認同至歐洲。

然而當歐盟內部出現越多的競爭與交往，再加上歐盟超國家組織下的共同決策對成員國內部政治的影響，是可以期待在未來出現的歐盟政體效應下，個人與社會群體改變看待自己與歐洲的關係。而這樣的觀點也解釋了歐洲化與歐洲認同出現的相關性。

而歐洲化研究大多重視成員國內有關於歐盟政策與適應壓力對成員國的影響。瑞斯則是特別注重在歐洲化過程中把「人」納入，並作為相互主體的意涵。作者並用社會認同與自我分類理論(self-categorization theories)解釋歐洲認同。<sup>124</sup>

自 1950 年開始隨著歐洲統合的進行，歐洲內部出現了社會運動，催生了歐洲統合的加速進行；其後更促使了歐洲跨國性政黨的出現。再加上成員國家間交往和成員國與歐盟的互動、歐洲化過程等促進了個人，特別是政治菁英與社會群體的歐洲集體了解。<sup>125</sup>各國政治菁英過去原有對於歐洲的認同會受到歐洲秩序概念、歐洲概念架構等會與原有的國家認同有交互影響的作用，這樣的過程因為政治菁英的作用，而使這些新的概念架構被接受且併入集體國家認同的建構過程。

因此歐洲統合的過程也對於集體的國家認同有影響。新的共享知識與集體國家認同獲得共鳴的程度等同了歐洲化過程中國家適應的程度(the goodness of fit)。新集體國家認同對於歐洲的看法內容也會隨著新獲得的共享知識，與原有

---

<sup>123</sup> Risse, T. (2001). A European Identity? Europeanization and the Evolution of Nation-State Identities. In M. G. Cowles (Ed.), *Transforming Europe-Europeanization and domestic change*.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pp. 198-216

<sup>124</sup> Ibid., pp.201

<sup>125</sup> Ibid., pp.200

集體國家認同共鳴的程度有所變化。因此作者認為統一的歐洲認同不會出現，而是隨著共鳴的程度高低而分成幾種類型。<sup>126</sup>

歐洲集體認同不代表由眾多個人對於歐洲的認同集合起來就可以形成，而是需要特殊的社會群體(social groups)與制度框架的存在。而且存在的要件就是要能清楚地表達自我認知(self-understanding)。<sup>127</sup>瑞斯認為因為這樣的邏輯說明了在不同的政治、歷史結構會出現不同類型認同的現象。

因此歐洲認同的出現就理論途徑來說，有許多種可能的類型。歐洲自 1980 年開始就開始思考歐洲認同出現的可能性與可能方式。然而最後呈現出來的是 1993 年生效的馬斯垂克條約在條款中注重「輔助性」(subsidiarity)原則與拒絕「聯邦」(federal)等字眼的出現，顯示了成員國對於歐盟有可能要求將國家人民認同轉移至對超國家機構的認同，是十分敏感且抗拒的。

而在 1990 年代國家認同也常常被國家政治菁英當成一種抵抗歐盟政策的方式。<sup>128</sup>然而也有學者不贊同這種悲觀的看法，他們認為因為經濟等因素，而使認同議題被放置在某些重要議題之後。<sup>129</sup>

因此吉默思(A. M. Jiménez)提供了三種歐洲認同可能形成的理論途徑，來解釋歐洲認同在不同理論脈絡的產生可能性。<sup>130</sup>第一種是以文化層面看待認同。支持這種理論途徑的學者認為歐洲認同產生的方式與傳統國家認同產生的方式相似。國家認同根基於文化因素，但是歐洲認同無法只根基於文化因素。也就是在歐盟統合過程中，歐洲認同與國家認同處於近似零和遊戲的狀態，人民有可能在歐洲統合過中裡轉移認同到歐盟，但是只可能發生在國家認同較弱的國家，而且在這種情形之下，歐洲認同無法與國家認同在國家內部二元並立。

---

<sup>126</sup> Ibid., pp.202

<sup>127</sup> Delanty, G., & Rumford, C. (2005). Theorizing Europeanization: towards a constructivist theory of society. pp.55

<sup>128</sup> Jiménez, A. M. R. (2004). European and National Identities in the EU's Old and New Member States: Ethnic, Civic, Instrumental and Symbolic Components. *European Integration online Papers (EIoP)*, 8(11), 1-37.pp.2

<sup>129</sup> Gstöhl, S. (2002). Scandinavia and Switzerland: small, successful and stubborn towards the EU. *Journal of European Public Policy*, 9(4), pp.529-549.

<sup>130</sup> Jiménez, A. M. R. (2004). European and National Identities in the EU's Old and New Member States: Ethnic, Civic, Instrumental and Symbolic Components. pp.2-4

第二種是認為歐洲認同是基於工具理性而產生的。特定社會群體因為政治上的利益得失而決定要或不要對於歐洲聯盟有更多認同。因此成員國考慮到歐洲政策的結果對自身國家有利與否，會影響到對於歐洲的認同。<sup>131</sup>

對此，瑞斯提供了一套解釋邏輯：國內政治菁英通常最重要的任務是維持政治地位與勢力，最直接的方式是尋求連任與人民對法案政策的支持。因此在處理認同議題，政治菁英偏向選擇與自身政治利益最符合的選項。工具性利益解釋了每個國家推動不同的認同與認同內容。在政治菁英支持的認同內容被選擇了之後，國家菁英會透過推廣達成社會化(Socialization)的效果。社會化也能解釋在認同遇到挑戰時，因行為者將認同視為「理所當然」(take it for granted)，而不會被輕易取代或消滅。<sup>132</sup>

最後一種是以公民(civic)的概念來解釋歐洲認同。歐洲認同是基於人民的同意，目的是為了和平的政治共存的這一發展，這其中還包括了共享文化規範與共同信念。<sup>133</sup>在此一概念下，歐洲認同是來自於成員國人民同意對未來會出現的歐洲公共空間行使權力並履行任務的一項承諾。

這樣的觀點汲取了審議式民主(deliberative theories of democracy)與哈伯瑪斯的溝通理性(communicative rationality)的概念，促使歐洲公共領域的出現並有效地促進了歐洲認同的出現。這種公民式認同與各種國家認同是可以並立相容的，並不會因為歐洲認同的出現，而弱化了國家認同。<sup>134</sup>

---

<sup>131</sup> Ibid., pp.3-6. ; Braun, M. (2008). Talking Europe the Dilemma of Sovereignty and Modernization. *Cooperation and Conflict*, 43, pp.397-420.

<sup>132</sup> Risse, T. (2001). A European Identity? Europeanization and the Evolution of Nation-State Identities. pp.202-203

<sup>133</sup> 見 Weiler, J. H. H. (1999). *The Constitution of Europe. Do the New Clothes Have an Empero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Mancini, G. F. (1998) "Europe -The Case for Statehood". Harvard Jean Monnet Working Paper 6/98.

<sup>134</sup> 包含了 U 原則(principle of universalization)與 D 原則(principle of discourse ethics)等對話倫理的要求：規範因滿足每個人的利益而受每個人所接受；所有參與者與受影響者皆認可。接著滿足「理想言說情境」(idea speech situation)的要求以形成具有正當性的公共領域。江宜樺，2002 年 12 月，〈公共領域中理性溝通的可能性〉，公共知識份子與現代中國國際學術研討會，上海華東師範大學中國現代思想文化研究所，頁 6-9。

## 第四節 小結

本章就歐洲化研究發展到目前為止的理論框架作一介紹。首先在第一節中解釋「歐洲化」一詞的意義，並且把歐洲化與歐洲統合兩者之間的關係與差異作清楚的解釋與闡述。「歐洲化」一詞說明了歐洲聯盟與成員國之間影響與被影響的雙向過程。並且代表著成員國是在加入歐洲聯盟之後，與歐盟間決策與執行等行為間發生的互動關係，以此與歐洲統合清楚地區別開來。另外針對歐洲化的範圍與界線，在多位歐洲化研究學者的研究中，多被分為國內的政體、政治與政策等分類方式。

第二節則是對於歐洲化的影響方向與機制等，控制歐洲化影響過程的因素。歐洲化因為是歐洲聯盟與成員國之間互相影響的過程，因此歐洲化發生的方向也多分為「由上而下」與「由下而上」兩種。

第一種是歐洲聯盟由上而下地經由歐盟政策的影響力，而去影響成員國國內的政策與政治結構。而成員國也會因為適應成本的因素而在歐盟決策過程之中，試圖上傳自身的國家政策偏好到歐盟層面。如此一來，成員國一來能夠提昇自身在歐盟的意見影響力，尤其是針對瑞典這種相對力量弱勢的小國；另一方面能夠縮小成員國適應歐盟政策的成本，減少國內反對聲音與資源支出。

除了上傳國家偏好之外，國家也有可能採取全盤皆收(Compliance)，或是完全不配合的態度。而成員國會出現不同的反應，能夠以適應壓力，或是適應度作為衡量的因素。另外在國家適應歐盟政策的過程中，也會出現不同的中介因素惠影響國家適應歐盟政策的過程。這是在歐洲化研究中必須要特別注意的。

第三節則是針對歐洲化研究與現存理論的研究，新制度主義對於歐洲化研究的影響不容小覷；另外社會建構主義則試圖解釋在歐盟與成員國政府經過了長時間的互動，而形成歐洲化現象之後，是否進一步能夠帶動集體歐洲認同的產生。以下兩章則是針對瑞典在外交安全政策與就業政策兩方面歐洲化現象的研究。

## 第三章 瑞典福利政策及外交政策

### 第一節 瑞典社會福利模式

本論文主旨為研究瑞典政策的歐洲化，在進行個別政策領域研究之前。首先，簡介瑞典在社會政策及社會政策領域的發展。

瑞典以中立政策與福利國家特色聞名。以下分別對瑞典社會福利模式與中立外交政策進行介紹。福利國家的概念以威連斯基(Wilensky)界定的：「政府保障每一個國民的最低所得、影響、健康、住宅、教育之水平，對於國民來說，這是一種政治權力，而非慈善。」<sup>135</sup> 而瑞典作為一個北歐福利模式的典型國家，瑞典社會福利模式為瑞典創造了一個各方面具有完善福利的社會。為了更加了解瑞典福利國家模式，以下就瑞典福利模式發展與特色作一介紹。

#### 一、瑞典社會福利模式起源與特色

瑞典社會民主主義受到 19 世紀德國社會民主主義的影響相當大。<sup>136</sup> 社會民主主義由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與階級鬥爭理論出發，但是不同於社會主義主張用暴力革命推動歷史發展，社會民主主義(或是改革主義(Reformism))論者接受了民主決定的模式，認為既然資本主義解放了生產力量，則應當公平地分配生產結果並實行漸進的改革，而不是只等待資本主義的崩潰。<sup>137</sup> 而瑞典從自身的經驗出發，歸納出了社會主義支持的國有化並不能解決瑞典面臨資本主義與工業發展帶來的經濟權力與分配的問題。反之應該讓民主來支配市場，民主有權對經濟與企業活動制定規則。民主支配市場意味著通過普遍選舉權與政治民主，使所有公民

<sup>135</sup> 林萬億，1994，《福利國家－歷史比較的分析》，台北：巨流，頁 7。

<sup>136</sup> 高鋒、時紅編著，2009 年，〈什麼是社會民主主義？〉，《瑞典社會民主主義模式-述評與文獻》，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頁 27-28。譯自 Carlsson, I. (2007). *What is Social Democracy?* Stockholm: Arbetarrörelsens Tankesmedja and the publishing house Idé och Tendens.

<sup>137</sup> 同上，頁 31。

—不僅是有財產的或是高收入的人—皆能獲得影響社會的機會與權利。<sup>138</sup>亦即透過議會制度中的階級動員是能夠實現社會主義的平等、正義與自由的一個工具。<sup>139</sup> 瑞典因此發展出不同於資本主義或是社會主義，具有自身特色的瑞典社會民主主義。

而在艾斯平-安德森(Gøsta Esping-Andersen)對於福利國家的研究中，瑞典、挪威等北歐社會福利國家的特色包含了均一給付(flat-rate benefit)與充分就業(full employment)等貝佛里奇式(Beveridge-type)公民給付模式之外，社會福利國家還具有去商品化(De-Commoditization)程度高、階層化(Stratification)程度低與北歐國家作為福利提供者，將家庭關係的成本社會化並解除了市場與傳統家庭的限制等特色。<sup>140</sup>

而在胡柏與史蒂芬斯(Huber and Stephens)的著作中，社會民主模式生產體制是強調普遍性的社會福利政策、高度的所得替代率確保了退休年金的水準、由政府提供高水準的社會服務、性別平等觀念被廣為接受、重視人力資本培養等。<sup>141</sup> 因此綜合來看，社會民主模式的特徵包括了：以全民為給付目標的普遍福利政策；社會福利支出佔國內生產毛額比例相對很高；接受給付人數相當多，因此福利水準無法達到最高的水準；福利體制與財政以國家為主導者；福利服務由國家提供，而人民必須支付高額稅金以支撐國家公共福利部門。<sup>142</sup>

以上對於社會民主式福利國家研究構築了瑞典社會福利模式的基本樣態。然而不同國家的福利政策在歷史的影響下會出現不同面貌，瑞典在瑞典社會民主工人黨(Sveriges Socialdemokratiska Arbetareparti, SAP)領導之下，開創了以中間路線(the middle way)、混和經濟策略(strategy of mixed economy)與雷恩模式

---

<sup>138</sup> 同上，頁 28、35。

<sup>139</sup> Esping-Andersen, G. (1990). *The three worlds of welfare capitalism*. Cambridge, UK: Polity Press, pp.12.

<sup>140</sup> 同上，pp. 27-28. 有關於福利國家體制比較研究請見艾斯平-安德森之著作。

<sup>141</sup> Huber, E. (2001). *Development and crisis of the welfare state*. Chicago ::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pp.85-112.

<sup>142</sup> 張菁芬，2005，《社會排除現象與對策：歐盟的經驗分析》，台北：松慧，頁 227。

(Rehn-Meidner model)經濟政策著名的瑞典模式(The Swedish Model)。<sup>143</sup>

## 二、瑞典社會福利模式

瑞典在各類福利國家比較中作為具有強烈統合主義特色的國家。中央集權式工資協商制度(centralized wage bargaining)與統合主義(Corporatism)被標誌為瑞典社會福利模式的特色。這兩種制度代表了勞資與政府三方協調的過程，包括了雇主與勞工，以及政府共同討論有關於社會與經濟的議題，而非只是單純地交付給勞資之間的協調。<sup>144</sup> 而瑞典模式另外一個重要的特色即是強大的勞工運動，以支持統合主義的運作。<sup>145</sup>

瑞典的第一個工會在 19 世紀下半出現，在 1906 年瑞典雇主聯盟(Employer's Confederation, SAF)與瑞典工會聯盟(藍領工人總會 Landsorganisationen, LO)達成了「十二月妥協」(December Compromise, 亦稱第一次歷史大妥協)，其中雙方同意雇主有權選擇工人，而同時工人亦有結社權與罷工的權利。<sup>146</sup> 到了 1932 年，社民黨藉著與共產黨(Communist Party)的合作在國會中取得執政權力，再加上社民黨與農黨合作，靠著「紅綠聯盟」(Red-Green Alliance, 或稱母牛協議 Cow deal)獲得農黨對於社會政策的支持，社民黨長期執政的歷史就此展開，也成為了奠定瑞典模式的基礎。

而在 1938 年瑞典工會聯盟與瑞典雇主聯盟兩者達成了勞資雙方的「第二次歷史大妥協」—勞資和諧基本協定(the Basic Agreement on Industrial Peace)，又被稱為「莎堡協議」(Saltsjobaden Agreement)，其代表由政府以及勞資雙方間的薪資談判等統合主義方式達到勞資關係的和平與穩定。因此，第二次的協議奠定了中央集權式工資協商制度(Centralized Wage Bargaining)的基礎。

<sup>143</sup> 林萬億，1994，《福利國家—歷史比較的分析》，頁 111。

<sup>144</sup> Huber, Evelyne, John D. Stephens, (2001), *Development and crisis of the welfare state*. pp.91.

<sup>145</sup> 林萬億，1994，《福利國家—歷史比較的分析》，頁 112。

<sup>146</sup> 同上，頁 33。



社民黨作為推動瑞典模式的主要推手，藉著對於平等地位、利益與公民責任的訴求來吸引農民與勞工組成政治聯盟對抗社會的不平等。再加上在 1920 年代發生的經濟大蕭條，更加深了失業等社會問題。因此從 1895 年社民黨的布蘭廷 (Hjamar Branting) 開始，到第二任黨魁韓生 (Per Albin Hansson) 所推動的「人民之家」 (People's Home, folkems) 概念，這些訴求的目標就是在解決因經濟發展而帶來的不均現象。

瑞典福利模式的概念就是在普及主義 (Universalism) 與團結 (Solidarity) 的精神帶領下而發展的。瑞典在社會民主黨執政的帶領之下，開始實施了大規模的社會福利政策，在經濟相關政策與勞動市場政策，以及大規模開展的教育、醫療及老年保險等社會保險措施，建立了完善的社會安全網絡。具體內容包括了瑞典的老人年金 (pension)、健康醫療保險、低收入住宅政策及就業保險 (Employment Insurance, EI) 等。

#### (一) 雷恩模式

瑞典著名的雷恩模式 (Rehn-Meidner Model) 是由兩位經濟學家雷恩 (Gösta Rehn) 與梅德諾 (Rudolf Meidner) 在 1951 年「工會與充分就業」一文中，修正了凱恩斯所主張的反循環政策 (countercyclical policy)，因而提倡一種經濟與團結工資的計畫。

這種雷恩模式政策目標在於在達到充分就業與團結工資的同時，能夠防止通貨膨脹和保持高度經濟成長。雷恩模式包含了提高經濟成長與抑制通貨膨脹所實施的財政限制政策、團結工資政策 (Solidaristic Wage Policy) 與積極性勞動市場政策 (Active Labour Market Policy, ALMPs)，其中包含的每一個政策皆能互相支持且環環相扣，使雷恩模式成爲一個不能被選擇性運用的經濟政策模式，而是必須全盤地納入瑞典福利模式思惟的一種經濟政策模式。<sup>147</sup>

<sup>147</sup> Meidner, R. (2002). Why did the Swedish Model Fall? In D. Coates (Ed.), *Models of Capitalism: Debating Strengths and Weaknesses*. pp.213-216.

雷恩模式首先是提出限制性財政措施以控制通貨膨脹，並且將生產所得再分配與要求企業負擔增加公共儲蓄的責任。與凱因斯模式不同之處在於雖然菲力浦曲線(Philippe's curve)說明了通貨膨脹率與失業率間具有反向關係；然而在雷恩模式中，藉著勞動市場政策與團結工資政策降低工資利潤，能夠降低通貨膨脹發生的機會。<sup>148</sup> 同時國家也控制了貨幣與信用市場進行宏觀經濟調控，將利率控制在比較低的程度。藉此預防投資景氣過熱，引發通貨膨脹。

因此瑞典經濟模式有數個特點：由國家干預市場經濟，並且為經濟發展制定長期計畫；二是在國際金融與經濟市場景氣發生週期變化時，提出適當的經濟政策，預防通貨膨脹或是縮短不景氣的週期，達到調節與控制國家經濟的目的。

## (二) 團結工資政策

團結工資政策也與積極性勞動市場政策結合，促使老舊或是低利潤的產業轉型或是結構調整，使瑞典國內產業具有高度的競爭力。換言之，團結工資政策就是藉著中央集權式工資協商制度，讓國家與勞資雙方達到共同議價薪資與調整幅度的目標。並透過集中協調達成統一的薪資加碼(wage drift)，可以避免計畫經濟帶來的「均貧」的問題。如此一來，獲利較高的工廠在面對團結工資政策能夠支持並且付出較多的人力成本；然而獲利低的產業或是工廠，因為團結薪資政策可能必須付出較多的工資或人力成本，這些勞力密集、獲利較低的工廠只能被迫試圖提高生產力或進行產業轉型，否則就會面臨倒閉的結果。這樣的結果會促進加速淘汰且更新生產產業結構。

然而，瑞典並不是由一開始即實施完全的薪資平等政策。瑞典從 1950 年代至 1980 年代中期為止，工會聯盟與雇主聯盟所協調的團結工資都是指藍領工人(Blue-collar)的薪資與調整幅度。一直到 1960 年代晚期，社會民主黨才開始試圖

---

<sup>148</sup> Erixon, L. (2008). The Swedish third way: an assessment of the performance and validity of the Rehn-Meidner model. *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 32(3), pp.368-371.

將團結工資政策的涵蓋範圍擴張到白領勞工(White-collar)的範疇，因此白領與藍領勞工在 1980 年代早期才達到薪資平均的目標。<sup>149</sup>

團結工資政策最主要的目的在於降低薪資水平的不平等，同時也能夠達到抑制通貨膨脹的效果。因為薪資水平相同，即使獲利較高的企業也無法大幅度地加薪，這樣一來能夠達到抑制通貨膨脹的問題，也能夠消除社會所得不均帶來貧富問題。

### (三) 積極性勞動市場政策

充分就業(Full Employment)也是另一個雷恩模式所需達成的目標與手段，換句話說，勞動市場政策能夠降低因為財政限制政策可能帶動的失業率，也能夠確保名目工資持續穩定的保持一定水準，不會因為失業率低而飆升。積極性勞動市場政策有三個要素：第一是在勞動力供給面實施在職教育與假期教育等職業訓練；二是強化勞動力與市場需求的接軌程度；最後是在需求面上即市場上增加就業機會。<sup>150</sup>

積極性勞動市場政策的目的在於鼓勵及促進人才流動，以及提高就業率。由於團結工資政策使得經濟產業進行了重組，由原有的老舊產業被釋放出來的勞動力，需要重新訓練使其能夠重新投入工作；而產業重組之後的經濟市場也迫切地對勞動力有所需求，因此積極性勞動市場政策就是由國家提供失業勞工的再訓練，使其能夠符合當時市場需求，儘快地回到工作職位上。

積極性勞動市場政策除了積極的就業訓練之外，也包含了失業保險(Unemployment Insurance, UI)與失業津貼(generous cash assistance)<sup>151</sup>等消極面的補償，藉著兩者的混和使用使失業者的就業力上升，儘快地脫離失業的狀態。<sup>152</sup>

<sup>149</sup> Ibid., pp.372-375.

<sup>150</sup> Ibid., pp.368.

<sup>151</sup> 失業保險分為兩部分，第一種是在由工會運作失業保險形成的根特制度下，自願投保的所得喪失保險(income loss insurance, Eak)；第二種則是針對未投保的失業者的現金援助(KAS)。

<sup>152</sup> Sianesi, B. (2002). Swedish active labour market programmes in the 1990s: Overall effectiveness and differential performance. *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 and Institute for Fiscal*

女性勞動力的高度參與也是北歐等國社會福利服務快速增長的原因與結果。1960年代經濟高度成長，各個國家一方面引進外國勞力的進入國內市場，一方面也為國內女性勞力提供了空間。女性勞動力進入市場之後，要求國家給予兒童日間照護(Daycare)與其他相關社會服務，這樣的發展促進了北歐福利國家的社會福利發展與公共部門的就業。而通常照護等工作以女性勞動力居多。這也進一步地促進了更多女性的就業。<sup>153</sup>

透過以上經濟市場政策、勞動力政策與工資政策的組合，造成了低度失業率與勞動力市場活絡的情況下，有大多數的人民擁有工作，而高度福利社會所需要的大量公共支出也因為稅收的充足，而能夠支撐瑞典社會福利的發展。

如上所述，瑞典模式是在國家干預的經濟模式、統合主義下的薪資協調、團結工資政策與積極性勞動市場政策等不同社會經濟政策共同形成的福利國家模式。並且瑞典融合了資本主義市場與社會主義的思維，即在社會主義的基本論述思維之上，接受私人所有權與自由市場的概念，而建立起一個龐大並且普遍地為人民提供完善的，即著名「從搖籃到墳墓」的一系列社會福利。

也因為瑞典模式帶來二戰之後瑞典的高度成長與相對穩定的經濟發展，才使得瑞典政府能夠開展各項年金、健康與教育等福利政策。藉著強大工會與雇主的合作、發達的經濟、高度就業、平等與團結等價值和成就造就了瑞典的「第三條路」，瑞典社會福利模式不僅成功地與新自由主義市場經濟和中央計畫市場經濟思惟相區別，並且在也戰後締造了亮眼的經濟表現。<sup>154</sup> (請見表 3-1)

---

*Studies*, 1-30. pp.4.

<sup>153</sup> Huber, Evelyne, John D. Stephens, (2001), *Development and crisis of the welfare state*. pp.98.

<sup>154</sup> Meidner, R. (2002). Why did the Swedish Model Fall? In D. Coates (Ed.), *Models of Capitalism: Debating Strengths and Weaknesses*, pp.219.

表 3-1：瑞典社會福利模式

目標	充分就業	平等
限制	價格穩定	有效性
工具/手段	宏觀經濟管理 積極性勞動市場政策	普遍性的福利 龐大的國家公共部門 團結工資政策

來源：Meidner, R. (2002). *Why did the Swedish Model Fall?* pp.219.

### 三、瑞典福利國家改革

在瑞典社會福利體制的「黃金年代」(Golden Age)結束之後，瑞典受到來自國內與國外的經濟因素影響，迫使社會民主黨必須要改變瑞典模式。國際經濟環境面臨了相當多的變化，包括布列敦森林體系(Bretton Woods System)的衰落；1971年由固定匯率制度轉為浮動匯率制度、以及1973年的石油危機，造成了國際經濟環境劇烈地變動。<sup>155</sup>

1980年代新古典經濟理論興起，將經濟主導權轉回到市場的呼籲削弱了歐美各福利國家政府干預市場的能力。而經濟全球化的發展也增強了商業的力量，全球分工讓企業能夠逃離國內勞工團體與法規限制，也多了政治籌碼與政府周旋。這樣的全球化發展情形加重了國內中央統合主義的崩潰。<sup>156</sup>

1980年代石油危機使得國際經濟問題的持續加重，逼迫社民黨改採中間路線。到了1985年瑞典政府整理外匯和金融市場，使利率上升及施行相關政策以解決通貨膨脹問題。此外政府廢除了銀行借貸上限與削減社會福利，這措施使罷工逐漸成為常態，更使得社民黨與其支持者間的連結被破壞。最後，導致了藍領

<sup>155</sup> Huber, E. (2001). *Development and crisis of the welfare state*. pp.223.

<sup>156</sup> Agius, C. (2006).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Swedish neutrality: challenges to Swedish identity and sovereignty*. Manchester ::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pp.124-125.

勞工和社民黨漸行漸遠，即使社民黨一直試圖吸引白領勞工支持作為工資協調中的力量，但是並不順利。這項發展也削弱了瑞典模式的正當性。<sup>157</sup>

接著為了解決經濟問題，以市場取向為主的意見開始出現在官方文書與經濟期刊上。爾後，稅制改革由社會民主黨與自由主義者發起，以此阻擋了社會重分配的形成。由此可見社民黨追求的就是以第三條路的形式達到瑞典改革。瑞典克朗(SEK)在同一時期也貶值了 16%，為瑞典工業製造形成了出口機會。<sup>158</sup>

社民黨在 1985 年選舉再度贏得政權，代表著第三條路獲得成功。但是到了 1988 年這看似泡沫的一切消失了。因為經濟危機的產生，為了解決危機，政府採取了凍結薪資，違反了之前不介入市場的承諾。到了 1990 年代社民黨更支持加入歐洲統合。長久以來選民對於社民黨以特有方式保持社會福利的期待消失，因此在 1991 年的選舉中選舉失敗，經濟在保守黨的帶領下持續衰弱，到了 1993 年更出現了負成長。<sup>159</sup>

保守黨在社民黨的支持之下承諾守住瑞典克朗(SEK)，在 1992 年秋天歐洲匯率機制危機中，政府與社民黨提出兩項危機建議：裁減補貼；推行新的福利政策。但是這些方式到最後以失敗告終，反而引起更嚴重的通貨膨脹。1994 年社民黨重新上台，只能持續進行社會福利裁減，並且增加徵稅以解決嚴重的國家經濟問題。<sup>160</sup>

#### 四、瑞典模式的基礎價值

團結(Solidarity)作為瑞典福利社會的基本概念，是社會福利國家藉以正當化社會福利政策互助合作理念的憑藉。然而在瑞典社會福利概念發展時，國內以農業為主要人民賴以為生的經濟模式。與其他英國、德國國內以工人階級為多數的

---

<sup>157</sup> Ibid., pp.122-123.

<sup>158</sup> Huber, E. (2001). *Development and crisis of the welfare state*. pp.241-243.

<sup>159</sup> Ibid., pp.243-245.

<sup>160</sup> Ibid., pp.245-250.

社會組成不同，農黨(The Agrarian Party)<sup>161</sup>因此成爲了瑞典在發展社會福利體制時的重要影響因素。<sup>162</sup>

瑞典自 1884 年由黑丁(Sven Adolf Hedin)開始提倡工人年金與意外保險。在議會討論時，包括農黨在內的人士組成的委員會(Worker's Insurance Commission)，在決定納入哪些階級人民時，了解到如果只納入受雇用的工人階級，則所佔比例人口將非常少。因此基於各社會階級的團結，與爲了使每位人民感受到社會福利的好處，委員會決定納入所有社會階級進入福利制度的範圍。<sup>163</sup>

然而在各方意見紛沓而來之影響的結果，第二次委員會所提的建議則是取消了納入各個社會階級的建議，而且國家的支付部分也縮小，而是由雇主負擔福利的供給成本。此時農黨黨魁丹尼爾森(A. P. Danielson)出面爲農民的利益發言，他認爲農民也應被納入福利的範圍，並且將由雇主納費的制度改爲以國家稅受支付社會福利所需要的成本。

然而，直到了 1907-1909 年因爲選制改革，而將投票權放寬之後。農民一直以來追求的普遍社會福利政策，與以稅制爲基礎的改革需求才開始因爲在選票上數量的增加，而逐漸被社會民主黨與保守黨重視。因此在布蘭廷任社會民主黨黨魁時，爲了在選舉中獲得執政的機會，社民黨尋求的支持對象由工人逐漸擴大到農民等較廣泛的對象。<sup>164</sup>因而社會民主黨開始提倡團結概念，包括布蘭廷即努力促成「人民黨」的政經制度，他主張瑞典社會民主黨是由一群平凡無奇人民的集合，其中同時包括了工人階級與農民。<sup>165</sup>

而根據柏格馬克(Åke Bergmark)引用自涂爾幹(Émile Durkheim)在《分工論》(The Division of Labor of Society)一書中，對團結概念的分類，團結代表了在一個

<sup>161</sup> 由農民組成，並且通常與城市工人、專門技術中產階級的利益有所衝突。另一個特色是通常在意特定範圍之議題，對於廣泛的議題較無涉獵。

<sup>162</sup> Baldwin, P. (1990). *The politics of social solidarity: class bases of the European welfare state, 1875-1975*.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93.

<sup>163</sup> Ibid., pp.83-86.

<sup>164</sup> Ibid., pp.87-93.

<sup>165</sup> 林萬億，1994，《福利國家－歷史比較的分析》，頁 48。

社會或共同體中連結個人的一種聯繫。這種聯繫可以依照類類型不同而分為有機性的團結與機械式的團結。

機械式的團結(Mechanical solidarity)出現在以較為類似的政治—家族(氏族)團體而組成的社會，有單一的宗教，是「其集體意識的共同信仰與情感的主要具體呈現」。因而社會的各個部分能夠輕易地離開社會這個文化上的單元而離去。

而另一種團結是有機性的團結(Organic solidarity)，這樣的團結方式出現在如同西歐國家也包括瑞典的現代社會中，其不仰賴文化或血緣、信仰，而是「在分工功能上的相互依存」。有機性的團結中，並不會有一個能夠取代「個人意識」的「集體意識」存在；而是已經假定個人「信仰與行動上的不一致」，雖然集體意識會有所削弱，共同的信仰與情感卻不會完全消逝，道德還是能夠發揮一定的作用。<sup>166</sup> 瑞典福利國家就是基於有機性的團結而發展出社會共享的理念，由國家進行社會財富的重分配，使得每一個人都能享受到社會保護的好處，不會因為資本主義重視個人主義而形成極度的社會貧富不均。

而以團結概念討論福利國家議題時，就延伸到公共財的分配正義(distributive justice)的問題。在物質分配上柏格馬克認為有三項原則是在分配過程中能夠被最大多數人所接受：一是需要(need)的原則，代表著個人包括貧苦疾病，或是處於幼兒或老年期等需求的滿足，是福利所必須滿足的。二是美德(merit)的原則，基於道德的原則而發展並分配社會福利，這樣的原則有助於激發願意供給福利政策所需成本的動機。最後是貢獻的原則，貢獻(contribution)的原則基本上並不是用於普遍性的社會福利體制。其基礎建立在資源的分配必須依照個人貢獻的程度。

167

因此討論到瑞典福利模式與團結概念的關係，柏格馬克認為社會福利體制必須受到最大多數人民的支持，並且人民也了解什麼是最適合自己與他人，以及應

---

<sup>166</sup> 紀登斯(Anthony Giddens)著，簡惠美譯，1994年，《資本主義與現代社會理論：馬克思、涂爾幹、韋伯》，台北：遠流，頁136-138。

<sup>167</sup> Bergmark, Å. (2000). Solidarity in Swedish Welfare – Standing the Test of Time? *Health Care Analysis*, 8(4), pp.397-400



當如何分配社會資源。在此情況下，瑞典社會固有的團結概念支撐了廣泛且完善的福利政策的形成，並且持續地支持福利政策發展。<sup>168</sup>

卡爾松(Ingvar Carlsson)<sup>169</sup>與林德格倫(Anne- Marie Lindgren)<sup>170</sup>曾經就社會民主主義價值，包括了自由、平等與團結做出解釋。首先就自由來說，他們認為對社會民主黨人來說，自由包含了兩層涵義。就出發點來看是個人的自由，然而獲得這種自由的方式是改善社會與勞動生活。也就是透過改善社會與勞動的環境，使集體中的個人獲得自由。然而集體與個人自由間勢必會有矛盾，因此必須用民主帶來的個人平等權力來處理這種矛盾。

第二個價值是平等，平等必須與自由相輔相成才能夠發會最好的作用。最後一種社會民主價值就是團結，團結說明了人生活在社會中，必須彼此依賴，以共同的最佳利益為起點而建立社會體制。這樣一來，只有在相互依賴與歸屬感的作用之下，才能確實保障個人的平等與自由，不會被他人所侵害。<sup>171</sup>

總結來說，瑞典社會民主主義以「團結」概念為基礎，一方面強調個人生存發展自由的維護，另一方面以平等來解決自由帶來的個人之間權利侵犯的問題，最後以社會共享的概念為基礎，使國家有權力進行財富的重新分配，解決資本主義帶來嚴重的分配不均的問題，形成共享、共存的福利社會。

以上瑞典在福利、外交政策以至於整個國家思維佔有重要地位的「團結」觀念做一簡單的介紹。對於團結觀念的了解，有助於了解瑞典在對外外交政策或是對內福利體制發展方向的內在邏輯。

---

<sup>168</sup> Ibid., pp.397.

<sup>169</sup> 1934 年出生於瑞典。1986 年奧洛夫·帕爾梅(Olof Palme)首相遇刺身亡後接任首相和社會民主黨主席。1991 年大選失敗下台，1994 年大選重新任首相和社會民主黨主席。

<sup>170</sup> 1943 年出生於瑞典，曾任社民黨刊物主編。與卡爾松共同撰寫《什麼是社會民主主義？》(What is Social Democracy?)。

<sup>171</sup> 高鋒、時紅編著，2009，〈什麼是社會民主主義？〉，頁 16-21。

## 第二節 瑞典中立政策傳統與不結盟政策

瑞典外交及安全政策傳統中，中立政策(Neutral Policy)與不結盟政策(Non-alignment Policy)佔有相當重要的地位。此外，國際主義(Internationalism)在瑞典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參與聯合國維和任務過程中，也逐漸成爲主導瑞典外交安全政策的主要思惟之一。因此以下將針對戰後至 1990 年代間，瑞典的中立政策與國際主義思惟的發展做一介紹與闡述。

### 一、瑞典中立政策傳統

瑞典自兩次大戰前就出現了中立的概念與傳統，阿及斯(C. Aguis)提出了瑞典的中立傳統具有其「歷史的延續性」。<sup>172</sup>在瑞典國王卡爾 14 世(King Karl XIV Johan, 1818-1844)時奠定了瑞典中立政策的基礎。在卡爾 14 世推動瑞典中立政策之後，資源缺乏使得瑞典偏向於重視國家自身發展，而非向外的擴張野心。<sup>173</sup>

經過了拿破崙戰爭至一次世界大戰，其中瑞典皆以貿易利益理由，並且保護作爲國家核心利益的主權獨立而強調中立政策。但瑞典在戰間期間體認到國際聯盟的能力(League of Nations)並不足以用國際法保護瑞典中立，因此決定以強大的國防武力作爲後盾，以保持瑞典的中立。

在二戰期間，雖然瑞典採取中立政策(non-belligerent status)，但基於情勢考量，也曾做出如運送物資、武器給芬蘭等行爲。也在德國佔領期間仍然持續地爲納粹德國運輸貨物，且招致許多批評。然而瑞典中立政策的中心即是使瑞典能夠安然立於戰爭之外，並且保持完整的主權獨立。因此面對德國的多項要求，瑞典

---

<sup>172</sup> Agius, C. (2006).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Swedish neutrality: challenges to Swedish identity and sovereignty*. pp.60-85.

<sup>173</sup> *Ibid*, pp.61-62. 瑞典的中立政策是出自於波爾塔瓦會戰(Battle of Poltava, 1709)的失敗後，瑞典的軍事地位開始式微。瑞典基於策略考量，決定以中立姿態保護自己的國家安全。而自從維也納會議(Congress of Vienna, 1814-1815)之後，瑞典不再參與任何軍事戰爭。

爲了自身的權益，都會盡量地滿足德國的需要。並且在盟軍之後開始反攻之後，瑞典也同樣地滿足盟軍的要求。<sup>174</sup>

基本上，瑞典的中立是建立在由歷史脈絡之上的自我認同過程，這個過程幫助了瑞典在戰後的積極中立政策(active neutrality policy)。<sup>175</sup>然而瑞典的中立政策並不像瑞士與奧地利是經過正式的國際條約認可，是瑞典作爲一主權國家，在國家對外政策上自我描繪的一種政策態度。因而瑞典不能被視爲一「中立國」，而僅能被視爲一抱持「中立政策」的國家。<sup>176</sup>

瑞典在冷戰時期的中立政策包括了：不參與軍事聯盟、保持獨立且強大的國防武力與對中立的完全支持。在平時則是堅守不結盟政策，避免參與任何可能的軍事與政治聯盟，以保持瑞典在冷戰兩極格局之下所創造出的穩定與美蘇兩國對於瑞典中立立場的信心。這些原則出現的重點是保持瑞典的主權完整。環繞著這項中心原則發展再加上二戰的經驗，瑞典發展出了第二項即對於瑞典武力的保持原則。最後一項原則是確保瑞典國內民意對於中立的廣泛支持；這一項原則幫助瑞典取信於大國，使軍事強權國相信瑞典由政府至人民皆同意並支持瑞典的中立政策。<sup>177</sup>

然而根據古斯塔夫松(J. Gustavsson)的看法，對瑞典來說，冷戰時期的潛在威脅是蘇聯。雖然瑞典官方提出了中立政策原則，實際上瑞典與西方國家的連結關係比起與蘇聯陣營的距離，來得緊密許多。<sup>178</sup>瑞典在1968年決定放棄發展核武，也是在與美國有保護約定下的結果。<sup>179</sup>馬姆博格(Mikael Malmberg)針對瑞典在冷戰期間國際觀點與策略做出了分析，他認爲瑞典在這時期的中立政策事實上

---

<sup>174</sup> Tepe, F. F. (2007). Swedish Neutrality and its Abandonment. *stanbul Ticaret Üniversitesi Sosyal Bilimler Dergisi*, 6(11), pp.186-187.

<sup>175</sup> Agius, Christine. (2006),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Swedish neutrality: challenges to Swedish identity and sovereignty*. pp.85.

<sup>176</sup> Aggestam, L. (2001). An end to neutrality? Continuity and change in Swedish foreign policy. In R. Niblett & W. Wallace (Eds.), *Rethinking European order: West European responses, 1989-97*. New York: Palgrave. pp.183-184.

<sup>177</sup> Ibid., pp.104-105.

<sup>178</sup> Gustavsson, J. (1998). *The Politics of Foreign Policy Change. Explaining the Swedish Reorientation on EC Membership*. Lund University Press. pp.75.

<sup>179</sup> Malmberg, Mikael, (2001). *Neutrality and State Building in Sweden*, Palgrave, pp.158.

是一種結合了國家中立政策、北歐合作關係(Nordic co-operation)與對聯合國集體安全承諾的綜合體。<sup>180</sup>

瑞典對於聯合國與歐體(European Community)的看法相當不同。瑞典認為歐體的存在與性質和瑞典極力追求的主權完整與政治軍事中立互相衝突。然而瑞典參與了聯合國，聯合國會員身分卻不會與瑞典主權有所磨損。因為聯合國對瑞典來說，更是發揚社會民主的團結概念的重要場域。<sup>181</sup> 在 1971 年瑞典議會曾經就是否申請歐體會員資格而通過反對的決議。瑞典外交部長艾蘭德(Tage Erlander)也曾在 1961 年發表談話表示歐體會員資格與瑞典不結盟的政策相互違背。這段發言也奠定了瑞典隨後約三十年的官方立場。<sup>182</sup>

由瑞典中立政策與不結盟政策之發展軌跡中，可以發現到由於歷史、地理位置上的特殊性，使得瑞典選擇以中立政策作為國家安全政策。然而這樣的中立政策在時間的推移之下，中立政策不但為瑞典帶來長時間的和平，也成為瑞典發展自身經濟與社會福利體制的重要基礎。<sup>183</sup> 因為政策歷史發展，使得瑞典中立政策已經深植在瑞典國家制度與公共論述當中。<sup>184</sup>

在後冷戰時期，雖然社民黨政府與比爾特(Bildt)政府試圖沖淡瑞典中立政策的色彩，將中立政策轉一種論述方式為不參與軍事聯盟的政策，但在瑞典大多數意見中，還是將中立政策視為支撐瑞典國家制度與認同中重要的組成因子。<sup>185</sup> 也使得之後的瑞典政府在歐洲聯盟或是歐盟安全暨防衛政策的作為之中，還是不能忽視這樣將瑞典與中立政策深刻連結的看法與意見。

---

<sup>180</sup> Ibid., pp.151.; Aggestam, L. (2001). An end to neutrality? Continuity and change in Swedish foreign policy. pp.183-184.

<sup>181</sup> Agius, Christine. (2006).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Swedish neutrality: challenges to Swedish identity and sovereignty*. pp.106.

<sup>182</sup> Aggestam, L. (2001). An end to neutrality? Continuity and change in Swedish foreign policy. pp.184.

<sup>183</sup> Malmberg, Mikael, (2001). *Neutrality and State Building in Sweden*. pp.146

<sup>184</sup> Gustavsson, J. (1998). *The Politics of Foreign Policy Change. Explaining the Swedish Reorientation on EC Membership*. pp.87

<sup>185</sup> 請見 Liuf, Paul, (1995). On the Road to Brussels: The Political Dimension of Austria's, Finland's, and Sweden's Accession to the European Union, Luxemburg, Austria: *Austria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Affairs*.; Aggestam, L. (2001), An end to neutrality? Continuity and change in Swedish foreign policy. pp.192-193.

## 二、瑞典的國際主義思惟

瑞典外交政策除了中立政策之外，還有另一個重要的面向-「國際主義」，瑞典除了強調強大的武力以維持中立政策之外；在國際事務上，瑞典積極地追求全球的和平與穩定。瑞典的國際主義包含了以國際法為標準、以聯合國為行動場域、推動裁減軍備(disarmament)等限制武力措施，及對第三世界國家的海外發展協助(Oversea Development Assistance)等經濟援助的行動原則。<sup>186</sup>

國際法的推廣是瑞典在外交上極力堅持的原則。在國際事務上，瑞典支持國家應以國際法為原則行動，並且將遵守國際法視為自身應當負擔的責任。在這一點上帶有道德規範性色彩，瑞典也強調必須對抗國際間的不正義(unjust)以達到維持國際法存在與國際和平穩定。<sup>187</sup> 因此瑞典藉由對於聯合國等政府間國際組織主動積極地支持，包括了裁軍、信心建立措施等促進國際和平的作為達到推廣國際法與促進國際穩定與和平的目的。

在歌德曼(K. Goldman)在 1991 年研究中認為瑞典的安全與外交政策帶有新自由制度主義(Neoliberal Institutionalism)的色彩。<sup>188</sup> 瑞典雖然也認為國家間貿易往來增加，有助於國家間和平關係發展；然而除了國家間經濟上的相互依賴(Interdependence)之外，還必須有國際制度(institution)的存在，包括國際規範與國際法、與國際組織等能夠維持國家間和平往來的國際建制(regime)。藉由國際制度的建立，使國際合作成爲一種持續性的行爲。<sup>189</sup>

而在柏格曼(A. Bergman)的看法中，瑞典國際主義表現出來對於正義與平等的追求，是受到國家歷史經驗與社會固有模式之影響，而表現在對外政策與作爲

<sup>186</sup> Goldman, K. (1991). *West European Politics*, 14(3), 122 - 143. pp. 122-143.

<sup>187</sup> Goldman, Kjell, Sten Berglund, and Gunnar Sjöstedt. (1986). *Democracy and foreign policy: the case of Sweden*, Gower Publishing Company.

<sup>188</sup> Goldman, K. (1991). *The Swedish model of security policy*. pp.128

<sup>189</sup> 請見：陳欣之，2003，〈國際關係理論：對現實主義的質疑〉，張亞中主編，〈國際關係總論〉，台北：揚智出版社。

上。<sup>190</sup>而瑞典身處北歐，作為北歐福利制度中最具代表性的國家深受北歐模式(Nordic Model)影響。

因為北歐地區的地理位置處於歐洲大陸的北端，在地理上離傳統歐洲核心地區相當遙遠。在歷史上幾世紀以來的歐洲地區戰爭中，北歐國家基於共同理念而選擇中立政策，因此發展出一種小卻具有競爭力，重視和平、共識型政治、社會福利、安全的國家類型。<sup>191</sup>而瑞典身為北歐地區的國家之一，其政治、經濟與社會上的觀點也深受北歐認同的影響。

因此北歐模式以福利制度理念與團結概念(Solidarity)為基礎，將國內層次與國際層次聯結起來；即在國際層次利用國內政治、經濟制度理念邏輯作為行為指標。因此必須以瑞典國內社會、經濟制度模式來理解瑞典對外政策邏輯。<sup>192</sup>北歐模式的存在並不是在解決特定的政策問題，而是在意識型態與理念上發展出北歐獨特的政策邏輯。北歐模式融合了制度化福利國家與民主的概念，在實際上運作之後出現的北歐團結主義，主張正義與公平等「善的」(good)國際關係概念。<sup>193</sup>

#### (一) 海外發展援助

如前所述，瑞典將福利國家傳統中的團結(Solidarity)概念深植在瑞典政策傳統之中；進而在外交政策中將團結、均富概念推廣到國際層次之上。<sup>194</sup>也就是說，瑞典國際主義即是在社會福利制度的基礎之上由內向外推展，由國家內部發展國家對外的全球責任。<sup>195</sup>瑞典國際主義包括了瑞典透過推動團結性世界秩序

---

<sup>190</sup> Bergman, A. (2007). Co-Constitution of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Welfare Obligations: The Case of Sweden's Social Democratically Inspired Internationalism. *Cooperation and Conflict* 42(1), 73-99.

<sup>191</sup> Ostergard, Uffe. (1997). The Geopolitics of Nordic Identity—From Composite States to Nation-states. In *Sorensen and Strath*, eds. pp. 25–71.

<sup>192</sup> Kuisma, M. (2007). Social Democratic Internationalism and the Welfare State After the 'Golden Age'. *Cooperation and Conflict*, 42(1), pp.10-13.

<sup>193</sup> Ibid., pp. 15-17.

<sup>194</sup> Bergman, A. (2004). *Post-Cold War Shifts in Swedish and Finnish Security Policies: The compatibility of non-alignment and participation in EU led conflict prevention* Paper presented at the The European Union and Conflict Resolution, pp. 3.

<sup>195</sup> Bergman, A. (2007). Co-Constitution of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Welfare Obligations: The Case of Sweden's Social Democratically Inspired Internationalism. pp. 77.

與國際社會中的正義觀念為主，具體表現在瑞典利用海外發展援助(Oversea Development Assistance)，積極地幫助非西方的第三世界國家對抗貧窮與不均的情況。<sup>196</sup>

瑞典本著國際團結與均富的理念，藉由海外發展協助(ODA)達到國際財富重分配的目標。<sup>197</sup> 瑞典與其他的北歐國家，在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的調查中，一直是提供海外發展援助上最積極的國家。根據 2009 年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的資料顯示，2008 年度瑞典總共投注了 47.3 億美金，約佔國民所得毛額(GNI)的 0.98%，是投入金額最多的國家之一。(請見表 3-2、圖 3-1)這些數字也說明了瑞典以海外發展援助作為國際主義具體表現的實際作為。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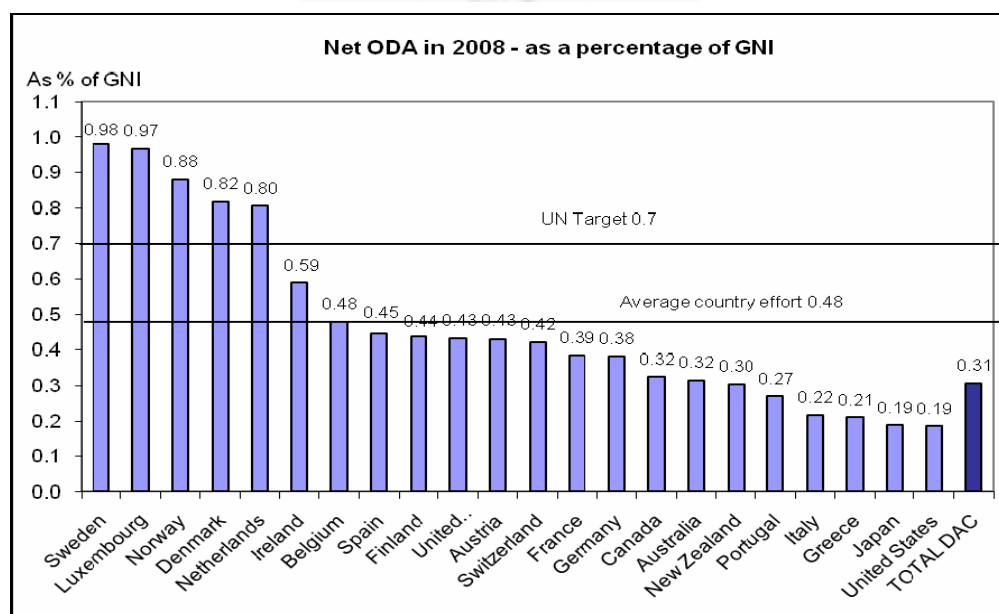
<sup>196</sup> 秩序與正義的概念來自於英國學派(English School)中對國際社會的秩序看法。Bull(1984)認為在一個以非西方國家為大多數的世界中，已開發國家應當幫助開發中國家去殖民化、推動人權保護與發展經濟等各方面建設。只有在一個團結的國際共同體出現之後，國際秩序的穩定才能夠出現。請見：Bull, H., (1984). *Justice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Hagey Lectures*. Waterloo, Ontario: University of Waterloo Press.

<sup>197</sup> Wheeler, N., 2000. *Saving Strangers: Humanitarian Intervention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p.21-54

表 3-2：瑞典、法國、德國與英國海外發展援助(ODA)及其所佔國民生產毛額

	1997-98	2005	2006	2007	2008
<b>Sweden</b>					
官方海外發展協助	1 652	3 362	3 955	4 339	4 732
ODA as % of GNI	0.75	0.94	1.02	0.93	0.98
<b>France</b>					
(單位：億美金)	6 024	10 026	10 601	9 884	10 908
	0.41	0.47	0.47	0.38	0.39
<b>Germany</b>					
	5 719	10 082	10 435	12 291	13 981
	0.27	0.36	0.36	0.37	0.38
<b>United Kingdom</b>					
	3 648	10 772	12 459	9 849	11 500
	0.27	0.47	0.51	0.35	0.43

圖 3-1 2008 年 OECD 各國海外發展援助與國民生產毛額排名



(來源：經濟合作及發展組織官方網 <http://www.oecd.org/dac/stats/dac/dcrannex>)



有學者肯定了瑞典福利制度價值對於瑞典對外作為的影響力，並且認為瑞典國際主義與團結的概念在瑞典國內取得了重要的國家意識型態的地位。<sup>198</sup> 根據派瑞特(C. Pratt)的國際主義理論，瑞典國際主義可以被視為改革國際主義(Reform Internationalism)，或是社會民主式國際主義。<sup>199</sup>

改革國際主義認為國際經濟體系對於低度發展國家(Least Development Countries, LCD)相當不公平。這些國家身處國際自由貿易經濟體系，卻必須承受國際貧富不均與區域經濟發展不均的問題。基於福利制度價值中的普遍主義與團結概念，瑞典認為必須在國際間進行國際上的財富重分配。海外發展援助可以作為一種促進與達成國際「社會均等」(Social equality)目標的方式。

自 1970 年代開始，瑞典就成為同心集團(Like Minded Groups)<sup>200</sup>的一員，並且支持南方國家提出的新國際經濟秩序(New international Economic Order, NIEO)，試圖說服美國、英國與德國等大型工業強國重視南北問題。新國際經濟秩序在後來的一段時間內成為南北關係與問題討論中的重點。

瑞典改革國際主義的看法顯示了來自於國內社會福利制度價值的影響，並且贊成在純市場邏輯之外有其他的力量來影響甚至主導經濟事務的態度。海外發展援助則是這種態度的實質表現，目的是在於發揚社會民主價值規範到國際層面。

## (二) 聯合國維和任務的經驗

而瑞典除了團結概念與社會福利制度價值在海外發展援助方面的作為之

---

<sup>198</sup> Palme, O., (1968). *Politik Är Att Vilja*. Stockholm in Bergman, (2007), pp.86. ; Trägårdh, L. (2002) 'Sweden and the EU: Welfare State Nationalism and the Spectre of Europe', in L. Hansen and O. Wæver (eds) *European Integration and National Identity*. London: Routledge, pp. 152.

<sup>199</sup> 請見：Pratt, C. (1990). Middle Power Internationalism and Global Poverty. In C. Pratt (Ed.), *Middle power internationalism: the north-south dimension* (pp. 3-24): McGill-Queen's Press. pp.4-10.人道國際主義可以被分為三類，自由國際主義(Liberal Internationalism)、改革國際主義(Reform Internationalism)與激進國際主義(Radical Internationalism)。

<sup>200</sup> Lovbraek, A., (1990). International Reform and the LikeMinded Countries. In C. Pratt (Ed.) *Middle power internationalism: the north-south dimension* (pp. 24-68): McGill-Queen's Press, pp.24-68.同心集團是由九個西方中等工業國家與英國組成的非正式集團，支持南方國家追求經濟發展平等。

外，瑞典在北歐福利模式的影響之下，自冷戰時期開始即將推動國際團結概念的實際作為也落實在對聯合國維和任務、裁軍等各項促進和平之行動的支持上。瑞典利用聯合國作為推廣國際和平與安全理念的平台。

然而瑞典與其餘北歐國家參與維持和平任務(peace-keeping operations)的歷史並非自聯合國才出現，在兩次大戰期間的國際聯盟(League of Nations，簡稱國聯)期間包括瑞典在內的北歐等國即有協助國聯進行維和任務的經驗。<sup>201</sup>

到了聯合國時期，由於聯合國憲章並未有任何維持和平行動的文字或概念，但因為集體安全體系的缺失，聯合國發展出「維持和平行動」(Peace-Keeping Operation, PKO)制度與作法。這項發展希望至少能夠控制小型戰爭或武力衝突的影響範圍。接著以國際外交方式或由安理會進行處理協調國家間衝突的解決方案，因此維持和平行動有時被稱為「憲章第六章半」(Chapter Six and a Half)。<sup>202</sup>

聯合國執行維和行動包含了三個原則：中立(Impartiality)、同意(Consent from the parties)與不使用武力(Self-defence)原則。其中的同意原則代表了必須得到衝突地區各方代表之同意，聯合國才能介入執行維和任務。聯合國維和行動又分為觀察任務與執行維和任務。觀察任務是指聯合國派出未經武裝人員進入衝突地區監督停火協議、撤軍等協議執行成果；維和執行任務指的是由聯合國派出一小隊軍事人員，所攜帶之武器如非自衛防身之目的則不得使用，是為不使用武力原則。

經過了國聯時期進行地區和平維持任務的經驗，瑞典與其他北歐國家奠定了彼此在聯合國國際維和行動中合作的基礎。而且瑞典在聯合國冷戰時期進行的 13 項維持和平任務中，有參與的項目多達了 11 項，可見瑞典對於聯合國維和行動參與的主動與積極程度。(請見表 3-3)

<sup>201</sup> 如 1935 年國聯在薩爾(Saar)地區公投期間所執行維護安全穩定的任務，瑞典提供了 261 名人員等參與國際維和任務之經驗，請見: Jakobsen, P. V. (2006). *The old Nordic model: peacekeeping during the Cold War (1947-1987) Nordic approaches to peace operations: a new model in the making?* 10-45: Routledge. pp.12-13..

<sup>202</sup> 楊永明，1997，〈聯合國維持和平行動發展：冷戰後國際安全的轉變〉，《問題研究》，第 36 卷，第 11 期，頁 24-26。

表 3-3：北歐國家冷戰時期參與之聯合國國際維和任務(1948-1987 年)

任務名稱	瑞典	丹麥	芬蘭	挪威
聯合國停戰監督組織 UNTSO 1948-	◎	◎	◎	◎
聯合國印度和巴基斯坦軍事觀察小組 UNMOGIP 1949-	◎	◎	◎	◎
第一期聯合國緊急部隊 UNEF I 1956-57	◎	◎	◎	◎
聯合國黎巴嫩觀察小組 UNOGIL 1958	◎	◎	◎	◎
聯合國駐剛果部隊 ONUC 1960-64	◎	◎		◎
聯合國西新幾內亞安全部隊 UNSF 1962-63				
聯合國葉門觀察團 UNYOM 1963-64	◎	◎		◎
聯合國賽浦路斯維持和平部隊 UNFICYP 1964-	◎	◎	◎	
秘書長駐多明尼加共和國代表團 DOMREP 1965-66				
聯合國印度和巴基斯坦觀察團 UNIPOM 1965-66	◎	◎	◎	◎
第二期聯合國緊急部隊 UNEF II 1973-79	◎		◎	
聯合國脫離接觸觀察員部隊（哥蘭高地） UNDOF 1974-	◎	◎	◎	
聯合國黎巴嫩臨時部隊 UNIFIL 1978-	◎		◎	◎
總數	11	9	9	8

來源：Jakobsen, P. V. (2006). The old Nordic model: peacekeeping during the Cold War (1947-1987) In *Nordic approaches to peace operations: a new model in the making?* Routledge. pp.15.

瑞典在 1948 年巴勒斯坦的觀察任務中即擔任重要的角色。而 1956 年聯合國緊急部隊(United Nations Emergency Force, UNEF I )是瑞典與其他北歐國家在維和行動上合作的重要起點。再加上當時的瑞典籍聯合國秘書長道格·哈瑪紹 (Dag Hammarskjold, 任期 1953-1961 年) 作為聯合國維持和平方動的重要推手，為國際社會介紹預防外交(Preventive Diplomacy)的概念。而第一任聯合國秘

書長特呂格韋·賴伊(Trygve Halvdan Lie, 任期 1946-1952 年)也是挪威籍出身。兩位前後任秘書長的存在使得北歐國家較傾向願意支持與提供聯合國維和行動中的各項任務需求。哈瑪紹就曾經在 1958 年說服瑞典政府派出人員領導聯合國停戰監督組織(UNTSO)的運作。而帕爾梅(Olof Palme)曾經在 1980 年與 1984 年擔任伊朗與伊拉克衝突間的聯合國協商代表等。<sup>203</sup>在有名望人士的鼓勵與倡導下，包括瑞典在內的北歐國家因此支持聯合國維和行動的誘因與動力也因此增加。

除此之外，對於瑞典與其他北歐國家來說，對於聯合國維和行動的支持首先是因為先前在國聯的成功經驗，使瑞典等國家認為維和行動對國家外交與安全有明顯的助益。而且國聯的成功經驗也為瑞典等北歐國家樹立起公正、中立 (Impartiality)的國際形象，瑞典可以藉著聯合國維和行動達到促進國際法與和平的發展，減少美蘇兩大強國濫用國際法與破壞和平價值的可能性。

此外瑞典也能夠藉著對維和行動的主動積極態度，再加上瑞典固有的中立政策，使瑞典免於陷於美蘇兩者的冷戰對峙而必須選擇一邊的困難。最後瑞典政府也能夠利用這樣的優勢有效地阻絕與回應來自於瑞典國內對於中立政策持懷疑態度的聲音。<sup>204</sup>

此外對於聯合國維和行動的積極支持也可以增進瑞典中立政策在國際上的可信度，並且有助於瑞典提倡其極力倡導的「團結」觀念。瑞典中立政策的可信度就是在一個新且和平的國際關係建立上，能夠做出有效也有用的貢獻之上。<sup>205</sup>因此瑞典一方面在軍事安全層面主張中立政策，另一方面在作為國家交往重要場域的聯合國中主動積極支持維和行動，這樣的外交作為有助於提昇瑞典的國際聲望，進一步確保瑞典在冷戰美蘇兩強對峙下能繼續保持中立，不會被捲入冷戰衝突之中。

---

<sup>203</sup> Jakobsen, P. V. (2006). *The old Nordic model: peacekeeping during the Cold War (1947-1987)*. pp.8-10.

<sup>204</sup> Agius, Christine. (2006).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Swedish neutrality : challenges to Swedish identity and sovereignty*. pp.108-110.

<sup>205</sup> Dohlman, E. (1989). *National welfare and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the case of Sweden's foreign trade polic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p.55.

瑞典首相帕爾梅(Olof Palme)甚至在 1960 到 1970 年代中將瑞典標誌為一個敢批評美蘇大國為特色的國家。<sup>206</sup>另外帕爾梅也曾表示瑞典的中立立場使瑞典有能力也有責任讓瑞典主動地成為東西方的橋樑。這顯示了瑞典與其他單純以自身國家利益考量為主的國家不同之處：瑞典關切國際環境的安全穩定，並且不單單只是致力於一時的穩定與妥協，而是積極地從可能導致衝突的源頭解決。<sup>207</sup>

中立政策與對維和行動的支持為瑞典帶來了一定的國際聲望，使瑞典能夠獨立於美蘇冷戰之外。並且使瑞典能夠藉著對於國際法的尊重與追求，以中等國家之力量制肘美國與蘇聯等大國。而聯合國就是瑞典能夠達成目標的重要場域。

除了為瑞典帶來安全層面上的國家利益之外，在理念上聯合國維和行動也符合瑞典國際主義追求的國際法的遵守與衝突的和平解決。瑞典社會福利社會強調團結合作和共識，而瑞典將國內理念規範表現在國際層面的方式就透過維和與仲裁調解的方式，在國際層次追求和平。除了瑞典的中立政策之外，主動積極地追求國際和平符合了瑞典社會民主式的理念。唯有兩者作為外交政策的兩面同時施行，才形成了完整的瑞典外交與安全政策。

在實質國家利益與理念上，聯合國維和行動皆符合瑞典所追求的情況與條件，因此瑞典追求法治與和平的國際主義思維表現在對於聯合國維和行動的積極主動上，與瑞典賴以為生的武裝中立政策共同形成了獨特的瑞典外交思維邏輯。

### (三) 國際核武裁軍

而除了對聯合國行動的支持，另外瑞典基於國際主義思維和國家利益也積極地推動國際裁軍的發展。在 1960 年代各國皆在討論是否應當發展核武，瑞典同

---

<sup>206</sup> Tunander, Ola, 1999. *The Uneasy Imbrication of Nation-State and NATO. The Case of Sweden*, *Cooperation and Conflict* 32(2): 169–203. ; Agius, C. (2006).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Swedish neutrality : challenges to Swedish identity and sovereignty*. pp.108.

<sup>207</sup> Palme, O., (1982). *Sweden's Role in the world*, in Bengt Rydén, Villy Bergström (eds.) *Sweden: Choice for economic and social policy in the 1980s*. London: George Allen and Unwin, pp.237.; Agius, C., (2006).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Swedish neutrality : challenges to Swedish identity and sovereignty*.pp.109-110.

樣地在辯論爲了是否發展核武以確保強大的國防實力。安登(Östen Undén, 1945-1962 任瑞典外交部長)反駁了發展核武的提議，選擇在聯合國推動且呼籲各國進行核武裁減。

之後 1963 年的部份核武禁試條約(Partial Test Ban Treaty, PTBT)呼應了瑞典推動的核武裁減作爲。瑞典進一步在 1962 年與其他國家重新成立了聯合國十八國裁軍委員會(UN Eighteen Disarmament Commission, ENDC)之外，瑞典也作爲 1968 年核不擴散條約(Treaty on the Non-Proliferation of Nuclear Weapons, NPT)的提倡者之一<sup>208</sup>，爲相關議題以及在條約產生與簽署的國際多邊談判過程中，提供專門學者人才以及協調溝通的相關資源。對於瑞典來說，國際裁軍最理想的狀態是能夠出現涵蓋所有國家的非核武區(nuclear free zone)，爲國際社會製造一個穩定、和平的環境。

到了 1970 年代，東西方冷戰邁入低盪(détente)時期。在低盪時期前的 1960 年代，美蘇核武軍備競賽達到最高峰，使得北歐地區極有可能成爲美蘇核武衝突的最前線。彈道飛彈技術(Ballistic Missile)與核子動力潛艇的發展增加了第二擊(credible second-Strike)的攻擊能力，冷戰情勢步入了美蘇「相互保證毀滅(Mutual assured destruction)」的階段。

這樣緊張的情勢對於持中立政策的瑞典而言，極有可能會危及國家中立與安全。而瑞典在國際中作爲一個小國(Small State)能夠做的是以瑞典固有的團結概念與人道和平爲基礎，向外輸出和平穩定與團結的規範信念。<sup>209</sup>因此瑞典在 1980 年代持續地與其他北歐國家合作推動非核武區的成立。

瑞典對於國際核武裁減的追求根基於本身中立國家傳統作爲調停人的使命(good office)、國際主義思維對於國際和平的追求，與作爲一個小國在兩極體系中追求自身的生存與安全等多方意義之上。

<sup>208</sup> Herman, S. R. (1998). The Woman inside the Negotiations: Alva Myrdal's Campaign for Nuclear Disarmament, 1961-1982. *Peace & Change*, 23(4), pp.514-519.

<sup>209</sup> Agius, C., (2006),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Swedish neutrality: challenges to Swedish identity and sovereignty*. pp.111-112.

透過瑞典在聯合國安全任務中積極地參與、推動人權保護、與危機處理和衝突預防的作為中表現瑞典在外交政策中充滿國際主義的特色。換句話說，瑞典試圖利用在聯合國中瑞典給予其他國家的印象，定義自身作為一個意見領導者的角色，進而領導世界意見(World Public Opinion)的產生，確立瑞典在後冷戰時期在國際上以國際主義為標誌，而定義自身不同於其他國家的獨特影響力與地位。<sup>210</sup>

而根基於團結概念與普遍主義的社會福利價值形成了瑞典主動積極的國際主義思維，與瑞典傳統中立政策共同形成了瑞典外交與安全政策的樣貌。在後冷戰時代，由於安全環境的改變，使得中立政策發生了質量上的變化。然而瑞典國際主義持續地在後冷戰時代發生影響力，也持續地影響瑞典在歐盟中的行為與邏輯。進而影響了瑞典在歐洲安全暨防衛政策中的主張與行動，繼續地推動瑞典自冷戰時代以來就積極支持的衝突預防與危機處理的安全政策邏輯。

### 三、北歐認同

北歐地區由於地理與歷史上與傳統歐洲有一定的距離，因此隨著時間過去，北歐地區在歐洲歷史中逐漸發展出獨特的「北歐認同(Nordic Identity)」、「北歐獨特性(Nordicity)」與「北歐地區(Norden)」等概念。<sup>211</sup> 因為北歐地區的地理位置處於歐洲大陸的北端，在地理上離傳統歐洲核心地區相當遙遠。在歷史上幾世紀以來的歐洲地區戰爭中，北歐國家基於共同理念而選擇中立政策，因此發展出一種小卻具有競爭力，重視和平、共識型政治、社會福利、安全的國家類型。<sup>212</sup> 而瑞典身為北歐地區的國家之一，其政治、經濟與社會上的觀點也深受北歐認同的影響。

<sup>210</sup> Goldman, Kjell, (1991). The Swedish model of security policy. pp. 80-81.

<sup>211</sup> Nodic 作為 Norden 的形容詞，一般指的是芬蘭、瑞典、丹麥、挪威與冰島所形成的區域。

<sup>212</sup> Østergård, Uffe. (1997). The Geopolitics of Nordic Identity—From Composite States to Nation-states. *Historical Journal*, pp. 25–71.

帕克(N. Parker)認為北歐國家因為這樣的地理與歷史因素，每個北歐地區內的國家皆發展出專屬於自身，特殊的對於國家安全與國際情勢的觀點(Nordic distinctiveness)。將這些北歐國家的觀點集合起來會形成北歐地區特殊論述(Nordic Posture)，此論述代表了北歐不同國家社會具有不同的獨特觀點；然而在許多層面上，北歐國家這些不同的觀點也能夠成爲一個集合，並且具有與其他歐洲地區相區別的獨特性。<sup>213</sup>

北歐國家雖然有著不同的歷史，彼此也有著不同的發展經驗，但是地理的鄰近性使北歐人塑造了共同的北歐認同。除了軍事面之外，北歐國家社會經濟面與文化政治面，利用相對於歐盟其他國家相對獨立且特殊的性質，與歐洲國家競爭、甚至是形成超越歐洲的成果。在瑞典，北歐(Nordic)一詞也成爲瑞典在政治論述上藉以區分瑞典與其他非北歐地區的核心用語。<sup>214</sup>

關於北歐認同的看法，保林(C. S. Browning)認為北歐認同不單單只在北歐地區內部流傳。除了作爲一種在同一塊土地上生活的人群共同記憶與認知外，北歐認同也可以作爲一種「北歐模式(Nordic Model)」出現在國際舞台中。也就是說北歐國家不單單是將這樣獨特的北歐認同作爲共享知識(Shared Knowledge)之外，在國際上也積極地推動一套北歐地區關於政治、經濟與社會等層面完整的論述。北歐模式作爲一種思維邏輯模式，北歐國家認爲這套模式支撐起了整個北歐地區與個別國家的國家認同。這套思維邏輯模式也幫助北歐自己去與其他歐洲地區與國家作區分，進而形成北歐「例外主義(Exceptionalism)」。而這樣的北歐模式除了北歐地區，北歐國家更相信這套模式是比其他類似模式更爲良好，北歐國家可以將這套模式向北歐地區以外的歐洲地區，甚至是向全世界推廣。<sup>215</sup>

因此北歐模式是由三個因素所組成，第一個是和平社會(Peace Societies)與和

---

<sup>213</sup> 北歐國家共同的歷史與文化，請見 Qui, K. (2005). *The Department of European Studies*, pp.8-14.

<sup>214</sup> Parker, N. (2002). Differentiating, Collaborating, Outdoing: Nordic Identity and Marginality in the Contemporary World. *Identities: Global Studies in Culture and Power*, 9(3), 355 - 381. p.359

<sup>215</sup> Browning, C. S. (2007). Branding Nordicity: Models, Identity and the Decline of Exceptionalism. *Cooperation and Conflict*, 42(1), 27-51. pp.27-28.



平製造者(Bridge Builder)，第二個因素是國際團結主義(Internationalist Solidarism)，最後是均等主義下的社會民主(Egalitarian Social Democracy)。<sup>216</sup>在冷戰期間，北歐地區能夠在美蘇兩大強權的夾縫之中保持穩定與和平。並且北歐各國在國內設立學術機構，推動國際政治研究。而瑞典是選擇在冷戰的情勢之下，保持強大國防軍事武力力量的中立政策。並且如同其他北歐國家一樣，強調和平是作為國家歷史的一部分。在必要的時候，北歐國家會以調停者(mediator)的身分出面作為一個「搭橋者(Bridge Builder)」，來緩衝東西間緊張的情勢。更有甚者，北歐國家在和平信念的領導之下，不單單只是消極地採取中立立場，而對外部事務漠不關心。相反地，北歐國家會作為一個「規範的創造者(norm entrepreneur)」，積極地向歐洲或是國際強權推廣和平的概念與規範。<sup>217</sup>

組成北歐模式的第二項因素為國際團結主義。北歐國家提倡「團結(solidarity)」的概念，因此北歐國家不僅僅是在緩衝冷戰期間東西方的衝突，也使北歐模式取得一個道德上的制高點。<sup>218</sup>以瑞典來說，瑞典以小國的角度，提倡主張第三世界國家同樣應該有權利發展自身的政治、社會與經濟層面事務，而不受強權與殖民主義的干擾。<sup>219</sup>而瑞典本身保持中立政策的地位，也使得瑞典有能力在國際事務與道德規範層面上有一定的發言權力。北歐國家所抱持的國際團結主義使北歐國家身處在冷戰時期，能夠立於衝突之外，又在國際間找到立足之地。<sup>220</sup>

第三項則是均等主義下的社會民主。北歐地區福利國家模式被稱為「第三條路(the third way)」、「北歐福利社會(the Nordic Welfare Society)」與「北歐福利模

---

<sup>216</sup> Ibid., pp.28.

<sup>217</sup> Ingebritsen, C. (2002). Norm Entrepreneurs: Scandinavia's Role in World Politics. *Cooperation and Conflict*, 37(1), 11-23. pp.11-12

<sup>218</sup> Browning, C. S. (2007). Branding Nordicity: Models, Identity and the Decline of Exceptionalism. pp.33.

<sup>219</sup> Trägårdh, L. (2002). Sweden and the EU: Welfare State Nationalism and the Spectre of "Europe". In L. H. a. O. Wæver (Ed.), *European integration and national identity: the challenge of the Nordic states*. New York: Routledge. pp. 153.

<sup>220</sup> Laatikainen, K. V. (2003). Norden's Eclipse: The Impact of the European Union's Common Foreign and Security Policy on the Nordic Group in the United Nations. *Cooperation and Conflict*, 38(4), 409-415.

式(the Nordic welfare Model)」等，北歐福利國家模式也因此成爲塑造成一種北歐模式的外在客觀印象。<sup>221</sup> 此外強調均等主義的北歐社會福利與經濟模式，有能力以社會民主模式與美國新自由主義、蘇聯國家社會主義作明顯的區分。再加上社會民主模式所強調的分配正義不屬於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兩個極端的哪一方，使得北歐國家有能力維護自身「搭橋者」的存在正當性。<sup>222</sup>

由上述因素可以得知，北歐模式意在建構一種在冷戰格局中顯得更先進、更和平的社會模式，藉以區分北歐地區與其他歐洲地區的不同。而瑞典基於團結概念傳統，與北歐模式認同的基礎，在面對歐洲統合的壓力下，積極地運用獨具北歐特色與根基於瑞典自身經驗的思考來與歐盟互動，並且推動符合瑞典政策邏輯的思維，以此試圖影響歐盟政策的發展。

### 第三節 小結

本章大致介紹了瑞典社會福利政策、中立政策以及參與聯合國維和任務的經驗。瑞典自兩次大戰期間社會民主黨在政治上逐漸地獲得了政治權力，因此帶動了瑞典社會福利模式的發展，在戰後締造了影響力深遠的瑞典模式。

瑞典模式的內涵包括了經濟政策面的雷恩模式與中央集權式工資協商制度、團結工資政策之外，作爲瑞典模式的重要組成部分，積極性勞動市場政策(ALMPs)幫助瑞典在滿足完善福利政策的同時，也鞏固了經濟的發展。之後在第五章則是會針對瑞典積極性勞動市場政策與歐盟就業策略發展過程中，瑞典固有政策邏輯對於歐盟就業政策的影響，同時也會探討歐盟就業策略發展過程中對於瑞典積極性勞動市場政策或是瑞典政府及社會關係的影響。另一方面瑞典中立政策的歷史悠久，除了在戰爭時期保持中立立場之外，在和平時期，瑞典也是以不

---

221 Kun, Q. (2005). Nordic Identity in the Post Cold War Time- New Challenges and New Opportunities. pp.12.

222 Agius, C., (2006),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Swedish neutrality : challenges to Swedish identity and sovereignty*. pp.107-108.

結盟政策作為保持國家在強權環伺狀態下的主權安全。因此即使冷戰結束之後，根基於國家傳統外交政策中的中立政策一時之間很難被政治菁英與人民放棄，也形成了瑞典在面對歐洲統合時的進入困難。

同時，瑞典在冷戰時期參與國際維和任務的經驗為瑞典的外交開啓了一條新的路線。瑞典雖然保持中立政策，但不代表瑞典願意將自身孤立於國際社會之外。因此瑞典在缺乏強大國家實力的情形下，以國際和平穩定為訴求，發揚國際主義作為外交上的目標，同時也是獲得影響力的手段。這條路線直到瑞典在面對歐洲統合的進展，同樣地被運用到歐盟安全政策領域中。

在之後的第五章，以歐盟安全暨防衛政策(European Security and Defence Policy, ESDP)的發展為脈絡，討論瑞典以「衝突預防」(Conflict Prevention)概念為訴求，在歐盟層面推動和平穩定與人道主義的立場。瑞典此舉在於藉此解決瑞典國內對於中立政策的擁護，與歐洲安全事務統合發展兩者之間可以預見的衝突。同時討論瑞典在參與歐盟安全暨防衛政策發展過程中，歐盟對於國家安全目標及國防組織的影響。並且在第五章的最後，討論這些發展帶來的歐洲化現象。而在第四章與第五章的討論中，討論重點在於檢視瑞典與歐盟兩者之間藉由政策相互影響來達到歐洲化雙向互動的效果，因此本文利用上傳與下載兩種概念，作為解釋瑞典對歐盟之影響，以及歐盟對瑞典之影響兩者的互動概念表達。

## 第四章 瑞典就業政策之歐洲化

本文在第三章討論到了社會福利體制作為瑞典標誌性的特色之一，積極性勞動市場政策(Active Labour Market Policy)是根基於瑞典社會福利體制的基本政策，在社會政策領域具有相當程度的代表性。因此本章將針對瑞典的積極性勞動政策在歐洲化過程中受到的影響與其對歐盟就業政策的影響作一研究與探討。

### 第一節 歐盟就業策略與開放協調法

#### 一、歐盟就業策略

歐洲統合在解決就業政策問題這一面向上，是屬於積極整合(positive integration)，其動力來自於對抗各國家因市場統合形成對國家社會政策的侵蝕。而阿姆斯特丹條約中關於就業政策章節確立了執委會在歐盟社會政策上的地位。這一發展也被認為是積極與消極統合兩者間的第三條路—國家共同合作，但是在社會政策上國家仍有完整的主權，並承諾推行一個共同的社會模式—也有可能讓歐盟社會政策成為歐盟的第四個支柱。

歐盟關於就業議題的討論在 1957 年的歐洲經濟共同體條約中僅有要求會員國盡力保持較高的就業率(Art.104 TEEC)。而在此階段中保持就業水準的目的是為了保持經濟市場活絡的需求，因此需要大量的勞動力進入市場以維持高度經濟成長的需求。而在 1963 年與 1968 年在歐盟層次也分別出現了關於勞工假日訓練與確保勞工自由流動法規執行的專門委員會出現。因此在 1970 年在歐盟高峰會之下設立了一個三方的就業諮詢委員會(advisory standing committee on employment, SCE)，邀請包括成員國、執委會、雇主組織與勞工組織等各方代表

加入。<sup>223</sup>因此在 1960 年代經濟高度發展的情況之下，歐盟藉由超國家層面的共同參與和討論，共同就經濟發展下的勞工市場與就業問題進行跨國性的合作。

到了 1970 年與 1980 年代，經過了戰後經濟高度發展時期。由石油危機開始，國際經濟遭逢了相當程度的不景氣，各國失業率大幅度地提高。就業問題逐漸被各國視為重要的政策議題。而在 1974 年歐洲共同體通過了第一個社會政策行動計畫(Social action programme)，將社會政策納入歐體目標中。然而至 1990 年代為止，雖然歐體社會政策範疇已有初步的發展，然而對就業議題尚未有明確的超國家層面的發展。

1990 年代進入了全球化時代，國家漸漸失去對於國家經濟的主導能力，連帶地就業率也受到全球化經濟影響而脫離國家能掌控的範圍。更有甚之，歐洲貨幣聯盟(European Monetary Union, EMU)的發展也同時激發了關於歐洲內部就業與失業問題的廣泛討論。<sup>224</sup>因此由 1992 年愛丁堡會議開始討論就業與經濟成長問題，並且在馬斯垂克條約中將 1957 年歐洲經濟共同體條約中所要求的高度就業率，正式成文化並且納入馬斯垂克約第二條的規定中。

而歐盟執委會主席戴洛斯在 1993 年所發表的《成長、競爭力與就業白皮書》(The White Paper on Growth, Competitiveness and Employment)中說明了 1992-1993 年的經濟危機必須要有適當的經濟與社會策略作為回應，因此建議了一系列的政策指導原則以回應歐盟各國所共同經歷的經濟衰退，希望能夠為歐盟建立起一套更廣泛符合歐洲經濟、工業與社會脈絡的就業策略。<sup>225</sup>而這份白皮書隨後也被歐盟布魯塞爾(Brussels)高峰會所採用。<sup>226</sup>

接著在 1994 年埃森(Essen)高峰會上奠定了更加明確的就業策略原則，對於就業的目標也由保護就業轉向為促進就業。埃森高峰會認為 1990 年代初期的經

---

<sup>223</sup> 後兩者的代表人數限制在 18 人以下。

<sup>224</sup> Umbach, G. (2009). *Intent and reality of the European employment strategy : Europeanisation of national employment policies and policy-making?* Baden-Baden: Nomos. pp.173-175.

<sup>225</sup> Ashiagbor, D. (2005). *The European employment strategy: labour market regulation and new governanc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p.92-93.

<sup>226</sup> Presidency Conclusions, Brussels European Council Brussels, 29 October 1993

濟衰退使得歐盟對於經濟與就業的承諾受到很大的質疑；因此更加明確的就業策略能夠平衡市場競爭與均等機會之間的矛盾與就業問題。<sup>227</sup>為了達成預定的目標，除了就業議題之外，也注重與社會夥伴間的對話和溝通。<sup>228</sup>因此埃森策略(Essen Strategy)承繼了戴洛斯提倡的白皮書所建議的就業政策目標發展出五項優先發展目標：第一是加強職業訓練以改進就業機會；第二為彈性化勞動時間和工資限制以增加就業；第三是降低非工資勞動成本；第四為採取積極性勞動市場政策以強化失業者就業意願；最後是提出針對長期失業者的對策。<sup>229</sup>

1995年的馬德里(Madrid)高峰會中更增加了以年輕勞工、長期失業者與女性成為埃森策略的重點目標對象，<sup>230</sup> 並計劃成立評價機制，以便對於各國實施狀況做出評估。1996年都柏林高峰會發表都柏林宣言(the Dublin declaration on employment)進一步地同意以穩定暨成長協定(Stability and Growth Pact)支持歐洲貨幣聯盟作為同時穩定經濟成長與就業率的宏觀經濟策略。<sup>231</sup>

因此照著先前就業議題在歐盟統合中的發展，在阿姆斯特丹高峰會前的政府間會議中提出了將就業納入歐盟正式政策目標內容。而最終阿姆斯特丹高峰會上成員國同意納入就業(employment)作為歐盟主要發展目標之一。然而在各國就業政策的決策過程中依然強調成員國主權的主導性，各國利用開放協調法平衡國家就業政策與歐盟就業策略間權力的矛盾，歐盟維持居中協調而非主導的角色。儘管阿姆斯特丹條約並沒有改變各會員國依舊是國內就業政策執行與指導者的角色。阿姆斯特丹條約卻是賦予執委會較高的權力以及作為政策執行推動的策略工具來源。因此，就業議題在阿姆斯特丹條約中首度被整合至正式條約之中，並且根據埃森策略制定的原則作為歐盟就業策略的中心主軸。

<sup>227</sup> Jenson, J., & Pochet, P. (2002). *Employment and Social Policy since Maastricht: Standing up to the European Monetary Union*. Paper prepared for *Nanovic Institute for European Studies*. pp.4.

<sup>228</sup> Schäfer, A. (2004). *Beyond the Community Method: Why the Open Method of Coordination Was Introduced to EU Policy-making*. *European Integration online Papers (EIoP)*, 8(13), 1-19. pp.8.

<sup>229</sup> 施世駿，2005，〈歐盟新治理模式與社會政策發展：「開放協調法」興起的歷史脈絡與政策意涵〉，《台灣社會福利學刊》，第四卷第一期，頁23。

<sup>230</sup> Presidency Conclusions, Madrid European Council Madrid, 15-16 December 1995

<sup>231</sup> Jenson, J. & Pochet, P. (2002). *Employment and Social Policy since Maastricht: Standing up to the European Monetary Union*. pp.5.

1997年由法國在阿姆斯特丹政府間會議期間召開的盧森堡會議，目的在於在使歐盟就業政策正式成文化之前，針對政策協調機制等問題先做清楚地界定。盧森堡會議被稱為「盧森堡就業高峰會」(Luxembourg job summit)，在盧森堡高峰會中，埃森策略被正式地納入歐盟社會經濟相關政策的脈絡之中，藉著這個過程，歐洲聯盟開始正式推動「歐盟就業策略」(European Employment Strategy)的發展，而這一發展過程也被稱之為盧森堡進程(Luxembourg Process)。在盧森堡進程當中，成員國同意在經濟統合之外，納入就業議題作為歐洲統合的一部分，並且儘快以就業議題為目標產出歐盟政策行動綱領(European Guidelines, EGs)。此外為了協助歐盟就業策略的執行與發展，成立了就業與勞力市場委員會(Employment and Labour Market Committee, ELMC)<sup>232</sup>，偕同就業及勞動社會事務部長會議(Employment and Labour and Social Affairs Council)共同就歐盟就業策略行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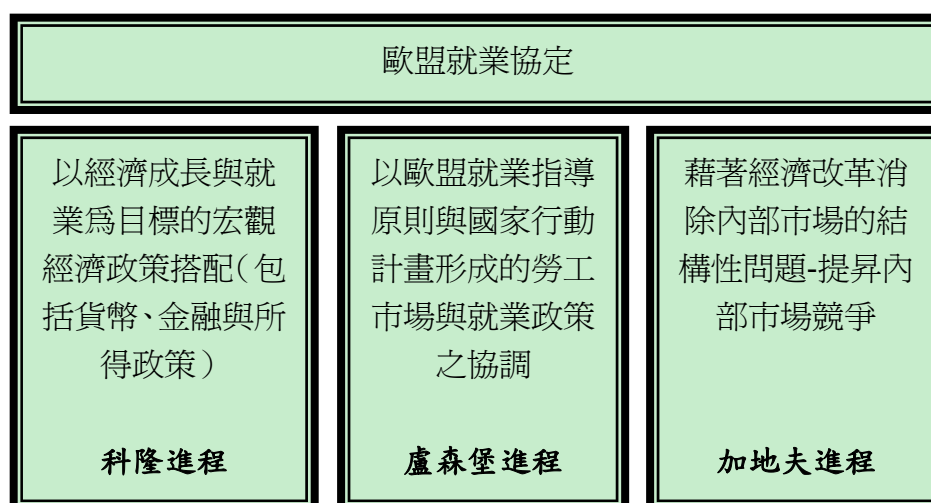
由圖4-1可以看出，除了盧森堡進程之外，歐盟就業策略另外具有加地夫進程(Cardiff Process)與科隆進程(Cologne Process)作為歐盟就業政策發展的支柱(pillars)。此一進程說明了歐盟就業政策發展和歐盟經濟政策發展的關係是密不可分的。<sup>233</sup>

---

<sup>232</sup> 是以 1963/68 年的專家委員會為基礎。隨後在 2000 年就業與勞力市場委員會改革成為 EMCO(Employment and Labour Market Committee, 2000 onwards)，委員會的任務是為 EPSCO(Employment, Social Policy, Health and Consumer Affairs Council)提供資料，並且促進歐盟就業綱領的實行成效，並且確保廣泛經濟政策準則的產出能夠與就業綱領的主軸能相互適應。

<sup>233</sup> Umbach, G. (2009). *Intent and reality of the European employment strategy : Europeanisation of national employment policies and policy-making?* pp.184-185. 在 1999 年到 2000 年間，歐盟就業策略內部組織也發生了一些變化。就業諮詢委員會(SCE)由 18 名雇主與勞工代表減為 10 名；另外就業諮詢委員會的工作任務也出現一些變動，包括了幫助成員國在制訂有關於社會政策立法時，協助其納入歐盟相關的就業綱領(EG)與廣泛經濟政策準則 (BEPG)的內涵，使成員國社會經濟政策能儘快與歐盟同步。

圖 4-1：歐盟就業協定(European Employment Pact)的三個進程



來源：Umbach, G. (2009). *Intent and reality of the European employment strategy : Europeanisation of national employment policies and policy-making?* Baden-Baden: Nomos. pp.185.

歐盟就業策略結合了教育、假日訓練政策、社會安全制度、勞力市場政策與稅制政策。<sup>234</sup>重點在於活用人力資源的彈性，並且著重於創新技術訓練和人力資本的培養。因此積極性勞動市場政策成為了歐盟就業策略的目標，並且歐盟就業策略作為一個勞力供給的政策，要能夠符合歐盟內部自由市場的經濟模式需求，平衡了新自由主義市場需求與戰後歐洲就業政策的發展脈絡。<sup>235</sup>而歐盟就業策略的內容包含了四個面向(pillars)。

第一個面向著重於就業能力(employability)：進行職業訓練等積極性勞工市場政策措施，防止失業情形的發生；或者是針對失業勞工進行積極的勞工訓練，使其能夠重新回到勞工市場，避免只是以消極性的失業津貼替代工資的政策出現。目標族群在於年輕人或是長期失業勞工，藉由新技術的重新訓練，幫助因為經濟產業結構發生轉變而失去工作的族群重新獲得就業的能力與機會。

<sup>234</sup> Jacobsson, K. (2005). Trying to reform the "best pupils in class"? The Open Method of Coordination in Sweden and Denmark. In J. Zeitlin, P. Pochet & L. Magnusson (Eds.) *The open method of co-ordination in action: the European employment and social inclusion strategies*. New York: P.I.E.-Peter Lang, pp.119.

<sup>235</sup> Jenson, J. & Pochet, P. (2002). *Employment and Social Policy since Maastricht: Standing up to the European Monetary Union*. pp.20.



第二個面向為企業家精神(Entrepreneurship)。對於企業提供各項好處，包括降低賦稅與降低工資成本，提高創業與經營的發展性與持續性，鼓勵雇主願意雇用勞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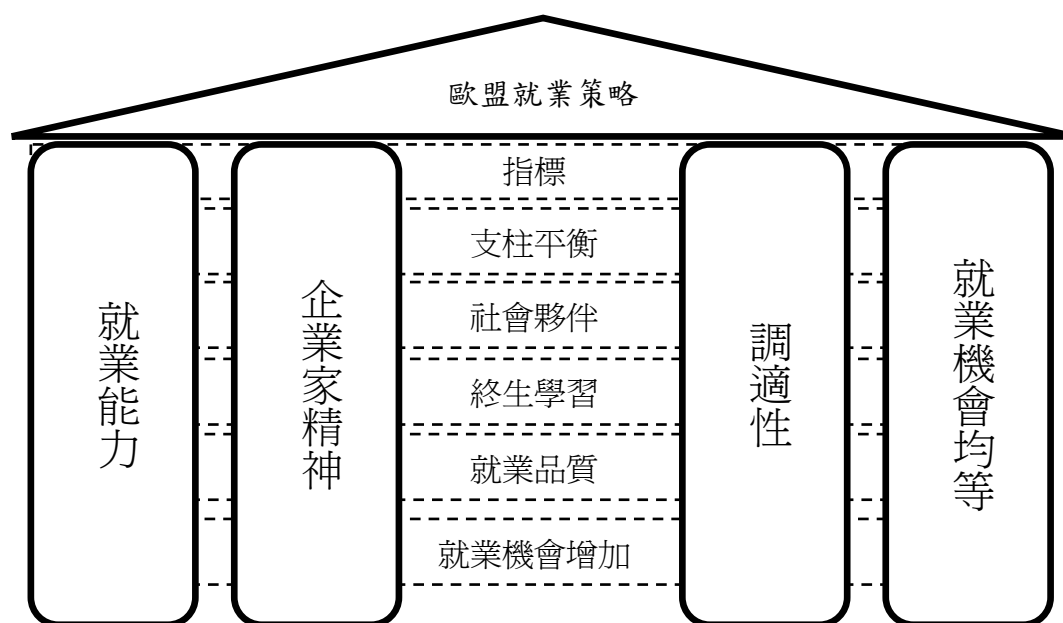
第三個面向為調適性(Adaptability)。調適性指的是對於工作組織的現代化使其具有彈性，並且保障職業安全與高度就業機會。對於工作時數、工作環境、勞工組織與勞工契約等面相的保護，代表了歐盟就業策略的中心思想在於對於職業的保護不再只是保有工作，還包括了對於工作品質的保障與提昇勞工在勞力市場繼續進步的能力。

第四個面向為就業機會平等(Equal opportunities)。這一面向牽涉到就業性別平等的議題，歐盟就業策略中很重要的目標在於使男性與女性獲得平等的就業機會。其中一個重要的部分在於改善兼職工作的環境與條件，還有由北歐國家所推動的幼兒照顧機能。藉著推動此一機能，使成員國能夠朝著能夠支持雙薪家庭(dual –breadwinner model)存在的社會政策聚合邁進。另一方面針對身心障礙者的勞動就業機會擴大也被視為是就業機會平等面向的一部分。<sup>236</sup>(請見圖4-2)

---

<sup>236</sup> Umbach, G. (2009). *Intent and reality of the European employment strategy : Europeanisation of national employment policies and policy-making?* pp.196-198.

圖 4-2：1997 年歐盟就業策略－「四個支柱」模式



來源：Umbach, G. (2009). *Intent and reality of the European employment strategy : Europeanisation of national employment policies and policy-making?* pp.198.

在2000年的里斯本高峰會(Lisbon Summit)中，歐盟就業策略也因為納入了更廣泛的社會政策目標如抵抗貧窮、增進社會保險制度與教育訓練等進入就業政策議題，而更加具體化。里斯本高峰會的改革計畫試圖結合經濟發展的動力，並且藉由歐盟對於社會和諧、公正與環境保護的關心，創造長期穩定的就業發展。里斯本策略也期許歐盟能夠以知識經濟為基礎的世界，成為最具競爭力之經濟體。<sup>237</sup> 里斯本高峰會將2010年的就業目標訂為70%的就業率、60%的女性就業率以及每年3%的就業成長率。<sup>238</sup>

此外，里斯本高峰會也正式地將開放協調法(Open Method of Coordination)明定為歐洲統合中嶄新的政策工具，作為歐盟就業策略的執行方法。在此之前開放協調法已經由其他的形式出現在歐盟經濟政策範疇中；由執委會及部長級會議每年提出的「廣泛經濟政策準則」訂定了關於各國國內經濟政策的一般性原則，再由高峰會採納，進而要求各國提出年度執行報告與計畫。廣泛經濟準則(Board

<sup>237</sup> 關於里斯本策略的具體目標與內容，請見：Presidency Conclusions, Lisbon European Council 23-24.03.2000

<sup>238</sup> Presidency Conclusions, Lisbon European Council 23-24.03.2000, point 6 &30.

Economic Policy Guidelines)和《成長與穩定公約》作歐盟治理模式的軟性與硬性治理方法，確保了歐洲經濟、金融市場的穩定與彼此協調。<sup>239</sup>

因此里斯本策略的出現反應著自由經濟與以歐洲社會模式為目標的社會保障與和諧兩方力量的互動結果。歐盟並不想以嶄新的政策協調過程讓歐盟達到經濟發展與社會保障的目標，而是原有的政策協調模式創造經濟成長、就業機會創造與社會和諧等目標的連結。<sup>240</sup>

而在2002年歐盟就業策略第一個五年的評估中，結果卻說明了歐盟就業行動綱領需要被重新地評估與界定；結論中也指出歐盟就業策略因為目標與方法手段太過於龐雜，導致成員國在實際施行上的困難，說明了歐盟就業策略的確需要適度地簡化，因此也導致了2003年對於歐盟就業策略的討論與改革。

2003年改革的目標在於避免歐盟就業策略執行上的重複與衝突；並且以三年為一循環，進行執行評估；改革就業綱領，使其朝向更穩定與具體的方向前進；將會放更多關注在執行層面上。

2002年巴塞隆納高峰會上也正式地以將盧森堡進程、廣泛經濟政策綱領(Broad Economic Policy Guidelines, BEPG)與內部市場策略(Internal Market Strategy, IMS)三者同步為主要目標。<sup>241</sup>執委會的目的在於使就業綱領能夠使得歐盟就業策略更加以結果為導向，能夠有清楚與簡化的就業策略定義與指導原則，在執行上能有更明確與簡化快速的效果。<sup>242</sup>

執委會更設立了歐洲就業專案小組(European Employment Taskforce)針對歐盟就業策略在執行上的政策挑戰與困難。由主席柯克(Wim Kok)提出的報告中指出里斯本策略依照當時的情況來說，很難在預計時程內達到目標；而針對歐盟就

---

<sup>239</sup> 施世駿，2005，〈歐盟新治理模式與社會政策發展：「開放協調法」興起的歷史脈絡與政策意涵〉，頁17。

<sup>240</sup> Umbach, G. (2009). *Intent and reality of the European employment strategy : Europeanisation of national employment policies and policy-making?* pp.187-188.

<sup>241</sup> Presidency Conclusions, Barcelona European Council, 15-16 March 2002, pp.43

<sup>242</sup> Umbach, G. (2009). *Intent and reality of the European employment strategy : Europeanisation of national employment policies and policy-making?* pp.205-209.; Jenson, J. & Pochet, P. (2002). *Employment and Social Policy since Maastricht: Standing up to the European Monetary Union.* pp.9.

業策略對於成員國的影響來看，報告中說明並未達到預期的影響力。因此柯克報告中針對歐盟就業策略的目標作出更動，而新的就業綱領包括了增強企業與勞工的相互適應能力；擴大勞工參與市場的機會；增加人力資本投注並加強人力資本投注的效率；透過良好治理促進執行層面的改革。<sup>243</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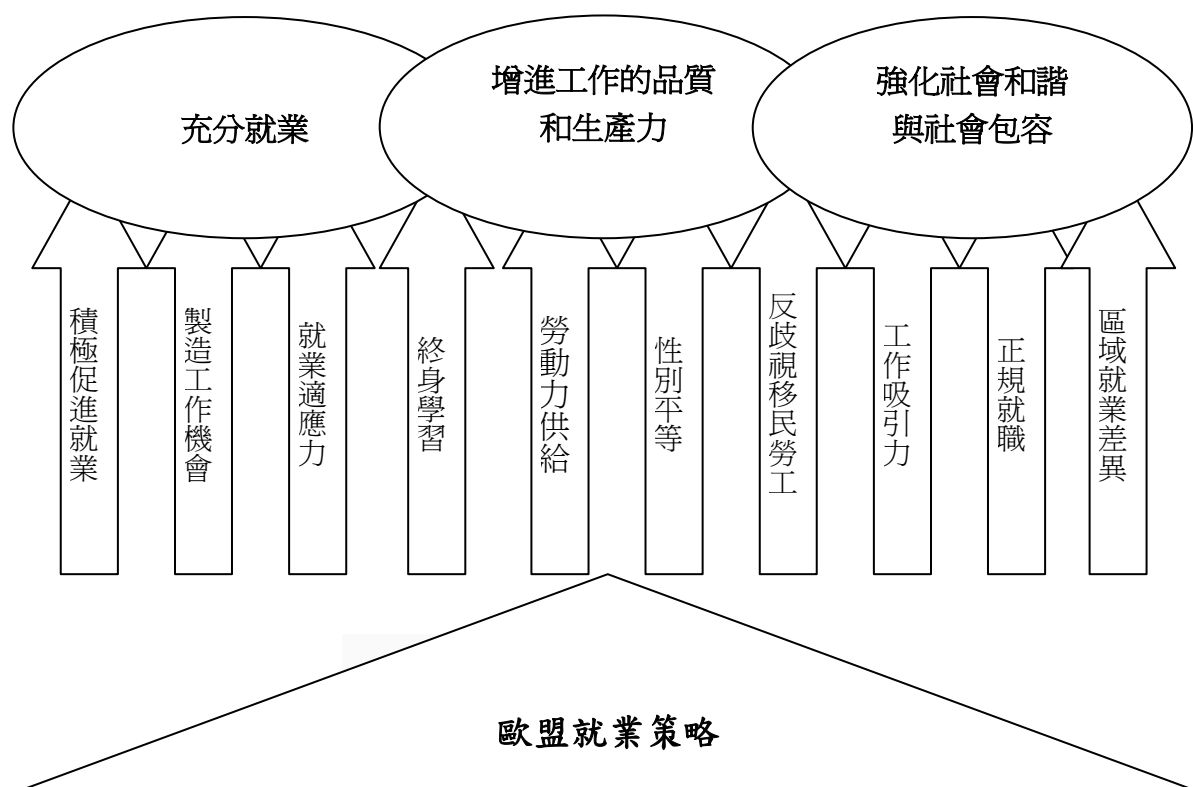
因此2003年歐盟執委會針對歐盟就業策略進行改革與簡化，先前的模型被捨棄，而是以新的三大首要目標為主：充分就業、增進工作的品質和生產力、強化社會和諧與社會包容。改善了先前歐盟就業策略的不足，使就業政策能夠與經濟政策相互搭配，在擴大後的歐盟能夠發揮應有的影響力。(請見圖4-3)



---

<sup>243</sup> Kok, Wim and Dell'Aringa, Carlo and Lopez, Federico Duran and Ekström, Anna and Rodrigues, Maria João and Pissarides, Christopher and Roux, Annette and Schmid, Günther, (2003). *Jobs, jobs, jobs: creating more employment in Europe*. European Commission Employment Taskforce, Brussels, pp.18.

圖 4-3：2003 年新「歐盟就業策略」－三大首要目標模式



來源：Umbach, G. (2009). *Intent and reality of the European employment strategy : Europeanisation of national employment policies and policy-making?* pp.211.

而歐盟依據2004年3月布魯塞爾高峰會決議而產生的高層專家團隊報告 (high level group of experts report)修正了里斯本策略。報告中說明了里斯本策略的問題是涵蓋的範圍太過於廣泛，反而很難在執行上有明確的手段目標。而實際上也證明了，自2004年開始的全球經濟問題使得成員國無法達到里斯本策略的要求。

雖然在1997年到2003年間各成員國國內就業政策改革逐漸朝著歐盟就業策略的要求接近，但是在國際經濟因素與執行面上的問題使得里斯本策略的目標有必要重新評估。<sup>244</sup>報告中也針對開放協調法進行評估，評估的結果是開放協調法並不能使成員國達到相互監督與促進的效果，因此損耗了里斯本策略的結果和可

<sup>244</sup> Kok, Wim, (2004). *Facing the challenge : The Lisbon strategy for growth and employment Report*, the High Level Group, pp.9-16.

行性。<sup>245</sup>

因而 2005 年新里斯本策略(A new start for the Lisbon Strategy)目標包括了吸引投資歐盟地區並促進就業；以知識經濟、創新為基礎，帶動經濟成長；促進成員國與執委會之合作。<sup>246</sup> 2005 年的春季布魯塞爾高峰會中通過了將就業綱領(EGs)與廣泛經濟政策綱領(BEPG)整合的決定，將此兩者統整為一份單一的綱領。執委會並要求各成員國依據新里斯本策略提報 2005-2008 年之具體國家改革計畫(National Reform Programmes)。<sup>247</sup>以期讓新的里斯本策略能夠在接下來的五年內發揮促進歐盟經濟發展與就業的積極作用。

## 二、開放協調法

在歐洲統合過程中，歐盟政策的產出與執行通常是由條約或是明確的法規訂定，以此要求各成員國遵守歐盟法規。執委會同時扮演了政策與法規的推動者，與成員國執行政策與法規的監督者，必要時能夠以行政制裁或是由歐洲法庭的司法途徑要求成員國強制遵守。<sup>248</sup>

相較於傳統的「硬性法」(Legal bindingness)管理，歐盟就業策略所採用的開放協調法，是屬於「軟性法」(Soft Law)的範疇。<sup>249</sup> 軟性法的治理精神包含了軟性管理與輔助原則，在政策目標制定過程中選擇包容不同成員國固有的政體與政策傳統，使成員國能夠依照需求和情形具有彈性地執行歐盟要求的目標與政策。歐盟必須要做的是在歐盟層面形成一種原則與模範(model)軟性促使各國基於壓力(adjust pressure)去改變本屬於國家自身裁量的社會政策。在這一個前提之下，

---

<sup>245</sup> Ibid., pp.7.39-42.

<sup>246</sup> Presidency Conclusions, Brussels European Council, 22-23 March 2005

<sup>247</sup> European Commission, 2005. Working together for growth and jobs A new start for the Lisbon Strategy, Communication from President Barroso in agreement with Vice-President Verheugen, COM (2005) 24, Brussels, pp.31.

<sup>248</sup> 施世駿，2005，〈歐盟新治理模式與社會政策發展：「開放協調法」興起的歷史脈絡與政策意涵〉，頁15。

<sup>249</sup> Treib, O. & Falkner, H. B. G. (2007). Modes of governance: towards a conceptual clarification. *Journal of European Public Policy*, 14:1, pp.5-6.

可以了解到歐盟社會政策發展是基於軟性治理的影響與國家自願性的行為而進行。

阿姆斯特丹條約中規範了歐盟社會政策的發展。在就業政策領域範圍裡，阿姆斯特丹條約第 125 條至 130 條的就業章節包含了開放協調法的精神與執行原則。由執委會主導產出一個共同指導原則(guidelines)，程序由特別歐洲會議起草，執委會制定基本規則，並由部長理事會通過。就業特別委員會、歐洲議會與社會夥伴等擔任諮詢角色參與其中。各國必須每年提出國家行動計畫(National action plans, NAPs)，交付執委會並且每年執委會會就各國提交計畫做出比較與分析。執委會並享有向會員國提出建議的權力，必須注意的是社會夥伴(social partner)的角色被強化。各國議會也藉由每年通過國家行動計畫(National Action Plan, NAPs)的機會參與歐盟社會政策運行，其也代表了歐洲統合的政治化。

由於每個國家對於實施就業政策指導原則的態度與作法不同，執委會目標即是建立起在執委會、成員國與社會夥伴間的信心。這樣一來，即使成員國對於指導原則的態度依然有所保留，但歐盟還是對於成員國有一定的影響。而且每年例行性的年度報告對於國家是一項來自於執委會及其他行為者有力的輸入項。國家在面對提交報告的底限的同時會有壓力而試圖符合要求。因此執委會有三項功能：制定指導原則的功能、評價各國家成果的功能與作為一個理念及意見集散地的功能。

另外成員國間也有互評的機制設計，讓各國接收到來自於其他成員國的壓力(peer pressure)，甚至評價報告刊出之後，國內的反應也有可能形成對於會員國的壓力。但從另一方面來看，執委會訂定大框架的指導原則讓會員國在轉換指導原則至國內規章的同時，有轉圜與政治操作的空間。

然而執委會擔心國家自主空間太大讓歐盟原則失去原有的效用，因此在 2000 年召開會議通過指導原則的明確框架範圍。因此直到 2000 年里斯本高峰會才將開放協調法視為正式的歐盟治理方法之一。里斯本高峰會界定了開放協調法的基礎。首先歐盟制定一套基本的準則，依據此準則並訂出配合的執行時間表。

接著歐盟爲了評估成員國執行的成果，執委會與其他歐盟機關會制訂出質化與量化的指標，並以最佳實踐的情形訂出標竿尺度。而下一步則是設定特定、具體目標使歐盟政策準則能夠與成員國內政策與之融合，也能同時兼顧成員國之國情不同，定期整合成員國的行動方案。最後歐盟將定期調控、評鑑以及同儕監督組織爲互相學習的過程。<sup>250</sup>

開放協調法作爲歐盟統合中較新的治理方式，與傳統歐盟治理方法是相當不同的。根據波拉斯(S. Borrás)與雅克布遜(K. Jacobsson)的分析，開放協調法的特色具有：限制法律的角色，歐盟制訂的政策準則並沒有強制性。歐洲法院與議會的力量並不介入其中。二是容許分歧的協調性原則，開放協調法一方面爲成員國設定目標，另一方面也允許成員國參與準則的制訂過程，加強成員國遵守的意願，而且容許成員國尋找最適合自身的政策策略，使各國的政策結果趨向一致。

第三是循環性的執程序，開放協調法使用數年爲一循環的程序，利用相互承諾(mutual commitment)與同儕壓力(peer pressure)以確保各國的執行結果。接著第四是加強成員國包括政府與民間等社會夥伴的參與，提昇了開放協調法的有效性。<sup>251</sup>

第五是政策學習，傳統的歐盟治理方式並不注重政策的學習效果，開放協調法強調由下而上知識的累積，鼓勵行動者將國內或在地的知識與經驗帶入政策討論，達成觀摩學習的效果。最後是政策間的聯繫，透過經濟和貨幣議題的統合，帶動了就業議題等新的歐盟發展議題。另外開放協調法的範圍包括了多層次，及眾多公部門與私部門行爲者，因此必須注重成員國內與歐盟層次的政策配合。<sup>252</sup>

對於歐盟就業策略，執委會所形成一個較大的計畫是關於歐盟就業計畫，主張將勞動力市場標準化(modernization)，其目標是平衡就業彈性(flexibility)與社會安全兩者，並且增加就業力。然而彈性這一觀念可以由兩方面探討：第一個是由

<sup>250</sup> Lisbon European Council 23-24.03.2000: Conclusions of the Presidency, point. 37

<sup>251</sup> Borrás, S., & Jacobsson, K. (2004). The Open Method of Co-ordination and New Governance Patterns in the EU. *Journal of European Public Policy*, 11(2), pp.188-189.

<sup>252</sup> Ibid.; 施世駿，2005，〈歐盟新治理模式與社會政策發展：「開放協調法」興起的歷史脈絡與政策意涵〉，頁 19-20。



勞方來看，勞動力的品質與技術層級和訓練（假日訓練與終生教育等觀念）；而由資方來看，彈性代表勞動力市場的去規範與再規範和新的工資契約模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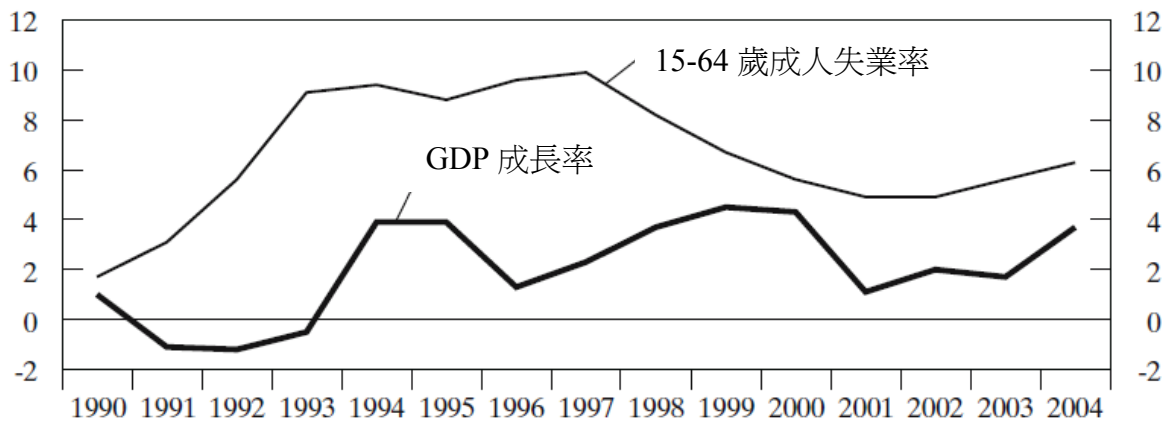
以上介紹了歐盟就業策略的發展，以及開放協調法在歐盟就業政策領域的運用與循環過程。以下就瑞典積極性勞動市場政策做一介紹，接著針對瑞典積極性勞動市場政策受到歐盟就業政策影響的層面作一分析。

## **第二節 下載：歐洲就業策略對瑞典的影響**

### **一、瑞典積極性勞動市場政策**

在1960年到1990年間，瑞典經歷了一段很長的低失業率時期。在瑞典模式與林恩模式(Rehn-Meidner Model)下形成的積極性勞動市場政策對於瑞典經濟與社會模式的貢獻不容小覷。在物價穩定與完全雇用的前提之下，利用「團結工資政策」(Solidaristic Wage Policy)減低產業間工資差別，另外運用積極的勞動力政策，如教育與職業訓練，配合失業保險等方式謀求勞動力的地域移動和（再）投入勞力市場，形成瑞典的低失業率榮景。

圖 4-4：1990 年至 2004 年瑞典國內生產毛額與失業率折線圖



來源：Kluve, J. 2007. *Active Labor Market Policies in Europe: Performance and Perspectives*. Berlin, Heidelberg : Springer-Verlag Berlin Heidelberg, p.62.

然而在1990年代初期開始，瑞典經歷了嚴重的經濟危機，失業率也節節高升，促成了瑞典加入歐洲聯盟的契機。(請見圖4-4)瑞典在2001到2003年間也經歷了經濟的低迷時期。因此瑞典在面臨新的全球化與歐盟經濟區時代，勞動力市場政策也相應地出現了改變。以下就戰後至21世紀初瑞典的積極性勞動市場政策作一介紹。

積極性勞動市場政策是由三個部分組成：協助就職機會的尋找；就業訓練；創造臨時工作機會、就職補助津貼與直接工作機會創造。<sup>253</sup>其中瑞典積極性勞動市場政策具有相輔相成的兩個重要面向：為失業者提供援助的保險制度(Unemployment Insurance, KAS)與一系列為失業者提供就業機會的積極性勞動市場政策與計畫。<sup>254</sup>

戰後1957-1958年的經濟不景氣為積極性勞動市場政策提供了嘗試與擴張的機會。由中央政府主導，並由政府、勞工與雇主三方組成的國家勞力市場局(National Labor Market Board, AMS, Arbetsmarknadsstyrelsen)與各地方層級勞力委員會、中央及地方政府共同制訂勞力市場政策。在初期勞力市場政策是以勞動力供給取向(supply-oriented programs)的計畫為主，以成人訓練和以地區為分野的

<sup>253</sup> Fraser, N. (1999). How Strong is the Case for Targeting Active Labour Market Polici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anpower*, 20(3/4), pp.151.

<sup>254</sup> Sianesi, B. (2002). Swedish active labour market programmes in the 1990s: Overall effectiveness and differential performance. *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 and Institute for Fiscal Studies*, pp.5..

勞動力供給為目標。然而到後期，為了因應全球不景氣國內經濟產業的需求，勞動力市場政策轉為偏向於需求面為基礎的政策模式。<sup>255</sup>

瑞典積極性勞動力市場政策的目標有：首先是針對尋找工作者，儘量減低求職者與工作本身的不合(mismatch)，促進求職者能直接進入工作職位的程度。二是提昇勞工的技術；在工資團結的情形下，促進與更新勞工技術也是至關重要的任務。三是採取不同的就業政策以符合產業與企業的需求，達成充分就業的目的，如創造就業，以及在勞力短缺的產業領域增加技術勞工的供給。<sup>256</sup>

而在具體勞力市場政策部分，第一個部分即是職業介紹與諮商服務，由政府提供的公共職業輔導所，在企業有需要時向輔導所報告並由職業輔導所輔導勞工就業。第二個部分是，依照瑞典模式的積極性勞動市場政策的目標在於勞動力的流動與充分利用，因此勞力政策的重點在於提供勞力的勞力市場訓練(Labour Market Training)與轉職補助金的積極性措施。勞力市場訓練的對象是職業輔導所的求職者，而針對特定較缺乏勞工的產業，政府也提供針對此產業的就職訓練，滿足勞工就業與產業人才的需要。

另外，除了公共訓練之外，針對企業內部勞工的職業訓練，政府也會提供企業職業訓練補助金，鼓勵企業為內部勞工進行技術更新。轉職補助金則是為了鼓勵勞工人才的流動，接受其他地域的勞工可以得到包括旅費、外地就業與日常生活的經費津貼，是為了平衡地區勞動力的供需平衡；另外工時縮短、雙親育兒假、假日職業再訓練與彈性退休制度也可以納入轉職補助金的範疇，皆是為了鼓勵勞工流動、再訓練與兩性平等就業的措施。

1970年代國際經濟環境的不景氣影響了瑞典內部勞動力政策的形態，以往以勞工供給為目標的積極性勞動市場政策，因為民間企業的雇用意願下降而面臨了挑戰，轉而以需求面為主要考量。因此瑞典積極性勞動市場政策的第三個部分

---

<sup>255</sup> Rehn, G. (1985). Swedish Active Labor Market Policy: Retrospect and Prospect. *Industrial Relations: A Journal of Economy and Society*, 24(1), pp.65-69.

<sup>256</sup> Fraser, N. (1999). How Strong is the Case for Targeting Active Labour Market Policies? pp.152-153.

是，瑞典政府採取了失業對策事業、民間企業補助金與地域開發援助等影響勞力需求的政策。失業對策事業實施的前提是，求職者必須先經過六個月的就業介紹與職業訓練時期，等過了六個月之後尚未就業者，才經由國家中央政府或是由中央政府補助地方政府提供的臨時公共建設與服務就職機會。一般以道路、植林與環境保護等就業機會為主，然而隨著婦女就業者增加，公共部門提供的托兒、保健、老人與殘障者照護的就業機會也隨之增加。<sup>257</sup>

國際經濟不景氣也影響了瑞典對於勞動政策的態度，為了提昇民營企業的雇用意願，政府除了過去鼓勵勞動力流動的政策之外，1975年更加進了以儲備補助金(Stockpiling Subsidies)為主的雇用補助金。針對某些經濟表現不好的產業提供補助，降低或減緩企業主解雇勞工的意願；或是1978-79年加入了招募人員補助金；對企業採用臨時職員所提供的補助。然而在1982年社會民主黨重新上台之後，這樣的作法馬上被強烈地批評並且被新政府結束。<sup>258</sup> 唯招募人員補助金被保留下來，政府針對民營企業雇用職業輔導介紹的失業者，政府予以補助企業此名失業者最長六個月50%的工資。其他類似的計畫也展現在地域開發援助上，政府針對北部地區較少開發的地域，為了鼓勵開發及雇用人員，提供企業開發援助。

瑞典積極性勞動市場的第四個部分是關於殘障者雇用促進計畫，包括了輔導就業之外，瑞典勞力市場政策為了保護殘障者就業機會，對於雇用殘障者的企業提供了四年起跳的「準保護雇用」計畫<sup>259</sup>，並且致力於改造企業環境，使其成為包容並接納殘障者就業的企業環境；並在支付工資時，會有保護殘障者的措施，以殘障年金考慮工資的支付額。最後是年輕人失業問題，針對不繼續升學也找不到工作的青少年，在少年工作計畫(Youth Jobs)之下，政府對於雇用者與少年求職者皆有六個月的臨時雇用津貼；而對於到了18歲的青少年，則是在青年團(Youth Teams)計畫下，也能夠得到適當的兼差機會。另外針對想要自行創業的年

<sup>257</sup> 一般由中央政府負擔營運成本的 75%，及勞工成本的 33%。

<sup>258</sup> 這與過去社民黨主政時，對於表現不佳的產業鼓勵其轉型的方式不同，是在保守黨主政下的產物，成效也十分有限。

<sup>259</sup> 第一年補助企業支付殘障者工資的 75%，第二年 50%，第三年及第四年 25%，第五年後經過討論再決定是否給予補助。

輕人，政府也提供了自營業開設援助津貼(Enterprise Allowance Scheme)，為年輕人提供廣泛的就業機會與方向。<sup>260</sup>

而瑞典在參與歐盟就業策略後，自 2002 年開始根據歐盟每年訂出的就業指導原則，而每年訂定國家就業行動計畫。瑞典國家就業行動計畫擬定的流程為：財政部與工業、就業及交通部(The Ministries of Industry, Employment and Communications)等相關政府部門經過討論之後，並協調各部會之間的合作與執行流程與可行性。接著即開始進行年度就業行動計畫之草擬，在此過程中加入包括勞工與雇主雙方的社會夥伴團體的諮詢意見。由國會通過之後，一方面呈交給歐盟事務顧問委員會(the Advisory Committee on EU Affairs)所屬的勞動市場委員會(the Standing Committees on the Labour Market)與財政委員會(Standing Committees on Finance)；另一方面交由工業、就業及交通部內國家勞動市場署研擬方案並傳達給全國個地方就業服務中心執行。

2003 年歐盟就業指導原則的三大目標為：完全就業、工作品質與生產力，以及社會和諧與社會包容。<sup>261</sup>瑞典根據歐盟就業指導原則訂定了 2003 年瑞典國家就業行動計畫，其目標原則可以分為九點。第一點是為失業者發展並實施主動和預防性措施；第二點是鼓勵創造就業機會和鼓勵創業者；第三點是處理勞動市場變化和促進勞動市場中的動力和適應性；第四點是促進人力資本發展和終身學習；第五點是促進勞動力供應和積極老齡化<sup>262</sup>；第六點是促進性別平等；第七點是打擊對於在勞動力市場處於不利地位的人民之歧視；第八點則是通過激勵措施，以增加工作勞動之吸引力；第九點是將未被法律定義為正式工作的項目轉換為常規就業：最後則是解決就業的區域差異。<sup>263</sup>

---

<sup>260</sup> 青年團計畫提供了每週五天，每天四小時的工作機會，工作場所多半為地方區域團體或是宗教慈善團體。關於瑞典積極勞力市場就業計畫請見：東京大學社會保障研究所著，張雪真譯，2004，《瑞典的社會保障制度》，生活家出版事業，頁 105-125。

<sup>261</sup> Ministry of Enterprise, Energy and Communications, (2003). Sweden's Action Plan for Employment 2003, Stockholm: Sweden.

<sup>262</sup> 行政院經建會人力處：Active ageing is the process of optimizing opportunities for health, participation and security in order to enhance quality of life as people age. 使健康、社會參與和安全達到最適化機會的過程，以提升民眾老年的生活品質。

<sup>263</sup> Ministry of Enterprise, Energy and Communications, (2003). Sweden's Action Plan for

而在 2005 年，針對里斯本策略的成果檢討報告《成長與就業改革方案 2006-2008》(The Swedish Reform Program for Growth and Employment 2006-2008) 當中，瑞典進一步地在身心障礙者就業、就業安全與彈性、社會夥伴參與，以及人力資本培養的新型模式等方面進一步地詳細闡述了改革的方向，以及欲達成里斯本策略的意願。<sup>264</sup>

而 2006 年 9 月國會大選後，以溫和黨為主的中間偏右派新政府上台後，針對前任政府的就業政策進行了一些改革，首先是針對已經離開勞動力市場的失業者採取有益的就業措施，強調公共資源必須充份運用在幫助失業者尋找工作及滿足就業市場職缺。第二是，失業保險也必須做適度的調整，以保證在職勞工領到的薪水一定要比沒工作者好，以確保勞動吸引力，包括了推廣工作優先原則(the work-first principle)、增加青年就業率、延緩高齡人口提早退休、持續加強反歧視的工作、以及積極促進身心障礙者就業等。

上述是瑞典積極性勞動市場政策在戰後至 21 世紀初的發展，以下針對瑞典積極性勞動市場政策受到歐盟就業策略影響的層面作一分析。

## 二、歐洲化過程之影響

根據羅培茲--山塔納(López-Santana)的分析，瑞典就業政策領域受到歐盟就業策略的影響跳脫了傳統歐洲化研究成員國順從與否的二分法式問題，與強調歐洲化過程與國家內化(internalization)的研究；而是將焦點放在成員國內政治結構與政策結果發生連續性的轉變結果(transformation)和程度上的差異。由於開放協調法的作用，使得傳統共同體以歐盟法院判決為強制手段的硬性法治理方式不能在此發揮解釋的作用。

其原因第一是，因為開放協調法是以成員國的自願為基礎，並不是以強制的手段逼迫成員國遵守。第二是，如前所述，開放協調法並不以國內立法適應為主，

---

Employment, Stockholm: Sweden, pp.2.

<sup>264</sup>而後，2006 年 10 月新政府上台後，重新擬定《成長與就業改革方案 2006-2008》(The Swedish Reform Program for Growth and Employment 2006-2008)

而是由各國自行決定執行方式，因此不牽涉法律的轉換。而且國內發生轉變的形式也會顯得較多樣化。第三是由於歐盟法院並不能發揮懲罰的作用，因此歐盟在歐盟就業策略中的強制力量相對縮小許多。<sup>265</sup>

圖 4-5：歐洲化過程中可能的政策結果



來源：López-Santana, M. (2009). pp.135.

由圖4-5可知，因此在歐盟就業政策的影響之下，成員國可能會有三種不同的反應程度：一是沒有變化，也就是軟性治理的方法對成員國沒有影響；二是適應(accommodation)，指的是在不影響成員國基本制度架構的前提下，成員國吸收了歐盟指導原則而改變了政策與程序。而光譜的另一頭是隨著政策與政策程序的改變，成員國內部的基本政治制度架構也因為歐盟就業策略以軟性治理的影響下而發生基礎的改變。

而針對瑞典受到歐盟就業策略的影響，羅培茲--山塔納認為需要從政治與法律方面、政府與社會間關係方面以及政府各部門間關係方面來檢視歐盟就業策略對於瑞典的影響。<sup>266</sup>

#### (一) 政府部門方面

瑞典的政府間部門關係是集體決策(collective decision-making)，政策的決定與施行必須先行與其他部門協調，才能保持政府機關運作的順暢。也就是說政策

<sup>265</sup> López-Santana, M. (2006). The domestic implications of European soft law: Framing and transmitting change in employment policy. *Journal of European Public Policy*, 13(4), 481–499. pp. 485-486.

<sup>266</sup> López-Santana, M. (2009). Soft Europeanization? The differential influence of European Employment Strategy in Belgium, Spain and Sweden. In M. Heidenreich & J. Zeitlin (Eds.), *Changing European employment and welfare regimes: the influence of the open method of coordination on national reforms*. New York: Routledge. pp.136.

執行的部門能夠不受到其他部門的干預，然而在執行上也必須和其他部門協調，否則政策會流於滯礙難行的情況。按照戰後的瑞典模式設計，瑞典的統合主義是瑞典模式的特色之一。然而在1990年代隨著政府、雇主與勞工間的對話減少與中央集中薪資協調的式微，政府與社會間的社會對話也逐漸衰弱。

而在瑞典政府內部負責製作瑞典國家行動方案的是工業部(ministry of Industry, Employment and Communication)與財政部。然而負責瑞典國內勞力市場政策的政府官員與負責製作瑞典國家就業行動方案的官員，實際上並不重複，換句話說，瑞典國家就業行動方案並不能完全地反應瑞典國內真正的歐盟就業策略的實行狀況。為了解決這個問題，瑞典政府曾經在2002年針對歐盟就業策略，對所有相關的政府部門與社會夥伴進行資訊與知識的宣傳。

而另外一個問題，則是雖然負責提供資訊給予上述兩部門製作瑞典國家行動方案的是國家勞力市場局與瑞典社會基金委員會(Swedish ESF Council)，然而根據雅克布遜(Jacobsson)在2003年進行的訪談，這兩個部門的的官員對於瑞典國家就業行動方案並沒有太多的參與感；而且對於歐盟就業策略的建議只有極少數會被國家勞力市場局納入政策考量，顯示了瑞典政府內部對於瑞典國家就業行動政策的相對消極態度。<sup>267</sup>

除了中央政府部門之外，歐盟就業策略對瑞典地方政府的就業政策也有影響。傳統上，瑞典中央政府是擔任政策決定的角色，而地方政府只是負責執行與管理政策在地方的施行。然而在歐盟就業策略施行之後，為了更有效地將就業目標在每一個人民身上實行，因此執委會在2000年到2002年的歐盟就業指導原則中強調區域及地方參與歐盟就業策略的重要性。

除此之外更以歐盟結構基金(European Structural Fund)的經濟支持為誘因，吸引區域及地方政府參與歐盟就業行動方案希望區域及地方政府能夠產生「地方就

---

<sup>267</sup> Jacobsson, K. (2005). Trying to reform the "best pupils in class"? The Open Method of Coordination in Sweden and Denmark. In J. Zeitlin, P. Pochet & L. Magnusson (Eds.) *The open method of co-ordination in action: the European employment and social inclusion strategies*. New York: P.I.E.-Peter Lang, pp. 4-5. 例如就業性別差異問題與移民勞工就業議題等。



業行動方案」(Local Action Plans for Employment)，藉以落實歐盟就業策略的目標。在這一發展之後，瑞典國內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的關係發生變化，雖然地方政府還不能夠參與國家決策過程，然而也不再是單純的執行者，而是與中央政府至少在就業政策領域範圍進行協調的角色。<sup>268</sup>在歐盟就業策略與歐盟結構基金的影響之下，瑞典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也共同參與了歐盟就業策略的施行與協調。

## (二) 政府與社會的關係方面

瑞典模式裡的中央集權式工資協商制度(Centralized Wage Bargaining)的設計為瑞典創造了社會夥伴(Social Partner)的傳統；然而在1991年雇主聯盟(Employer's Confederation, SAF)退出三方協調的制度，與1992年保守黨政府裁去雇主聯盟在政策決策過程中的代表資格，僅存諮詢功能，使得社會夥伴的傳統在1990年代逐漸衰微。然而因為歐盟就業策略關於國家行動方案的設計，的確改善了瑞典國內政府與社會之間的協調。<sup>269</sup>

在國家行動方案的產生過程中，社會夥伴自2000年起能夠在相關議題中提供意見，並且能在歐盟就業策略介入的政策領域中加入決策過程，這使得社會夥伴相當支持歐盟就業策略。對於社會夥伴而言，歐盟就業策略採用開放協調法，為社會夥伴在國家行動方案產生過程中提供了新的動力，將社會夥伴重新帶回瑞典國內的社會對話當中。<sup>270</sup>雖然如此，但是社會對話的效果還是相當有限，僅限於資訊分享而不能達到真正參與政策過程的目的。<sup>271</sup>

而在瑞典國家行動方案中並沒有非政府組織(NGO)的參與。在2002年工業部

<sup>268</sup> López-Santana, Mariely. (2009). Having a Say and Acting: Assess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European Employment Strategy as an intra-governmental coordinative instrument. In: Kröger, Sandra (ed.): What we have learnt: Advances, pitfalls and remaining questions in OMC research, *European Integration online Papers (EIoP)*, Special Issue 1, Vol. 13, Art. 15, pp.3-4.

<sup>269</sup> López-Santana, M. (2009). Soft Europeanization? The differential influence of European Employment Strategy in Belgium, Spain and Sweden. pp.138.

<sup>270</sup> Jacobsson, K. (2005). Trying to reform the "best pupils in class"? The Open Method of Coordination in Sweden and Denmark. pp.116-119.

<sup>271</sup> Jacobsson, K. & Schmid, H. (2002). Real Integration or just Formal Adaptation? 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National Action Plans for Employment. In C. d. La Porte & P. Pochet (Eds.) *Building social Europe through the open method of co-ordination*. New York: P.I.E.-Peter Lang, pp.88.

曾經採納了關心殘障就業的非政府組織的建議。雖然樂於接受非政府組織對於國家行動方案的建議，然而瑞典政府與固有的社會夥伴還是拒絕開放非政府組織參與勞工市場政策決策過程。<sup>272</sup>

2002年一個爲了打擊社會排除而形成的非政府組織網絡，繼2001年參與社會包容政策國家行動計畫之後，也積極地想要參與瑞典就業國家行動計畫的過程，並且「打破固有社會夥伴就業政策諮商中的壟斷」。因此在工業、就業與交通部的支持之下，非政府組織網絡雖然還不能參與正式的國家行動計畫諮詢過程，但是在2003年瑞典工業、就業與交通部同意與就業領域的非政府組織共同召開會議討論就業相關領域政策事務。<sup>273</sup>

在勞動市場政策部分，瑞典政府與社會夥伴雖然還是爲了自身的利益而拒絕非政府組織的參與。<sup>274</sup>但是可以看出在非政府組織的努力之下及歐盟指導原則的要求下，瑞典政府正一步一步地朝向此一方向邁進。

### （三）政治與立法方面

羅培茲--山塔納認爲在政治與立法方面，歐盟就業政策中國家行動方案的設計影響了政治決策過程的前階段，也就是問題認識、議程設定與政策形塑的階段。換句話說，成員國在定期向歐盟提出國家行動方案以及必須在國內實施歐盟就業策略的情形之下，會對於政策的問題認識與政策的結果發生影響。歐盟就業策略提出的就業指導原則爲成員國在就業領域的政策中提供了一套明確的原則，因此在政策過程的擬定階段，成員國勢必會因爲指導原則的影響而決定政策的方向。

<sup>272</sup> Jacobsson, K. (2005). Trying to reform the "best pupils in class"? The Open Method of Coordination in Sweden and Denmark. pp.117-118..

<sup>273</sup> Jacobsson, K. & Vifell, Å. (2007). New Governance Structures in Employment Policy Making – Taking Stock of the European Employment Strategy. In I. Linsenmann, C. O. Meyer & W. Wessels (Eds.) *Economic government of the EU: a balance sheet of new modes of policy coordination*.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pp.64-65.

<sup>274</sup> 詳細請見：Jacobsson, K. & Johansson, H. (2009). The micro-politics of the open method of coordination : NGOs and the social inclusion process in Sweden. In M. Heidenreich & J. Zeitlin (Eds.) *Changing European employment and welfare regimes : the influence of the open method of coordination on national reforms*, New York: Routledge, pp.173-191.

同樣地在國家立法方面，歐盟就業策略的軟性治理也會影響了國家在就業相關領域的立法結果。然而瑞典在研究的結果中顯示，歐盟就業策略對瑞典國內政治方面產生了影響(適應 accommodation)，但是程度很低；而在立法方面則是沒有變化(no change)。<sup>275</sup>

而根據2005年雅克布遜(Jacobsson)的研究，瑞典積極性勞動市場政策與歐盟就業策略所提出來的指導原則本身就十分符合，甚至是比歐盟的就業政策標準來得高。雖然在大原則上，瑞典與歐盟就業策略的方向一致，然而雅克布遜也提出在中低收入勞工稅收標準、性別與移民勞工的議題上，瑞典受到來自於歐盟的建議(recommendation)。

然而瑞典對此的態度十分地模糊，雖然接受了歐盟的建議，卻並未立即地在國內實施改革。但是在之後的2001年與2002年瑞典在國內進行了以中低收入階層為目標的稅制改革<sup>276</sup>，瑞典政府說明因為當時政府收入足以支撐稅制改革，並非完全因為歐盟的建議。然而正是因為歐盟為瑞典訂立了朝中低收入階層稅收降低的目標方向，因此在瑞典有能力時也朝著歐盟建議的方向訂立政策。<sup>277</sup>

這說明了歐盟就業策略以開放協調法的方式在社會夥伴對話、政策方向與政府部門間協調中，帶來了不同以往傳統硬性法治理的動力，以此動力影響成員國內的政策與執行。

此外在2001年訪談中也顯示在瑞典政府部門內部的訪談中，內部官員認為歐盟就業策略為瑞典積極性勞動市場政策納入更多政治議題、加強了社會夥伴參與，以及在成員國同儕壓力與歐盟執委會評估的設計下迫使瑞典相關官員思考並改善瑞典積極性勞動市場政策的發展。其中成員國提供國家行動方案以選出最佳示範與執委會的評估的因素是需要被特別強調的。<sup>278</sup>

---

<sup>275</sup> López-Santana, M. (2007). 'Soft Europeanisation? How the Soft Pressure from Above Affects the Bottom (Differently): The Belgian, Spanish and Swedish Experiences.' *Max Weber Programme, EUI Working Papers*. (MWP 2007/10), Florence: European University Institute.

<sup>276</sup> 以國家補貼的方式降低對於中低收入階層的稅收標準。

<sup>277</sup> Jacobsson, K. (2005), Trying to reform the "best pupils in class"? The Open Method of Coordination in Sweden and Denmark. pp. 120-121.

<sup>278</sup> Ibid, pp.131-132.

因此羅培茲--山塔納運用歐洲化研究中的適應度檢定(the degree of fit)概念來檢視瑞典積極性勞動市場政策被歐盟就業策略影響的程度。開放協調法影響成員國的方式是以歐盟就業指導原則為標準形塑成員國內政策的問題認識與政策方向，因此在檢視成員國受到歐盟就業策略影響的方式是以觀念上的適應(ideational fit)與制度上的適應(institutional fit)作為評價影響結果的方式。

以瑞典作為研究目標的結果，瑞典在觀念的適應上，宣稱因為瑞典在歐盟就業策略形成時已經上傳了瑞典在就業政策上的偏好。<sup>279</sup>因此在觀念上的適應上，瑞典雖然不適應(misfit)的程度很低，但這是因為瑞典積極性勞動市場政策與歐盟就業策略的中心概念相當符合的緣故。而在制度適應度上，也因為瑞典的積極性勞動市場政策與歐盟就業策略的需求相當貼近，因此制度不適應的程度很低。因此瑞典在制度與觀念不適應程度皆很低的狀態下，瑞典積極性勞動市場政策被歐盟就業策略影響的程度也很低。<sup>280</sup>

### 第三節 上傳：瑞典對歐盟就業策略的影響

瑞典在 1995 年加入了歐洲聯盟，在瑞典加入之後所要面對的第一個問題就是歐洲貨幣金融的統合。為了平復國內對於歐洲貨幣金融統合可能會有的疑慮，瑞典政府試圖證明歐盟不僅僅只是注重經濟方面的統合，而這樣的經濟統合並不會導致瑞典模式的滅亡，歐盟在經濟統合之外更注重社會層面的統合。因此瑞典極力地試圖在就業政策領域中取得主導的位置。<sup>281</sup>

其實在馬斯垂克條約前的政府間會議期間，針對歐洲經歷的嚴重經濟衰退與

<sup>279</sup> 請見第四章第三節。

<sup>280</sup> López-Santana, M. (2009). Soft Europeanization? The differential influence of European Employment Strategy in Belgium, Spain and Sweden. pp.145-147.

<sup>281</sup> Riel, B. v., & Meer, M. v. d. (2002). The advocacy coalition for European employment policy – The European integration process after EMU. In Forthcoming, H. Hegmann & B. Neumaerker (Eds.), *Die Europäische Union aus politökonomischer Perspektive* Metropolis Verlag. p.11.

高漲的失業問題，歐盟一直有相關的討論。<sup>282</sup>然而在多方的考量下，就業議題暫時不被納入馬斯垂克條約：第一個是在歐洲經濟暨貨幣聯盟的議題討論中，爲了僅僅快地針對貨幣金融問題達成共識，對於較高爭議性並且也非經濟議題的社會、就業政策採取迴避的態度。<sup>283</sup>第二個理由是薩拉斯(Robert Salais)提出的社會國家主義(Social Nationalism)，國家不願意讓歐盟的影響力深入到影響國家經濟、勞力市場等方面的就業政策。<sup>284</sup>

而針對在馬斯垂克條約之後的幾年，就業議題是否需要被納入歐盟條約又再次被持續討論著。而在此過程當中，瑞典上傳國家的勞動力市場政策偏好，希望能達到歐盟在就業政策方面的進展，一方面能夠安撫國內對於歐洲統合危害瑞典模式的疑慮；另一方面瑞典也能在歐盟社會相關政策領域中取得影響力。針對此一上傳的層面，本節討論瑞典在阿姆斯特丹條約簽訂前，歐盟就業政策發展與政府間會議的過程，瑞典發揮影響力的過程。而表 4-1 是針對歐盟就業政策被納入阿姆斯特丹條約過程中，重要會議整理列表。

表 4-1：阿姆斯特丹條約磋商期有關歐盟就業政策的討論

1992 年 12 月	愛丁堡高峰會	討論經濟復甦問題。
1993 年 6 月	哥本哈根高峰會	失業與經濟衰退爲討論主題。《成長、競爭、就業白皮書》被提出。
1993 年 12 月	布魯塞爾高峰會	基於就業白皮書的建立，而設立行動計畫打擊失業問題。
1994 年 6 月	科孚島高峰會	韋斯坦多普檢討小組 <sup>285</sup> 設立。就業政策開始被遊說加入政府間會議議程。
1994 年 12 月	埃森高峰會	提出了五項原則供會員國每年就勞動力市場政策進行檢驗。
1995 年 6 月	嘎那(Cannes)高峰	韋斯坦多普檢討小組開始活動

<sup>282</sup> Ashiagbor, D. (2005). *The European employment strategy : labour market regulation and new governance*. pp.101-104..

<sup>283</sup> Dyson, K. & Featherstone, K. (1999). *The Road To Maastricht: Negotiating Economic and Monetary Un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p.170.

<sup>284</sup> Salais, R. (2001). *Filling the Gap Between Macroeconomic Policy and Situated Employment: A Hidden Agenda for Europe* In L. Magnusson & B. Stråth (Eds.), *From the Werner Plan to the EMU : in search of a political economy for Europe*. Oxford: Peter Lang. pp.430-446.

<sup>285</sup> 由韋斯坦多普(Carlos Westendorp)主導成立。韋斯坦多普是西班牙歐盟事務部長

	會	
1996 年 3 月		荷比盧備忘錄：試圖將就業政策加入政府間會議議題。
1996 年 3 月	杜林(Turin)高峰會	政府間會議正式開始：就業政策被加入議題設定當中。
1996 年 12 月	都柏林高峰會	上呈修改草案
1997 年 6 月	阿姆斯特丹高峰會	將就業章節正式加入阿姆斯特丹條約

來源：Riel and Meer, (2002), The advocacy coalition for European employment policy – The European integration process after EMU. pp.3.

### 一、阿姆斯特丹條約政府間會議

阿姆斯特丹條約歷經四年多的磋商，可以被分為三階段：第一階段為會前會，自 1995 年 5 月至 1996 年 5 月，由各國委派之「檢討小組」(Reflection group) 非正式地磋商，並廣納學界與政界的建言，向歐盟高峰會提出總結報告；第二階段為政府間會議(Intergovernmental Conferenc)，各國政府首長在杜林(Turin)高峰會正式宣布召開後，於 1996 年 3 月至 1997 年 6 月密集展開磋商談判；談判成果之草約在經由阿姆斯特丹高峰會簽署認可後進入第三階段，各國按其憲法程序進行條約之批准，而於 1999 年 5 月正式生效實施。<sup>286</sup>

在阿姆斯特丹條約草案商議過程中，將就業議題正式加入條約草案的是在 1996 年 12 月的都柏林高峰會，由愛爾蘭擔任輪值國主席。這份歐盟高峰會文件中表示即將以打擊失業率為歐盟主要目標，並且在新的共同體條約中加入就業章節，正式地將就業議題納入歐盟發展目標當中。<sup>287</sup>而在 1997 年的阿姆斯特丹高峰會中，同意這份草案並且正式地將就業章節納入阿姆斯特丹本文章節之中。因此阿姆斯特丹條約是試圖將就業與經濟穩定視為必須同時達成的兩個目標，而歐盟就業政策和穩定與成長公約的結合也說明了歐盟藉著結合兩者解決經濟成長與就業，為歐洲地區人民營造適宜的生存環境。<sup>288</sup>瑞典在這樣的歐盟就業政策發

<sup>286</sup> 藍玉春，2001，〈解析歐盟阿姆斯特丹條約〉，《政治科學論叢》，頁 16。

<sup>287</sup> Presidency Conclusions, Dublin European Council, 29 March, 1996.

<sup>288</sup> Ashiagbor, D. (2005). *The European employment strategy : labour market regulation and new*

展過程當中，作為一個以社會民主價值為基礎的國家扮演促進與試圖領導的角色，可以用跨國性「倡導聯盟」來解釋瑞典在歐盟就業政策發展過程中運用由下而上的路徑影響歐盟政策，以達到瑞典平撫國家對於歐盟的懷疑聲浪。

## 二、倡導聯盟的誕生

根據喬韓森(K. M. Johansson)的分析，瑞典在參與阿姆斯特丹條約前政府間會議(IGC)的階段，由於瑞典在歐洲政治中國家影響力有限的情況下，選擇了以倡導聯盟(advocacy coalition)的方式進行遊說，試圖將就業議題加入阿姆斯特丹條約的章節中，促成歐盟就業策略的發展。

為了某種議題或目標而集結在一起的跨國聯盟(transnational coalition)所能發揮影響力的階段，是在於政策形成前的議題設定(agenda-setting)階段。在議題設定的階段比起後期的政策決定階段有更多的空間給予跨國聯盟針對某一特定議題更多的遊說與斡旋空間。因此本文運用喬韓森(K. M. Johansson)對於跨國倡導聯盟(transnational advocacy coalition)的分析角度來分析瑞典對於歐盟就業策略的上傳能力。<sup>289</sup>

而接下來必須討論到基於什麼原因與動力使不同國家與團體的行為者願意集合在一起共同倡導某個特定目標。喬韓森認為因為歐盟政策的決定有很大程度是被政治機會架構變化(the changing structures of political opportunity)所影響；也就是說，歐盟制度變化會影響了不同行為者的利益，基於共同的信念與利益，有可能會集結一群特定的行為者而形成倡導聯盟，並且在程度上能比國家影響力來得較大。而跨國聯盟更可以被視為是國家與超國家層面間，提供連結的傳輸系統，並且在國家在形塑政策與執行政策過程中發揮與歐盟層面連結的作用。<sup>290</sup>以下就阿姆斯特丹前政府間會議形成的跨國聯盟行為者與瑞典在其中扮演的角色

---

*governance*. pp.120.

<sup>289</sup> Johansson, K. M. (1999). Tracing the employment title in the Amsterdam treaty: uncovering transnational coalitions. *Journal of European Public Policy*, 6(1), pp. 85-101.

<sup>290</sup> *Ibid.*, pp.87-88.

做一分析。

歐洲社會黨(Party of European Socialists, PES)是一個 1992 年成立的泛歐洲政黨，成員來自於歐盟成員國和挪威的社會民主主義政黨和工黨。<sup>291</sup>歐洲社會黨作為歐洲議會內的一個政黨團，最高機關是它的大會。歐洲社會黨大會每 5 年內要召開至少兩次會議，職責包括了選舉主席、政策的制定與修改以及決定接納新的成員與否。另外在歐洲議會選舉之前召開的大會則將決定在議會選舉時所發布的一份統一的宣言。<sup>292</sup>

而針對就業議題，歐洲社會黨在 1994 年埃森(Essen)高峰會前夕已經發表了宣言，其中指出了歐盟欠缺有效的就業政策。<sup>293</sup>另外歐洲社會黨提出了一份名為《讓歐洲人工作》(Put Europe to Work)的文件，試圖在歐盟提倡就業政策的重要性。而這份名為《讓歐洲人工作》的文件是歐洲社會黨在促進就業議題加入阿姆斯特丹條約過程中，重要的文件之一。這份文件產生的背景是在 1993 年執委會主席戴洛斯提出《成長、競爭與就業白皮書》的背景之下，由歐洲社會黨內部成員成立的歐洲就業促進小組(European Employment Initiative, EEI)為了打擊失業率而產生的文件。

艾倫·拉爾森(Allan Larsson)<sup>294</sup>在西班牙首相費利佩·岡薩雷斯·馬克斯(Felipe González Márquez)與瑞典首相卡爾森(Ingvar Carlsson)的推薦之下，被任命為歐洲就業促進小組主席。就卡爾森的觀點來說，他認為歐洲社會黨應當把焦點放在歐洲就業議題上。在經過了 1980 年代法國與 1990 年代瑞典的嚴重經濟危機之後，國家實際上沒有能力單獨處理失業問題，因此必須要有一個共同的歐洲就

---

<sup>291</sup> 歐洲社會黨的四大任務：加強歐盟內部和整個歐洲的社會主義和社會民主運動；發展各國成員政黨、成員政黨議會黨團、歐洲社會黨黨團和歐洲社會黨本身的緊密合作關係；制定歐盟的共同政策；在歐洲議會選舉中採取統一步調。

<sup>292</sup> 至今為止歐洲社會黨共召開過 6 次大會：1992 年在海牙、1995 年在巴塞隆納、1997 年馬爾莫、1999 年米蘭、2001 年柏林和 2004 年布魯塞爾。

<sup>293</sup> PES (1994) Party Leaders' Declaration, Essen, 7–8 December 1994.

<sup>294</sup> 艾倫·拉爾森(Allan Larsson)，瑞典前財政部長、前國會議員，曾任瑞典國家勞動力市場委員會總幹事、歐盟委員會總幹事。現任瑞典隆德大學主席、歐盟委員會能源和氣候變化主席顧問。



業議題的解決辦法。<sup>295</sup> 但也因為瑞典當時尚未加入歐洲聯盟，因此與歐洲聯盟相關的政黨會是一個影響歐盟政策的有利途徑。<sup>296</sup>

因此在 1993 年歐洲就業促進小組被歐洲社會黨政黨領袖會議(the party leader's conference)採用的《讓歐洲人工作》這份文件，因此這份文件又被稱為「拉爾森報告」(Larsson Report)，其中針對歐洲的經濟情勢與就業議題提出分析與看法。除此之外，這份文件產出的過程中，拉爾森與各國社會民主黨與工黨人士的接觸，也是這份文件的重要貢獻之處。

拉爾森報告實現了跨國偏左派政府間高層政治菁英的諮詢與協商<sup>297</sup>，而拉爾森所接觸的這些政治菁英，隨後有許多人也成為了參與阿姆斯特丹條約政府間會議的執委會、歐盟理事會成員之一。也就是說，拉爾森成功地利用個人的身分拉近了許多具有同樣理念的政治菁英，而這些人也能夠在阿姆斯特丹條約上發揮影響力。<sup>298</sup>

這份拉爾森報告隨後被政黨領袖會議與 1994 年科孚島會議前歐洲社會黨的會議所採用，此會議中同時也肯定了戴洛斯的《成長、競爭與就業白皮書》，說明了歐洲就業促進小組的理念與執委會的理念有許多符合之處。<sup>299</sup>在瑞典 1995 年加入歐洲聯盟之後，拉爾森被任命為歐盟執委會就業署(DG V)署長。拉爾森本人也與瑞典卡爾森總理合作推動歐盟的就業政策發展，在執委會內部試圖發揮影響力。拉爾森曾經針對就業議題發表過《針對 1996 年政府間會議的一種觀點》(A Vision for IGC 1996: A European Employment Union – to make EMU possible)，

---

<sup>295</sup> Gustavsson, J. (1998). *The Politics of Foreign Policy Change. Explaining the Swedish Reorientation on EC Membership* Lund University Press. pp.141-169.

<sup>296</sup> Johansson (1999). Tracing the employment title in the Amsterdam treaty: uncovering transnational coalitions. pp.90.

<sup>297</sup> Ladrech, Robert (1997) Partisanship and party formation in European Union politics, *Comparative Politics* 29, pp.180.

<sup>298</sup> Johansson (1999). Tracing the employment title in the Amsterdam treaty: uncovering transnational coalitions. pp.90.

<sup>299</sup> Hix, Simon (1995) Parties at the European level and the legitimacy of EU socio-economic policy, *Journal of Common Market Studies* 33, pp.547.

積極地在歐盟層面推動就業議題的被重視，與共同辦法的產生。<sup>300</sup>

此外《讓歐洲人工作》這份文件的初稿實際上來自於北歐國家瑞典與丹麥共同成立的 SAMAK 跨國聯盟。拉爾森也作為這個聯盟的主席，翻譯了名為《Satt Europa I arbete》以瑞典文為主的文件作為《讓歐洲人工作》的基礎。因此瑞典實際上以符合瑞典觀點的文件「推銷」至歐洲社會黨，換句話說，如同喬韓森的分析，歐洲社會黨成為了瑞典行動的場合，但也同時作為一個行為者在歐洲聯盟這個活動場所行動並推銷屬於自己的理念。<sup>301</sup>而拉爾森除了與各國政治菁英建立私人連結之外，也與歐洲工會聯盟秘書長加貝加利(Emilio Gabaglio)在任歐洲就業促進小組主席期間建立私人關係，也與瑞典代表路德(Gunnar Lund)維持密切的個人聯繫關係。

1995 年馬德里舉行了勞工暨社會事務會議(Labour and Social Affairs Council)中，首次加入了就業議題。在馬德里會議中，歐盟承認了一個屬於歐盟的就業政策是有利於歐盟發展的。在歐盟持續地進行貨幣金融與經濟統合的發展過程中，各國勞動市場政策必須和促進成長及穩定的總體經濟政策相結合。因此在馬德里歐盟高峰會議確立了「就業機會的創造在歐盟及各會員國家是首要的社會、經濟及政策目標」。<sup>302</sup>

因此在上述背景驅使之下，1995年馬德里會議之後，歐洲社會黨發表了政黨領袖宣言，其中指出了為了因應不同於以往的經濟情勢，以及即將更進一步的歐盟經濟金融統合，歐盟應當針對各國的失業情況提出辦法，促成各國勞力市場的互相協調。而1996-97年的政府間會議即是推動歐盟構建就業政策能力的絕佳時機。<sup>303</sup>

---

<sup>300</sup> Larsson, Allan, (1998). The European Employment Strategy and the EMU: You Must Invest to Save, *Economic and Industrial Democracy*, Vol.19, No. 3, pp.391-415. ; WHITE PAPER ON THE 1996 INTERGOVERNMENTAL CONFERENCE, Note of July 1995 on the fundamental interests of Sweden with a view to the 1996 IGC

<sup>301</sup> Johansson, K. M. (1999). Tracing the employment title in the Amsterdam treaty: uncovering transnational coalitions. pp.89.

<sup>302</sup> Madrid European Council Madrid, 15-16 December 1995: Conclusions of the Presidency.

<sup>303</sup> Lightfoot, S. (2005). *Europeanizing social democracy? : the rise of the Party of European Socialists*. New York: Routledge. pp.54-55.

而瑞典政府本身在 1994 年也曾經聲明以推動歐盟就業政策發展為主要目標。<sup>304</sup> 瑞典試圖以瑞典模式為內涵的社會政策型態影響歐盟社會及就業政策。<sup>305</sup> 因此瑞典在阿姆斯特丹政府間會議(IGC)過程中的目標即是將就業政策議題加入阿姆斯特丹條約中，推動「歐洲的就業聯盟」(Employment Union for Europe)<sup>306</sup>，其目標包括了推動積極性勞動市場政策、職業性別平等、促進低開發地區與加強社會對話。<sup>307</sup>

此外瑞典雖然強調在歐盟層面發展共同就業政策的重要性，卻也強調成員國政府在就業政策議題中的直接協調角色。<sup>308</sup> 在 1995 年路德<sup>309</sup>將就業政策提案交給歐洲檢討小組，提案中說明了就業政策實際上是歐洲各國都很關心，而且是必須共同處理的問題，因此希望能夠將就業政策議題在阿姆斯特丹條約中獨立成一個章節，成為歐盟未來發展的目標之一。<sup>310</sup> 瑞典的提案中建議由歐盟提出綱領性的原則與程序，由各國裁量的協調性辦法，藉此以避免來自其他成員國對此一方案的反對。<sup>311</sup>

這份提案後來受到檢討小組的支持，檢討小組認為就業政策問題雖然是各國國內議題，然而歐盟有責任為成員國的就業政策創造出適當的方向。<sup>312</sup> 因此將就業政策議題納入即將到來的 1996 年政府間會議的議程中。

---

<sup>304</sup> Miles, L. (1997). *Sweden and European integration*. Aldershot: Ashgat. pp.265

<sup>305</sup> Bieler, A. (2000). *Globalisation and enlargement of the European union: Austrian and Swedish social forces in the struggle over membership*: Routledge. pp.70-71.

<sup>306</sup> Sweden, (1996). Note for July 1995 on the Fundamental Interests of Sweden with a View to the 1996 Intergovernmental Conference: Summary of Positions of the Member States of the European Union with a View to the 1996 Intergovernmental Conference. Brussels, European Parliament:II, pp.150-152.

<sup>307</sup> Sweden, (1996). Strengthening the Fight Against Unemployment: An Issue for the Intergovernmental Conference. Stockholm, Swedish Ministry of Finance. pp.3

<sup>308</sup> Lindal, R. (1996). The Swedish Debate, in F. Algieri, H. Grabbe, K. Hughes *et al.* (eds) *The 1996 IGC – National Debates (2) : Germany, Spain, Sweden and the UK*. London,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37-50.

<sup>309</sup> 當時作為檢討小組中的瑞典代表。

<sup>310</sup> Miles, L. (1997). *Sweden and European integration*. pp.280-281.

<sup>311</sup> Johnson, A. M. (2005). *European welfare states and supranational governance of social policy*.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in association with St. Antony's College Oxford. pp.111-112

<sup>312</sup> Council (1996). 1996 Intergovernmental Conference (IGC '96): Reflection Group Report and Other reference for Documentary Purpose. Luxembourg, General Secretariat of the Council of the European Union. pp.23. 包括了歐洲社會黨代表、前法國密特朗政府成員吉歌(Elisabeth Guigou)、與德國總理柯爾關係密切的歐洲議會議員布洛克(Elmar Brok)等的支持。

根據強生(Ailish Johnson)的研究，1996 年的政府間會議議程當中小國如瑞典、丹麥、比利時等國家支持就業應當納入阿姆斯特丹條約中<sup>313</sup>，並成為獨立的章節；而大國如英國、德國與法國的態度顯得相當地不情願。<sup>314</sup>杜林高峰會確認了檢討小組的提案將就業政策納入 1996 年政府間會議的正式議程當中。

丹麥在 1996 年 7 月 6 日在科克(Cork, Ireland)召開的政府間會議會前會(information meeting)中提出就業政策條約章節草案。除了條款草案之外，在介紹章節草案的過程中，強調了歐盟就業政策會與歐洲經濟暨貨幣聯盟(EMU)、廣泛經濟政策指導原則(BEPG)相互支持之外，對於歐盟的財政並不會形成新的負擔，以及就業政策議題依舊屬於成員國國家管轄的範圍，歐盟並沒有能力干涉國家在國內就業政策的主導能力。<sup>315</sup>

在經過了瑞典與丹麥對於就業政策議題的推動與支持，1996 年 9 月愛爾蘭輪值主席國綜合了各方的方案而形成正式的條約草案，其中包含了大部分瑞典與丹麥提出的草案內容，但也適當地修改以防止其他國家如英國的強烈反對。條約草案中呼籲各國支持就業政策作為歐洲聯盟對抗失業問題的一個重要方法。而都柏林高峰會中執委會整理了自 1994 年到 1996 年關於歐盟就業政策的成員國報告等資料，集合而成為「歐盟就業策略」(European Employment Strategy, EES)<sup>316</sup>，為就業政策納入正式條約做好了事前準備。<sup>317</sup>

### 三、英國、德國與法國的回應

而在瑞典與歐洲社會黨，以及其他國家共同推動歐盟就業政策的同時，勢必

---

<sup>313</sup> 瑞典、西班牙、葡萄牙、荷蘭、盧森堡、義大利、希臘、丹麥與比利時等國。

<sup>314</sup> Johnson, A. M. (2005). pp.113-114.

<sup>315</sup> 草案中有四項條款：復興歐洲就業政策；就業政策監督、評估機制與政策綱領的協調；激勵措施；成立諮詢性的委員會。IGC 1996a.

<sup>316</sup> Commission, (1997). *The Way Forward: The European Employment Strategy, Contributions to and Outcome of the Dublin European Council, 13 and 14 December 1996*. Brussels, DG Employment and Social Affairs.

<sup>317</sup> Johnson, A. M. (2005). *European welfare states and supranational governance of social policy*. pp.117.

會遭受到某些國家的反對。其中最反對歐盟介入被認為國家事務範圍的就業政策領域的是英國、法國與德國。<sup>318</sup>

在 1997 年英國國會大選之前，英國在保守黨執政的情況之下，十分反對歐盟在社會政策層面進一步地統合。在 1997 年五月底英國曾經建議加入：

成員國與共同體應當共同發展協調性的策略以發展就業，而且必須注重技術培養與適合的勞動力，以及能夠因應經濟變遷的彈性勞動力市場。<sup>319</sup>

而且英國反對瑞典提案中詳列的就業指導原則，強調僅以「技術性、受過訓練與適任的勞動力」來取代。在因此 1997 年大選結束為止，英國是瑞典與其他社會民主國家推動歐盟就業政策過程中最大的障礙，而法國與德國通常是站在英國的身後支持英國的決定。

然而 1997 年布萊爾(Tony Blair)政府上台之後，其工黨的背景使得英國比以前願意支持歐盟就業政策的發展；此外也使得過去在官方發言中持反對意見，實際上持曖昧態度的德國與法國無法再躲在英國的背後。

法國在政府間會議召開之前，由於對於歐洲經濟暨貨幣聯盟的高度關注，以及 1997 年法國大選的影響，對於就業議題的關注不如歐洲經濟暨貨幣聯盟。然而法國總理朱貝(Alain Marie Juppé)則是在國內社會黨的壓力之下，再加上 1997 年大選輸給了社會黨的若斯潘(Lionel Jospin)，法國的態度因此轉向於支持歐盟就業政策的發展。<sup>320</sup>

德國的態度從歐盟就業政策醞釀是否加入新的歐洲條約時，在 1996 年針對政府間會議的文件中，一再地強調輔助性原則的重要性，清楚地分辨了歐盟層面與國家層面權力的界線。除了防止歐盟對於國家政策領域的干涉，另一個重要的

---

<sup>318</sup> Ashiagbor, D. (2005). *The European employment strategy: labour market regulation and new governance*. pp.112.

<sup>319</sup> Johnson, A. M. (2005). *European welfare states and supranational governance of social policy*. pp.118.

<sup>320</sup> Riel and Meer, (2002). *The advocacy coalition for European employment policy – The European integration process after EMU*. pp.6.

原因是一旦歐盟就業政策的出現，勢必會造成國家政府部門支出的增加。德國在先前不同歐盟政策發展的過程中，了解到會有許多額外的支出會出現，對於剛統一的德國來說，任何新增的支出對於其政府都會是極大的負擔。<sup>321</sup> 因此上述兩項原因說是德國反對將就業議題加入到新的歐盟條約之主要原因。

當時的德國總理柯爾(Helmut Kohl)曾經聲明，他在都柏林高峰會中是抱持著實際(pragmatic)的態度，然而實際上是因為當時德國議會掌握在社會民主黨的手裡，再加上在都柏林高峰會前的各個歐盟高峰會發展趨勢是逐漸傾向支持歐盟就業政策的發展，因此柯爾在歐盟就業政策的發展態度上較傾向談判籌碼的取得(bargaining chip)，而非抱持著完全的反對立場。<sup>322</sup> 而且歐盟就業政策實際上將焦點放在教育、工作訓練與相關促進勞動力市場彈性的措施，再加上隨後歐盟社會基金的運作，對於德國的國家財政並沒有太大的負擔。在各方考量上皆對德國現行勞動力市場政策與財政沒有太大負擔的情況之下，德國決定支持歐盟社會政策的發展。

最終在包括瑞典在內的國家努力地推動之下，就業政策獨立於社會政策章節，在歐洲經濟暨貨幣聯盟章節之後在歐盟大國皆同意歐盟就業議題被納入阿姆斯特丹條約的情況之下，歐盟就業政策才能夠往前成功地邁開一大步。

#### 第四節 小結

本章整理了歐盟就業策略與開放協調法，以及瑞典積極性勞動市場政策的發展之後，就歐盟政策下載至瑞典層面，與瑞典上傳偏好到歐盟層面的雙向互動過程作出了探討。

瑞典作為一個社會福利體制發達的國家，如同第三章所述，積極性勞動市場

---

<sup>321</sup> Johnson, A. M. (2005). *European welfare states and supranational governance of social policy*. pp.113

<sup>322</sup> Johansson, K. M. (1999) Tracing the employment title in the Amsterdam treaty: uncovering transnational coalitions. pp.96.

政策、團結工資政策與林恩模式成爲奠定了瑞典模式的三大基礎。因此，瑞典的積極性勞動市場政策的發展必然是領先於其他歐洲國家之前。也成爲了瑞典針對歐盟就業策略，在其發展中發揮自身國家影響力的有利領域。

瑞典先在歐盟中聯合其他社會民主主義政黨，共同推動就業議題的重要性，使得就業政策在阿姆斯特丹條約中能夠單獨存在一個章節。也標誌著歐盟開始重視歐洲內部的就業問題。

因此歐盟就業策略對於瑞典自身就業政策的影響相當地小，不是因爲瑞典不願意配合歐盟政策；而是因爲在歐盟就業策略發展過程中，瑞典已經上傳了大量的國家政策偏好與政策軌跡到歐盟層面，使得歐盟就業策略已經與瑞典積極性勞動市場政策有相當大的符合之處，才會出現歐盟政策對於瑞典就業政策影響程度小的結果。

然而如同第二節所述，瑞典國家內部政府部門間、政府與社會夥伴之間的關係卻隨著歐盟就業策略的進行和每年度國家行動計畫的影響而發生了改變。這種改變不全是無或有的問題，而是逐步地發生在政府部門間與社會之間的關係。

瑞典積極性勞動市場政策一方面上傳了國家先進的福利國家理念，在歐盟就業議題中發揮了國家影響力；另一方面，也因爲歐盟就業策略的影響，使得國家內部政府部門，與社會團體之間的關係發生了或多或少「質」的變化。

## 第五章 瑞典外交政策之歐洲化

前部分章節在介紹過了歐洲化研究與研究對象－瑞典的中立政策傳統和歷史之後，本章以 1995 年瑞典加入歐洲聯盟，至 2005 年為止為研究目標，討論歐盟安全暨防衛政如何影響了瑞典外交安全政策；以及在歐洲安全暨防衛政策發展過程中，瑞典為了維繫外交中立政策的傳統，試圖以衝突預防概念和人道主義的觀點影響歐盟安全政策的方向與內涵。

當討論到瑞典外交安全政策的歐洲化，王(Reuben Wong)在 2005 年提出了外交安全政策的三種歐洲化模型。第一種是由上往下的政策聚合，代表了歐盟外交安全政策影響成員國往與歐盟同一方向趨近的現象(policy convergence)。第二種是國家由下而上地傳達國家偏好與政策模型至歐盟層面，進而影響到其他國家(national projection)。最後一種是認同的建構與社會化(socialization)，說明了以歐盟或是歐洲利益與認同為中心，國家利益與認同逐漸地與歐洲的利益認同靠攏的過程。<sup>323</sup>

斯特朗(Bennet Strang)在 2007 年也提出了歐洲化研究中，被影響的外交安全政包含了四種模型：國家適應歐盟政策(national adaptation)、國家推動自身偏好(national projection)、菁英社會化(elite socialization)與官僚組織重組(bureaucratic reorganization)。<sup>324</sup>其中菁英社會化指的是當國家政府菁英參與了歐盟層面的決策過程之後，會對政府菁英自身的信念與價值觀產生影響，使其更易於站在歐盟信念與利益的角度思考。<sup>325</sup>

而本章融合了兩位學者的觀點，採用三種外交安全政策的歐洲化類型觀點，包括由上而下的政策聚合、由下而上的國家推動，與菁英參與歐盟活動，造成社

<sup>323</sup> Wong, R. (2005). The Europeanization of foreign policy, In C. Hill & M. Smith (Ed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the European Un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p.134-53.

<sup>324</sup> Strang, B. (2007). *Winds of Change: The Europeanization of National Foreign Policy*. *Maastricht European Studies Papers*, 1, pp.16-19.

<sup>325</sup> *Ibid.* pp14-16..



會化的過程。以上述觀點來研究瑞典國家外交安全政策與歐盟安全暨防衛政策雙向影響及互動的過程。

本章總共分爲四節：第一節就歐盟安全暨防衛政策的發展做一介紹，以及瑞典中立政策在後冷戰時代至加入歐洲聯盟爲止的轉變。第二節針對瑞典在歐盟安全暨防衛政策影響之下，外交安全目標與國防部門組織的變化。第三節以小國影響力(*small state influence*)的觀點說明瑞典試圖影響歐盟安全暨防衛政策的目標與執行層面，以及瑞典政府菁英的安全認同在參與歐洲安全暨防衛政策的過程中逐漸被影響與社會化的過程。第四節則是就上述三節的研究結果做一小結。

## 第一節 歐盟安全暨防衛策略與瑞典中立政策

### 一、歐盟安全暨防衛策略

1989 年到 1991 年在蘇聯與東歐發生一連串的變化，使得瑞典必須重新思考中立政策的可行性。德國的統一和冷戰的結束，使得瑞典必須審視瑞典在歐洲地區，與全球外交安全格局中的地位。

隨著蘇聯與東歐集團的瓦解，冷戰時期瑞典需小心翼翼地維持國家獨立與安全的必要性已經大幅地降低。在這種情況下固守冷戰時期，瑞典堅持的武裝中立主義已經變得缺乏現實上的可行性。其次，後冷戰時期，法德和解與歐洲聯盟的發展證明了在歐洲地區發生毀滅性的世界大戰的機會越來越小。國際政治結構由以往的兩極結構，轉變成以美國爲首，其他軍事、經濟大國跟隨在後的後冷戰國際安全格局。使瑞典強烈意識到其自身力量的單薄，瑞典以往以國際主義與人道爲號召的獨特角色受到了限制。

再加上歐洲聯盟在歐洲地區安全事務角色日益強化的發展下，瑞典在加入歐盟之後，在國防安全與外交領域上受到歐洲化的影響。本章的目的在於研究瑞典在國防與外交政策與歐盟安全暨防衛政策雙向的歐洲化過程。

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Common Foreign and Security Policy,CFSP)起源於1970年代的「歐洲政治合作」(European Political Cooperation, EPC)。1970年在盧森堡會議(Luxembourg Summit)上，通過了比利時外長達維農(Viscount Davignon)所提出的與有關外交政策事務合作的「達維農報告」(Davignon Report)。報告內容提出建議認為歐體會員國應該在國際政治與外交事務上採取一致立場與作為，並共同決定以政府間主義原則(Intergovernmentalism)處理關於歐體政治合作組織與運作原則。

接著依照使史密斯(Smith)的分類，可以將1993年前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的發展階段再細分為1973年的「哥本哈根報告」(Copenhagen Report)<sup>326</sup>、「倫敦報告」(London Report)<sup>327</sup>、1986年的《單一歐洲法》(Single European Act, SEA)與1993年生效的《馬斯垂克條約》(Treaty of Maastricht)等四個階段。<sup>328</sup>

到了《馬斯垂克條約》奠定了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作為歐洲聯盟三個支柱中的第二個支柱(Pillar)，並以歐盟國家為主體對外支持共同的安全目標與外交政策，並確保聯盟對外行動的一致與有效。<sup>329</sup>1997年《阿姆斯特丹條約》(Treaty of Amsterdam)與2001年《尼斯條約》(Treaty of Nice)皆進一步明文由歐洲聯盟界定安全政策與施行，還有進行體制改革，有助於成員國貫徹歐盟共同的政策與行動。

歐洲安全暨防衛政策(European Security and Defense Policy, ESDP)自1999年發展以來，成為歐洲聯盟在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中關於防衛層面上的重要政策。然而在歐洲安全暨防衛政策出現之前，歐洲聯盟防衛機制的功能是由西歐聯盟

<sup>326</sup> 該報告提出歐體政治合作的組織與運作原則的具體改善之道，並對政治合作之目標與會員義務加以確認，並且強化了跨政府間的資訊共享機制。

<sup>327</sup> 再加上「歐洲聯盟鄭重宣言」(Solemn Declaration on European Union)(1983)、「道奇委員會報告」(Dooge Committee Report)等重要宣示性的文件。到此一階段確立了歐洲政治、安全合作的基本規範。

<sup>328</sup> Smith, Michael E., (2004). *Europe's Foreign and Security Policy: 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Cooperation*, U. 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172-205.

<sup>329</sup> 歐盟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目標包括了：保衛聯盟共同價值、基本利益與獨立；以各種方式增強聯盟及其成員國之安全；根據《聯合國憲章》原則與《赫爾辛基最後議定書》與《巴黎憲章》的目標，維護和平與加強國際安全；促進國際合作；發展與鞏固民主法治，尊重人權及基本自由。鄭啓榮，2008，《全球視野下的歐盟共同外交和安全政策》，北京：世界知識，頁55。

(Western European Union)所承擔。<sup>330</sup>

而在 1993 年生效的馬斯垂克條約中，爲了避免軍事同盟本身複雜性，影響了未來持中立政策的國家(如奧地利與瑞典)加入歐洲聯盟有可能引發的問題，因此馬斯垂克條約刻意將安全事務之軍事部分由條約中劃分出去，而由西歐聯盟來承接歐洲軍事安全的任務，實爲一種技術性的安排。<sup>331</sup>

#### (一) 1997 年阿姆斯特丹條約與 1999 年科隆高峰會

而在阿姆斯特丹條約中，納入在 1992 年彼得斯堡宣言中出現的「彼得斯堡任務」(Petersberg Tasks)，作爲阿約的第 17 條第 2 款中的目標任務，其內容包括了人道救援行動、維持和平任務與危機處理的戰鬥任務，以此界定了歐盟決定與執行任務的行動範圍。

雖然馬斯垂克條約與阿姆斯特丹條約與西歐聯盟(Western Europe Union, WEU)的合作，爲歐洲聯盟提供了歐洲安全與防衛的一項重要來源。但是歐洲聯盟對於南斯拉夫地區衝突的無能爲力，歐洲聯盟成員國開始認爲必須要有屬於歐盟自身的軍事能力存在，歐盟才有能力處理發生在歐洲聯盟區域內的民族衝突與日益多樣化的武力衝突。<sup>332</sup>

因此由 1998 年在波特夏賀(Pörschach)的歐盟非正式高峰會議中提出歐洲應當有自己的行動能力開始，到英法聖馬洛(St.Malo)雙邊高峰會議，英法雙方卻達成了戰略性共識，也就是英法兩國都接受實際上強大的歐洲，也接受了歐盟必須具備在全球事務上發揮干預的能力。<sup>333</sup>

而 1999 年的科隆(Cologne)高峰會議更明確決定讓歐盟無限制地扮演在安全

<sup>330</sup> 關於西歐聯盟在冷戰與後冷戰時期的發展與角色轉變，請見：吳萬寶，2001，《西歐聯盟：一個軍事組織的變遷》，台北：五南。

<sup>331</sup> 陳勁，2004，《歐盟外交政策與對外關係》，台北：五南，頁 190。

<sup>332</sup> 代表南斯拉夫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解體而引起的民族衝突，包括了斯洛維尼亞戰爭(1991 年)、克羅埃西亞戰爭(1991 年-1995 年)、波士尼亞戰爭(1992 年-1995 年)、科索沃戰爭(1999 年)與馬其頓紛爭(2001 年)。

<sup>333</sup> 關於英法雙方具體建議內容請見：吳萬寶，2003，《邁向歐盟建軍之路 歐盟共同歐洲安全暨防衛政策》，台北：韋伯國際，頁 62。

與防衛政策上的角色，且奠定未來強化歐洲軍事能力的方針。<sup>334</sup>到了 1999 年歐盟赫爾辛基(Helsinki)高峰會上，歐盟決議在 2003 年成立快速反應部隊(Rapid Reaction Force)，以執行彼得斯堡任務中所闡述的歐盟安全任務目標，並且同時發展非軍事的危機處理機制，<sup>335</sup>顯示了在 1999 年對於歐洲安全及防衛政策的發展是影響相當重大的一年。

除了歐洲聯盟在安全及防衛政策上軍事能力的建構，在 2000 年的尼斯(Nice)高峰會議上，歐盟也強調歐洲安全及防衛政策下的非軍事面向(civil dimension)的能力建構。非軍事面向包括了警察、強化法治，強化文人行政與人道保護等四大優先發展領域。<sup>336</sup>

## (二) 赫爾辛基首要目標

在 1999 年的赫爾辛基高峰會上，歐盟認為在歐盟安全暨防衛政策的目標之下，必須有相應的武力來滿足歐盟的需求，因此提出了建立武裝部隊的計畫。因此在赫爾辛基高峰會中，歐盟提出了「赫爾辛基首要目標」(Helsinki Headline Goals)<sup>337</sup>，計畫在 2003 年之前，歐盟安全暨防衛政策成員國在自願(voluntarily)的基礎之上，建立一支擁有 5~6 萬人，並且可以在 60 天內集結完成，任務持續一年以上的快速反應部隊，以此部隊來滿足彼得斯堡任務的需要。

在初期的赫爾辛基高峰會與尼斯高峰會的發展階段，是建立赫爾辛基首要目標的制度性框架。並且成立了政治暨安全委員會(Political and Security Committee)、軍事委員會(EU Military Committee, EUMC)與軍事參謀部(EU Military Staff, EUMS)。

由於赫爾辛基首要目標內的內容要求成員國基於「自願」而承諾對歐盟安全暨防衛政策提供武力支援。也就是說必須要召開會議，以確認成員國參與意願與

<sup>334</sup> 吳萬寶，2003，《邁向歐盟建軍之路 歐盟共同歐洲安全暨防衛政策》，頁 66。

<sup>335</sup> 同上，頁 69。

<sup>336</sup> 吳萬寶，2009，《歐洲安全暨防衛政策與境外任務》，台北：天空數位圖書，頁 21。

<sup>337</sup> Helsinki European Council, 10 and 11 December 1999: Presidency Conclusions

軍力承諾。因此在 2000 年 11 月在布魯塞爾(Brussels)召開了「軍力承諾會議」(Capability Commitment Conference)<sup>338</sup>，會議中歐盟成員國達成決議願意提供歐洲快速反應部隊約 10 萬人、400 架各式軍機與 100 艘軍艦，作為歐盟將來執行任務之需。

然而在 2001 年歐盟召開「能力改善會議」(Capability Improvement Conference)，當中針對 2000 年的軍力承諾會議的執行成果提出檢討與建議，最終提出了「歐洲行動能力計畫」(European Capability Action Plan, ECAP)以縮小歐盟能力與預定目標之間的差異。會議決議中指出成員國同意「自願地動員力量和盡力與他國合作，積極促進歐盟現有快速反應部隊能力。」<sup>339</sup>

而 2003 年，即 1999 年和赫爾辛基首要目標訂定的目標期限。歐盟再度召開軍事能力會議，針對 1999 年到 2003 年歐盟軍事能力發展情況作檢討。歐盟各國在會議中坦言，2003 年赫爾辛基武力目錄(Helsinki Force Catalogue, HFC)內各國提供的武裝部隊與武器，可以讓歐盟有能力執行完整的彼得斯堡任務目標；然而尚有缺失需要改善，否則會影響歐盟執行任務的期限，以及限制歐盟同時執行一個以上任務的能力。<sup>340</sup>

因此為了持續發展歐洲快速反應部隊的能力，於 2003 年通過了「2010 首要目標」<sup>341</sup>。「2010 首要目標」計畫在 2010 年為限，建立一支具備快速反應能力的戰鬥群(battle groups)，而快速能力包涵了快速決策、計畫與部署等三方面的能力。一個戰鬥群擁有約 1500 名人員包括後勤與戰鬥人員。每一個戰鬥群需要在 15 天內組成，並且要能持續行動 30 天以上並以 120 天為一循環。2010 首要目標超越了彼得斯堡任務的指導性質，並且擴張了歐盟安全暨防衛政策的行動範圍與執行能力。

由歐盟共同外交與安全政策高級代表索拉納(Javier Solana)起草的一份「在

<sup>338</sup> 現今為一年召開一次軍力會議，每年檢討各國承諾與需改善的情形。

<sup>339</sup> Presidency Conclusions, Laeken European Council, 14-15 December 2001

<sup>340</sup> 吳萬寶，2009，《歐洲安全暨防衛政策與境外任務》，頁 108。

<sup>341</sup> Presidency Conclusions, Brussels European Council, 17-18 June 2004

一個更美好世界中安全的歐洲」(A Secure Europe in a Better World)的「歐洲安全戰略」(European Security Strategy, ESS)<sup>342</sup>，在2003年12月12-13日由各會員國在歐盟布魯塞爾(Brussel)高峰會上通過，其中詳細列出了歐盟在21世紀初面對的全球安全威脅。面對這樣多變化的安全環境，歐盟擬定的戰略目標、相關的政策與結構變遷等部分，可以說是歐洲統合五十年來第一份有關歐洲安全的詳細戰略規劃。<sup>343</sup>

此外其中更點出歐盟在作為一個經濟強權的同時，也要能夠負擔起全球安全的角色。尤其在後冷戰時期，安全威脅以民族、宗教等地區性與跨國性衝突為主，再加上恐怖主義的全球蔓延，與冷戰時期國家間軍事競賽型態有很大的差異。因此歐盟作為歐洲地區的要角，必須要有能夠解決衝突及維持歐洲地區和平的軍事能力。

因此歐盟安全暨防衛策略必須在三個層面予以加強：第一，面對新的安全威脅型態，歐盟要有能夠早期監管，迅速並且強而有力反應的能力。而且歐盟應具備同時執行數個任務的能力；第二，必須建立一個更有能力的歐洲，以面對新的挑戰。歐盟必須對歐盟安全暨防衛政策中的資源配置做出更有效率的分配，並且將各會員國的軍力予以整合，尤其是情報、資訊與科技的分享；第三，歐盟內部團結有助於歐洲安全暨防衛政策發揮影響力。歐盟在過去數年所發展出有關防衛政策的合作機制，即著眼於將各會員國個別力量統合，以發揮整體的力量。<sup>344</sup>

介紹過歐盟安全暨防衛政策中軍事能力的建構與發展後，總括來說歐洲快速反應部隊的決策與執行架構可以分為負責決策的歐盟高峰會與輔助的政治暨安全委員會，屬於戰略層面；負責擬定計畫則是以軍事委員會與軍事參謀總部為首的機構；負責執行的機構為歐盟軍事委員會與歐盟防衛局<sup>345</sup>，最後則是成員國，

<sup>342</sup> European Union, "European Security Strategy: A Secure Europe in a Better World," Brussels, December 12, 2003.

<sup>343</sup> 甘逸驊，2006，〈歐洲安全與防衛政策的軍事層面：歐盟的全球戰略地位〉，《問題與研究》，第45卷第5期，頁120。

<sup>344</sup> 同上，頁121。

<sup>345</sup> 2004年成立之政府間機構，針對各國軍事能力發展與研究，統一籌購與歐盟快速反應部隊武裝的問題，增進歐洲的軍事與協同作戰能力。吳萬寶，2009，《歐洲安全暨防衛政策與

負責提供歐盟條約所規範的軍事與非軍事能力與設施。<sup>346</sup>

以上為歐盟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CFSP)與歐盟安全暨防衛策略(ESDP)到 21 世紀初為止的簡短介紹。歐盟安全暨防衛策略中所包含的目標任務以彼得斯堡任務中所界定的範圍為主，包含了衝突預防與維持和平等任務。

## 二、1990 年代瑞典中立政策的發展

在冷戰結束之後，瑞典所面臨的安全環境也發生了極大的改變。首先是兩極格局消逝，國家安全威脅的來源不再是一個強大且外來的國家，例如冷戰時期的蘇聯；而是轉換為發生在數個國家間或是一國內部種族與宗教衝突。第二個是恐怖主義、民族衝突與人權問題成為安全問題的主要因素。

恐怖主義活動的增長，使得國家面對國家安全問題與部署問題時，必須做一個與傳統國防政策截然不同的思考。一國境內或是特定地區的民族衝突與人權問題，則有時是必須透過跨國合作的方式才能有效地處理。面對這種與冷戰時期的國際安全環境相比有極大差異的國際情勢，瑞典的中立政策也隨著國際環境的變化產生了影響與變遷。

而在 1980-1990 年代初期瑞典遭逢了嚴重的經濟危機，瑞典選擇了接受歐洲自由貿易聯盟(The European Free Trade Association, EFTA)的會員身分為瑞典確保了市場與經濟發展的暫時穩定，這項決定也標誌了瑞典對歐體的態度發生轉變的開始。

在 1987 年社會民主黨曾經發表過政府文書表示瑞典在地理上與歷史文化上作為歐洲的一部分，因此歐洲的發展會影響到瑞典現在與將來的政策。因此在經濟因素的影響之下，瑞典為了挽救搖搖欲墜的國家經濟，對歐洲統合的態度開始

---

境外任務》，頁 121-123。

<sup>346</sup> 同上，頁 121。

軟化。企業界、工會與政黨菁英逐漸出現由於瑞典對於歐洲市場的依賴，因此加入歐體是保護瑞典經濟與擴大政治影響力的作法。

然而在冷戰剛結束的時候，社民黨依舊保持中立不結盟政策立場。雖然在1990年社民黨首相卡爾松(Ingvar Carlsson)發表了在結合歐體成員身分與中立政策的前提下，加入一個嶄新歐洲秩序的意願。然而中立不結盟政策歷史傳統悠久。即使是在蘇聯解體後，在政策軌跡的影響下，瑞典必須要重新建構新的國防安全觀與新的中立政策論述才有可能使中立政策與加入歐體兩者之間不會衝突。<sup>347</sup>

接著1991年的大選中，非社民黨黨派聯手以「瑞典重新出發(A New Start for Sweden)」的口號贏得大選。包含中立者、自由黨、中央黨與基民黨所組成的聯合內閣—比爾特(Carl Bildt)政府上台。比爾特政府認為歐盟成員國的身分有助於解決瑞典這十餘年來嚴重的經濟問題。瑞典加入歐盟後藉著弱化原本福利國家與瑞典模式，而再度使瑞典經濟重新活絡，是為瑞典帶來自由化與國際競爭力的唯一方式。<sup>348</sup>

比爾特政府對於中立政策的看法是希望能夠激發瑞典內部重新思考中立政策對瑞典的重要性與適切性。1991年比爾特政府提出將瑞典外交安全政策與歐洲認同接軌的議題討論，希望能夠引發國內對於瑞典安全政策的審視，重新思考中立政策在後冷戰時期的意義。<sup>349</sup>

進一步地，比爾特政府希望能將傳統中立不結盟政策這一概念淡化為僅存不結盟(non-alignment)的態度作為瑞典的外交政策方針，強調以不參與軍事聯盟(Sweden stands outside of military alliance)為主要內涵，<sup>350</sup>

---

<sup>347</sup> Agius, Christine. (2006).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Swedish neutrality : challenges to Swedish identity and sovereignty*. pp. 187-189.

<sup>348</sup> Ibid., pp. 147-149.

<sup>349</sup> Ibid., pp.150.; Aggestam, L. (2001). An end to neutrality? Continuity and change in Swedish foreign policy. pp. 189.

<sup>350</sup> Karvonen, L. & Sundelius, B. (1996). The Nordic Neutrals: Facing the European Union. In L. Miles (Ed.) *The European Union and the Nordic countries*, Routledge, pp.252.



而在瑞典申請歐洲聯盟會員時，的確是想要保有中立政策的傳統。然而歐盟對於安全議題比預期中來的積極與強硬，因此不願意在安全議題上容許例外。因此瑞典的中立政策的內涵在爲了經濟利益加入歐盟的前提下，開始被限縮以及安全觀的被重新敘述。

比爾特政府也有極大的熱情想要加入歐盟。1993年瑞典加入了多國聯軍特遣部隊(Combined Joint Task Forces, CJTF)，並且以加入後有助於北歐和平爲由，平撫來自於國內的質疑聲浪。在瑞典政府的努力下，再加上後冷戰時期的安全環境情勢，成功使得瑞典中立政策的實質內涵開始發生改變。<sup>351</sup>

總結來說，比爾特政府是試圖帶領瑞典走向正常化國家，淡化中立政策的影響力。而經過了這個過程，1994年重新上任的社民黨政府在承繼了比爾特政府的政策軌跡之後，基本上已經不可能完全回到傳統社會民主黨式的論述。然而在加入歐盟的公投中，瑞典內部依然有許多分歧，公眾辯論的焦點主要是擔心加入歐盟之後，許多的社會福利措施如健康、教育、文化、勞工政策都將會消失。這一點說明了瑞典內部對於歐盟的態度仍然有許多懷疑與反對的傾向。

社民黨雖然也支持加入歐盟，但是社民黨對於加入歐盟的內容與前提卻不太相同：社民黨主張必須在維持社會民主體制的前提之下加入歐盟，並在加入之後在歐盟內部推廣社會民主概念，以期能重建福利國家與瑞典模式傳統。

在一般民眾的意見中，民眾所關心的問題，最重要的還是保障人民既有的社會福利服務，在這個基礎之上接受加入歐盟所帶來的變化。最終瑞典在加入歐盟與否的公投中以 52.3%對 48.8%(投票率約 83.8%)的公投結果下通過了加入歐洲聯盟的決議。

然而在瑞典剛加入歐盟時，面臨了兩難。一方面瑞典雖然身爲一個抱持中立政策的國家，卻不想成爲一個問題製造者；另一方面瑞典試圖在安全議題上尋找更廣泛的解決問題的模式，包括維持和平、仲裁與促進國家間對話。在瑞典的立

---

<sup>351</sup> Ibid., pp.150-155.

場看來，歐盟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初期的發展還無法促使瑞典真正成為歐洲的一員，瑞典還在試圖保持國家在安全與主權方面的高度自主性。

因此在 1995 年，根據瑞典政府報告指出瑞典無法在歐盟做出任何軍事安全承諾，說明了瑞典政府欲保持中立政策的立場。因此針對歐盟安全事務，瑞典則是清楚地將「共同防衛」(common defence)與「共同防衛政策」(common defence policy)區分開來。瑞典表明了絕對無法接受歐盟安全政策被視為一種「共同防衛」；瑞典的策略就是將歐盟安全政策的範疇限制在人道救援、危機處理與維和任務的歐盟「共同防衛政策」，並且積極地推動此一內涵的歐盟共同防衛政策。

352

根據赫洛夫(Herolf)的看法，瑞典在加入歐洲聯盟前後且參與歐盟安全暨防禦政策的態度和觀點是建立在瑞典對於自身國家安全與外部安全環境，以及中立不結盟政策三者之間的交集點之上。首先是冷戰結束所帶來的安全威脅型態發生改變。恐怖主義、區域衝突與內戰等武裝衝突形式與傳統國家之間的戰爭有很大的差異。南斯拉夫戰爭標誌了戰爭原因與型態之變化，瑞典自此之後所發展之衝突處理的能力並不與其國家中立理念相衝突。再加上俄羅斯力量上升，石油管線問題也牽涉到波羅的海周邊安全穩定。

第二個是瑞典不結盟政策之角色。瑞典抱持的不結盟政策立場有助於瑞典在歐盟安全暨共同防禦策略中規避制度及名稱上的問題，並強調重視實際作為。不結盟立場僅代表了瑞典不願意被拖進任何一場國際戰爭中，也不應該因為這樣的立場而否定了瑞典維護團結與安全之責任。最後是瑞典之安全政策傳統。在冷戰結束後，瑞典是基於經濟考量決意加入歐盟。安全對於瑞典來說，目的在於創造鄰近區域之和平，而非單純保護瑞典本國安全。<sup>353</sup>

---

<sup>352</sup> The EU Intergovernmental Conference 1996, Government Report 1995/96:30, Stockholm, 30 November 1995, pp. 26–30. 轉註自 Ferreira-Pereira, L. C., (2005). The Militarily Non-Allied States in the Foreign and Security Policy of the European Union: Solidarity 'ma non troppo',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European Studies*, 13(1), pp.32.

<sup>353</sup> Herolf, G. (2007). Sweden and ESDP. In K. Brummer (Ed.), *The North and ESDP-The Baltic States, Denmark, Finland and Sweden*: Bertelsmann Stiftung. pp. 47-50

如上所述，雖然瑞典抱持著這樣的態度，而在歐盟安全事務中，成員國必須在條約義務的壓力之下，發展各國的國家軍事能力計畫。在此一邏輯之下，瑞典作為歐盟安全暨防衛政策的一員，在歐盟現存制度與條約框架之下，瑞典國家軍力結構與軍事能力必然會受到歐盟安全暨防衛政策相當程度的影響。

而瑞典軍事傳統中，除了中立與不結盟政策之外，還有另一個重要的面向是國際主義(Internationalism)。國際主義中所重視的人道主義與國際和平穩定來自於瑞典在聯合國參與維和任務的經驗。藉著對於衝突預防的推動使瑞典能夠在中立政策的限制之下，參與國際安全事務。因此當瑞典在加入歐盟之後，面對歐盟安全事務的發展，瑞典採用其在聯合國的經驗開始推動衝突預防與人道主義。

而在本章接下來的章節中，首先討論瑞典在歐盟安全暨防衛政策發展過程中，因為歐盟安全暨防衛政策的影響，而造成瑞典國家安全政策目標及國防組織的變遷。

接著會研究瑞典在歐盟安全暨防衛策略的目標界定過程中，是否真正地發揮了影響力，甚至是成功地上傳(Upload)了與國家切身相關的安全政策偏好。

## **第二節 下載：歐洲安全暨防衛政策對於瑞典的影響**

### **一、歐盟安全暨防衛政策影響瑞典的途徑**

瑞典加入了歐盟安全暨防衛政策之後，雖然在政府安全方針上依舊維持不結盟政策的路線，然而實際上瑞典的國家安全及軍事政策受到歐盟安全暨防衛政策很大的影響。歐盟安全暨防衛政策作為歐盟的對外安全及軍事政策，經過成員國共同制定及表決討論的過程，實質上已經成為成員國如瑞典等在國家安全及軍事發展上的目標與發展方向。以下就歐盟安全暨防衛政策在政策目標與能力發展上

對瑞典等成員國的影響。<sup>354</sup>

首先是歐盟安全暨防衛政策對成員國在軍事目標上有顯著的影響。1997 年被納入阿姆斯特丹條約的彼得斯堡任務，為歐盟安全事務界定了明確的目標。在赫爾辛基首要目標中，也納入了彼得斯堡任務作為任務目標與框架。自歐盟安全暨防衛政策發展之初，彼得斯堡任務為歐盟劃出了一條清楚明瞭的目標道路。

在阿姆斯特丹條約之後的各項目標與決議中，彼得斯堡任務佔有了極大的影響力。彼得斯堡任務將歐盟安全及對外關係的目標界定為人道與緊急救援、危機處理、衝突預防以及促進國際和平。這就界定了歐盟安全暨防衛政策的內容還有歐洲快速反應部隊的能力與目標。因此在國家訂定軍事任務與方向時，歐盟安全暨防衛政策主張的彼得斯堡任務目標會影響國家對安全威脅與軍事任務之類型。

第二項是歐盟安全暨防衛政策在實際執行時，執行的過程經驗與結果影響了歐盟安全暨防衛政策在自身定位與能力上的界定。在歐盟安全暨防衛政策產生之前，歐洲地區已有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存在，再加上聯合國維和任務對全球各地衝突維和任務的領導地位。歐盟安全暨防衛政策的定位與能力發展問題的確引起質疑。在歐盟開始實際執行任務之後，對於歐盟安全暨防衛政策在國際維和任務的功能與定位也越形明顯。

在歐盟第一次執行的軍事性任務-馬其頓(EUFOR Concordia)任務中，原本 1999 年由於科索沃戰爭引起的馬其頓內部動亂不安是由北約部署軍隊至馬其頓境內，<sup>355</sup>而後歐盟建議馬其頓後續任務可以作為歐盟嘗試的第一個軍事任務，並且相信歐盟已經有能力接手具有挑戰性的任務。<sup>356</sup>因此在與北約合作的「柏林及其附加協定或安排」(Berlin-Plus arrangement)的基礎之上，歐盟決議在歐盟-北約聯合聲明<sup>357</sup>的框架下承接北約在馬其頓的任務-「和平女神」(EUFOR Concordia)

<sup>354</sup> Quille, G. (2006). The impact of EU capability targets and operational demands on defence concepts and planning. In A. J. K. Bailes, G. Herolf & B. Sundelius (Eds.) *The Nordic countries and the European security and defence polic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p.131-138.

<sup>355</sup> 北約馬其頓任務(Operation of Essential Harvest)之後，北約認為必須維繫在馬其頓境內的和平態勢，因此成立『Amber Fox』任務保護國際監督員安全，後任務期限延長至 2002 年。

<sup>356</sup> Presidency Conclusions, European Council meeting in Laeken 14 and 15 december 2001

<sup>357</sup> EU-NATO declaration on ESDP(Brussels), December 16, 2002

任務。在馬其頓任務的經驗當中，歐盟安全暨防衛政策的任務屬性被明確地界定為在危機處理任務中，與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在柏林-附加機制(Berlin-Plus)基礎之下的對外軍事行動策略夥伴之關係。<sup>358</sup>

而歐盟在剛果進行的「阿緹米斯」(Artemis)任務，則是為歐盟安全暨防衛政策強化了「骨幹國家」(framework nation)概念。亦即為了增加任務執行的速度與效率，以單一國家為首負責指揮任務行動的進行。通常作為骨幹國家，都是在任務地區有其重要利益，也會是投注最多軍事力量的國家。<sup>359</sup>阿緹米斯任務根據聯合國安全理事會決議 1484 號作為行動基礎，歐盟決定以法國為首且任命法藉任務指揮官。這也是第一次由歐盟單獨執行的軍事任務，也是歐盟第一次在海外所執行的軍事任務。<sup>360</sup>

以上列舉了兩項歐盟安全暨防衛政策所執行的任務。<sup>361</sup>這兩項任務的執行對於歐盟的意義來說，是經由實際任務的執行，使歐盟安全暨防衛政策了解並修正歐盟在相關議題上的經驗與執行能力。由另一方面來說，歐盟安全暨防衛政策執行任務的地理範圍與類型範圍逐漸擴大，因此更需要成員國投注人力與金錢方面的資源。

以上述兩個任務來說，瑞典皆有參與任務過程，另外例如波士尼亞與赫塞哥維納地區的歐盟警察任務團(EU Police Mission)與科索沃法治任務團(EULEX Kosovo)等，瑞典也參與了這些軍事與非軍事任務。因此在歐盟安全暨防衛政策需求影響之下，瑞典勢必要改革國內國防組織與軍事能力，以符合歐盟條約義務的要求。

---

<sup>358</sup> Quille, G. (2006). The impact of EU capability targets and operational demands on defence concepts and planning. pp. 133.

<sup>359</sup> Reichard, Martin, (2006). The Eu-Nato Relationship: A Legal And Political Perspective, Ashgate Pub Co. pp.121-145.

<sup>360</sup> 法國在歐盟通過決議願意成剛果任務前，即表明願意執行此項任務，並與英國發表圖格(Le Touquet)聲明，關切在非洲之人道與衝突預防等問題。請參見何泰宇，2005年，〈歐盟安全暨防衛政策之研究－以2003年剛果軍事任務為例〉，《遠景基金會季刊》，第四卷第六期，頁185-238。

<sup>361</sup> 歐盟安全暨防衛政策詳細任務介紹，請見：Pirozzi, Nicoletta, (2009). Military and Civilian ESDP Missions: Ever Growing and Effective?, *Documenti IAI – Istituto Affari Internazionali*, No 0929.

歐盟在執行了包括馬其頓任務等軍事與非軍事任務之後，對於歐盟安全暨防衛政策與北約、聯合國的合作情況更加明確。除了與北約在柏林-附加機制(Berlin-Plus)的基礎下進行合作，與聯合國在軍事危機處理上有更加緊密的合作框架。<sup>362</sup>在阿緹米斯任務之後，關於聯合國與歐盟在軍事任務上的合作可以分為兩種模式。第一種是造橋模式(Bridging Model)，即歐盟在短時間內協助並取代聯合國執行任務，給予聯合國時間針對任務地區最新的發展而計畫符合需求之新任務目標。第二種是待命模式(Standby Model)，指的是歐盟武裝部隊以待命協助的方式，在聯合國維和部隊執行遭逢困難緊急時，提供協助穩定情況。<sup>363</sup>

2010年首要目標當中提出了一些新的想法，例如英法聯合提倡「戰鬥群」(Battlegroup)的概念，戰鬥群的概念革新給予了成員國明確的改革目標。英法兩國在2003年11月時英法兩國提到歐盟應當建立起如同先前「阿緹米斯」任務中曾出現的小型戰鬥群作為歐盟執行任務時的單位。爾後在2004年11月兩國再度舉行高峰會再次強調此一戰鬥群的概念。因此在阿緹米斯任務經驗與英法提倡之下，「歐洲戰鬥群」(EU BattleGroups)的概念，並且以2007年為目標要能達到初步發展規模。歐盟戰鬥群必須具有可互通性(Interoperability)、部署力(Deployability)與支持能力(Sustainability)。可互通性代表了成員國在執行歐盟任務時，在科技與資訊上必須發展與他國戰鬥人員合作且溝通無虞的能力。因此在執行聯合行動時，各國能夠合作執行歐盟任務。部署力代表著要能夠依照理事會要求在10天之內達到部署軍力完畢的目標，以快速反應能力且迅速到位為主要目標，並且有足以支撐長期軍事行動的能力。<sup>364</sup>

由上述發展過程當中可以知道，瑞典在歐盟安全暨防衛政策的發展影響之

---

<sup>362</sup> Council of the European Union, ESDP presidency Report, Annex II, "EU-UN co-operation in Military Crisis Management Operations Elements of Implementation of the EU-UN Joint Declaration", Brussels, 17-18 June 2004.

<sup>363</sup> 請見 Hansen, W. (2007). EU-UN Cooperation in Peace Operations: Chances, Concepts and Constraints. In H.-G. Ehrhart (Ed.) *Die Europäische Union im 21. Jahrhundert* VS Verlag für Sozialwissenschaften, pp.238-48.

<sup>364</sup> 關於歐洲戰鬥群，請見 Quille, Gerrard, (2006). The EU Battlegroups, Policy Department, European Parliament, pp.4-10.

下，爲了符合歐盟安全暨防衛政策對成員國提出的需求，瑞典軍事能力與組織於實際上發生了變化。而以下就瑞典軍事能力及目標的具體變遷內容做一闡述。

## 二、瑞典軍力規模與目標變遷

瑞典在加入歐盟與歐盟安全暨防衛政策之後，爲了滿足歐盟安全暨防衛政策以危機處理與衝突預防爲主的任務目標，瑞典針對其國防軍力與部門組織配置上進行了改革。

先前處於冷戰期間的瑞典，身處於兩極緊張對峙的情況之下，依靠的安全資源來自於瑞典本身具有強大的國防武力。瑞典實行徵兵制，重視對國民的軍事教育，並且也將重心放在國防武器的研究發展。冷戰期間瑞典可以動用的軍力可達 30 個旅 80 萬人次之多，空軍實力也可與英法等國比擬，更具有可以派遣 20 艘潛水艇至波羅的海的能力。<sup>365</sup>

然而在後冷戰時期，歐盟安全暨防衛政策的發展，與彼得斯堡任務目標影響了瑞典的國防外交政策方針。不同於冷戰時期瑞典追求的強大武裝中立政策，這時期的瑞典國防追求的是一支短小而精悍，任務取向並且能夠快速反應與組織起來以面國家安全事務與國際任務的軍隊。<sup>366</sup>

在 2004 年的《我們的未來國防》(Our Future Defence)報告書中，說明了瑞典進行國防軍力改革的目的是能在衝突早期即可快速反應，以拯救最多的人民。<sup>367</sup>由瑞典政府發出的各項政府文件中顯示，瑞典進行國防與軍力改革是受到歐盟安全暨防衛政策的影響，以危機處理與衝突預防爲軍事任務目標而建構的軍力組織。

根據瑞典在後冷戰時期與歐盟交往的過程中，對於外部環境與瑞典國防政策

<sup>365</sup> Andersson, J. (2007). A New Swedish Defence for a Brave New World. In J. H. Matlary (Ed.) *Denationalisation of defence : convergence and diversity*. Aldershot, England ; Burlington, VT : Ashgate Pub-, pp.139.

<sup>366</sup> Swedish Armed Force, (2006). *The Facts 2006-2007*, Stockholm: Swedish Armed Force.

<sup>367</sup> Ministry of Defence, (2004). *Our Future Defence– The focus of Swedish defence policy 2005–2007*, Swedish Governmental Bill 2004 / 05:5, Stockholm: Ministry of Defence.pp.10.

發展的看法可以分爲三個階段：<sup>368</sup>

1. 1991 年到 1995 年：

東西冷戰剛剛結束，雖然冷戰時期強大的蘇聯已不復存在，然而承繼蘇聯而出現的國家俄羅斯不論在國土面積與資源上，依舊是不可小看的大國，因此瑞典在擔心俄羅斯的力量的同時，爲了保護自身的安全還是採取了不結盟政策。總而言之，這個時期的瑞典尚處於觀察國際情勢與風向的時期，再加上 1990 年代瑞典正遭逢國內的經濟危機，瑞典正在考慮是否加入歐盟以挽救岌岌可危的瑞典經濟，因此瑞典繼續保持了不結盟政策的路線與自身強大的國防武力，靜觀其變，以決定下一步該如何走。

2. 1995 年到 1999 年：

雖然冷戰結束了一段時間，全球各地地區衝突的數目實際上並沒有降低。1990 年代巴爾幹地區的宗教、種族的嚴重衝突代表了新的衝突類型產生，包括了種族主義、民族主義與恐怖主義正威脅著後冷戰時期歐洲地區的和平。爲了適應這種新興的安全環境，歐盟安全暨防衛政策的目標通過了以彼得斯堡任務爲基礎，建立能夠因應國際維持和平任務之軍事與非軍事層面的能力。瑞典欣然接受了這樣的安全觀點，同時並開始逐漸地調整國防軍力規模與組織以面對在後冷戰時期的安全挑戰。

3. 1999 年到 2000 年，及 2000 年之後：

歐盟安全暨防衛政策在阿姆斯特丹條約與尼斯條約中被清楚地界定其能力範圍與目標之後，瑞典作爲歐盟安全暨防衛政策的一員，積極地改革國內的防衛政策與軍隊。與其他歐盟國家類似，瑞典雖然在傳統上擁有中立與不結盟政策，然而在實際上瑞典已經放棄了這樣的觀點，將國家軍隊能力目標放在國際危機處理與衝突預防之上，而逐漸降低國家疆界防衛在國防政策上的比重。

---

<sup>368</sup> Andersson, J. (2007). A New Swedish Defence for a Brave New World. pp.136-137.



### (一) 軍力規模的變動

瑞典自 1999 年起，爲了因應外部安全環境的改變，與歐盟安全暨防衛政策中衝突預防、危機處理與維繫國際和平等軍事安全目標需求，開始進行國防改革。根據瑞典國防委員會(Swedish Defence Commission)在 1999 年的呈給瑞典議會的報告中，瑞典在 1999 年的國防目標是：抵抗軍事攻擊；瑞典國土安全的防衛；促進國際和平與安全；承平時期的保障瑞典社會安全。<sup>369</sup>

然而瑞典國防委員會也在報告中指出，瑞典受到外部侵略的可能性已經大幅度地下降，瑞典應當發展更具有彈性與機動性的國防武力。另外此份國防報告也建議瑞典政府應當增加瑞典執行國際和平任務的能力。瑞典應該在短期之內發展出足夠支持在歐洲與其鄰近地區執行維持和平，與強化和平任務的能力。在報告的最後，瑞典國防委員會建議瑞典應該將國防政策目標放在國際合作上，藉以提高瑞典的在歐洲的戰略角色。這份報告說明了由政府支持的智庫開始推動瑞典在國防目標與實質國防配置上，朝向與歐盟進行密切的聯繫和合作的方向。<sup>370</sup>

而隨後瑞典政府 1999 年通過《新防衛政策》(The New Defence)法案，其中強調要革新瑞典的國防體系，包括減少軍隊規模，使瑞典軍隊成爲規模不大，卻有絕佳作戰能力之軍隊。在法案文件中，瑞典明確地指出了因爲共同安全暨外交政策與歐盟安全暨防衛政策以危機處理和衝突預防爲主要目標，瑞典的國防政策與目標應當隨著歐盟的需要而做出改變與革新。除了目標革新之外，瑞典國防組織架構也出現了新的改革目標。<sup>371</sup>

而在瑞典 2004 年《我們的未來國防》(Our Future Defence)報告書中明白指出瑞典與歐盟同時面對新的安全威脅與衝突類型，而瑞典作爲歐盟的一份子必須發展與歐盟目標一致的國防政策。歐盟安全暨防衛政策的發展改變了瑞典的國防

<sup>369</sup> Swedish Defence Commission, (1999). *A changing World – A Reformed Defence*, (Executive Summary) Stockholm: Ministry of Defence. pp.3.

<sup>370</sup> *Ibid.*, pp.2.

<sup>371</sup> Ministry of Defence, (1999). *The New Defence (Det nya försvaret)- A short version of the Government Bill 1999/2000:30*, Stockholm: Ministry of Defence, pp.8-9.

政策，歐盟安全目標轉變為瑞典安全政策的中心。瑞典跟隨歐盟的能力目標共同發展危機處理能力能夠增加歐盟能力，也能夠對國際危機處理任務有所裨益。<sup>372</sup>因而在這份報告書中瑞典明確地指出瑞典的安全政策與歐盟合流，並且以歐盟任務目標為重心的發展。

歐洲戰鬥群(Battlegroup)的進展也帶動了北歐戰鬥群(Nordic Battlegroup)的發展。歐洲戰鬥群強調在短時間內基於歐盟高峰會的決議而行動。因此歐洲戰鬥群有可能必須同時在一個以上的地區執行歐盟高峰會所交付的任務。為了支持歐盟安全暨防衛政策，瑞典、芬蘭與挪威在 2004 年的布魯塞爾高峰會上宣布在歐盟戰鬥群的概念下，組成多國戰鬥群以執行歐盟任務。瑞典與芬蘭、挪威、愛沙尼亞等國隨後共同組成聯合北歐戰鬥群(Joint Nordic Battlegroup, NBG)。

瑞典承擔了主要進行協調計畫、準備與訓練的責任國家(Framework Nation)之角色。北歐戰鬥群在 2008 年 1 月 1 日正式成立，此外瑞典也是投注最多人力在北歐戰鬥群組成的國家，瑞典提供了大約有 1100 名人員。<sup>373</sup>北歐戰鬥群的出現也說明了瑞典對於歐盟安全事務的軍事層面的態度也發生轉化，願意支持並且加入軍事層面的行動。

而 2009 年瑞典政府以《功能性的防衛政策》(A Functional Defence)為題，提出了 2010 年至 2014 年的防衛政策方針。其中強調除了防衛本土之外，瑞典必須發展面對世界各地衝突的能力。因此瑞典必須持續地使其國防政策體系更具功能性與快速反應能力。<sup>374</sup>

瑞典在國防與安全政策上的目標變遷也帶動了瑞典在實際上的國防軍隊組織上的改變。在瑞典 2004 年《我們的未來國防》中說明了為了增加瑞典在國際危機處理任務的參與度，必須要使瑞典在國際危機處理任務中的人員與能力增

---

<sup>372</sup> Ministry of Defence, (2004). Our Future Defence– The focus of Swedish defence policy 2005–2007, Swedish Governmental Bill 2004 / 05:5, Stockholm: Ministry of Defence. pp.8.

<sup>373</sup> Andersson, J. J., (2006). Armed and Ready? The EU Battlegroup Concept and the Nordic Battlegroup, Stockholm: SIEPS. pp.37.

<sup>374</sup> Ministry of Defence, (2009). A Functional Defence, Government Bill on the future focus of defence. A focus that extends over a five-year period, 2010–2014.

加。而且瑞典朝著資訊型國防(network-based defence)目標邁進，在軍事任務中提供精確的數據與資訊。以及在人員、訓練及武器採購等方面的改革，皆是以符合歐盟安全暨防衛政策的任務需求為主。

總而言之，瑞典在國防政策上的改革有三個方面：第一個是任務目標的國際化，不再講求以防衛本土為主要重點，而是以兼顧國土保衛與執行以歐盟託付為主的國際任務。第二個是軍隊科技現代化，如上所述之網路型國防等概念，追求軍事科技的效用與準確，以便瑞典軍隊在執行國際任務時，能夠以最有效率、最低傷害的方式達成任務目標。最後是人力資源的配置。由於國防目標的轉變，在軍力資源的配置上勢必有所調整。

以兵役制度為例，瑞典執行徵兵制，在 19-47 歲間的男性有義務服兵役，女性也可以自願性服兵役。在冷戰時期，因應強大國防的需要，徵兵數量相當多，幾乎所有男性皆有義務服兵役。然而在後冷戰時代，國防政策與外部安全威脅類型的變化，瑞典實際上不再需要龐大軍力才能支撐國家國防，徵兵的制度也開始發生改變。

首先是徵兵人數減少，不同於以往幾乎每位符合年齡的男子都會收到徵兵命令，在 2000 年之後約只有五分之一的符合年齡男性收到需接受基本軍事訓練要求的命令，其餘則可以用社會服務等代替。<sup>375</sup>調查顯示，瑞典軍力自從 2000 年在國防預算與人員進行裁減之後，至 2006 年為止已經減少了將近 20% 的人員。<sup>376</sup>而由表 5-1 可看出在 2006 年到 2009 年間，瑞典陸海空三軍的人數也不斷地下降。

瑞典在人員組織以及軍隊架構上，一改於以往冷戰時期以數量為主的國防武力思維，而是追求更有行動力、速度與能力的軍隊架構。反應了瑞典國防政策目標與架構上大幅度的改變。

---

<sup>375</sup> 另外接受軍事訓練的國民可以自願選擇是否執行國際任務。詳情請見：Andersson, J. (2007). *A New Swedish Defence for a Brave New World*. pp.144-145.

<sup>376</sup> Wedin, L. (2008). *Northern Europe and the ESDP: the case of Sweden*. In C. Archer (Ed.) *New security issues in Northern Europe: the Nordic and Baltic states and the ESDP*, New York: Routledge, pp.47.

表 5-1：瑞典國防軍力 2006-2009 年度變化表

Branch	2006	2007	2008	2009
陸軍	18000	21000	17500	16300
海軍	5000	5000	4600	3800
空軍	10000	8000	3000	3200
指揮部	32000	7500	6900	5300
後勤	---	5500	5000	5400
國土保衛	410000	41000	38000	38000
總數(人數)	106000	88000	75000	72000

來源：Ministry of Defence, 2009. *The pocket guide to the Swedish Armed Forces*, Stockholm: Ministry of Defence.

瑞典國防與安全政策在 1990 年代到 21 世紀初期歷經了極大的轉變。不同於傳統要求維持強大武力的國防政策，瑞典在後冷戰時期的國防安全政策在軍力數量上要求比以往所要求的規模縮小許多。因此爲了因應這樣的變化，瑞典國防工業也面臨了合併、私有化與國際化的現象。

自冷戰時期發展以來，現今瑞典的國防政策已不足以支撐規模龐大的國防工業，包括紳寶(SAAB)在內的製造商也在後冷戰時代出現了轉型或合併的現象。而瑞典大部分的國防安全公司皆具有外資股權，是瑞典與歐洲地區國際國防工業重組的結果。國防工業的重組與國際化一方面能夠繼續爲瑞典國防安全政策提供有利的軍事能力支援；另一方面又能繼續維持原有國防安全公司的長遠經營，是在後冷戰時代下國家安全政策與國防工業適應的結果。<sup>377</sup>

<sup>377</sup>有關瑞典國防工業的轉型與國際化，請見：Andersson, J. (2007). A New Swedish Defence for a Brave New World. pp.135-156.；Björn Hagelin, (2006). The Nordic attitude to and role in EU-linked defence industrial collaboration In A. J. K. Bailes, G. Herolf & B. Sundelius (Eds.) *The Nordic countries and the European security and defence polic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p.185-194.

## (二) 積極參與歐盟國際任務

除了上述瑞典將歐盟安全暨防衛政策的目標納入了國家國防政策的目標當中，瑞典也在歐盟主導的多次歐盟境外任務裡，採取越來越主動的態度。即便瑞典基於不結盟政策，在歐盟安全政策發展中極力避免未來可能出現的歐盟共同防衛體系<sup>378</sup>，但是瑞典依舊願意提供 1900 人的部隊加入快速反應部隊(Rapid Reaction Force)以因應危機處理與衝突預防的行動任務。<sup>379</sup>

而歐盟實際上在 2003 年的「和平女神」(Concordia, FYROM)行動中首次嘗試實施衝突預防，以處理馬其頓境內的民族衝突。而隨後的「阿緹米斯」(Artemis)行動是歐盟成功地部署軍力到剛果境內，以避免大規模的人道與民族危機。瑞典在阿緹米斯任務裡主動地參與了某些可能導致人員傷亡的戰鬥，除了阿緹米斯任務是由聯合國安理會所授權的之外，剛果等非洲地區也是瑞典外交安全政策，基於人道主義，積極保持關注的地區。

而在 2005 年啟動，於 2007 年通過的「2008 民事型首要目標」中，瑞典也主動地提供了包括民事反應隊(Civilian Response Team)、警察與監督單位方面的實際上的資源與人員。<sup>380</sup>因此瑞典被認為是由不情願的成員國(reluctant members)經過了積極地參與歐盟安全事務而轉換為主動的角色(active role)。

總而言之，歐盟安全暨防衛政策對於瑞典的影響除了瑞典國防政策的目標與組織產生變化之外，在對外的行動包括對於歐盟任務的支持，顯示了歐盟安全暨防衛政策在這段期間逐漸地成為瑞典國防外交政策的中心。

瑞典在接受了歐盟安全暨防衛政策的目標之後，將衝突預防等國際和平任務視為國防武力發展的既定行動類型，因此帶動了國防政策與組織的一連串改革。再加上瑞典在歐盟在非洲等地執行任務過程，以及非軍事層面的積極作為看來，

<sup>378</sup> 請見第三節所述。

<sup>379</sup> Bergman, (2004). Post-Cold War Shifts in Swedish and Finnish Security Policies: The compatibility of non-alignment and participation in EU led-conflict prevention. *The European Union and Conflict Resolution*. Uppsala University: ECPR, pp.13.

<sup>380</sup> Wedin, L. (2008). Northern Europe and the ESDP: the case of Sweden. pp.51.

瑞典認為衝突預防與人道主義思維的歐盟安全政策，與傳統的瑞典國防外交政策衝突之處有限，因此積極地接受歐盟安全暨防衛政策作為後冷戰時代瑞典新的國防外交政策的藍圖。

更有甚者，瑞典在歐盟安全暨防衛政策的目標與非軍事層面的發展中，除了積極地接受之外，更有起到促進與推動的作用，以下第三節就瑞典在歐盟安全暨防衛政策發展過程中，向歐盟推動新安全目標與促進非軍事層面發展，以及瑞典政治菁英在歐盟中被社會做一敘述與討論。

### 三、菁英社會化的過程

瑞典在加入歐盟之後，以至於與歐盟安全暨防衛政策發展中的互動。在歐盟安全暨防衛政策發展初期，瑞典的態度偏向於抗拒歐盟出現共同的軍事力量。然而隨著歐盟安全暨防衛政策的發展、包括科索沃戰爭等安全任務與 911 事件的發展，瑞典在參與歐盟安全暨防衛政策發展過程中，對於安全威脅類型與安全的認知也發生了轉變。

再加上瑞典在 2001 年擔任輪值主席國，參與歐盟事務的經驗，導致了瑞典政治領導菁英對於瑞典與歐洲地區乃至於歐盟間的關係，做出了新的詮釋。這個轉變代表了瑞典在歐洲化過程中，政治菁英藉由參與歐盟作為一個歐洲社會的場域，瑞典政治菁英接受了社會化的作用而產生了學習的過程。

然而瑞典實際上在剛剛加入歐盟的 1995 年時，由國防委員會的報告當中已經顯示了瑞典的安全及防衛政策論述發生了後冷戰時期的首次變化。在 1995 年的國防委員會及相關報告當中，瑞典即已將瑞典國防任務目標放在衝突預防、危機處理與人道救援上。代表著瑞典的安全認同不再只是局限於維持瑞典國家自身安全，而是將範圍往外擴張，延伸至瑞典以外的歐洲地區。而瑞典國家議會也分別在 1995 年與 1996 年通過瑞典安全政策的新方向決議。<sup>381</sup>

---

<sup>381</sup> Rieker, P. (2006). Sweden-Teacher and Pupil. In P. Rieker (Ed.) *Europeanization of national security identity- the EU and the changing security identities of the Nordic states*. London:

因此在阿姆斯特丹條約中，瑞典推動衝突預防等彼得斯堡任務作為歐盟安全暨防衛政策目標，也代表了瑞典由單純國家為主的安全認同，逐漸將重心放在歐洲地區作為一個整體的安全認同的轉變。

歐盟安全暨防衛政策的發展對瑞典來說，致使瑞典國家安全認同發生了相當程度的轉變。在 1999 年的《新防衛政策》法案中明白地指出瑞典雖然保持不結盟政策，但也同時具有歐洲安全的認同與維繫歐洲安全與和平的責任。<sup>382</sup> 因此與以往瑞典參加聯合國維和任務與北約任務時期不同，瑞典的安全認同逐漸偏向歐洲地區，不以單獨國家安全或是人道救援為安全論述主軸，而是加入了以歐洲地區為整體的安全認同架構。

在瑞典國內，雖然瑞典在北約和平夥伴與歐盟之內相當活躍。然而在瑞典國內還是維持了瑞典傳統且以武力為主的安全論述，與瑞典在國際間以國際主義為行動準則活動的形象有差別。歐盟的發展為成員國引進了全面安全 (Comprehensive Security) 的概念，瑞典在接受了歐盟安全暨防衛政策等安全政策的發展，但是在國內還是保持了全民國防 (Total Defence) 的概念。<sup>383</sup>

當歐盟安全暨防衛條約開始發展的時期，1997 年芬蘭與瑞典發表聯合備忘錄，目的在於避免歐盟出現往共同防衛邁進的可能性。在阿姆斯特丹高峰會的前幾個星期，瑞典與芬蘭希望能夠使共同安全暨外交政策繼續維持在馬斯垂克條約的樣貌，將成員國對歐盟安全事務責任建立在彼得斯堡任務的基礎上。阿姆斯特丹條約中聖彼得堡任務的納入，對瑞典來說其實是為了避免歐盟出現軍事力量。然而西歐聯盟在阿姆斯特丹條約中作為歐盟執行危機處理任務軍事力量的一部分而被納入歐盟。其實是瑞典極力避免，卻造成了無法預期的後果。<sup>384</sup>

1998 年瑞典曾經公開發言認為歐盟的軍事行動必須要在聯合國安理會決議

---

Routledge, pp. 76-77.

<sup>382</sup> Ministry of Defence, (1999). *The New Defence (Det nya försvaret)- A short version of the Government Bill 1999/2000:30*, Stockholm: Ministry of Defence

<sup>383</sup> Rieker, P. (2006). *Sweden-Teacher and Pupil*. pp.81.

<sup>384</sup> Eliasson, J. (2004). *Traditions, Identity and Security: the Legacy of Neutrality in Finnish and Swedish Security Policies in Light of European Integration*. *European Integration online Papers (EIoP)*, 8, pp.6-7.

案的前提下才能執行。甚至在科隆高峰會中，原本其他國家試圖忽略聯合國決議案前提，卻被瑞典以國內政治為由欲行使否決權而失敗。

然而英法聖馬洛宣言(the Anglo-French Declaration at St. Malo)卻受到瑞典的支持。瑞典態度開始轉變的原因是在科索沃戰爭之後，瑞典發覺在其他成員國也支持 1997 年阿姆斯特丹條約中人道救援作為歐盟安全政策目標的情形下，很難繼續堅持聯合國安理會決議作為歐盟執行安全任務的必然前提。因此在歐盟條約中，僅以聯合國憲章規範作為行動原則的歐盟安全任務限制。在瑞典國內，雖然政府極力淡化英法聖馬洛宣言的影響力，卻引起國內左派極力地攻擊與抵制。瑞典政府也因此遭受到來自於國內輿論極大的壓力。<sup>385</sup>

1999 年赫爾辛基高峰會前夕瑞典的態度相當猶疑，在其他成員國的壓力與索拉納保證瑞典不擔負共同防衛責任之下，瑞典才同意支持歐盟自身能力的發展。在瑞典國內，政府則是強調赫爾辛基高峰會的發展說明了歐洲共同安全暨防衛政策強化了聯合國委託的前提，才得以安撫國內民意與其他政黨反對意見。<sup>386</sup>

隨後在 1999 年瑞典國防委員會的報告當中，如第二節所述，開啓了瑞典跟隨歐洲安全暨防衛政策而進行的一系列國防政策目標與軍事力量的改革。

由第二節中所述瑞典安全政策與國防改革的發展中可以得知瑞典在安全論述上接受了歐洲地區作為一個整體安全範圍的概念。尤其在 911 事件之後，瑞典與其他大部分國家了解到後冷戰時期安全威脅的目標不再只是其他國家，還包括了恐怖組織等非國家的行為者。

因此瑞典在 2002 年整合國家國防架構組織，重新成立了瑞典緊急事件管理署 (Swedish Emergency Management Agency, KBM)，針對恐怖主義等新型安全威脅成立國家內部的緊急處置流程。也就是說，隨著冷戰的結束，還有更多的安全威脅以不同形式出現，因此瑞典必須要擴張其定義的安全威脅範圍。不同的威脅會

---

<sup>385</sup> Ibid., pp.8.

<sup>386</sup> Ibid., pp.12



有不同的應對方式。因此全民國防只是包含在國家安全政策中的一環。<sup>387</sup>

2001 年瑞典擔任輪值主席國的經驗對於瑞典政治菁英來說，也是一個很重要的學習與社會化的過程。作為歐盟輪值主席國的期間，瑞典政府由上到下，必須將歐盟政策邏輯與歐盟既有規範(Acquis communautaire)納入考量中。<sup>388</sup> 因此在擔任 2001 年輪值主席國時，瑞典在從歐盟主席國角度思考並舉行哥特堡會議等作為的同時，瑞典政治菁英也在以歐盟為基礎的場域中內化了歐盟的邏輯規範，形成了一種社會化(socialization)的過程。

這樣的看法說明了瑞典作為一個歐盟或是歐盟安全暨防衛政策的成員國在參與了決策與特定政策領域發展的過程受到影響的過程。這樣的經驗促使瑞典更有動力參與歐盟安全暨防衛政策的發展，並且遵從歐盟安全暨防衛政策帶來對國家安全政策的影響。<sup>389</sup>

雖然在 911 事件的陰影之下，使得歐盟與瑞典等其他成員國開始強化非軍事層面的危機處理能力。但是歐盟安全暨防衛政策的發展使得瑞典很難在國內與國際上保持不同的安全論述：在國內強調軍事武力對瑞典國防的重要性；在國際上強調較廣泛的安全論述。這兩種截然不同的安全政策邏輯使瑞典很難同時在國內與國際上維持兩套不同的論述。

對於瑞典來說歐盟安全暨防衛政策只有在衝突預防與危機處理的基礎之上，瑞典才能夠在與國內不結盟政策不相違背的情形下加入歐盟安全暨防衛政策。並且在歐盟安全暨防衛政策任務目標的影響之下，回過頭來使瑞典國內安全論述發生改變，由傳統的武裝中立、以防衛國土安全為主的安全論述，轉向以全面安全觀念為基礎，增強瑞典執行國際維和任務的行動能力，進行國防軍力與組織的改革。

<sup>387</sup> Eksborg, A. L. (2004). The Swedish Emergency Management Agency, experiences and conclusions after two years. *Blueprint, the magazine of emergency planning society*, UK.

<sup>388</sup> Lee-Ohlsson, F. (2009). Swede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European Security and Defence Policy. *Cooperation and Conflict*, 44:2, pp.133. Interview, No.9.

<sup>389</sup> Ibid., pp.134. Interview No. 4

瑞典在後冷戰時期的安全認同脈絡、受到由自身推動之衝突預防和危機處理等概念而形成的歐盟安全暨防衛政策影響之下，由瑞典政治菁英開始在安全認知與認同上發生了學習與社會化的過程。也造成了瑞典外交與國防政策在安全論述與外部安全認知上的巨大轉變。

### 第三節 上傳：瑞典對歐盟安全暨防衛政策的影響

#### 一、衝突預防的推動

瑞典推動「衝突預防」(Conflict Prevention)作為歐盟安全暨防衛政策的目標內容根基於下列幾點考量：

第一個原因是基於本身國際主義思維的影響。第二，隨著冷戰的結束，原本的兩極體系由於蘇聯的消失，而成為以美國為首的單極體系。這也代表著瑞典採取中立政策的時空背景已然消失，瑞典要在後冷戰時代重新建立國家安全定位與國際影響力，瑞典必須要找到一個新的安全論述。

第三，如前所述，瑞典自冷戰時期，在東西兩極格局下，以聯合國為平台積極地推動維護和平(peace-keeping)等人道、和平任務。瑞典在衝突預防與國際危機管理任務等方面經驗相當地豐富。一旦歐盟接受了作為維護和平的全球角色，則瑞典能夠憑藉著自身的豐富經驗，在歐盟安全政策領域中取得發言地位。第四，協助歐盟推動衝突預防等維護和平任務，並不與瑞典的中立與不結盟外交政策傳統相悖。<sup>390</sup>

對於瑞典來說，雖然在歐盟會員國的身分壓力之下，瑞典不結盟政策遭受到嚴峻的挑戰，但卻未磨損瑞典對於國際主義的堅持。歐盟對於衝突預防概念的支持，使瑞典能夠將歐盟視為一個活動的平台。在歐盟中，瑞典利用推動和平規範

<sup>390</sup> Stromvik, M. (2006). Starting to 'think big': the Nordic countries and EU peace-building. In A. J. K. Bailes, G. Herolf & B. Sundelius (Eds.) *The Nordic countries and the European security and defence polic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14

使瑞典雖然作為一個不結盟國家，卻能夠在歐洲安全政策領域中有所貢獻。<sup>391</sup>

由瑞典將衝突預防視為「瑞典基於其推動和平與團結的傳統之下必要的作為」，由此可知瑞典將衝突預防視為國家政策傳統的一種實現。如第三章所述，瑞典藉由參與聯合國維和任務的經驗，樹立起具有堅守不結盟政策，同時也推動多邊主義與國際主義的國家形象。冷戰結束後，聯合國在馬其頓所執行的維和任務對瑞典與其他北歐國家來說，符合了瑞典自冷戰時期以來延續的外交行動邏輯，就是以維持和平與人道主義為基礎的行動原則。<sup>392</sup>

而在聯合國參與維和任務的經驗促使了瑞典以「衝突預防」推動的新安全政策觀點。<sup>393</sup>瑞典在歐盟安全暨外交政策中，為了避免一個與瑞典外交政策傳統相違背的歐洲共同防衛體的出現，因此需要「上傳」衝突預防來迴避瑞典中立政策在加入歐盟之後可能遇到的理念衝突與國內的反對聲音。

而對歐盟來說，在北大西洋公約領導的科索沃任務之後的重建任務是難以忽略的慘痛經驗。科索沃重建過程中公共秩序的嚴重破壞，還有警力的缺乏，也使得歐盟下定決心要發展非軍事層面的危機管理能力。<sup>394</sup>瑞典因此成功地上傳了與其外交政策邏輯相符的外交政策偏好。

根據布克達(A. Björkdahl)對於在歐盟安全暨防衛政策制定過程中，作為重要行為者如瑞典外交部長與代表使節的訪談，還有相關研究的結果顯示：瑞典在相關會議中，對歐盟安全暨防衛政策的目標上有很大的影響。

首先瑞典將「衝突預防」的概念形塑成一種道德上的規範，是應該被廣為接受與採納。接著，瑞典作為一個規範的推動者，所謂「規範推動者」(Norm advocacy)

<sup>391</sup> Bergman, A. (2004). Post-Cold War Shifts in Swedish and Finnish Security Policies: The compatibility of non-alignment and participation in EU led conflict prevention Paper presented at the The European Union and Conflict Resolution, pp. 2.

<sup>392</sup> Archer, Clive (1994) Conflict Prevention in Europe: The Case of the Nordic States and Macedonia, *Cooperation and Conflict* 29: 367–86. 轉註自：Björkdahl, A. (2007). Constructing a Swedish Conflict Prevention Policy Based on a Powerful Idea and Successful Practice. *Cooperation and Conflict*, 42(2), 169-185

<sup>393</sup> Björkdahl, A. (2007). Constructing a Swedish Conflict Prevention Policy Based on a Powerful Idea and Successful Practice. *Cooperation and Conflict*, 42(2), pp.174-177.

<sup>394</sup> Dwan, Renata, (2004). Civilian tasks and capabilities in EU operations, *Paper commissioned by the Study Group on Europe's Security Capabilities,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 Centre for the Study of Global Governance*, pp.2-3.

是建立在道德共識之上並可以訴諸於人的一種非強制，並且形塑出何謂「正確」的行動概念。<sup>395</sup>

而瑞典的策略就是試圖由國內論述出發，在歐盟場域中推動一種特殊的規範，並且使其他成員國相信並且願意接納。瑞典作為一個國際政治上的「小國」所能運用且藉著自身可以推動的規範力量去影響歐盟層面政策的策略。<sup>396</sup>而小國在這裡並非國際政治上力量有限的小國；在此處所稱的小國是一種相對的概念，相對於英、法、德等掌握絕對優勢的「大國」，瑞典雖然作為一中型國家，但在面對英、法、德等國時，在歐盟事務上能夠發揮的影響力很有限，因此必須利用推動道德概念與議題等方法，來達到影響歐盟事務的效果。

以下就瑞典推動衝突預防概念的方向、議題與推動過程做一闡述。

#### (一) 納入彼得斯堡任務安全目標

瑞典推動「衝突預防」在歐盟安全暨防衛政策中第一個嘗試就是在阿姆斯特丹條約簽訂過程中引進彼得斯堡任務所界定的安全及防衛目標。因此，1996年芬蘭與瑞典在阿姆斯特丹會議前提出外交備忘錄，提倡歐盟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應當以西歐聯盟所主張的彼德斯堡任務為主，進而多增加人道救援、維和與危機處理等安全層面事務為主要目標任務，使歐洲統合成為一個發展和平的進程 (peace project)。<sup>397</sup>

瑞典此舉在於試圖藉著瑞典在維持和平與衝突預防任務的豐富經驗，擴大瑞典在歐盟安全事務的影響力。彼德斯堡任務的推動也為歐盟各國帶來更多安全領

<sup>395</sup> Checkel, J. (2005)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Socialization in Europ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59(4): 801-826. pp.803-805.

<sup>396</sup> Björkdahl, A. (2008). Norm advocacy: a small state strategy to influence the EU. *Journal of European Public Policy*, 15, 135-154. Björkdahl 利用了四項解釋因素來說明如同北歐國家等小國如何利用策略與資源發揮國際影響力。這四項因素包括了規範概念的推動者、有說服力的論述、輪值主席國和促進聯盟，以及國家提供資源（人力和財政資源）的能力。

<sup>397</sup> Ferreira-Pereira, L. C. (2005). The Militarily Non-Allied States in the Foreign and Security Policy of the European Union: Solidarity 'ma non troppo'.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European Studies*, 13:1, pp.23.

域的涉獵與合作。為後冷戰的歐盟激起另一種不同的安全思維可能性。<sup>398</sup>瑞典與芬蘭共同提出的備忘錄成為政府間會議討論歐盟安全事務的基本論述，更因此影響了歐盟安全事務的發展方向。

而且以彼得斯堡任務作為歐盟安全事務的任務目標內容同時能夠被抱持三種態度的成員國接受：第一種是歐盟成員國普遍地認為歐盟必須有獨立於美國之外的軍事能力，而阿姆斯特丹條約的安排能夠使得歐盟能夠擁有一定程度的軍事能力；第二種是如同法國與德國等試圖推動歐盟獨立強大軍事能力的國家，這些安排能夠先使得歐盟發展初步的軍事能力；第三種是抱持著以北大西洋公約組織作為歐洲主要軍事能力觀點的國家，如英國、丹麥與荷蘭等國家，彼得斯堡任務是以衝突預防與人道主義為主，與北大西洋公約主張的共同防衛之安全觀點不盡相同；最後一種就是持中立政策的成員國，如奧地利與愛爾蘭等國，衝突預防的推動使得他們有空間規避防衛同盟的議題。

瑞典藉著衝突預防的推動有效地達到了擺脫瑞典在歐盟裡消極(*reluctant*)的形象，並且在安全議題上取得了議題方向設定的主導角色，更能夠在瑞典國內消除對於歐盟安全事務損害瑞典中立政策的質疑。<sup>399</sup>因此瑞典藉著推動衝突預防在國內與國外為自身爭取到了有利的位置。

阿姆斯特丹條約要求了歐洲在軍事層面更緊密的合作與團結，也包括了更密切的歐洲安全統合。瑞典等中立國家雖然達到推廣不同安全概念的目的，實際上卻無法達到完全保護自己立場不受影響的目標。阿姆斯特丹條約降低了需要共識決決定的事務項目數量，使小國能夠發揮影響力的範圍縮小。而且在促進歐洲團結的目的上，阿姆斯特丹條約要求成員國約束「任何有可能與歐盟安全利益與效率相違背的行動」。在這樣的發展之下，瑞典等中立國家逐漸地無法掌控歐盟安全事務的發展。

---

<sup>398</sup> Agius, Christine. (2006).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Swedish neutrality : challenges to Swedish identity and sovereignty*. pp. 167-168。

<sup>399</sup> Ferreira-Pereira, L. C. (2005). *The Militarily Non-Allied States in the Foreign and Security Policy of the European Union: Solidarity 'ma non troppo'*. pp.24-25.

## (二) 1999 年科隆高峰會

1999 年科索沃事件之後，歐盟在科隆高峰會上擴大自身的軍事能力。瑞典在這些變化的初期還能夠區分危機處理與軍事行為兩者的差別而區分自己的介入範圍。然而在隨後的赫爾辛基高峰會與尼斯高峰會，歐盟大幅度地發展自身的軍事目標與能力，對於瑞典來說，無一不是觸動在中立政策立場的敏感地帶。因此在中立國紛紛反對西歐聯盟與歐盟軍事的統合，卻招致了各方對於包含瑞典在內等中立國家的批評。<sup>400</sup>

在輪值主席國德國的提倡之下，歐盟安全政策朝向軍事防衛方向發展，然而瑞典與芬蘭依然持續地以 1996 年聯合備忘錄的基本原則，在科隆高峰會前夕的準備過程中推動衝突預防的原則。

在科隆高峰會前，根據布克達(A. Björkdahl)對於前瑞典外交部長瓦倫(Lena Hjelm-Wallén)的訪談中說明了瑞典試圖為歐盟安全暨防衛政策引入除了一般國家危機處理能力(Crisis Management)之外的歐盟防衛類型。<sup>401</sup>瑞典制定了《瑞典行動計畫》(Preventing Violent Conflict- Swedish Action Plan)作為推動衝突預防的基本文件，此份文件中列舉了五項重要目標：第一項為促進「預防文化」(culture of Prevention)；第二項為認識國際安全結構中的危險因子；第三項為發展國際規範體系；第四項為強化國際性的制度框架與工具；最後是在不同領域，強化瑞典預防國際衝突的能力。<sup>402</sup>

瑞典行動計畫完整地傳達了瑞典在推動衝突預防上的意見與推動的決心，並且成功引起了包括歐洲高峰會祕書處與執委會的重視。瑞典也說服了歐盟執委會對外關係總署(European Commission ED External Relations)署長巴頓(Chris Patten)

<sup>400</sup> Ferreira-Pereira, L. C. (2004). The Militarily Non-Allied States in the CFSP of the 1990's. *European Integration online Papers (EIoP)*, 8:3, pp.8-9.

<sup>401</sup> Björkdahl, A. (2002). *From Idea to Norm – Promoting Conflict Prevention*. Lund: Lund University Press. pp.141

<sup>402</sup> Ds1999:24 (1999) *Preventing Violent Conflict- Swedish Action Plan*. Stockholm: Swedish Ministry for Foreign Affairs.

與索拉納(Javier Solana de Madariaga，歐盟共同外交與安全政策的高級代表)支持瑞典推動衝突預防的概念。<sup>403</sup>

原本科隆高峰會的結論草案由德國準備，但在其中並未提到任何有關於非軍事層面與衝突預防的議題。瑞典外交部長林德(Anna Lindh)成功地說服當時的法國總統席哈克(Jacques René Chirac)在科隆高峰會前同意支持瑞典將衝突預防的文件加入議程當中。<sup>404</sup>瑞典同時也以為處理國內強烈反對軍事化的歐盟安全暨防衛政策為由，說服了法國支持瑞典的提議。<sup>405</sup>因此在科隆高峰會之後，歐盟安全政策並未走向共同防衛的方向，而是以增進歐盟在危機處理與衝突預防的能力，發展以危機處理能力為中心的歐盟安全暨防衛政策。<sup>406</sup>

在科隆高峰會與赫爾辛基高峰會之後，衝突預防與危機管理共同成為歐盟安全暨防衛政策的主要目標。而瑞典在這過程中所發揮的影響力，雖然不能明確地被指出與界定，但也不能夠完全地排除。<sup>407</sup>

而在歐盟高峰會的推廣之下，歐盟尼斯高峰會就歐盟安全暨防衛政策的政策內涵達成了共識。成員國認為，歐盟如果想要在國際安全事務上取得重要位置，則衝突預防的能力是歐盟所必須發展的項目之一。而這一結論也成為 2001 年瑞典任輪值主席國時推動衝突預防的重要基礎。

在此過程中，瑞典做為一個小國(small state)，在推動規範性的目標的同時，勢必需要積極尋找能夠支持瑞典推動衝突預防的國家。因此在經過了 1999 年到 2000 年間與芬蘭、德國與義大利的雙邊會議後，瑞典成功地使三個國家接受了衝突預防對於歐洲安全暨防衛議題上的重要性，並願意支持瑞典的作為。<sup>408</sup>

---

<sup>403</sup> Björkdahl, (2002). *From Idea to Norm – Promoting Conflict Prevention*. pp.118-119

<sup>404</sup> Jakobsen, P. V. (2009). Small States, Big Influence: The Overlooked Nordic Influence on the Civilian ESDP. *JCMS: Journal of Common Market Studies*, 47(1), 81-102. pp.93

<sup>405</sup> Jonson, P. (2006).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uropean Security and Defence Policy – An Assessment of Preferences, Bargains and Outcomes* (Stockholm: FOI-Swedish Defence Research Agency). pp.82-3

<sup>406</sup> Ferreira-Pereira, L. C. (2004). The Militarily Non-Allied States in the CFSP of the 1990's. pp.9.

<sup>407</sup> Björkdahl, A. (2002), *From Idea to Norm – Promoting Conflict Prevention*. pp.142

<sup>408</sup> Elgström, O., Bjurulf, B., Johansson, J. and Sannerstedt A. (2001) 'Coalitions in the European Union Negotiations', *Scandinavian Political Studies* 24(2): 111-128.

因為瑞典在事前的努力，到了 2001 年瑞典擔任輪值主席國時，藉著輪值主席國在資訊、程序上所能擁有的資源，再加上輪值主席國在規範上的影響力，瑞典藉著正式職位擁有了「形塑議題」(agenda-shaping)的優先權力。<sup>409</sup>

### (三) 2001 年瑞典在輪值主席任內的推動

在 2001 年衝突預防是瑞典作為輪值主席國在外交安全政策的首要之選。然而因為輪值主席國必須表現公正不阿，不為自身利益活動的形象，瑞典宣布以「開放、有益的與服務心態」(being open, helpful and service minded)作為 2001 年任輪值主席國的準則。<sup>410</sup>

基於瑞典促進和平與國際主義的傳統，瑞典發表了《預防暴力衝突－瑞典 21 世紀政策觀點》(Preventing Violent Conflict -Swedish Policy for the 21<sup>st</sup> Century)<sup>411</sup>。瑞典試圖藉著提高衝突預防在議程中的優先性，使安全事務除了軍事力量與非軍事危機管理面向之外，加入衝突預防作為歐盟安全事務的第三項內涵。<sup>412</sup>而由 2001 年瑞典外交部長林德(Anna Lindh)在一般事務理事會(GAC)的會議上公開指出歐盟在安全暨防衛政策上應當同時發展衝突預防與危機管理的能力。<sup>413</sup>這一次的公開發言成功地使瑞典在形塑歐盟安全暨防衛政策上獲得了指導性的位置。

也因為在瑞典的推動之下，2001 年 6 月哥特堡(Göteborg)高峰會中，歐盟通過了「預防暴力衝突計畫」(*Programme for the Prevention of Violent Conflict*)作為歐盟共同安全暨防衛政策中衝突預防方面的指導性文件。這份文件說明了歐盟在

<sup>409</sup> Tallberg, J. (2003). 'The agenda-shaping powers of the EU Council Presidency.' *Journal of European Public Policy*, 10:1, pp.1 - 19.包含了議程設定(agenda-setting)、議程設計(agenda-structuring)與特定議題排除(agenda exclusion)。

<sup>410</sup> Bjurulf, B. (2001). How did Sweden Manage the European Union? *Center for the European Intergartion Studies*, C96, pp.6.

<sup>411</sup> Swedish Ministry for Foreign Affairs (2001) *Preventing Violent Conflict-Swedish Policy for the 21<sup>st</sup> Century*, Government Communication 2000/01:2, Stockholm: Ministry For Foreign Affairs. pp.10

<sup>412</sup> Ibid, p.7.

<sup>413</sup> Lindh, A. (2001) Intervention in the open debate on Conflict Prevention the General Affairs Council Meeting, 22 January, 2001, Stockholm.轉註自 Björkdahl, A. (2008). Norm advocacy: a small state strategy to influence the EU. *Journal of European Public Policy*, 15, 135-154. pp.147.



衝突預防領域中短期，與長期的目標，並且正式地將衝突預防概念放在歐盟安全事務重要的位置上。<sup>414</sup>

除此之外，瑞典在輪值主席國任期之後，依然持續地推動衝突預防的概念。瑞典在 2002 年曾經在赫爾辛堡(Helsingborg)召開了關於衝突預防的論壇，邀請了許多相關人士與會共同討論衝突預防的概念以及具體的推動等事項。<sup>415</sup>此外瑞典外長林德更於 2003 年繼續提倡「衝突文化」(Culture of Prevention)概念，將衝突預防的概念深入外交決策與執行的過程。隨後艾利森(Jan Eliasson)更進一步地提倡「梯形預防」(ladder of prevention)的概念。梯形預防同時具有了簡單的理性選擇邏輯，以及能夠處理所有的複雜情況變因選項，足以作為歐盟衝突預防思維中基本的行事邏輯與策略準則。<sup>416</sup>

因此根據索拉納(Solana)在 2004 年的發言指出：「2001 年在哥特堡所通過關於衝突預防之文件有助於歐盟在實際上發展短期與長期衝突預防的能力。」<sup>417</sup>也就是說瑞典實際上透過輪值主席任期內與任期之後對於衝突預防的推動，衝突預防作為歐盟安全暨防衛政策的任務目標的地位也逐漸穩固，並且發展至一定的程度，且對於歐洲安全事務發揮了一定的影響力。

瑞典以國家外交傳統中原有的國際主義與不結盟政策傳統為本，形成國家在全球安全事務責任的觀點，並且在歐盟層面上推動與其相符合的政策和行動。瑞典在歐盟安全暨防衛政策開始發展時，因為其中立傳統和與歐盟保持距離的歷史使瑞典在推動論述時有一定的困難，因為其他成員國認為瑞典只是想要削弱歐盟安全暨防衛政策的軍事發展腳步。而隨著歐盟安全暨防衛政策進程的發展，瑞典逐漸取得了歐盟安全暨防衛政策非軍事任務層面推動的先驅者角色。<sup>418</sup>

---

<sup>414</sup> The Council of the European Union, 2001. *Programme for the Prevention of Violent Conflict*, Göteborg, pp.5.

<sup>415</sup> Solana, J., (2004). A Tribute to Anna Lindh, in Anders Mellbourn(ed.), *Developing a Culture of Conflict Prevention*, Madariaga European Foundation, pp.10

<sup>416</sup> Eliasson, J., (2004). A Culture of Prevention—Sweden and Conflict Prevention, In Anders Mellbourn(ed.), *Developing a Culture of Conflict Prevention*, , Madariaga European Foundation, pp.41.

<sup>417</sup> Solana, J. (2004). A Tribute to Anna Lindh, pp.11

<sup>418</sup> Jonson, P. (2006).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uropean Security and Defence Policy* –

## 二、歐盟安全暨防衛政策的非軍事層面發展

歐盟安全暨防衛政策自 1999 年發展軍事層面能力以來，相對地非軍事層面 (Civilian dimension) 的發展比較不受到注意。瑞典推動危機處理與衝突預防實際上是延續著原本瑞典國內所支持的促進和平、遵守國際法與維持和平等外交政策方針。為了滿足上述目標，瑞典除了在歐盟安全暨防衛政策目標上推動衝突預防之外，也積極地推動歐盟安全暨防衛政策的非軍事層面。

瑞典在國內外交政策邏輯的驅使之下，以成立快速反應部隊滿足危機處理的需求為主要論述，並以 1999 年科索沃維和任務(KFOR)的案例中因國際法的被破壞使情況惡化的例子說明，除了快速反應的軍事能力之外，歐盟安全暨防衛政策的非軍事層面因素能使軍事任務更加有效率。<sup>419</sup>

瑞典等北歐國家認為歐盟安全暨防衛政策需要發展非軍事層面能力，作為輔助歐盟危機處理與衝突預防目標的資源和工具，也就是說歐盟在發展快速反應軍事能力的同時，非軍事層面的應對與後續處理能力也是歐盟安全暨防衛政策的重要面向。

根據吳萬寶的整理，歐盟安全暨防衛政策發展非軍事層面的目的在於確保歐盟安全暨防衛政策在執行軍事任務之後，避免衝突再度升高，而且在轉型期間確保任務目標當地的和平與穩定。也就是說，在歐盟執行軍事任務之後，以歐盟安全暨防衛政策擁有的非軍事層面能力與工具，來發揮補充與鞏固任務目標當地秩序與穩定的功能。

歐盟發展非軍事層面的能力目的在於在危機中拯救生命、維持秩序、避免情勢進一步升高、促進恢復至和平、穩定和可自我維持內部秩序的情勢，並且處理可能存在對歐盟國家不利的效應，與處理相關問題。<sup>420</sup> 歐盟追求在發展軍事能力

---

*An Assessment of Preferences, Bargains and Outcomes.* pp.94

<sup>419</sup> Jakobsen, P. V. (2009). *Small States, Big Influence: The Overlooked Nordic Influence on the Civilian ESDP.* pp.93.

<sup>420</sup> 吳萬寶，2009，《歐洲安全暨防衛政策與境外任務》，台北：天空數位圖書，頁 125。

的同時，注重非軍事層面的目的在於促進歐盟實現維持和平、危機管理與衝突預防的能力。

歐盟安全暨防衛政策的非軍事層面能力發展在 1999 年赫爾辛基高峰會上只出現了原則性的指示：「在與軍事性措施與資源並行之下，以協調和有效利用聯盟本身與會員國擁有之各類民事措施與資源。」<sup>421</sup>瑞典與芬蘭以科索沃的經驗作為推動非軍事層面發展的有力理由，讓成員國了解到單單發展歐盟安全暨防衛直政策的軍事面向是不足以應付發生的歐洲等地的軍事衝突，唯有以非軍事層面工具與能力建立和平與穩定局勢，才能達成歐盟保護人權、維持和平的目標。<sup>422</sup>

爾後，在費拉(Santa Maria da Feira)高峰會通過了「強化共同歐洲安全暨防衛政策」的主席結論報告，奠定了歐盟安全暨防衛政策的非軍事層面發展輪廓。<sup>423</sup>其中又以警察能力為首先的發展目標，主席結論報告中提出了「非軍事警察的具體目標」(concrete targets for civilian police)，表示由成員國提供警力支援，處理在歐盟安全暨防衛政策所執行的危機處理與衝突預防的任務中，可能出現的警力需求。目標在 2003 年時，能夠有 5000 位以上警力支援歐盟任務需求；且希望成員國發展出在 30 天內，能派遣 1000 名以上警力支援任務的快速反應能力。<sup>424</sup>

另外，歐盟也希望能夠發展出整合性的警察執行單位(Integrated Police Units, IPUs)，以面對混和軍事與非軍事兩種形態的任務中，可能出現的由軍事指揮過渡到非軍事警察維持穩定的情形。歐盟更希望發展具有豐富經驗的警察先遣小組，以評估非軍事警察任務的風險，且界定任務型態與程度，與規劃任務等工作。

425

---

<sup>421</sup> Presidency Conclusions Helsinki European Council 10 and 11 December 1999.

<sup>422</sup> Björkdahl, A. (2008), Norm advocacy: a small state strategy to influence the EU. pp.92.

<sup>423</sup> Presidency Conclusions Santa Maria da Feira European Council 19 and 20 June 2000.

<sup>424</sup> 請見 Presidency Conclusions Santa Maria da Feira European Council 19 and 20 June 2000., Appendix 4

<sup>425</sup> 張嘉斌，2009，〈論歐盟安全暨防衛政策非軍事工具之建構與發展〉，《歐洲國際評論》，第三期，頁 55-56。

瑞典在赫爾辛基高峰會中也成功地說服法國支持成立危機處理非軍事事項委員會(Committee for Civilian Aspects of Crisis Management, CIVCOM)負責非軍事層面安全事務。這說明了瑞典在推動非軍事層面上的努力與成果。

在瑞典任歐盟輪值主席國的 2001 年任期內，瑞典在哥特堡(Göteborg)高峰會中，對於歐盟安全暨防衛策略在非軍事層面上的發展，推動重要而且完善了非軍事層面工具與機構的發展。

根據哥特堡高峰會會議文件，哥特堡高峰會通過了一系列歐盟安全暨防衛政策非軍事能力的目標與具體計畫：包括了警察行動計畫(Police Action Plan)、強化法治、文人行政與市民保護的面向。強化法治是指地方制度與法治機關被武裝衝突所瓦解的地區，歐盟能夠請成員國階段性地提供相關專家與人員，幫助當地恢復一定程度的法治水準與秩序。

文人行政的目標是儘速幫助當地重新建立有運作能力的行政機關，並且由歐盟提供諮詢、訓練與監督執行的功能。最後是扮演人道協助角色的市民保護目標，重點在拯救與保護當地平民；然而這樣的能力必須有軍事面向的支援如運輸能力等相互支援，非軍事與軍事層面能力的相互配合也成為歐盟共同安全暨防衛政策發展的重點。<sup>426</sup>

因此瑞典在歐盟安全暨防衛政策與 2001 年擔任歐盟輪值國主席的過程中，除了持續推動衝突預防作為歐盟安全暨防衛政策的主要內涵之外，在歐盟安全暨防衛政策的能力與工具層面上，以發展非軍事能力補足了軍事能力在執行任務時所不能觸及的部份。此外瑞典在資源與財政上也貢獻了歐盟安全暨防衛政策非軍事層面最多的人員與財政上的支援。<sup>427</sup>

---

<sup>426</sup> Presidency Conclusions on the European Security and Defence Policy., Göteborg European Council 15.16 June 2001.

<sup>427</sup> Björkdahl, (2008), Norm advocacy: a small state strategy to influence the EU. pp94-96.

## 第四節 小結

本章針對瑞典中立外交政策與歐盟安全暨防衛政策之間的雙向歐洲化互動過程作研究。瑞典自二次大戰之前就開始了保持中立政策的傳統，中立政策與福利體制可以說是瑞典國家特色的重要組成部分。然而在後冷戰時期，國際環境的變遷，再加上瑞典面臨嚴重的經濟危機，瑞典有足夠的動機加入歐洲經濟統合。

然而在歐洲安全事務的統合過程中，瑞典政府受制於國內對於中立政策的強大支持，即使已經盡力淡化中立政策對於瑞典安全政策的影響，還有降低了以往瑞典中立政策限制瑞典參與國際安全事務的範圍，對於有可能走向共同防衛體的歐盟安全政策，瑞典的適應壓力仍然是非常大。

因此瑞典利用冷戰時代以來，瑞典在聯合國中活動所依恃的國際主義，在歐盟安全暨防衛發展過程中，極力地推動「衝突預防」的概念，並且不遺餘力地推動歐盟非軍事層面能力的發展。

因此即使瑞典的外交安全政策受到歐盟安全政策「下載」的政策影響，瑞典其實在歐盟安全暨防衛政策發展過程中，也「上傳」了一部分國家安全政策偏好，試圖降低瑞典適應歐盟安全政策對瑞典造成的適應壓力。本文認為這是成員國對於歐盟形成下載壓力的同時，以主動的態度(pace-setting)預先上傳了國家的偏好，使得成員國的適應壓力變小，讓成員國更易於適應歐盟政策的影響。

此外，政治菁英的社會化也造成了瑞典政治菁英對於國家安全認同更偏向於歐盟的安全認同。參與歐盟任務和歐盟輪值主席國的經驗對於瑞典政府和政治菁英而言，促使他們有站在歐盟角度思考的經驗。經過了這一過程的洗禮，使瑞典安全認同融合了原有的國際主義，再加上對於歐盟整體安全事務的關切，瑞典實質上已經拋棄了中立政策，而朝向以歐盟與瑞典國家安全並重的安全思維。

## 第六章 結論

### 第一節 研究回顧

本文以瑞典的歐洲化研究為目標，討論瑞典在 1995 年加入歐盟之後，在歐洲聯盟內部面對來自於歐盟層面的歐洲化壓力，瑞典是如何因應，並且在歐盟決策的階段即上傳國家偏好到歐盟政策的過程。

歐洲化研究代表了一種由歐盟政策所引發對成員國政策的適應壓力，依據個成員國固有政策邏輯與歐盟政策的差異，會對不同成員國帶來不同程度的適應壓力。再加上經濟因素、政策軌跡與傳統國家論述等不同的中介因素影響，因此會形成各成員國國內政治制度不同的變遷程度。

而當成員國在適應過程中體認到，要適應歐盟政策有時候會付出相當大的代價，例如財政上，或是國內民意的反對等。對於成員國而言，當這些代價大過於適應歐盟政策所能帶來的益處的時候，成員國有可能會採取拖延的態度，或者是在歐盟政策產出的決策過程中試圖影響政策的內容，盡可能地降低適應成本。

在本文中，歐洲化被視為一種歐盟與成員國雙向互動的過程。由歐盟往成員國方向的影響會帶來成員國內政府制度與部門權力間的變化，並且極有可能會根本地改變原本存在於成員國內傳統的政策邏輯。同樣地，成員國為了避免國家適應歐盟政策的結果是帶來龐大的財政或政治成本，成員國也會試圖由下而上地上傳國家政策的偏好至歐盟層面。

本文選擇了瑞典為研究的對象。瑞典加入歐洲聯盟約十餘年的時間，在歐盟政策的適應上有較 2000 年後加入的新成員國足夠的資料可供研究。此外瑞典加入歐盟的動機，一般來說較偏向於經濟的因素。完善的社會福利體制是瑞典引以為傲的成就之一。自二戰結束以來，瑞典發展出了令人欽羨的社會福利模式。瑞典福利模式包含了幾個相當重要的因素

：雷恩模式、團結工資政策與積極性勞動市場政策。這些綜合了經濟、勞資關係與就業政策等的策略為瑞典打造出了名聞遐邇的瑞典社會福利模式。

而本文在第四章要討論的瑞典積極性勞動市場政策作為瑞典社會福利模式的基礎之一，在歐洲相當地先進於其他國家的就業政策。因此當瑞典加入歐盟之後，為了擴大瑞典在歐盟事務的影響力，積極地在歐盟層面推動社會政策統合的發展。瑞典在阿姆斯特丹條約之前，積極地運用倡導聯盟的力量在歐盟層面推動將就業政策加入到正式的歐盟條約之中，並且推動了歐盟就業策略的發展。

歐盟就業策略另外一個特色就是開放協調法的運用，透過軟性治理的國家行動計畫與歐盟執導原則，使得成員國自願地跟隨歐盟政策的腳步逐步地改變國內政策，朝與歐盟政策會合的方向邁進。

瑞典在上傳了就業政策的偏好之後，因此受到歐盟的影響相對地很小。發生這樣的情形是因為瑞典已經預先上傳了國家政策偏好，因此受到的適應壓力降到最低，才會發生沒有受到顯著影響的結果。然而瑞典在政府部門之間、政府與社會夥伴間的關係也會受到一些影響。大致來說，歐盟就業策略發展的邏輯與瑞典積極性勞動市場政策的邏輯是相當符合與類似的。

瑞典自二戰結束之後，瑞典具有堅定的外交中立政策傳統：戰時中立，並在承平時堅守不結盟的立場，更以強大的武力作為中立政策的後盾。在瑞典國內，中立政策受到許多人民的擁護。瑞典民意十分排斥瑞典有可能加入以西歐國家為主的軍事聯盟，他們認為這會破壞了瑞典處於美蘇兩強間的平衡態勢，而在冷戰期間危害瑞典的安全。

而這一點在冷戰結束之後，瑞典又因經濟因素而加入歐盟之後，就面臨了嚴峻的挑戰。瑞典一方面要在加入歐盟之後配合歐洲聯盟的要求，另一方面也要抵擋來自國內對於瑞典政府加入歐盟之後，可能放棄中立政策的質疑與懷疑聲浪。

因此瑞典在 1990 年代前期，在比爾特政府的努力之下，將中立政策的傳統淡化為僅在軍事上不結盟的立場，改變了以往瑞典保持完全中立的路線。

歐盟安全暨防衛政策的發展原本以共同防衛為主要發展方向。對瑞典來說在

國內強力支持軍事不結盟立場情形下，歐盟安全暨防衛政策的發展為瑞典帶來了極大的適應壓力。

一旦瑞典接受了這樣的歐盟安全政策，在國內會遭受到極大的反彈，政治成本的代價使瑞典必須尋求上傳國家偏好，亦即以衝突預防概念為主的維和任務作為歐盟安全暨防衛政策的主要目標。

衝突預防的概念與瑞典國際主義有很大的關聯。瑞典國際主義來自於社會福利體制中「均富」、「正義」與「公平」的概念，再加上北歐社會中固有「團結」概念的影響，因此瑞典在冷戰時代裡就積極地參與聯合國維和任務、提供海外發展援助等，試圖在國際社會裡追求正義，與公平的理念。

聯合國維和任務的經驗也為瑞典帶來了國際聲望，瑞典為了升高在歐盟的影響力，因此在歐盟安全事務發展過程中，極力地推動衝突預防作為歐盟安全暨防衛政策的政策目標。這樣的作法一方面使得歐盟安全政策的發展符合了以往瑞典的外交安全政策邏輯，另一方面藉著主動推動國際法規範、和平與人權的理念，瑞典提高了在歐盟安全事務的影響力，也能夠擺脫不情願與消極(*reluctant*)的負面形象，轉變為主動積極的角色。

因此瑞典在歐盟推動衝突預防的概念，成功地將彼得斯堡任務納入阿姆斯特丹條約與歐盟安全暨防衛政策的發展，作為歐盟安全政策發展初期的主要目標。另外在歐盟非軍事能力層面的發展，瑞典也貢獻了一臂之力，達成了上傳國家政策偏好的目的。

除此之外，瑞典除了在歐盟政策發展過程當中上傳了國家的偏好。在擔任歐盟輪值主席國任期內，也是瑞典繼續地上傳偏好的絕佳時機。例如歐盟非軍事層面能力的發展，在瑞典主席國任期內取得了顯著的發展即是一例。

輪值主席國除了使瑞典有能力影響歐盟政策發展之外，實際上也能夠影響瑞典政府菁英對於歐盟的看法。瑞典在加入歐盟之後，由國防目標與軍力配置可以了解到瑞典受到歐盟的影響逐漸地將純粹國家安全的概念擴大到以歐盟為主體的地區安全概念。進一步地，瑞典輪值主席國的經驗提供了瑞典政府菁英站在整



體歐洲聯盟角度思考的機會。這樣的經驗有助於瑞典政治菁英對於地區安全認同的轉換，達到了使瑞典在歐盟內部類似於「社會化」的效果。

歐洲化研究承繼上一代的歐洲統合研究而來，目的在於檢視成員國加入歐洲聯盟之後，對於歐盟政策的接受與被影響的程度。本文的研究問題為當歐洲化研究出現之後，為了更加地了解歐洲化研究的內涵與發展，因此選擇了以案例研究的方式來討論歐盟與成員國之間的歐洲化過程。本文關於瑞典之歐洲化研究說明了歐洲化作為一種成員國與歐盟之間的雙向互動過程，將重點放置在國家層面討論成員國的適應與回應。

本文討論瑞典政策歐洲化過程的結果，說明了成員國在加入歐盟之後，還是以國家利益作為優先考量，成員國政府傾向於優先考慮到國內適應的成本與民意的反應，而非以歐盟整體的利益為主要考量。

瑞典在與歐盟互動的過程，選擇上傳偏好的理由是基於工具性利益。瑞典上傳了衝突預防的概念，是因為這項概念與原有的國家外交安全政策並不衝突；而推動就業政策領域的發展，是基於瑞典作為一擁有強大社會福利制度的國家，為了彰顯瑞典在社會福利政策的領導角色，以及最小化國家適應歐盟政策的考量。

然而隨著加入時間越久，與歐盟互動交往得越深，成員國由政治菁英開始是的確有產生認同轉變的可能性，如第四章討論的瑞典政治菁英安全認同的轉變。在本文的討論中，輪值主席國的經驗也是一個很好的機會，但是這樣的轉變需要更長的一段時間或適當的機會才有可能發生。

歐洲統合由二戰後發展至今，成員國數量的擴大為歐洲統合提供了一個良好的開始。但是在成員國加入之後，由於歐洲聯盟並非真正地存在一個中央政府，在各國政府各自行動的基礎下，成員國要在政治統合與經濟統合之外，進一步培養對於歐洲聯盟的認同，還需要一段相當長的時間。

儘管如此，本文認為也是因為歐盟並不存在著中央政府，而且也不拘泥於硬性法治理的途徑，也發展出如第五章討論的開放協調法等軟性治理方法，才能夠

在不招致成員政府的極力反彈之下，一步步地達成統合的目標。例如瑞典也曾經受到歐盟的建議改善稅制，雖然建議(Recommendation)不具有實質的法律效力，然而瑞典在一兩年後仍然按照了歐盟當初的建議而改善國內稅制。雖然在接收到建議的當下瑞典並無實際行動，但是瑞典在之後稅制的改革過程中，也願意採納歐盟的建議方向而進行改革。

在討論過瑞典與歐盟雙向影響的過程之後，對於歐洲化與歐洲統合間的關係可以被視為歐洲化研究討論了歐盟與成員國之間的雙向互動過程，在了解了成員國的歐洲化過程之後，有助於釐清歐洲統合發展的瓶頸和優勢，而進一步地為歐洲統合的方向與步伐做調整與評估。

## 第二節 研究展望

本文針對瑞典加入歐盟之後的十年間，即 1995-2005 年間，針對外交政策與就業政策的歐洲化研究進行研究與討論。限於研究篇幅，在此研究過程中，有許多力有未逮之處，希望之後的研究者能夠進行補充，使瑞典與歐盟之間的雙向歐洲化過程能夠更加完整。

此外，當歐洲的經濟統合與政治統合到達了一定程度之後，為了進一步深化與廣化歐洲統合的幅度，成員國內部對於歐洲聯盟的認同也須被注重，以及積極地培養。本文在討論瑞典之歐洲化議題時，著重在政府菁英的作為以及對於歐洲聯盟的觀點上，對於國內民意對於歐洲聯盟發展的看法，並未多加探究。

因此未來研究的可行方向為討論成員國和歐盟互動的過程之外，也討論這樣雙向的互動過程是否有助於歐洲集體認同的發展。當歐洲統合發展的議題越廣，或是觸及的政治相關議題越深化，需要發展歐洲集體認同來消除民族國家間的界線與距離，使歐洲朝向更緊密的方向邁進。

# 參考文獻

## 壹、西文部分：

- Agius, C. (2006).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Swedish neutrality : challenges to Swedish identity and sovereignty*. Manchester ::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 Anderson, J. (2002). *Globalization and Europeanization: A Conceptual and Theoretical Overview*. Paper presented at the Germany and Europe: A Europeanized Germany?
- Anderson, J. J. (2007). Denationalisation of Defence. In J. H. Matlary (Ed.), *convergence and diversity* Burlington, VT : Ashgate Pub.
- Andersson, J. (2007). A New Swedish Defence for a Brave New World. In J. H. Matlary (Ed.), *Denationalisation of defence : convergence and diversity*: Aldershot, England ; Burlington, VT : Ashgate Pub.
- Ashiagbor, D. (2005). *The European employment strategy : labour market regulation and new governanc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Aspinwall, M., & Schneider, G. (2001). *The rules of integration : institutional approaches to the study of Europe*.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 Bache, I., & George, S. (2006). *Politics in the European Union* (2nd ed.). Oxford, [U.K.];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Bache, I., & Marshall, A. (2004). Euroeanisation and Domestic Change: A Governance Approach to Institutional Adaptation in Britain. *Queen's Papers on Europeanisation*, 4, 1-17.
- Baldwin, P. (1990). *The politics of social solidarity : class bases of the European welfare state, 1875-1975*. New York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Banus, E. (2002). Cultural Policy in the EU and the European Identity. In M. Farrell, Stefano Fella and Michael Newman (Ed.), *European integration in the 21st century - unity in diversity?* (pp. 158-183). Thousand Oaks, Calif. :: SAGE Publications.

- Beck, U., & Grande, E. (2007). Cosmopolitanism: Europe's Way Out of Crisis.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Theory*, 10(1), 67-85.
- Beichelt, T. (2008). Dimensions of Europeanisation In T. B. François Bafoil (Ed.), *Européanisation. D'Ouest en Est L'Harmattan* Frankfurt/Oder Logiques Politiques
- Bergman, A. (2004). *Post-Cold War Shifts in Swedish and Finnish Security Policies: The compatibility of non-alignment and participation in EU led conflict prevention* Paper presented at the The European Union and Conflict Resolution
- Bergman, A. (2007). Co-Constitution of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Welfare Obligations: The Case of Sweden's Social Democratically Inspired Internationalism. *Cooperation and Conflict* 42(1), 73-99.
- Bergmark, Å. (2000). Solidarity in Swedish Welfare – Standing the Test of Time? *Health Care Analysis*, 8(4), 395-411.
- Bieler, A. (2000). *Globalisation and enlargement of the European union: Austrian and Swedish social forces in the struggle over membership*: Routledge.
- Björkdahl, A. (2002). *From Idea to Norm – Promoting Conflict Prevention*. Lund: Lund University Press.
- Bjorkdahl, A. (2007). Constructing a Swedish Conflict Prevention Policy Based on a Powerful Idea and Successful Practice. *Cooperation and Conflict*, 42(2), 169-185.
- Björkdahl, A. (2008). Norm advocacy: a small state strategy to influence the EU. *Journal of European Public Policy*, 15, 135-154.
- Bjurulf, B. (2001). How did Sweden Manage the European Union? *Center for the European Intergartion Studies*, C96, 1-29.
- Borneman, J., & Fowler, N. (1997). Europeanization. [Article].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26, 487.
- Borrás, S., & Jacobsson, K. (2004). The Open Method of Co-ordination and New Governance Patterns in the EU. *Journal of European Public Policy*, 11(2), 185-208.
- Börzel, T. (2002). Pace-Setting, Foot-Dragging, and Fence-Sitting: Member State Responses to Europeanization. *Journal of Common Market Studies*, 40(2),

193-214.

- Börzel, T. A., & Risse, T. (2003). Conceptualizing the Domestic Impact of Europe. In K. Featherstone & C. M. Radaelli (Eds.), *The Politics of Europeanization* (pp. 57-82).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Börzel, T., & Risse, T. (2000). When Europe Hits Home: Europeanization and Domestic Change *European Integration online Papers (EIoP)*, 4(15), 1-24.
- Braun, M. (2008). Talking Europe – the Dilemma of Sovereignty and Modernization. *Cooperation and Conflict*, 43, 397-420.
- Browning, C. S. (2006). Small, Smart and Salient? Rethinking Identity in the Small States Literature. [Article]. *Cambridg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19, 669-684.
- Browning, C. S. (2007). Branding Nordicity: Models, Identity and the Decline of Exceptionalism. *Cooperation and Conflict*, 42(1), 27-51.
- Browning, C. S., & Joenniemi, P. (2004). Regionality Beyond Security? The Baltic Sea Region after Enlargement. [Article]. *Cooperation & Conflict*, 39, 233-253.
- Bruno, I., Jacquot, S., & Mandin, L. (2006). Europeanization through its instrumentation: benchmarking, mainstreaming and the open method of co-ordination ... toolbox or Pandora's box? [Abstract]. *Journal of European Public Policy*, 13, 519-536.
- Bull, H., (1984). *Justice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Hagey Lectures*. Waterloo, Ontario:University of Waterloo Press.
- Buller, J., & Gamble, A. (2002). Conceptualising Europeanisation. *Public Policy and Administration*, 17(2), 4-24.
- Bulmer, S., & Burch, M. (1998). Organizing For Europe: Whitehall, The British State And European Union. *Public Administration*, 76(4), 601-628.
- Carlsson, I. (2007). *What is Social Democracy?* Stockholm: Arbetarrörelsens Tankesmedja and the publishing house Idé och Tendens.
- Cowles, M. G. (2001). *Transforming Europe*. Ithaca, N.Y. :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Delanty, G. (2002). Models of European Identity: Reconciling Universalism and Particularism. [Article]. *Perspectives on European Politics & Society*, 3, 345-359.

- Delanty, G. (2005). The Idea of a Cosmopolitan Europe: On the Cultural Significance of Europeanization. [Article].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Sociology*, 15, 405-421.
- Delanty, G. (2007). European Citizenship: A Critical Assessment. [Article]. *Citizenship Studies*, 11, 63-72.
- Delanty, G., & Rumford, C. (2005). Theorizing Europeanization: towards a constructivist theory of society *Rethinking Europe : social theory and the implications of Europeanization* (pp. 1-27).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 Dell'Olio, F. (2005). *The Europeanization of citizenship*. Burlington, VT : Ashgate.
- Dohlman, E. (1989). *National welfare and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 the case of Sweden's foreign trade polic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Dohlman, E. (1989). *National welfare and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the case of Sweden's foreign trade polic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Dwan, Renata, (2004). Civilian tasks and capabilities in EU operations, *Paper commissioned by the Study Group on Europe's Security Capabilities,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 Centre for the Study of Global Governance*
- Dyson, K. (2000). EMU as Europeanization: Convergence, Diversity and Contingency. *Journal of Common Market Studies*, 38(4), 645-666.
- Dyson, K., & Featherstone, K. (1999). *The Road To Maastricht: Negotiating Economic and Monetary Un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Dyson, K., & Goetz, K. (2003). Europeanization in Context: Concept and Theory. In K. Dyson & K. Goetz (Eds.), *Germany, Europe, and the politics of constraint* (pp. 37-53). New York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Earles, K. (2004). *Policy Feedback in the Reregulation of the Swedish Welfare State*. Paper presented at the CPSA ANNUAL CONFERENCE.
- Eliasson, J. (2004). Traditions, Identity and Security: the Legacy of Neutrality in Finnish and Swedish Security
- Erixon, L. (2008). The Swedish third way: an assessment of the performance and validity of the Rehn–Meidner model. *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 32(3), 367-393.
- Esping-Andersen, G. (1990). *The three worlds of welfare capitalism*. Cambridge, UK :: Polity Press.

- Fairbrass, J. (2003). The Europeanization of Business Interest Representation: UK and French Firms Compared. *Comparative European Politics*, 1(3), 313-334.
- Ferreira-Pereira, L. C. (2004). The Militarily Non-Allied States in the CFSP of the 1990's. *European Integration online Papers (EIoP)*, 8(3), 1-14.
- Ferreira-Pereira, L. C. (2005). The Militarily Non-Allied States in the Foreign and Security Policy of the European Union: Solidarity 'ma non troppo'.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European Studies*, 13(1), 21-37.
- Ferrera, M. (2005). *The boundaries of welfare*. Oxford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Fraser, N. (1999). How Strong is the Case for Targeting Active Labour Market Polici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anpower*, 20(3/4), 151-164.
- Goldmann, K. (1991). The Swedish model of security policy. *West European Politics*, 14(3), 122 - 143.
- Gould, A. (1999). The erosion of the welfare state: Swedish social policy and the EU. *Journal of European Social Policy*, 9(2), 165.
- Graziano, P., & Vink, M. P. (2007). *Europeanization : new research agendas*. Basingstoke;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 Gst̄ohl, S. (2002). Scandinavia and Switzerland: small, successful and stubborn towards the EU. *Journal of European Public Policy*, 9(4), 529–549.
- Gustavsson, J. (1998). *The Politics of Foreign Policy Change. Explaining the Swedish Reorientation on EC Membership* Lund University Press.
- Hall, P., & Taylor, R. (1996). Political Science and the Three New Institutionalism. *Political Studies*, 44(5), 936-957.
- Hansen, W. (2007). EU-UN Cooperation in Peace Operations: Chances, Concepts and Constraints. In H.-G. Ehrhart (Ed.), *Die Europäische Union im 21. Jahrhundert* (pp. 238-248): VS Verlag für Sozialwissenschaften.
- Haverland, M. (2005). Does the EU cause domestic developments? The problem of case selection in Europeanization research *European Integration online Papers (EIoP)*, 9(2).
- Heidenreich, M. (2006). The Europeanization of Solidarity: Between Global Markets, N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European Regulations. *Globality Studies Journal : Global History, Society, Civilization*(2).

- Heidenreich, M., Bischoff, Gabriele. (2008). The Open Method of Co-ordination: A Way to the Europeanization of Social and Employment Policies? *Journal of Common Market Studies*, 46(3), 497-532.
- Herman, S. R. (1998). The Woman inside the Negotiations: Alva Myrdal's Campaign for Nuclear Disarmament, 1961-1982. *Peace & Change*, 23(4), pp. 514-530.
- Herolf, G. (2007). Sweden and ESDP. In K. Brummer (Ed.), *The North and ESDP-The Baltic States, Denmark, Finland and Sweden* (pp. 45-58): Bertelsmann Stiftung.
- Hettne, B. (2002). The Europeanisation of Europe: Endogenous and Exogenous Dimensions. *Journal of European Integration*, 24, 325-340.
- Hix, S., & Goetz, K. H. (2000). Introduction: European Integration and National Political Systems. *West European Politics*, 23(4), 1-26.
- Howell, K. E. (2004). Developing Conceptualisations of Europeanization: Synthesising Methodological Approaches. *Queen's Papers on Europeanization* 3.
- Huber, E. (2001). *Development and crisis of the welfare state*. Chicago :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Hvinden, B., & Johansson, H. (2007). *Citizenship in Nordic welfare states : dynamics of choice, duties and participation in a changing Europe*.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 Ingebritsen, C. (2002). Norm Entrepreneurs: Scandinavia's Role in World Politics. *Cooperation and Conflict*, 37(1), 11-23.
- Jacobsson, K. (2005). Trying to reform the "best pupils in class"? The Open Method of Coordination in Sweden and Denmark. In J. Zeitlin, P. Pochet & L. Magnusson (Eds.), *The open method of co-ordination in action : the European employment and social inclusion strategies* (pp. 107-136). New York: P.I.E.-Peter Lang.
- Jacobsson, K., & Johansson, H. (2009). The micro-politics of the open method of coordination : NGOs and the social inclusion process in Sweden In M. Heidenreich & J. Zeitlin (Eds.), *Changing European employment and welfare regimes : the influence of the open method of coordination on national reforms* (pp. 173-191). New York: Routledge.
- Jacobsson, K., & Schmid, H. (2002). Real Integration or just Formal Adaptation? On



-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National Action Plans for Employment. In C. d. La Porte & P. Pochet (Eds.), *Building social Europe through the open method of co-ordination* (pp. 71-98).. New York: P.I.E.-Peter Lang.
- Jacobsson, K., & Vifell, Å. (2007). New Governance Structures in Employment Policy Making – Taking Stock of the European Employment Strategy. In I. Linsenmann, C. O. Meyer & W. Wessels (Eds.), *Economic government of the EU : a balance sheet of new modes of policy coordination*(pp. 53-71).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 Jakobsen, P. V. (2006). The old Nordic model : peacekeeping during the Cold War (1947-1987) *Nordic approaches to peace operations: a new model in the making?* 10-45: Routledge.
- Jakobsen, P. V. (2009). Small States, Big Influence: The Overlooked Nordic Influence on the Civilian ESDP. *JCMS: Journal of Common Market Studies*, 47(1), 81-102.
- Jenson, J., & Pochet, P. (2002). Employment and Social Policy since Maastricht: Standing up to the European Monetary Union. *Nanovic Institute for European Studies*, 1-32.
- Jiménez, A. M. R. (2004). European and National Identities in the EU's Old and New Member States: Ethnic, Civic, Instrumental and Symbolic Components *European Integration online Papers (EIoP)*, 8(11), 1-37.
- Johansson, E. (1997). The Role of Peacekeepers in the 1990s: Swedish Experience in UNPROFOR. *Armed Forces & Society*, 23(3), 451-465.
- Johansson, K. M. (1999). Tracing the employment title in the Amsterdam treaty: uncovering transnational coalitions. *Journal of European Public Policy*, 6(1), 85-101.
- Johler, R. (2002). The EU as Manufacturer of Tradition and Cultural Heritage. In U. Kockel (Ed.), *Culture and economy : contemporary perspectives* (pp. 221-230). Aldershot, Hampshire, England ; Burlington, VT, USA: Ashgate.
- Johnson, A. M. (2005). *European welfare states and supranational governance of social policy*.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in association with St. Antony's College Oxford.
- Jordana, J., Levi-Faur, D., & Puig, I. (2006). The Limits of Europeanization: Regulatory Reforms in the Spanish and Portuguese Telecommunications and

- Electricity Sectors. [Article]. *Governance*, 19, 437-464.
- Jupille, J., & Leblang, D. (2007). Voting for Change: Calculation, Community, and Euro Referendums. [Articl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61, 763-782.
- Karvonen, L., & Sundelius, B. (1996). The Nordic Neutrals: Facing the European Union. In L. Miles (Ed.), *The European Union and the Nordic countries* (pp. 243-259): Routledge.
- Kluve, J. (2007). *Active Labor Market Policies in Europe: Performance and Perspectives*: Berlin, Heidelberg : Springer-Verlag Berlin Heidelberg.
- Knill, C., & Lehmkuhl, D. (1999). How Europe Matters. Different Mechanisms of Europeanization *European Integration online Papers (EIoP)*, 3, 1-20.
- Knill, C., & Lehmkuhl, D. (2002). The national impact of European Union regulatory policy: Three Europeanization mechanisms.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Research*, 41(2), 225-280.
- Kohler-Koch, B., Eising, Rainer. (1999). *The transformation of governance in the European Union*.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 Kuisma, M. (2007). Social Democratic Internationalism and the Welfare State After the 'Golden Age'. *Cooperation and Conflict*, 42(1), 9-26.
- Kun, Q. (2005). Nordic Identity in the Post Cold War Time- New Challenges and New Opportunities. *The Department of European Studies*, 1-90.
- Laatikainen, K. V. (2003). Norden's Eclipse: The Impact of the European Union's Common Foreign and Security Policy on the Nordic Group in the United Nations. *Cooperation and Conflict*, 38(4), 409-441.
- Ladrech, R. (1994). Europeanization of Domestic Politics and Institutions: The Case of France. *Journal of Common Market Studies*, 32(1), 69-88.
- Læg Reid, P. (2000). Europeanization and Domestic Administrative Response. *ARENA seminar*, 1-31.
- Læg Reid, P. (2004). Europeanization of Central Government Administration in the Nordic States. *Journal of Common Market Studies*, 42(2), 347-369.
- Lee-Ohlsson, F. (2009). Swede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European Security and Defence Policy. *Cooperation and Conflict*, 44(2), 123-142.
- Lightfoot, S. (2005). *Europeanizing social democracy? : the rise of the Party of*

- European Socialists*. New York: Routledge.
- Lindahl, R., & Naurin, D. (2005). Sweden: The twin faces of a euro-outsider. [Article]. *Journal of European Integration*, 27, 65-87.
- Lindal, R. (1996). The Swedish Debate, in F. Algieri, H. Grabbe, K. Hughes *et al.* (eds) *The 1996 IGC – National Debates (2) : Germany, Spain, Sweden and the UK*. London,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37-50.
- López-Santana, M. (2003, 2004/09/02/2004 Annual Meeting, Chicago, IL). *Soft Europeanization?: The Influence of The European Employment Strategy in Processes and Employment Policies in EU Member State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Conference Papers --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 López-Santana, M. (2006). The domestic implications of European soft law: Framing and transmitting change in employment policy. *Journal of European Public Policy*, 13(4), 481-499.
- López-Santana, M. (2007). Soft Europeanisation? How the Soft Pressure from Above Affects the Bottom (Differently): The Belgian, Spanish and Swedish Experiences. *Max Weber Programme, EUI Working Papers*.
- López-Santana, M. (2009). Soft Europeanization? The differential influence of European Employment Strategy in Belgium, Spain and Sweden. In M. Heidenreich & J. Zeitlin (Eds.), *Changing European employment and welfare regimes : the influence of the open method of coordination on national reforms* (pp. 134-153). New York: Routledge.
- Lovbraek, A., (1990). International Reform and the LikeMinded Countries. In C. Pratt (Ed.) *Middle power internationalism: the north-south dimension* (pp. 24-68): McGill-Queen's Press
- Mair, P. (2004). The Europeanization dimension. *Journal of European Public Policy*, 11(2), 337-348.
- Martinsen, D. S. (2005). The Europeanization of Welfare - The Domestic Impact of Intra-European Social Security. [Article]. *Journal of Common Market Studies*, 43, 1027-1054.
- Mastenbroek, E., Michael Kaeding. (2006). Europeanization Beyond the Goodness of Fit: Domestic Politics in the Forefront1. *Comparative European Politics*, 4(4), 331-354.
- Meidner, R. (2002). Why did the Swedish Model Fall? In D. Coates (Ed.), *Models of*

- Capitalism: Debating Strengths and Weaknesses* (pp. 211-228).
- Miles, L. (1997). *Sweden and European integration*. Aldershot: Ashgat.
- Nygård, M. (2006). Welfare-Ideological Change in Scandinavia: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Partisan Welfare State Positions in Four Nordic Countries, 1970-2003. *Scandinavian Political Studies*, 29(4), 356-385.
- Ojanen, H. (2000). Participation and Influence: Finland, Sweden and the post-Amsterdam Development of the CFSP. *EU-ISS Occasional Paper*, 11.
- Olsen, G. M. (2007) Toward Global Welfare State Convergence? Family Policy and Health Care in Sweden, Canada and the United States, *Journal of Sociology & Social Welfare*, 34 (2), 143-164.
- Olsen, J. P. (2002). The Many Faces of Europeanization. *Journal of Common Market Studies*, 40(5), 921-952.
- Østergård, Uffe. (1997). The Geopolitics of Nordic Identity—From Composite States to Nation-states. *Historical Journal*, pp. 25–71.
- Palier, B. (2004). *The Europeanisation of Welfare Reform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Cost Conference.
- Parker, N. (2002). Differentiating, Collaborating, Outdoing: Nordic Identity and Marginality in the Contemporary World. *Identities: Global Studies in Culture and Power*, 9(3), 355 - 381.
- Persson, T. (2007). Explaining european union adjustments in sweden's central administration. *Scandinavian Political Studies*, 30(2), 204-228.
- Pirozzi, Nicoletta, (2009). Military and Civilian ESDP Missions: Ever Growing and Effective?, *Documenti IAI – Istituto Affari Internazionali*, No 0929.
- Policies in Light of European Integration. *European Integration online Papers (EIoP)*, 8, 1-14.
- Pratt, C. (1990). Middle Power Internationalism and Global Poverty. In C. Pratt (Ed.), *Middle power internationalism: the north-south dimension* (pp. 3-24): McGill-Queen's Press.
- Pratt, C. (1990). Middle Power Internationalism and Global Poverty. In C. Pratt (Ed.), *Middle power internationalism: the north-south dimension* (pp. 3-24): McGill-Queen's Press.

- Quille, G. (2006). The impact of EU capability targets and operational demands on defence concepts and planning In A. J. K. Bailes, G. Herolf & B. Sundelius (Eds.), *The Nordic countries and the European security and defence policy* (pp. 119-140). New York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Radaelli, C. M. (2000). Whither Europeanization? Concept stretching and substantive change *European Integration online Papers (EIoP)*, 4(8), 1-28.
- Radaelli, C. M. (2004). Europeanisation: Solution or problem? . *European Integration online Papers (EIoP)*, 8, 1-26.
- Radaelli, C. M., R.Pasquier. (2007). Conceptual Issues. In P. Graziano & M. P. Vink (Eds.), *Europeanization : new research agendas*.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 Raveaud, G. (2007). The European Employment Strategy: Towards More and Better Jobs? *Journal of Common Market Studies*, 45(2), 411-434.
- Rehn, G. (1985). Swedish Active Labor Market Policy: Retrospect and Prospect. *Industrial Relations: A Journal of Economy and Society*, 24(1), 62-89.
- Rieker, P. (2004). Europeanization of Nordic Security: The European Union and the Changing Security Identities of the Nordic States. *Cooperation & Conflict*, 39, 369-392.
- Rieker, P. (2006). Sweden-Teacher and Pupil. In P. Rieker (Ed.), *Europeanization of national security identity- the EU and the changing security identities of the Nordic states* (pp. 63-89). London :: Routledge.
- Riel, B. v., & Meer, M. v. d. (2002). The advocacy coalition for European employment policy – The European integration process after EMU. In H. Hegmann & B. Neumaerker (Eds.), *Die Europäische Union aus politökonomischer Perspektive Metropolis Verlag*.
- Risse, T. (2001). A European Identity? Europeanization and the Evolution of Nation-State Identities. In M. G. Cowles (Ed.), *Transforming Europe-Europeanization and domestic change* (pp. 198-216). Ithaca, N.Y. ::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Rnberg, J. C. (2008). The Europeanization of Swedish alcohol policy: the case of ECAS. [Article]. *Journal of European Social Policy*, 18, 380-392.
- Rumford, C. (2005). Cosmopolitanism and Europe. *Innovation: The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s*, 1-9.

- Rumford, C. (2007). Does Europe Have Cosmopolitan Borders? *Globalizations*, 4, 327-339.
- Salais, R. (2001). Filling the Gap Between Macroeconomic Policy and Situated Employment: A Hidden Agenda for Europe In L. Magnusson & B. Stråth (Eds.), *From the Werner Plan to the EMU : in search of a political economy for Europe* (pp. 413-447). Oxford: Peter Lang.
- Sassatelli, M. (2007). The Arts, the State, and the Eu: Cultural Policy in the Making of Europe. *Social Analysis*, 51, 28-41.
- Sassatelli, M. (2008). European Cultural Space in the European Cities of Culture. *European Societies*, 10, 225-245.
- Schäfer, A. (2004). Beyond the Community Method: Why the Open Method of Coordination Was Introduced to EU Policy-making. *European Integration online Papers (EIoP)*, 8(13), 1-19.
- Scharpf, F. W., & Schmidt, V. A. (2000). *Welfare and work in the open economy*. Oxford ;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Schmidt, V. A. (2001). Europeanization and the Mechanics of Economic Policy Adjustment *European Integration online Papers (EIoP)*, 5, 1-24.
- Schmidt, V. A., & Radaelli, C. M. (2004). Policy Change and Discourse in Europe: Conceptual and Methodological Issues *West European Politics*, 27(2), 183-210.
- Schneider, V., Häge, Frank M. (2008). Europeanization and the retreat of the state. *Journal of European Public Policy*, 15, 1-19.
- Sianesi, B. (2002). Swedish active labour market programmes in the 1990s: Overall effectiveness and differential performance. *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 and Institute for Fiscal Studies*, 1-30.
- Sift, S., BRÜGGEMANN, M., Peters, B., & Wimmel, A. (2007). Segmented Europeanization: Exploring the Legitimacy of the European Union from a Public Discourse Perspective. *Journal of Common Market Studies*, 45, 127-155.
- Smith, Michael E., (2004). *Europe's Foreign and Security Policy: 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Cooperation*, U. 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Stenberg, S.-A. (1998). Unemployment and Economic Hardship: A Combined Macro-

- and Micro-Level Analysi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Unemployment and Means-Tested Social Assistance in Sweden. *European Sociological Review*, 14(1), 1-13.
- Strang, B. (2007). Winds of Change: The Europeanization of National Foreign Policy. *Maastricht European Studies Papers*, 1, 1-24.
- Stromvik, M. (2006). Starting to 'think big' : the Nordic countries and EU peace-building. In A. J. K. Bailes, G. Herolf & B. Sundelius (Eds.), *The Nordic countries and the European security and defence policy* (pp. 199-214). New York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Tallberg, J. (2003). The agenda-shaping powers of the EU Council Presidency. *Journal of European Public Policy*, 10(1), 1 - 19.
- Taylor-Gooby, P. (2004). *New risks, new welfare*. New York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Taylor-Gooby, P. (2005). *Ideas and welfare state reform in Western Europe*. New York : Palgrave Macmillan.
- Tepe, F. F. (2007). Swedish Neutrality and its Abandonment. *istanbul Ticaret Üniversitesi Sosyal Bilimler Dergisi*, 6(11), 183-201.
- Trägårdh, L. (2002). Sweden and the EU: Welfare State Nationalism and the Spectre of "Europe". In L. H. a. O. Wæver (Ed.), *European integration and national identity : the challenge of the Nordic states* (pp. 130-181). New York: Routledge.
- Treib, O., & Falkner, H. B. G. (2007). Modes of governance: towards a conceptual clarification *Journal of European Public Policy*, 14(1), 1-20.
- Tunander, Ola, 1999. The Uneasy Imbrications of Nation-State and NATO. The Case of Sweden, *Cooperation and Conflict* 32(2): 169–203.
- Umbach, G. (2009). *Intent and reality of the European employment strategy : Europeanisation of national employment policies and policy-making?* Baden-Baden: Nomos.
- Vifell, Å. (2004). Swedish employment policy and European guidelines. *Score rapportserie*(11).
- Wedin, L. (2006). The impact of EU capability targets and operational demands on defence concepts and planning : the case of Sweden In A. J. K. Bailes, G.

- Herolf & B. Sundelius (Eds.), *The Nordic countries and the European security and defence policy* (pp. 141-149). New York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Wedin, L. (2008). Northern Europe and the ESDP : the case of Sweden. In C. Archer (Ed.), *New security issues in Northern Europe : the Nordic and Baltic states and the ESDP* (pp. 38-55). New York: Routledge.
- Wheeler, N. J. (2000). *Saving strangers : humanitarian intervention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Wheeler, N., 2000. *Saving Strangers: Humanitarian Intervention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Widfeldt, A. (2004). Elite Collusion and Public Defiance: Sweden's Euro Referendum in 2003. *West European Politics*, 27(3), 503 - 517.
- Wivel, A. (2005). The Security Challenge of Small EU Member States: Interests, Identit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U as a Security Actor. *Journal of Common Market Studies*, 43(2), 393-412.
- Wong, R. (2005). The Europeanization of foreign policy In C. Hill & M. Smith (Ed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the European Union* (pp. 134-153.).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貳、中文部分：

- 甘逸驊，2006，〈歐洲安全與防衛政策的軍事層面：歐盟的全球戰略地位〉，《問題與研究》，第45卷第5期，頁111-136。
- 江宜樺，2002，〈公共領域中理性溝通的可能性〉，許紀霖主編，《公共性與公共知識份子》，江蘇人民出版社。
- 吳志成，王霞，2007，〈歐洲化:研究背景、界定及其與歐洲一體化的關係〉，《教學與研究》，6期，頁48-55。
- 吳萬寶，2001年，《西歐聯盟：一個軍事組織的變遷》，台北：五南。
- 吳萬寶，2003，《邁向歐盟建軍之路 歐盟共同歐洲安全暨防衛政策》，台北：韋伯國際。
- 吳萬寶，2009，《歐洲安全暨防衛政策與境外任務》，台北：天空數位圖書。
- 東京大學社會保障研究所著，張雪真譯，2004，《瑞典的社會保障制度》，台北：



生活家出版事業。

林萬億，1994，《福利國家－歷史比較的分析》，台北：巨流。

施世駿，2005，〈歐盟新治理模式與社會政策發展：「開放協調法」興起的歷史脈絡與政策意涵〉，《台灣社會福利學刊》，第四卷第一期，頁 1-52。

紀登斯(Anthony Giddens)著，簡惠美譯，1994年，《資本主義與現代社會理論：馬克思、涂爾幹、韋伯》，台北：遠流。

高鋒、時紅編著，2009，〈什麼是社會民主主義？〉，《瑞典社會民主主義模式-述評與文獻》，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

張菁芬，2005，《社會排除現象與對策：歐盟的經驗分析》，台北：松慧。

張嘉斌，2009，〈論歐盟安全暨防衛政策非軍事工具之建構與發展〉，《歐洲國際評論》，第三期，頁 45-74。

陳欣之，2003，〈國際關係理論：對現實主義的質疑〉，張亞中主編，《國際關係總論》，台北：揚智出版社。

陳勁，2004，《歐盟外交政策與對外關係》，台北：五南。

楊永明，1997，〈聯合國維持和平行動發展：冷戰後國際安全的轉變〉，《問題研究》，第 36 卷，第 11 期，頁 23-40。

鄭啓榮，2008，《全球視野下的歐盟共同外交和安全政策》，北京：世界知識。

藍玉春，2001，〈解析歐盟阿姆斯特丹條約〉，《政治科學論叢》，第 15 期，頁 15-44。

## 參、政府官方資料：

### 歐盟官方資料

Commission, (1997). The Way Forward: The European Employment Strategy, Contributions to and Outcome of the Dublin European Council, 13 and 14 December 1996. Brussels, DG Employment and Social Affairs.

Council (1996). 1996 Intergovernmental Conference (IGC '96): Reflection Group Report and Other reference for Documentary Purpose. Luxembourg, General Secretariat of the Council of the European Union

Council of the European Union, ESDP presidency Report, Annex II, "EU-UN

co-operation in Military Crisis Management Operations Elements of Implementation of the EU-UN Joint Declaration”, Brussels, 17-18 June 2004.

EU-NATO declaration on ESDP(Brussels), December 16, 2002

European Commission, (2005). Working together for growth and jobs A new start for the Lisbon Strategy, Communication from President Barroso in agreement with Vice-President Verheugen, COM (2005) 24, Brussels.

European Union, “European Security Strategy: A Secure Europe in a Better World,” Brussels, December 12, 2003.

Helsinki European Council, 10 and 11 December 1999: Presidency Conclusions

Kok, Wim and Dell’Aringa, Carlo and Lopez, Federico Duran and Ekström, Anna and Rodrigues, Maria João andPissarides, Christopher and Roux, Annette and Schmid, Günther, (2003). Jobs, jobs, jobs: creating more employment in Europe. European Commission Employment Taskforce, Brussels

Kok, Wim, (2004). Facing the challenge : The Lisbon strategy for growth and employment Report, the High Level Group.

Lisbon European Council 23-24.03.2000: Conclusions of the Presidency.

PES (1994) Party Leaders' Declaration, Essen, 7–8 December 1994.

Presidency Conclusions on the European Security and Defence Policy., Göteborg European Council 15.16 June 2001.

Presidency Conclusions Santa Maria da Feira European Council 19 and 20 June 2000., Appendix 4.

Presidency Conclusions, Barcelona European Council, 15-16 March 2002.

Presidency Conclusions, Brussels European Council Brussels, 29 October 1993.

Presidency Conclusions, Brussels European Council, 22-23 March 2005.

Presidency Conclusions, Dublin European Council, 29 March, 1996.

Presidency Conclusions, European Council meeting in Laeken 14 and 15 december 2001.

Presidency Conclusions, Lisbon European Council 23-24.03.2000.

Presidency Conclusions, Madrid European Council Madrid, 15-16 December 1995.

## 瑞典官方資料

Ministry of Defence, (1999). *The New Defence (Det nya försvaret)- A short version of*

Ministry of Defence, (2004). Our Future Defence– The focus of Swedish defence policy 2005–2007, Swedish Governmental Bill 2004 / 05:5, Stockholm: Ministry of Defence.

Ministry of Defence, (2004). Our Future Defence– The focus of Swedish Defence policy 2005–2007, Swedish Governmental Bill 2004 / 05:5, Stockholm: Ministry of Defence.

Ministry of Defence, (2009). A Functional Defence, Government Bill on the future focus of defence. A focus that extends over a five-year period, 2010–2014.

Ministry of Enterprise, Energy and Communications, (2003). Sweden's Action Plan for Employment 2003, Stockholm: Sweden.

Ministry of Enterprise, Energy and Communications, (2003). Sweden's Action Plan for Employment, Stockholm: Sweden.

Sweden, (1996). Note for July 1995 on the Fundamental Interests of Sweden with a View to the 1996 Intergovernmental Conference: Summary of Positions of the Member States of the European Union with a View to the 1996 Intergovernmental Conference. Brussels, European Parliament.

Swedish Armed Force, (2006). *The Facts 2006-2007*, Stockholm: Swedish Armed Force.

Swedish Defence Commission, (1999). A changing World – A Reformed Defence, (Executive Summary) Stockholm: Ministry of Defence.

Swedish Ministry for Foreign Affairs (2001) *Preventing Violent Conflict-Swedish Policy for the 21<sup>st</sup> Century*, Government Communication 2000/01:2, Stockholm: Ministry For Foreign Affairs

Swedish Ministry of Finance, (1996). Strengthening the Fight Against Unemployment: An Issue for the Intergovernmental Conference. Stockholm: Sweden. The Government Bill1999/2000:30, Stockholm: Ministry of Defence,

WHITE PAPER ON THE 1996 INTERGOVERNMENTAL CONFERENCE, Note of July 1995 on the fundamental interests of Sweden with a view to the 1996 IGC.